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廉兮 博士

「我」與「我們」：走在心懷鄰里的路徑上

Me and Us: Walking the Path of Neighborly Love and Care



研究生：游雅帆 撰

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Certificate of Approval of Examination Committee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

研究生 游雅帆 君所提之 論文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e Thesis Graduate Student Proposed

(題目) 「我」與「我們」:走在心懷鄰里的路徑上

Title

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口試，認為符合 博士 學位標準。

After evaluation and the oral examination by the committee members, the student complies with the PhD degree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The Convener of Examination Committee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委員

Committee Member

指導教授

Advising Professor

系主任

(所長)

Th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2 日

ROC

Year

Month

Date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學位論文原創性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THESIS/DISSERTATION ORIGINALITY

學位論文題目：「我」與「我們」：走在心懷鄰里的路徑上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Me and Us: Walking the Path of Neighborly Love and Care

本人在此聲明，所呈交的學位論文是在指導教授 廉兮 的指導下，由個人獨立研究所完成之最終版本。本人對論文內容負責，除了文中已經標註引用處的內容外，論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人已經發表或撰寫過的研究成果。對本研究及學位論文做出重要貢獻的個人和組織，均已在文中以明確方式標明。

該論文內容如有違反學術道德或學術規範的行為，如造假、變造、抄襲、研究成果重複發表或未適當引註、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不當作者列名等，本人願意承擔由此而產生的法律責任和法律後果。

I declare that the thesis/dissertation herein is the final version of my work, which is composed and accomplished individu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y supervisor, Prof. ○○-○○○○. I am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thesis/dissertation: It contains no research result that was previously published or written by another person.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ork of others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the text, and a list of references is given. Any contribution made by other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is explicitly acknowledged in the thesis/dissertation.

If any research misconduct, including fabrication, falsification, or plagiarism in proposing, performing, or reviewing research, or in reporting research results, is discovered in my thesis/dissertation, I am willing to bear correspond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nd all the results therefrom.

聲明人 Declarant：



日期 Date：2026/02/10

1140303 修訂



誌謝

這篇論文不是我一個人完成的作品，而是在許多關係裡——每一次一起做事、一起卡住、一起回看、一起修補——才讓那些原本只存在於撐住生活的拿捏，逐漸能被說清楚、被理解、也被承接。它之所以能成立，靠的不是一個人的能力，而是許多人在不同位置上，願意讓我靠近、願意與我對話，也願意在我還說不清楚的時候，陪我把經驗整理成可以被理解的語言。

首先要感謝牛犁的夥伴，以及居住在豐田地區的大家。謝謝你們讓我一直留在現場，不只讓我「做事」，也讓我學會「怎麼一起做」。你們把我放進關係裡；在日常的忙亂、衝突、疲憊與笑聲中，讓我看見知識其實是一起長出來的。若有些名字我選擇不逐一寫出，並非遺忘，而是出於尊重與保護；但你們的身影與教我的分寸，都在這篇文字裡。願我能把這份書寫再帶回現場，成為我們繼續同行的一點點工具，而不只是一本完成的論文。

接著，要感謝一路陪我把路走出來、亦師亦友的廉兮、夏林清、丘延亮、林香君、林慧絢以及夥伴雪霞。謝謝你們願意讀一篇很慢、很貼近生活、也不那麼工整的論文；你們給我的支持，是那種「不拆穿、不戳破、陪伴前行」的支持。更謝謝你們沒有急著替我下結論，而是在我快要慣性處理現場時，用提問、回看與定位，把我拉回到「我站在哪裡、我為誰說、我願意承擔什麼」的根本。你們給我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一種能在制度縫隙裡仍保有人的溫度的工作方法，讓我更有勇氣相信：把知識放回人、把行動放回生活，是值得的——不是軟弱，而是一條需要堅持的路。

在這些同行之中，我想特別把一段致謝留給我的指導教授廉兮。謝謝你在我最懷疑自己、最難把話說清楚的時候，願意接住我。你一次次提醒我回到人、回到生活：我在寫的不是概念，而是關係如何被撐住、日常如何被做出來。你給我的不只是書本與文本的指引，更是一種同行的示範——你怎麼走進現場、怎麼聽、怎麼問、怎麼在制度與關係的拉扯裡仍守住人的尊嚴。因為你，我更敢相信：把知識放回人、把行動放回生活，不只值得，也確實可以被寫清楚、被傳遞，成為他人可以參照的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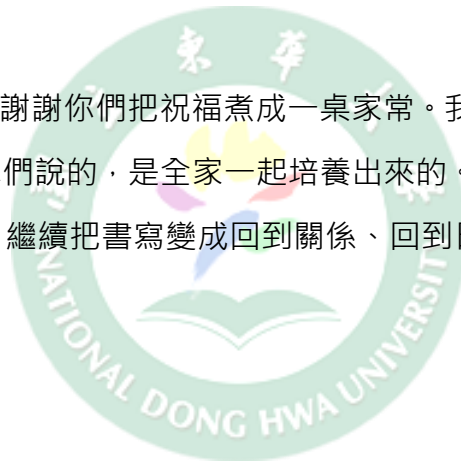
最後要謝謝我的家人。謝謝潘玉梅，我的母親，你的生命與我的生命交織成我理解世界的起點。也謝謝我的先生鈞弼。從我們婚後、家裡有了四個孩子開始，這二十一年我一路在社工現場、進修與書寫之間奔走；你不是在旁邊「幫忙」，而是把家真正接起來：讓日常能運作、讓孩子有人照顧、讓我不管多晚都還有地方可以回來。這

份支撐不只是生活後勤，更是一種關係上的允許——允許我在不確定裡慢慢找路、在疲憊時仍能再出發。

更重要的是，你也把自己放進這篇論文裡：願意敞開、願意自我揭露，讓我們的經驗不只停在「我怎麼做」，而能成為他人理解家庭、工作與社區關係如何被撐住的參照。你的坦誠讓這篇研究多了一個關鍵的倫理重量：不是把別人的故事拿來說，而是我們一起把自己的處境說清楚、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上。謝謝你用真心與勇氣，陪我把這段路走完。

還有牧晨、凡萱、富民、雯安，謝謝你們四個孩子。你們承受我的焦慮、忙亂與固執，也用你們的幽默、直白、甚至偶爾的抱怨，把我拉回日常。你們在我上課時等我、當我的專屬司機、為了誰去接送而拌嘴、在群組裡第一時間報喜——這些看起來很小的事，其實就是你們在陪我把路走完。謝謝你們陪我練習：把責任分出去、把關係留住。

也謝謝大姊、二姊，謝謝你們把祝福煮成一桌家常。我要說，這篇論文不是我一個人的完成，它真的像你們說的，是全家一起培養出來的。這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我會帶著你們給的力量，繼續把書寫變成回到關係、回到日常的一份回禮。



摘要

本研究以長期投入地方實踐的生命經驗為出發點，探討在現代社會中，當生活逐漸被制度、經濟與成長邏輯壓縮時，人如何在縫隙中撐住彼此，並重新為生活開展可持續的存在位置。研究並非以既定理論套用社區案例，而是從行動現場出發，透過生命敘事、行動反思與場域實踐，嘗試理解那長期被忽略、卻實際支撐社會運作的生活知識與實踐知識如何生成。

論文前半部聚焦於「後台建設」與「承擔」的生成，指出在制度資源不足或失能的情境下，許多支撐家庭、組織與社區運作的勞動，往往被隱匿於正式制度之外。這些後台工作不僅維繫了日常生活，也逐漸內化為行動者的倫理要求，使「承擔」成為回應關係的主要方式。然而，當承擔長期缺乏可分擔的結構與共同性支持時，便可能轉化為對自我高度要求的壓力，並在身體與情緒層面顯現其邊界。

進一步地，透過生命敘事與地方實踐的交織，分析從承擔到共生的轉向歷程，指出共生並非理念宣告，而是在不確定與反覆修補中，學習不再獨自承接，而是讓關係成為支撐力量的過程。以「豐田會」的實踐為例，論文說明當制度無法即時回應生活需求時，人們如何透過互助、協調與信任，暫時性地重組治理關係，形成一種由生活自身出發的集體回應。

在此脈絡下，本研究提出「家園經濟」作為理解上述實踐的重要視角。家園經濟並非一套替代性經濟模式的設計藍圖，而是一種對早已存在於生活之中的實踐重新命名的嘗試。它所回應的核心問題在於：當經濟被放置於不該在的位置，反過來支配生活本身時，人如何重新將生活放回中心。相較於以獲利與擴張為導向的經濟邏輯，家園經濟更關注人如何一起生活、資源如何不被耗盡，以及人如何與自然共存。

總結而言，本研究主張「實踐走在理論之前」的研究立場，拒絕以單一理論框架預設行動的意義，而是在實踐中生成理解，在行動中形塑思想。「心懷鄰里」、「地方實踐」與「家園經濟」三者，構成一種彼此關連的實踐取向，使生活得以在制度縫隙中持續被撐住。研究試圖指出，在拒絕只有一種秩序被允許存在的前提下，如何為多種生活方式保留被理解、被承接，並得以延續的可能。

關鍵字：行動研究、社區工作、生命敘事、共生、手工知識、實踐知識、家園經濟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long-term engagement in local practice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explores how people sustain one another and re-open possibilities for a livable and sustainable existen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ere everyday life is increasingly compressed by institutional systems,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logics of growth. Rather than applying established theories to community cases, this research begins from the site of action itself. Through life narratives, reflective practice, and situated action, it seeks to understand how forms of life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knowledge—often overlooked yet fundamental to sustaining social operations—are generated and enacted.

The first half of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what is termed “backstag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ethic of “bearing responsibility.” It argues that under conditions where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are insufficient or dysfunctional, much of the labor that sustains families,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is rendered invisible and excluded from formal systems. These backstage practices not only maintain everyday life but are gradually internalized as ethical demands placed upon actors, making responsibility-bearing a primary mode of responding to relationships. However, when such responsibility lacks shared structures and collective support over time, it can turn into excessive self-demand, revealing its limits at the bodily and emotional levels.

Through an interweaving of life narratives and local practices,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transition from bearing responsibility to co-existence. Co-existence is not presented as an ideological declaration, but as a process of learning—amid uncertainty and continual repair—not to carry everything alone, but to allow relationships themselves to become sources of support. Using the practice of the Fengtian Collective as an example, the thesis illustrates how, when institutional systems fail to respond promptly to lived needs, people temporarily reconfigure governance relations through mutual aid, negotiation, and trust, forming a collective response grounded in everyday life.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Homeland Economy” as a key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practices. The homeplace economy is not a blueprint for an alternative economic system, but an attempt to rename practices that have long existed within everyday life. The central question it addresses is this: when the economy is placed where it does not belong and comes to dominate life itself, how can life be re-centered? In contrast to economic logics

driven by profit and expansion, the homeland economy emphasizes how people live together, how resources are sustained rather than depleted, and how humans coexist with nature.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position that practice precedes theory. It resists imposing a sing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predefine the meaning of action, instead generating understanding through practice and shaping thought through action. “Holding the neighborhood in one’s heart,” “local practice,” and “The homeplace economy” together constitute an interconnected practical orientation through which life continues to be sustained within the crack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is study ultimately seeks to demonstrate how, by rejecting the premise that only one social order is allowed to exist, space can be preserved for multiple ways of living to be understood, supported, and carried forward.

Keywords : Action Research; Community Development Work; Life Narrative; Co-existence; Craft Knowledge; Practical Knowledge; The homeplace Economy.



目錄

摘要	III
Abstract	V
目錄	VII
表次	X
圖次	X
第一章 從事業到志業：一個行動者的回望	2
第一節 一場行動實踐的開場	3
一、 為何行動？我是誰？從命名開始說起	4
二、 從地方的互動與經驗中，長出屬於自己的方法與路徑	6
第二節 從交易邏輯到關係倫理的轉化	7
第三節 讓知識回到人，讓行動回到生活	9
第四節 視框分析：實踐知識	10
一、 視框移動分析	10
二、 在行動中生成的一種研究方式	19
三、 方法論的整體收束	22
第五節 小結	22
第六節 論文各章節安排	23
第二章 裂縫中的知識：從勞動到行動倫理	26
第一節 勞動的身體記憶	26
一、 勞動經驗與生命態度	27
二、 從生命勞動史到社區工作的張力與同行	31
三、 從高強度勞動節奏到關係倫理的轉向	32
第二節 母女在裂縫中縫補生活	33
一、 以下是母親的伴侶順序：	34
二、 以下是潘玉梅所生的子女簡要介紹	35
三、 潘玉梅與游雅帆：生命交疊與行動倫理	36
第三節 家庭與地方的行動倫理	40
一、 裂縫中彼此縫補、共生前行的實踐	40
二、 家人的縫補：極限中的分工與韌性	42
第四節 補償到承擔：鈞弼的地方實踐	43
第五節 裂縫，就是我行動的起點	45
第六節 小結	46
第三章 從培力到手工倫理的「行動的分寸軸」	48
第一節 社區營造與現實矛盾	49
一、 分一杯羹：從地方實踐中看見的掙扎	51
二、 被切割的整合：夥伴工作的真實現場	52

第二節 從「地方培力」到「知識體」的生成	55
三、 在裂縫中看見價值	56
第三節 從「培力的正義」到實踐知識的學習	60
一、 從「揭露不公」到「重製權力」	61
二、 從「培力的正義」到「實踐知識的學習」	62
三、 小默的工作內容記錄節錄	63
四、 彼此需要被理解、被成全	68
五、 責任的內化與關係的倫理	69
第四節 從生業到志業的回返——重讀貧窮文化後的培力轉向	70
第五節 社區行動中的關係、倫理與覺察	73
一、 關係的修練：從危機到連結的行動	73
二、 在矛盾中同行的社區行動——小孟	76
三、 臨界的邊界：從危機照顧到關係治理的倫理	81
第六節 小結	85
一、 「行動的分寸軸」的意涵	85
二、 從手工倫理到可參照的經驗	86
第四章 在關係中重新理解「成功」與「成長」	88
第一節 從遷移的女孩到成為夥伴——雪霞	88
一、 行動中反思	90
二、 再行動：在南香事件中的共學與鬆動	91
三、 持續鬆動的「我們」——行動中的再學習與倫理生成	94
第二節 兩代工作者——阿玉與小明	96
第三節 不同時間的視角看見	98
一、 工作紀錄	99
二、 我在不同階段的「工作價值」變化軸線	102
第四節 留一點餘地：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學習分寸	103
一、 游雅帆的多重置身	104
二、 我的 24 小時：在生活的節奏裡學習理解他人	108
三、 在多重置身之中練習理解	110
第五節 敘事作為方法：從自我書寫到對話與協商	111
一、 敘事的社會位置：在圖像與故事之間聽見彼此	112
二、 生命拼貼作為方法：在手工與敘事之間生成理解	115
三、 從自我書寫到對話的學習：靠近的艱辛	122
第六節 小結	123
第五章 行動與韌性的倫理：在破裂中織回關係的力量	126
第一節 第一代社區工作的行動模式	126
一、 我們親身走過的「作用力衝突」	127
二、 用「個人的能力」來看成功，其實會把人越推越累	128

三、	這不是能力問題，是孤單的問題.....	130
第二節	從初哀到勞基法.....	131
一、	牛犁成立初哀.....	131
二、	從「像家一樣」的協會，到「組織化」的協會.....	133
三、	教育政治視角下的社區組織轉骨.....	139
第三節	社區中的看不見的邊界線.....	140
一、	從邊界看到主體性：能力未被看見的小卡.....	141
二、	兩位榮民的生存戰術.....	144
三、	被忽略的位置與社區邊界的再生產.....	146
第四節	小結.....	149
一、	從「工作紀錄」到「知識文本」.....	150
二、	閱讀之後.....	150
三、	在破裂中把「我們」織回來.....	151
第六章	調整中的社區路徑——家園經濟.....	154
第一節	「後台建設」：從被撐住到撐住他人.....	154
一、	行動生成的軌跡.....	155
二、	匱乏中形成的生存邏輯.....	156
三、	身份認同.....	163
四、	在洪水之中撐住彼此：制度啟動前的行動能力.....	166
第二節	從承擔到共生：一段不再孤立的生命敘事.....	169
一、	不安與承擔的生長史.....	169
二、	從承擔內化成一種價值而內耗.....	172
三、	共同性的崩解——再次孤獨.....	174
四、	濕地：一個可以呼吸的地方.....	175
五、	讓「一起」站得住的實踐知識社群.....	182
第三節	豐田會：從制度失能開始.....	186
一、	海葵颱風那一夜，發生了什麼事.....	187
二、	為什麼只能自救.....	188
三、	豐田會防災工作坊-豐田防災手冊.....	189
四、	從預防到外援：豐田會救災網絡的形成與行動.....	191
第四節	一直都在的家園經濟.....	192
一、	隱在牛犁的循環經濟.....	193
二、	用行動與社區對話——家園經濟.....	194
三、	緩慢行動中的辨識與共創.....	197
第五節	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	198
一、	何謂生活知識：不是技巧清單，而是可延續的分寸.....	199
二、	三個生命敘事：知識的來源與行動的脈絡.....	200
三、	從理解到承接：生命敘事作為公共行動.....	202

第六節 小結	203
第七章 結論：從「我」到「我們」的知識生成路徑	206
第一節 路徑型結論：在關係縫隙中生成的知識與倫理	206
第二節 結論：在行動中生成—實踐知識	207
第三節 行動的條件限制與結論	210
一、 行動的條件限制	210
二、 本研究的貢獻	211
三、 研究的定位與後續方向	211
參考文獻	213
中文文獻	213
英文文獻	215
附錄	217
附錄一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簡介	217
附錄二 牛犁女性社區工作實踐與學習歷程	223
附錄三 2006 年~2009 年每週午餐會報（佐證資料）	227
附錄四 豐田防災手冊	229
附錄五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服務學習課程	230

表次

表 一 研究者勞動經驗	27
表 二 研究者母親的婚與狀態	34
表 三 研究者的兄弟姊妹狀態	35
表 四 小默社區工作實踐與學習歷程：以領到證書為依據	67
表 五 研究者工作價值的轉變	102
表 六 鈞弼的工作態度	102
表 七 研究者的多重置身分	104
表 八 研究者一天行程	108

圖次

圖 一 實踐知識作為方向感的認識論運作圖（羅盤／方向場）	20
圖 二 研究者母親/潘玉梅與研究者/游雅帆的生命交疊	39
圖 三 國內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發展歷程	48
圖 四 當天慧絢與廉兮帶領大家討論的書寫	92
圖 五 阿玉透過自繪圖象敘說在牛犁工作的感受	97
圖 六 現場工作的責任分工機制	100
圖 七 雪霞的 4 格敘事圖像	114
圖 八 阿公阿嬤的敘事圖像	114
圖 九 敘說藝術-生命拼貼——懷舊模組	122

圖 十 豐田三村防災地圖	190
圖 十一 豐山村簡易疏散避難圖	190
圖 一二 香港理工大學經費分配圖	194





第一章 從事業到志業：一個行動者的回望

如果人不說自己的故事，世界就只剩下管理者在說話

有些故事，需要被慢慢走過，在相伴中漸漸被理解。

我這篇博士論文的起點，不是從正式的學術訓練開始，而是從我童年與成長過程中反覆經驗的勞動與生活實踐出發。從小在原生家庭中承擔照顧與勞動的角色，我學到的不是課本知識，而是一種在現場、隨機應變、邊做邊學的「手工知識」，它塑造了我看世界與看待社會的方式，也成為我今天學術研究的根基。

這些非正式的學習經驗包括：童年在家庭與社區裡的早期勞動、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摸索生活策略、透過身體與人際網絡累積出的經驗智慧。這些過程讓我敏銳地感受到：社會中的許多不平等並非單純數據或理論可以描述，而是具體存在於人們的生活軌跡之中，特別是在那些被主流話語忽略的群體之間。

這是我個人脈絡的交代，既是對我自身生命史的誠實，也是我研究方法論的一部分，因為只有承認自己是如何被塑造、如何學習，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生活處境，並在學術語言與實踐現場之間搭起橋樑。社區工作，已經成為我一生的事業體，也是我願意用餘生去實踐的志業。曾經的我，深信只要努力、只要投入，就能改變現實。社區工作成了我的事業，也成了我對世界的回應。前半生的行動，多半出於功能與效率的思維，滿足資本家的需求、順應國家的期待，讓自己看起來可靠、能幹、有價值。

那時我以為這就是實踐，但後來才明白，這樣的努力，其實讓我成了制度的一部分，也讓我逐漸失去與人相處的溫度。真正的行動，不該只是完成任務，而是創造有溫度的關係。我渴望讓人與人之間能彼此依靠、互相支持，讓生活本身成為學習與成長的場域。當居民的能動性與韌性能在互動中被看見，我們共同走過的那些經驗，就會長成屬於「我們」的知識體。那是集體生成的智慧，會在日後成為行動的依據，不再需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隱忍¹，而能光明正大的說：我們正在一起創造更好的生活。

如今牛犁協會²已有二十多位有薪的工作者，這讓我深刻感受到，在《勞基法》

¹ 在體制語言裡回應成果，在真實生活中守住人與人的溫度，讓信任成為真正的指標。

²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的框架下，勞動條件不只是制度上的保障，更是關係再造的開始。在法律與制度的邊界裡，我們學習如何建立有溫度的工作文化，讓每一份勞動都能被尊重，讓彼此的付出都能有被看見的價值。那是一種更成熟的社區互動層次，一種能在秩序裡仍保有情感的工作方式。

在我的行動背後，藏著一段長久的怨懟，那是我對母親的情結。多年來，用高密度、無縫銜接的工作方式，我背負著對她的誤解與不滿，也在這些情緒的糾結裡，看見自己如何在社區工作中，不斷重演那份控制與被控制的慣性。我的原生家庭讓我學會以刺蝟的方式與人相處。我敏感、容易受傷，也因為不安全感而武裝自己。婚後，這樣的性格延伸到與先生、孩子、朋友、夥伴的互動中。易怒、愛計較、防衛、貪婪，這些我不願面對的特質，成了我生命的印記。每當我過於追求「成功」的樣貌，或想讓事情「如我所願」地進行時，心與身都會再度受傷。於是我不斷提醒自己；覺察不是一次的領悟，而是一場持續的練習。

我在一次次的對話、衝突與修正裡學習，看見自己的社會位置、情緒來源與行動邏輯。當我能意識到行動發生的條件與關係，就能重新設計自己的反應。這樣的訓練，讓我從「行動者」成為「覺醒者」。三十年來，我在社區的道路上跌跌撞撞，迷失、掙扎、重返、再出發。我看見太多人的故事有自己的影子。清楚行動不只是工作，而是一趟面對生命的旅程。

社區工作，對我而言，早已不只是「服務」或「職業」。它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學習與他人相處、與自己和解的方式。在陪伴與扶持的路上，我學會讓行動更溫柔，讓制度裡仍有情感的縫隙，讓我自己也不再那麼為難自己與他人。也許，這才是我真正想走的路，一條從理解走向共生、從責任走向愛的路。當我能帶著平靜與喜樂繼續前行，也許，那就是我與母親、與夥伴、與社區，終於一起抵達的地方。

第一節 一場行動實踐的開場

我的研究以手工知識為根、關係為土壤的行動實踐。意圖為整體研究 / 行動書寫定錨：我從何處出發、與誰同行、在什麼倫理與知識位置上開展行動？對我來說，命名不是裝飾性的標題，而是進場姿態與價值宣示。它牽動我與母親、社區婦女、行動夥伴之間的關係理解，也形塑此研究如何處理「底層處境與群體互動的公共性」的辯證。

「手工知識」在此指涉一種從生活勞動、身體實作、關係交織中慢慢長出的在地智慧；它是邊做邊學、邊錯估邊修補、在匱乏中摸索可行之道的知識形式。而「關係為土壤」提醒我們：任何知識若離開了人與人彼此倚靠的網絡，就失去了滋養與再生能力。本章藉命名歷程的梳理，說明我如何從個人受苦的生命史，轉向與鄰里共構、並在行動中生成韌性知識與手工知識的過程。

一、為何行動？我是誰？從命名開始說起

在論文計畫考時研究論文題目時，丘延亮提醒我「自我救贖-走在心懷鄰里的路徑上」太抽象與太學術了；或許「從『我』到『我們』：如何心懷鄰里的路徑」更貼近日常。這提醒讓我內心一震：原來標題會牽動整個行動基底。回望我的行動歷程，那些艱辛究竟為了什麼？我要向誰說？為何要說？我站在哪個知識位置發聲？以什麼姿態展現？

在真正動筆之前，我用了一整年在思考：我必須先透過命名，定位自己進場書寫的身分與倫理立場。以下整理我在命名過程中的幾次轉折，也藉此釐清我與母親、與社區、與夥伴之間交織出的價值位置。

（一）命名一：從「我」到「我們」：如何心懷鄰里的路徑（資格考時構想，後未採用）

初衷：從「我」到「我們」-如何心懷鄰里的路徑：一直是我博士論文到資格考時的命名，從個人出發 → 進入社會關係 → 參與集體實踐 → 回返自我反思的螺旋式歷程。強調「我」不是孤立的行動者，承認自己的有限性與他人的重要性，而是在與「我們」互動中被形塑與再造的學習主體。

價值態度：展現拒絕單向度的助人或倡議，而是一種更謙卑的關係邏輯，且我並不是先知或領導者，而是從自身困頓與傷痕出發，一路與他人共行，才逐漸辨識出我們的方向與可能。

為何不採用：「如何」一詞把焦點放在方法與步驟，好像我還在探索要怎麼走進去；然而事實上，我已經踩在路上，正在行走、正在實踐。此命名的語感仍停留在「待進入」階段，與我當下「已在其中」的身體經驗略有落差。

（二）命名二：自我救贖：走在心懷鄰里的路徑上（亦未採用）

命名歷程：資格考後在完成計畫考時，許多的書寫不斷堆疊進來時，論文書寫不僅是讓我解脫苦難，更是從童年去剖開自我的生命傷痕、貧窮、階級內化、兩代家庭壓力中出發，重新看見自己的歷史與行動位置，也對母親的理解與重新詮釋、貧窮與生存邏輯所帶來的反身辨識與療癒，在一次次生活斷裂之中看見壓迫與被壓迫、錯估、受傷進而學習與他人同行的韌性知識。「自我救贖」就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的語彙。

為何不採用：「自我救贖」將焦點過度集中在個人療癒，易遮蔽母親、鄰里、夥伴之間交互生成的集體面向，容易讓閱讀者誤以為本文以主體轉化為終點；然而我真正想呈現的是「家與母親的交織」，那像一張由多重關係手工編織而成的知識網。此研究的核心不在個體解脫，而在群體交織、同行與公共性的逐步展現。我並不是用自我救贖的位置上來書寫，因此這命名也不採用。

（三）命名三：「我」與「我們」：走在心懷鄰里的路徑（本研究採用）

這個命名比較能同時承載我個人生命經驗、群體如何生成、倫理姿態與行動的開放性，也是我的研究動機，去想這些經驗怎麼影響我看世界、做事情的方式。更想弄清楚「知識」是怎麼在人與人的互動、彼此的關係裡，一點一點被創造出來的，符合我的論文的目的與問題意識。

我：具體、受過生命磨損的身體與歷史：「我」出身底層，帶著貧窮、勞動、被照顧與照顧他人的交錯經驗；也是在教育、社區實踐中持續學習、帶傷前行的行動者。此「我」永遠不純粹，永遠與他者纏繞交織。

我們：不斷形成中的關係網絡：「我們」不是既定群體，而是在互動中生成、在行動中重組的共同體。包含了鄰里、社群、行動者、照顧者、母女、婦女團體等多重角色。此「我們」保留張力：沒有人完全帶領，也沒有人單向被改變；同行關係中彼此觀看、互動、交織，如同不停被織補的布面。

走在：正在發生的生活政治：我不是論述某個完成式成果，而是在描述一段持續中的行動。走在 = 身體在場、實踐參與、邊走邊學；是未完成、可修正、可討論的歷程敘事。

心懷鄰里：倫理姿態與行動選擇：重點不在「服務」或「治理」，而是在鄰里網絡中共存、共感、互為支撐；是將他人放心上的生活倫理，也是一種回應底層處境的政治敏感度。

路徑：不是終點，而是可被走出的痕跡：我關心的，不是先設定一個目標再去衡量成果，而是專注在行動過程中踩出的每一步線索是怎麼開始、與誰同行、何處受阻、如何繞路、哪些臨時結盟、哪些裂痕需要縫補。這種「路徑」的思考方式，就像手工知識一樣，是在邊做邊調、錯了再補的歷程中慢慢成形的。

二、從地方的互動與經驗中，長出屬於自己的方法與路徑

當我與母親、與社區的女性或其他夥伴，在彼此生命裡交織起失落與抵抗的記憶時，我們追求的不再是一個明確的「改變目標」，而是學習如何在彼此身邊，共同走出一條能被實際踩出的路。這是一條心懷鄰里之人、一邊掙扎一邊前行的路，關注的重點在於共構的歷程與關係如何相互編織。這也是一場以手工知識為根、以關係為土壤的實踐：在不穩定與匱乏中，我們一點一點累積韌性，把碎裂的生命編成可以同行的織品。

在地方工作中，以下的視角尤其重要，首先、社區工作的基底是關係型的；社區不是靠單一專家或制度運作，是居民、工作者、政府、NGO 等多方在互動中彼此影響、彼此學習。若忽略知識在這些關係中如何生成，就容易只套用外來理論，錯失地方自身的智慧與方法。

其次決策與行動的正當性來自關係中的共構；一個社區行動能否被接受、能否持續，取決於參與者是否「認同」並「共同創造」這些想法。單向輸出的知識往往落地困難；反之，透過互動共構出來的知識，更容易被行動者認領與實踐。

最後讓社區發展有機成長，而不是被外力「移植」；很多社區計畫失敗，是因為硬套外面的成功案例，卻不符合當地生活邏輯。透過關係生成的知識，方案能反映在地人的真實處境與需求，使發展是「長出來的」，而不是「搬進來的」。

因此，探問「知識如何在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中被一點一點創造出來」，不只是學術上的興趣，更是理解社區行動生命力的關鍵。它提醒我們，社區工作不應成為外來規劃的套版，而要從地方的互動與經驗中，長出屬於自己的方法與路徑。

第二節 從交易邏輯到關係倫理的轉化

我的社區實踐，始於一個極為現實的盤算：社區營造是否能為我們這群生活在邊緣的婦女，創造一個可以解決生計、可學習、有網絡的公共參與機會？作為照顧者、母親，也是家庭經濟的支柱，我的起心動念並不來自政策理想，而是源自對於貧窮處境的深刻經驗與記憶。這樣的社區工作，是整個人際關係被深刻地嵌入在交換與利益計算中。

從原生家庭開始，明白「無資源者」在體制中如何無聲、無權、無望。我的母親從未擁有過安身立命的工作，也未曾得到制度性支持，讓我們一家長期游走於社會安全網之外。成年後，我自己也因家族債務糾葛，帶著一家人輾轉遷移尋找那個能夠落腳、安頓的地方，直到最終落腳花蓮豐田。在這裡，我看見了社區工作的另一種可能。它不只是志願服務，而是一條能讓我與身邊的婦女透過「有給職」的方式，重新連結社會、找回能動性的實踐之路。

我從七歲就開始打工，到如今已超過五十五年，做過形形色色的雇傭工作。三十五歲以前，我搬過二十次家，每一次的搬遷、每一次換工作，都像是在提醒我：生活沒有穩定這回事。這些勞動與漂泊的經驗，在心底種下了一顆「不安全」的種子。我總覺得，一旦手上有了餘裕，不管是錢還是時間，事情就一定會出差錯。因此，我幾乎從不允許自己鬆懈下來，哪怕是普通的一天，也活得像隨時要面對危機。焦慮與擔心成了我日常的生活基底。

婚前如此，婚後依然。嫁給軍人，外人以為有保障，卻絲毫沒有減輕那份經濟壓力。對我而言，「下一餐在哪裡」的恐懼始終盤踞在心頭。來自原生家庭的求援電話從不間斷：有人出事、有人病倒、有人毒品買賣、有人未成年懷孕。甚至還要處理家人因感情糾紛、法律糾紛而向我借錢的困境。每一次求助都像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而這些年，感覺幾乎都是我獨自扛起了娘家所有的風浪。那種日子，不只是辛苦，而是長期活在「下一刻會出事」的預感裡，沒有真正的安全感，沒有真正的休息。

因此，當我踏入社區工作領域時，心裡其實懷著前所未有的期待：這或許是我翻轉人生的機會。社區工作有政府支持，即使嘗試失敗，也不必自己承擔金錢損失，對長年在不安與風險中打轉的我而言，這幾乎是夢想中的「美好工作」。然而，即

便進入了這個領域，我的思維依然延續著過去的模式。從小到大，無論對家人、親人，甚至社區夥伴，我總是以「我提供什麼」和「他們回應什麼」來衡量一段關係。我的人生經驗告訴我：世上不存在真正無條件的付出，每一份給予，背後總有交易。

這樣的認知一直牢牢佔據著我，直到生命中出現了幾個人，開始鬆動這道心牆。1982 年，我遇見了鈞弼(也就是我的先生)，他物慾極低，總是先想到別人，甚至常常不為自己打算。那是我第一次真切看見，一個人可以如此不計得失。到了 52 歲，在課堂上遇見了廉兮老師。即使明知我們學生的問題層出不窮，她從不揭穿、不批判，只是靜靜地陪伴。還記得在我準備資格考時，廉兮對我說：「我會想辦法跟你一起把這條路走完。」那一刻，我的心被觸動；原來，這世界真的可能存在，不求交易、只是單純站在你身邊的人。從那時起，我才開始明白，關係不必只是計算與交易，也可以建立在真心與信任之上。這份領悟，讓我在社區工作的路上，從習慣的「交易邏輯」，慢慢轉向「關係倫理」去看見人、回應人，而不僅是衡量付出與收穫。

我在閱讀林香君(2015：193)〈立於實踐〉：「...突發一場被診斷為『躁鬱症』住院又在半年後經歷一個自發性跳躍質變從此未再復發的改變過程的文章.....」看她如何真誠地書寫自己的轉變；我看見阿肥(丘延亮)在讀書會上的那份誠摯、想與我們同行的熱情與對生命的急迫感；也聽到夏林清老師分享她如何在生命的困頓中，一點點完成轉化；慧絢選擇將雙腳踩下與我們同行。那時我心裡想：「他們真的比我還勇敢。」這些經驗，像一股股溫暖的水流，慢慢滲進我長年僵硬的防衛系統。正是他們的「不拆穿」、「不戳破」、「陪伴前行」，讓我逐漸打開那層深埋在身體裡的保護殼。我開始嘗試，嘗試「信任」，嘗試相信這世界也可能有不求回報的真心。我開始願意與人同行，也願意學習「去愛別人看看」。這不是抽象的道理，而是一種用身體感覺到的知識，透過一次次真實的關係經驗，我慢慢學會了信任與陪伴的實踐智慧。回望自己，我漸漸明白，過去那些防衛與猜忌，並不是冷漠或刻意的距離，而是來自「太努力」、「太怕失去」、「太想保護自己」的生命習性。

那是一道長年累積的心理堡壘，背後是持續不斷的生存焦慮。然而，在幾段真誠而穩定的關係中，我慢慢鬆動了自己。從工具性的「交換邏輯」中走出來，轉向「關係倫理」的實踐，我發現，那並不是一種失去，而是一種獲得；獲得了能夠與人共感、共行的力量。這是一條從以自我為中心，走向對他人關懷與共感的學習之

路。它不是來自課本、也不是專業制度能教的，而是在一次次生活現場的情感勞動、身體實作與關係碰撞中，一針一線編織出來的。這樣的學習，正是一種「手工式的知識生成」是慢也需要時間、無法複製，卻真實而有溫度。它讓我從不信任，到終於打開心門，學會在關係中安放自己。

也正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驗，我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寫這篇論文，它不是一份遠離現場的學術作業，而是承載著我在關係中被改變、被打開的歷程。對我來說，書寫不只是整理資料或分析案例，而是一種回到現場、回到那些情感交織與行動發生的地方，去觸摸知識是如何在人與人的互動中被一點一點編織出來的過程。

這份力量來自真實經驗的支撐，使我能避免流於空泛的討論，而是用生命去回應研究問題，不只是「研究關於什麼」，更是「我為什麼要研究、我從哪裡說話」。正因如此，我的論文才能在理論與經驗之間搭起一座橋，把手工式的知識生成與社區實踐緊緊相連。

第三節 讓知識回到人，讓行動回到生活

這一章的書寫，其實是一趟回到自己生命現場的旅程。不是為了證明什麼理論，而是為了回望：我如何在生活與勞動之間，慢慢學會理解世界，也學會理解自己。那些童年裡的家務、照顧、打工與調度，不只是勞動經驗，它們其實是我最早的學習現場。那是一種沒有老師、沒有教材、卻讓人長出判斷力與韌性的學習。後來我才明白，那也是一種知識，一種「從做中學」的手工知識。

這樣的知識不追求完美，而是靠錯誤、修補與關係來成形。它不在學院裡，而在日常裡；不在政策文件裡，而在彼此照顧、彼此看見的細節裡。我開始明白，社區裡那些能讓人安頓的力量，並不是來自專業的設計，而是來自願意傾聽、願意一起面對困難的人。

從這樣的經驗出發，我對「專業」有了新的理解。所謂專業，若只是被制度框限、被效率衡量，它很容易讓助人的工作變成一種控制、控制時間、控制情緒、甚至控制關係。而我在現場看見的，是另一種可能：當我們把焦點放回人、回到關係，專業才會重新有溫度。那不只是技術的專業，而是一種以人為本、以關係為師的實踐。

於是我更確信，「學習」不只是接受知識，而是參與世界；「助人」也不只是給

予，而是共同生成。這樣的學習和工作方式，讓我逐漸從「執行者」變成「行動者」，從服從制度的人，變成能與他人共同創造現場意義的人。

在閱讀丘延亮 (2014)〈實踐永遠在理論的前頭〉，接住一個重要的提醒：丘延亮指出，夏林清的行動研究之所以有力量，正在於它不是先有理論再去套用，而是先去做、在地、帶著政治位置往前推；在現場邊做邊學，讓理解在經驗中生成。

而自我敘事本身亦是一種社會實踐，能使人重新看見自己如何嵌入關係與社會脈絡之中。丘延亮以「百衲師」比喻那些依靠經驗、修補與臨場判斷前進的人，這正是我所熟悉、也願意承擔的學習方式。

然而，丘延亮同時提醒：若缺少「更慢、更細」的拆解與釐清，實踐的複雜性很容易在快速命名中被壓扁，甚至被管理式語言收編。這使我更明白：知識不是單向灌輸，而是在關係中互動、在共同承擔中生成；學習不是「被教會」，而是「一起生成」。也因此，助人者必須保持自覺，不讓專業制度替我們下結論，不讓管理邏輯接管判斷，而是願意與人同行、與現場共同呼吸，讓那些看似混亂、矛盾、難以說清的經驗，被耐心地保留下來，並被反省性地整理成可被承接的理解。

基於此，本論文的書寫不僅是個人經驗的回望，更是方法論的選擇：我以自己的勞動史與情感史為入口，嘗試把「我」從個人故事推向「我們」的社會知識；並在書寫中刻意放慢，讓經驗得以被拆開、被對照、被釐清，讓「慢、細、拆開、反省、避免被管理語言收掉」更明確地長在段落裡。

這樣的知識是慢的、溫的、帶著傷痕的，也正因如此更真實、更有韌性。總結而言，本論文對我最重要的啟示是：知識必須回到人，行動必須回到生活；唯有在關係與經驗之中，我們才能重新看見，學習不是距離現實的理解，而是活在當下的實踐；助人不是職業任務，而是與他人共同尋找生存之道的過程。即使緩慢、甚至混亂，正是在一點一滴的摸索裡，我們才重新織回人的尊嚴與社群的力量，形成一種能共同活下去的韌性。

第四節 視框分析：實踐知識

一、視框移動分析

本節以「視框移動分析」作為全文的前導，聚焦我如何在三個互相牽動的視角

中改寫理解：手工知識、生命敘事與家園經濟。對我而言，視框不是抽象理論，而是入場時決定我「看見什麼、忽略什麼、如何介入」的工作方式。

首先，「手工知識」讓我把行動從「把事情做完」移到「在制度縫隙裡撐出可行空間」：方案不再只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而是撐開皺摺、插針埋樁、拼裝補綴的工法，並且常在協作與承擔中被磨出分寸。

其次，「生命敘事」使我不再把經驗寫成一次性的故事重述，而是回到自我敘說與視框分析，照見我如何框定當事人與情境、如何形成介入設定、以及這些設定帶來的後果（夏林清，2004a：142-143）；同時以結構與庶民站位避免把弱勢快速寫成「問題—解方」。

最後，「家園經濟」把我的注意力從產業或方案績效，拉回共同生活如何被治理：在制度撐不到時，人們如何透過分工、互助、照顧與共享資源，把日子持續運轉，並在關係中協商「如何一起活下來、如何生活」（米尼奧羅，2021：90；廉兮，2014：83）。以下我將以案例呈現：這三個視框如何彼此映照、推動我的理解轉向，並把「撐住生活」的判斷整理為可對話、可承接的實踐知識。

（一）手工知識作為視框：協助我進入現場的理解

讀完夏林清與丁乃非及丘延亮的互文對話，我才懂「手工知識」不是用來說明別人的標籤，而是一副陪我入場的眼鏡（夏林清，2006a；丘延亮，2006）。它讓我在制度來不及、資源不對等時，不急著把人寫成問題，而先看見關係怎麼撐、分工怎麼調、哪些小小的拼裝與補綴讓日子繼續。也因此，我開始把這些分寸寫成可被對話、可被承接的實踐知識。

1. 手工知識不是一個人想出來的，是一群「協作」磨出來的

我對「手工知識」的理解，並不是先把概念定義好，再拿去套用田野；相反地，它是在閱讀夏林清、丁乃非、丘延亮三篇互文對話，並再回到夏林清的作者回應之後，逐步形成的一個觀看框架：讓我在進入現場時，開始用不同的尺度辨識行動、理解方案、也重新評估「有效」究竟指向什麼。夏林清（2006a）在〈在地人形〉把心理教育工作者置於「政治歷史皺摺」之中，指出在皺摺裡工作，必須「經由方

案的操作得出一股力道，撐開皺摺，辨識出『在地人形』的發展方向(夏林清，2006a：201)。這一句話讓我第一次把「方案」從「解決問題的工具」移開：方案不再是答案本身，而是用來撐開局面、看見縫隙的操作媒介。也因此，我後來在現場不再急著把事情做完、把流程補齊，而更在意：此刻的介入是否真的撐出了可行的空間，是否讓關係還能繼續被接住、被協作。

同一篇文章裡，夏林清借引他人語彙，談到走在社會變革取徑中的工作者，要能磨練「往體制結構隙縫裡插針埋樁」的硬功夫(夏林清，2006a：227)。這句「插針埋樁」把手工知識推到更具體的層次：它不是態度，也不只是理念，而是一種在制度節奏來不及、資源不對等、權力關係糾結時，仍能在縫隙中找到支點、做出臨時但有效的連結與承擔的能力。對我而言，這直接改變了我對現場細節的看法，那些看似瑣碎的安排、那些在關係中反覆拿捏的分寸，不再只是「後勤」或「善後」，而是行動能否成立的關鍵工法，並且本身就構成知識。

丁乃非在〈拼裝車上手工業〉延伸並回應夏林清，提出「拼裝」作為台灣與家庭處境的隱喻，進一步將夏林清三十年的基進教育實踐，讀成一種在拼裝國度、家庭與學院之間「以手工藝的勞作氣力」去「拼裝自我、組架集體」的過程(丁乃非，2006：243)。這段回應替我補上了另一個視框：手工知識不是在完整系統中運作的技術，而是在材料不足、結構粗糙、零件隨時可能鬆脫的條件下，仍能把人、資源、節奏與承擔重新組架成可行的集體行動。也因此，我在進場後開始更能理解：很多時候行動不是「做出一個完美方案」，而是先把能用的部分拼起來，讓生活先撐得住、讓合作關係先成立，之後才有機會慢慢把粗糙處磨出較穩的規矩。

丘延亮的〈實踐永遠是在理論的前頭〉則把「手工知識」的知識型態說得更尖銳：他以「補綴匠的百衲手藝 (bricolage)」來比擬這種能力——在「一大堆破銅爛鐵」之中「東挑西揀、又切又剪」，把損壞之物恢復使用價值(丘延亮，2006：249)。這個比喻讓我在回看自己的行動時，能把「臨時」「補丁」「邊做邊改」從負面語彙中救出來：它不是缺乏專業，而是對條件的回應方式；不是不夠理論，而是實踐本來就常常走在理論前頭。更重要的是，丘延亮同時提醒「命名」與「反省」的張力：如果反映尚未經過更嚴格的認知鍛鑄，過快的總結可能落入感性主導(丘延亮，2006：246)。這個提醒也反過來要求我：在把行動寫成論文時，必須讓「補綴」不只是一種浪漫化的敘事，而要回到結構條件、位置與權力關係，說清楚我究竟是在

什麼限制中、如何做出哪些判斷。

最後，夏林清在〈手工知識的勞動組合〉把這組回應收束成一個很關鍵的觀點：說明手工知識不是一個人想出來的，是一群「協作」磨出來的，手工知識就是「在地現場裡，一群人透過協作、批判、回看與承擔，把感性經驗鍛造成可共享的行動智慧」；而這整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勞動組合。例如；丁乃非提出的「方域 / 在地性」、丘延亮提出的「立身 / 政勢」可作為實務工作者覺察自身與他者脈絡的地標；而三人互相回應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實踐知識的雙層（對外與對內同時發生）協作活動」，也是「協作生產手工知識」的勞動（夏林清，2006b：250-251）。

這讓我更清楚：我在論文裡要談的「實踐知識」，並不是我個人的心得總結，而是我如何在現場與他人協作、在制度縫隙中承擔與調度、並在回觀書寫中把那些原本只屬於「撐住生活」的判斷，整理成可被辨認、可被對話、也可被檢驗的手工知識。換言之，這四篇文本提供我的，不只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套把行動放回撐開皺摺、拼裝、補綴與協作之中的視框——它改寫了我看待現場的方式，也構成我後續將行動經驗轉化為論文書寫的知識基礎。

2. 手工知識作為入場視框：從閱讀到實踐知識的生成

閱讀夏林清（2008）〈卡榫——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之後，我進入現場時更不再把問題簡化成「個人狀態」或「制度缺口」，而會先問：差異結構是如何在關係裡被再現的？我此刻站在哪個位置？我的介入會讓哪一種差異被遮蔽 / 被顯影？夏林清提醒：實踐者需要成為「處境中的行動者」，不是抽離地觀察，而是在「存在位置」裡承擔、介入、並辨識行動如何可能（夏林清，2008：138）。這個視框也讓我更能理解自己在個案與家庭脈絡中的「手感式」進入：例如我觀察小明³的工作狀態、連回阿玉⁴因收入變動而轉往西瓜田、又得承擔照顧與就醫接送，身體甚至需要每週打止痛針——我不是急著把它寫成「不穩定」或「需要被矯正」，而是學著在關係脈絡裡找到可讓生活撐下去的調度方式（例如把較合適的臨時工安排給阿玉）（我的論文案例）。這樣的理解轉向，正對應夏林清所說：在差異結構再現的學習空間裡，理解不是一次到位的同情，而是能在關係中做出不同抉擇、練習不

³ 牛犁第二代工作者，與阿玉是母子關係。

⁴ 阿玉是第一代牛犁工作者，小明的母親。

同對待的能力；也因此，我的書寫逐漸從「制度如何完善」轉向「人如何在縫隙中彼此撐持」，並把這些可延續的分寸命名為我的實踐知識。

夏林清 (2010)〈走在解殖的路徑中：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讓我在書寫時更敢把「看似瑣碎的勞動分配」當成知識，而不只當成背景敘事。當夏林清把實踐視為「透明實驗室」、把知識視為在日常中逐步開拓的求變致知路徑(夏林清，2010：60)，我回看自己的生命敘事與社區工作記錄，就更能辨認：許多被我先前提為「只能撐住」的選擇，其實是一套在制度撐不到時仍可延續生活的手工知識。

例如在我自己的家庭史敘事裡，鈞弼在沒有保險、必須獨自撐起早餐店與醫院照顧的雙重壓力下，日復一日地以身體勞動「揉麵、備料、賣早餐、收攤、再趕去醫院」，我在文中已直接將其命名為「一種用身體硬撐出來的行動倫理 / 手工知識」(我的論文案例)。這個命名的改變，不是情緒性的讚頌，而是把勞動放回「母子盒般階序關聯」與資源縫隙中理解：誰被迫承擔、如何分工、如何在關係裡把日子縫回來；也因此，我的觀點逐漸從「把問題處理掉」轉向「在縫隙裡形成可持續的分寸」，並把這些分寸寫成可被承接、可回饋現場的實踐知識。

(二) 生命敘事

生命敘事，不是把人生重新講一次，而是把我放回實踐處境中回觀：我如何看見、如何介入、又如何被結構與關係推著走。透過「夠用的燈」照出視框與信念，以庶民站位避免把弱勢寫成問題—解方；並以立於實踐的自我敘說，把選擇、調度與後果整理成可對話的知識路徑。

1. 照見與看見

夏林清 (2004a) 用自己的自敘文本示範：生命敘事不是把人生「說一遍」而已，而是把人生當作行動研究的材料來回觀，去辨識「我怎麼看、我怎麼做、我怎麼被脈絡推動」。她一開始就把問題拉到知識與社會的關係：心理學的知識與方法，如何在特定社會位置裡發生作用 (夏林清：2004a-132)，並明說自己的生命選擇、專業發展與社會探究「合而為一」

在方法上，她把「自我敘說」當成一種能夠照見自身視框的方式：敘說文本本

身就承載說者的「視框 / 看的方式 / 關係方式」，因此敘事不只是情感抒發，而是能用來辨識：我在敘說中凸顯了什麼、忽略了什麼、如何組織經驗成為可理解的脈絡。她進一步用「視框分析」把這件事說得更具體：在行動研究裡，視框分析指的是行動者如何框定當事人、當事人與環境系統之間的角色與問題；而「介入視框」則指行動者在採取系列行動前，早已對情境特色與自己行動之間的關係做出一套「設定」，這套設定形塑了行動目標與策略（夏林清，2004a：142-143）。

因此更能映照出，我的敘事對我而言是一盞「夠用的燈」：我不求一次說完全部人生，而是先照亮此刻要走的路，為何我總在制度縫隙裡用勞動撐住關係？為何我習慣把責任扛在身上，又如何慢慢學會分出去？這些看似個人的習性，其實藏著深層信念；自我敘說能把那些未必清楚覺察、卻一直引導我行動的東西照出來，讓我得以回看與反省。也因此，我讀文本與理論時不是旁觀者，而是帶著生命經驗反覆拆解概念、權力與價值，再把抽象語言轉回現場，形成手工式的行動知識。這篇博士論文正是在自我與學術的互相編織中追問：當知識長期被權力與專業壟斷，我們是否仍能從生活與在地實踐中，生成另一種更公共、更解放的知識？

換言之，這篇文章提供生命敘事一個很關鍵的研究姿態：把「我怎麼走到這裡」寫成一條可回觀的行動路徑，並且把敘事中的選擇、介入、調度與後果，整理成可被對話、可回饋現場的知識。

2. 用結構視角與庶民站位

生命敘事若要避免把弱勢 / 邊緣太快寫成「問題—解方」，需要先把視角站穩在結構與關係上，三十年後回頭看，我越來越想守住一個提醒：弱勢 / 邊緣不要太快被寫成「問題—解方」。以前我做社區工作，常把行動想成「把困難處理掉、把方案做完整」；丘延亮（2004）提醒我，「貧窮文化」若被當成性格缺陷就會汙名化；放回結構匱乏的脈絡，它其實指向一套求生理路與防護機制（丘延亮，2004：59–60），許多「不配合 / 不信任」也可能是自保與抵抗（丘延亮，2004：60），更要避免被挪用成「需要被矯正」的標籤（丘延亮，2004：64–69；74–75）。因此我重新回看游雅帆碩士論文裡的小毅事件：我曾用效率與責任把她寫成「學不會 / 抗拒學習」（游雅帆，2013：66），但換一個讀法，她的節奏可能是在多重壓力下維持生活運轉的方式；真正暴露的不是她學不會，而是我拒絕把她的生活處境納入理解。

同時，丘延亮也提醒「貧窮文化」在歷史上很容易被誤讀、被挪用，甚至被拿去替政策失敗背鍋，最後變成「向貧窮開戰」那種把人主渠化、清除掉「非主流因子」的政治工具（丘延亮。2004：64–69；另見〈為何要讀貧窮文化〉，頁 11–15）。這些提醒逼我承認：我以為自己在「幫忙」，其實也可能不知不覺替制度說話，把夥伴推向更可被治理的位置；而成功到底是把我們推離彼此？還是讓我們重新靠近？

把這個問題再往前推，我就會更懂廉兮說的「庶民視角」在提醒什麼：教育與政策很容易用主流眼光，把偏鄉 / 清貧者當成「補助與教化的對象」；但庶民視角要我們換一個站位，看見家園其實是互助團結、生命創化與社會學習的基地，清貧處境中的能動性不該被簡化成「缺乏」或「等著被救」（廉兮，2014：083–090）。她引用 bell hooks (1990)談家園：即使破碎脆弱，也有「基進的面向」；家園能讓人恢復在外部世界被否定的人性尊嚴。所以生命敘事裡那些看似瑣碎的做飯、照顧、分工、借物、互相接送，不是陪襯，是「家園如何成為基地」的證據。提醒我們把生命敘事寫成「詮釋權」的爭奪，而不是替人代言、把「困境」改寫成：差異結構如何讓生活變難（而非人格）、把「改變」改寫成：人物如何在日常裡做出可延續的調度與分寸（廉兮，2014：111–112）。

因此，生命敘事不是替個人下診斷、替制度找解方，而是用結構視角與庶民站位，寫出處境如何形成、策略如何生成、關係如何承接；讓故事保留人的尊嚴與能動，也讓讀者看見制度責任與治理盲點。

3. 立於實踐的自我敘說：生命敘事作為方法

林香君(2015)用自己的研究歷程說明：生命敘事不是「把人生講清楚」而已，而是把自己放回實踐處境中，透過回觀去辨識視框如何形成、如何移動、又如何改變行動。她把自我敘說研究定位為「立於實踐」：研究者的認識不是先有理論再套進生活，而是常常在限制中先做、先扛、再回頭思辨，形成一個可被檢驗與修正的「實踐—認識」辯證循環（林香君。2015：190–191）。

林香君指出：在第一個循環，她具體示範「視框移動」會如何改寫故事：同一段經驗若只用個人 / 家內視角，很容易把痛苦縮減成關係或性格問題；但當她透過差異視框對話與差異參看，看見階級、勞動處境、父權與資源分配的擠壓時，文本

意義就被重新脈絡化，個人的受苦被理解為社會結構作用下的結果（192–200）。

在第二個循環，她進一步區分「敘說為理解」與「敘說為行動」：真正的實踐取向不是進田野做觀察報導，而是要在「活生生的現場」與他者協作、承諾置身處境，並用反映性敘說在行動中不斷檢視假設、修正方法，生產對現場有用的知識（p.200–209）。因此她也提出兩個層次的「實踐性知識」：一是因應處境複雜性的在地知識（用來啟發、參看，而非移植套用），二是對「知識如何被產生」的反身性知識（例如：我如何框定問題、如何看見自己如何在看）（p.207–209）。

到第三個循環，林香君把自我敘說的社會價值說得更清楚：它能推進一個人從個我覺解到行動發聲、組織學習、再到社群協作，讓敘事不只停在理解或批判，而能長出可同行、可協作的實作能力（p.209–215）。換言之，這篇對生命敘事最大的提醒是：你的故事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寫得動人」，而在於你能不能把自己的視框、位置與行動後果公開出來，讓敘事成為一條可回觀、可對話、可回到現場的知識路徑。

（三）家園經濟

1. 持續把日子治理下去的實作知識

家戶的管理：米尼奧羅（Walter D. Mignolo）在討論殖民現代性時，刻意把「經濟」從市場與成長的語言拉回到「治理生活」的問題。他指出，「經濟（oikonomie）」這個詞的早期意義其實是「家戶的管理」，而且在「非西方和非現代宇宙學」中，這種管理並不只關乎人類，也「包含人類以外的生命」（米尼奧羅，2021：90）。換言之，經濟原本指向的是：如何在家戶／家園層次分配食物、時間、勞動與照顧，讓生活在匱乏與風險之中仍能維持平衡與延續。米尼奧羅接著指出，到了十八世紀，隨著美洲被「發現」並被剝削、土地與人民被納入資本積累，「經濟」逐漸轉向「財富和積累的管理」，並由「無形的手」來操控；結果是「市場取代家戶，成為經濟生活的中心」，而資本積累也取代了原本較偏向「平衡的家戶管理」（米尼奧羅，2021：90）。因此，在解殖脈絡下，「經濟」不再能被理解為中立的交換法則，而是一套治理性的分類與規訓：它決定什麼算生產、什麼算價值、哪些生活安排被承認、哪些被排除或被貶為「私人事」。

這也使我在界定「家園經濟」時，得以把焦點從地方產業或財務模型移開，改從「制度如何形塑生活、以及生活如何在制度撐不到的地方被治理與照顧」來理解：家園經濟指涉的，是家戶／家園如何透過分工、互助、照顧與共享資源，持續把日子治理下去的實作知識（米尼奧羅，2021：90）。

2. 由我們決定如何一起生活

我在界定「家園經濟」時，會先把「經濟」從市場—成長的語言，拉回到「生活如何被治理」的問題。換言之，「經濟」並非自然存在的中立交換，而是一套會把生活制度化、分類、允許或排除的治理語言；把經濟拉回家戶治理，是為了重新看見：撐住生活的分工、照顧與互助，本來就屬於經濟的核心。

同樣地，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原初豐裕社會〉中，正是透過對「僅足維生的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的反省，鬆動資本主義把匱乏當成常態的視角。他指出，「豐裕」未必靠無止盡的擴張與積累，而是有兩條路徑——「需求之『容易滿足』不是生產多些，就是希求少些」；也因此，當他細究採獵社會的生計安排時，才會「不得不稱之為『原初的豐裕社會』」（薩林斯，1988：22）。在後續討論中，他更以「一種物質的豐盛」來描述：除了食物與飲水之外，在日常必需品與非維持生存的範圍，許多需要其實「一般也易於獲得滿足」（同前：27）。這些論述使我得以把「生計經濟」理解為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生活安排：重點不是把錢做大，而是如何在具體條件下，把生活所需分配好、把風險一起扛住、讓日子繼續。

基於上述兩條線索（經濟作為家戶治理的原義；以及生計經濟對「匱乏—積累」常識的鬆動），我在本研究提出的「家園經濟」因此不是地方產業化或財務模型，而是把經濟重新放回鄰里共同生活：在制度撐不到的地方，我們透過分工、互助、照顧與共享資源「一起活下來」，並把「如何生活」重新交回到共同體的協商與決定之中（米尼奧羅，2021：90；薩林斯，1988：22、27）。

3. 家園不是被教化的對象，而是互助的生活基地

廉兮（2014）提出「庶民視角的教習踐行」，把家園從「被補助與被教化的對象」翻轉為人民互助團結的生活實踐所在，並主張抵殖民政治應「立足於以家園作

為生命創化與社會學習的教育基地」(廉兮，2014：83)。這個視角也使家園政治不再以國家承認的公民身分為唯一邊界：在後殖情狀的「邊界僭越 / 混雜性」中，跨界者 (如移民、僑民、流亡者、回歸者) 正是典型代表 (廉兮，2014：95)，因此我在本研究亦將移工等被制度化排的生活者，視為可能共同構成家園互助網絡的關係成員。另一方面，廉兮透過茹妮老王敘說指出，用主流貨幣尺度定義貧窮會遮蔽生活世界的富裕與自足，並拒絕將「以雇傭的、剝削的」模式複製到地方(廉兮，2014：119-121)；這使我得以把「生計經濟」理解為一種以生活維繫為核心的治理方式，而非以積累為目的的市場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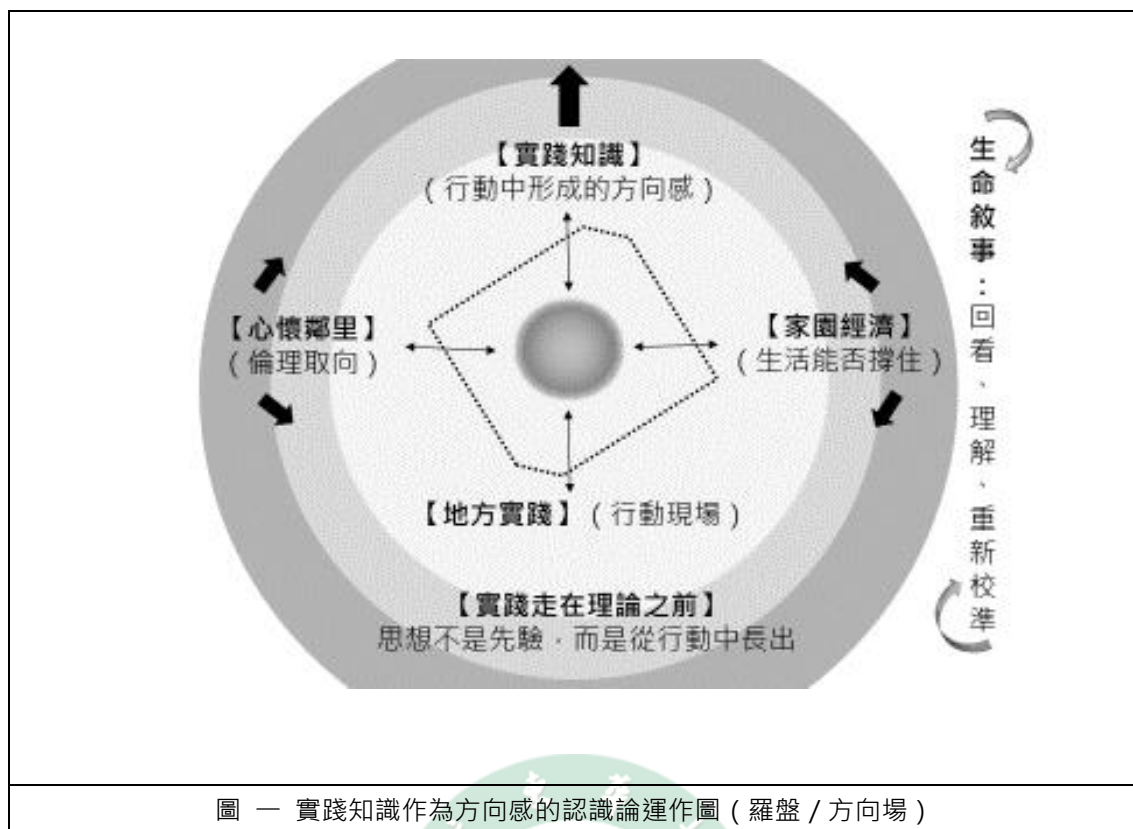
因此，本文所稱「家園經濟」指的是：在制度撐不到的地方，庶民 (包含邊緣混雜的位置) 透過互助、照顧、勞動分配與共享資源，把共同生活撐住，並在關係中協商「如何一起活下來、如何生活」的生計治理實作(廉兮，2014：83、119-121)。

米尼奧羅(2021)；薩林斯(1988)；廉兮(2014)。我歸納為以四項指標辨識家園經濟的運作原則：(1) 互助與照顧如何被組織成可延續的分工；(2) 風險與負擔如何在關係網絡中被分攤或轉移；(3) 共享資源 (時間、空間、物資、資訊與人力) 如何被維持、擴增或修補；(4) 跨界 / 弱承認成員 (如移工) 如何被納入、被排除，或如何以實作方式成為共同生活的關係一員。

二、 在行動中生成的一種研究方式

實踐知識作為方向感的認識論運作圖 (羅盤 / 方向場)：與其將研究方法理解為一套事前設定的技術步驟，這個書寫更希望說清楚：我是如何在被捲入、承擔與反覆修正之中，逐步形成判斷方向，並在生命敘事的回看中把經驗整理成可對話的知識。

在我的研究裡，圖一之所以是「認識論運作圖」，是因為它清楚顯示：知識不是來自先驗理論，而是來自：心懷鄰里的倫理位置、社區實踐的行動現場、家園經濟的生活理解，再透過生命敘事的回看與命名轉化為「實踐知識」。這不是方法流程圖，而是我如何「知道」的路徑圖。



整個書寫所使用之圖像為一張「認識論運作圖」，用以說明本研究如何理解知識的生成方式，而非呈現研究流程或行動步驟。此圖的核心主張為「實踐走在理論之前」：思想並非先驗地存在於行動之前，而是在行動之中逐步生成。

我在說明我的立場，知識來源並非來自先行設定的理論框架，而是來自我在具體實踐中，如何同時面對倫理位置、行動現場與生活能否被撐住的多重判斷。透過生命敘事的回看、理解與命名，這些行動中的判斷得以轉化為可被說明與對話的「實踐知識」。因此，這張圖並非方法流程圖，而是一張呈現我「如何知道」的路徑圖。

我也並非先設定研究問題再蒐集資料，而是先行動、先被捲入關係與責任之中；研究問題則是在反覆行動、受挫、回看與調整的過程中逐步浮現。基於此，研究的目的並非驗證既有理論，而是從實踐中辨識：人在制度失能、資源不足與關係拉扯的情境下，如何做出判斷、如何撐住生活，以及如何在行動中逐步形成方向感。

1. 圖的底層：實踐走在理論之前(思想不是先驗，而是從行動中長出)

圖的底層呈現本研究最根本的方法立場。研究並非以明確界定的研究問題為起點，而是從長時間的實踐經驗出發。透過實際行動中的承擔、修正與回看，研

究問題逐步成形。在此立場下，研究不是為理論服務，而是嘗試從實踐中辨識方向，理解行動如何在現實條件中被推動或受限。

2. 圖的中層：三個同時作用的行動場域

圖的中層並非呈現三個依序展開的步驟，而是三個在每一次行動中同時運作的判斷面向。它們彼此牽動、互相校準，構成我在實踐中做出判斷的整體取向。

(1) 心懷鄰里——倫理起點

在方法上，這代表我並非抽離位置的研究者，而是帶著關係、情感與責任進場。我的在場方式本身，即是研究得以成立的重要條件。行動始終牽涉到誰承擔、誰被忽略、關係是否會斷裂等倫理問題。

生命敘事在此的功能，是讓這樣的倫理位置得以被理解，使行動不被簡化為個人性格或道德偏好，而能被放回生命經驗與結構條件中加以說明。

(2) 地方實踐——行動現場

在方法上，這一層說明研究資料並非事後刻意蒐集，而是在行動中自然生成。工作紀錄、會議討論、衝突過程、行動後的回顧書寫，以及與夥伴的對話，皆構成本研究的重要材料。

生命敘事在此的功能，是讓行動不被切割為單一案例或成果展示，而是被放回時間脈絡中理解，使反覆、挫折、修正與未完成本身，成為理解社區行動運作方式的重要線索。

(3) 家園經濟——生活理解

在方法上，這一層代表行動評估並非以單一制度績效或量化指標為準，而是回到生活是否被撐住、關係是否得以延續、資源是否能循環等問題。

生命敘事在此的功能，是讓經濟不再只是抽象制度或理論模型，而是回到人的生活史、家庭史與災後經驗中被理解，使經濟成為一種生活如何得以延續的實踐問題。

3. 圖的上層：實踐知識（在行動中形塑思想的判斷方向）

圖的上層為本研究方法論的總結位置。本研究並非將資料轉化為抽象理論，而是透過反身性書寫，整理行動者在實踐中如何做出判斷、如何在倫理、制度與關係之間被拉扯，並在一次次修正中調整方向。

生命敘事在此的角色，是將原本僅存在於行動當下的直覺、分寸與猶豫，轉化為可被理解、可對話的實踐知識。這些知識緊貼行動生成，並非抽離實踐而來。

三、方法論的整體收束

因此，本研究不追求可普遍化或可複製的結論，而是透過具體經驗的描述與反思，提出一種可被他人辨識、對話，甚至轉譯的行動理解。與其說本研究提供標準答案，不如說它保留了一個入口，使不同位置的行動者能透過這些書寫，看見行動背後的條件、代價與倫理，並在自身場域中重新提問與重新行動。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以生命回望作為論文的開場，不是為了替自己「交代背景」，而是要先把說話的位置、行動的起點、以及我願意承擔的倫理立場說清楚：如果人不說自己的故事，世界就只剩下管理者在說話。於是，第一章先讓「我」現身--帶著童年勞動、照顧、漂泊與焦慮所磨出來的生存感；也帶著那些曾經用力過頭、想把一切控制住、因此反覆受傷的慣性。這些不是旁枝末節，而是理解我如何做社區、如何與人相處、如何形成判斷力的知識根部。

第一節透過「命名」的往返，完成了研究的定錨：我不是在寫一個完成式的成果，而是在描述一段仍在發生的路徑；我也不是站在「教人怎麼做」的位置，而是承認自己一直在關係裡學、在現場裡修、在錯估裡補。當我把題目落在「我與我們：走在心懷鄰里的路徑」，其實已經把本論文的核心語法放進來——兩者都在勞動、互助、衝突與修補中慢慢生成。說明：本研究所說的「手工知識」，不是技巧清單，是一種在匱乏裡仍能活下去、在關係裡仍能前進的分寸與智慧。

第二節回到我最現實的起心動念：社區工作一開始並不浪漫，而是出於對貧窮與不安全感的回應，因此關係很容易被放進「交易邏輯」裡計算——我付出什麼、你回應什麼、我能不能因此更安全。這一節重要的不只是自白，而是指出：當人的

生命長期被逼在風險邊緣，防衛、猜忌、效率與控制，往往不是性格缺陷，而是生存策略。也因此，本章所說的「轉化」，不是道德式的改過，而是我在幾段真實而穩定的同行關係中，慢慢學會把人從「資源與功能」的位置，重新放回「可以被信任、可以互相依靠」的位置；從完成任務，轉向練習關係倫理——看見人、回應人、一起承擔，而不是只衡量成本與回報。

第三節則把這段生命與行動經驗，推進成方法論的選擇：讓知識回到人，讓行動回到生活。我在這篇論文裡要保存的，不是被管理語言壓扁後的「成功模式」，而是那些在日常裡慢慢形成的判斷：怎麼聽、怎麼等、怎麼不拆穿、怎麼在矛盾裡先撐住關係、怎麼在制度邊界內仍保有溫度。知識在此不再是先有理論再套用，而是在現場邊做邊懂；是一種把經驗「放慢、拆開、對照、釐清」的練習，讓複雜性不被快速結論收走，讓那些混亂與遲疑也能被理解、被承接。

第四節談的是透過閱讀文本後的視框轉移，行動的轉變用一條閱讀—進場—回觀—再命名的路徑，不是先把概念定義好再去套現場，而是讓文本提供一種「看見方式」，進場後再被現場修正，最後回到你的生命敘事與行動脈絡裡，把那些原本只在「撐住生活」的判斷，整理成可對話的實踐知識。

因此，第一章完成的工作，是把整篇論文的底層承諾立起來：我以生命敘事作為進場方式，以行動研究作為理解途徑，以「手工式」的慢與細作為抵抗管理收編的寫作倫理；並且把「我如何被塑造」與「我們如何生成」放在同一張關係網裡思考。接下來的章節，將在這個基底上，進一步走入更具體的場域與事件：讓「我們」如何形成、如何在制度與匱乏之間找路、如何在勞動與互助中長出可延續的生活知識與公共性，一步一步被看見。

第六節 論文各章節安排

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以生命回望開場，不為交代背景，而是先說清楚我從哪裡說話、如何進場、願意承擔什麼倫理位置。從「命名」的往返定錨研究路徑，再回到貧窮與不安全感下的交易邏輯，辨識我如何在同行關係中轉向關係倫理。最後提出方法論選擇：讓知識回到人、行動回到生活。並將視框分析的移動如何成為實踐知識、在行動中生成的一種研究方式也在這章節說清楚。

第二章：以「裂縫」為線索，依序從勞動的身體記憶出發，走入母女在匱乏中縫補生活的日常，再擴及家庭與地方如何在制度邊界裡長出行動倫理；並以鈞弼的地方實踐呈現「補償」如何走成「承擔」，最後回到：裂縫即知識與行動的起點。

第三章從社區營造的規範要求與現場矛盾談起，追問「培力」如何不淪為計畫語言。接著描寫地方經驗如何生成知識體，並以培力正義檢視學習關係。重讀貧窮文化後，我把培力從教導轉向承接生活策略，並在衝突中練習覺察，避免被管理語言收編。最後提出「行動的分寸軸」：在制度與情感之間拿捏，讓行動既可被交代，也能保住人與關係。

第四章本章把「成功／成長」重新放回關係中思考。透過雪霞、阿玉與小明的生命路徑，照見人在匱乏與差異下如何撐住尊嚴與能動性；並以同一事件的重看，學習在成果壓力與人之常情之間留一點餘地。進一步，我以「多重置身」深化理解：它不只是角色清單，而是把我放回制度與關係的權力網，看見我在母親、學生、主管與債務人等位置上，如何同時承受要求、也可能對他人施加要求；以及這些位置如何互相牽動，讓焦慮轉為控制、讓無力變成催促。最後以「生命拼貼」作為方法，讓自我書寫走向對話與協商，使理解不再只是同理，而是對權力與責任的誠實辨認，並在現場的微調中生成可持續的共事與共存。

第五章以「成功是把我們推離彼此？還是讓我們重新靠近？」作為進場提問，試著把社區工作從績效與解方邏輯拉回關係倫理：知識常能處理問題，卻未必能處理人與人的關係。透過重讀「貧窮文化」與「庶民視角」，我重新辨識那些被貼成「不配合、拖延、沒企圖」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匱乏結構下用來維持尊嚴、減少挫折、讓日子繼續轉的生存戰術，而不是性格缺陷。章中先回顧第一代「成功＝能撐」的行動模式，如何在高壓多線下把成敗推回個人，讓沉默與內耗累積；再寫世代交會下情感倫理與制度語言（勞基法、權益、保障）的碰撞，將衝突視為「如何一起工作」的協商。接著以新住民、高齡者、母親與孩子的案例，看見社區裡看不見的邊界如何形成與再生產，並在小卡與榮民的選擇裡讀出手工式的生活治理智慧。最後把這些破裂與修補，整理成一條韌性的路：不急著把人寫成「問題—解方」，而是在裂縫中多留一個位置，讓「我們」得以被重新織回。

第六章以「家園經濟」的實踐知識立場回看我在長期社區行動中的經驗，說明當制度與市場撐不到生活時，人們如何透過關係、分工與節奏的調整，讓日子得以

延續。此處的「經濟」不是一套替代性制度藍圖，而是發生在家庭、鄰里與社區之間的日常實作：資源如何被運用與循環、承擔如何被分攤，以及在壓力持續加劇時，關係如何不被消耗到崩解。第一至第四節分別從後台建設、生命承擔、制度失能與家園經濟的實作面向，呈現行動如何在現場反覆生成、修正與調整；這些經驗未必能匯聚成可複製的模式，卻形塑出一種行動取向——在成長與效率邏輯壓縮生活之際，重新為生活撐開空間，並在彼此仍有限的條件下，一起把日子往前推。第五節引入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說明理解實踐知識必須回到人的生命歷程：行動深受位置、歷史與被接住經驗形塑；生命敘事則讓容易被快速命名為個人或情緒問題的經驗，得以放回關係與結構脈絡中理解。透過整理低可見度的日常做法，本章試圖讓「怎麼做才撐得住」不再只是私人的辛苦，而成為可回看、可討論、可承接的實踐知識。

第七章本以「從我到我們」為主軸，回應一個核心追問：當治理語言常把人快速框成「問題—解方」，我們能否用更貼近生活、也更負責任的方式理解現場？我以長期置身社區實踐的經驗，提出一種「路徑型結論」：知識不是先有答案再套用，而是在制度縫隙與關係拉扯中，透過回看、協商與修正慢慢長出來。章中進一步釐清手工知識、承擔與共生、家園經濟的意義，並誠實交代研究的限制與可延伸方向。這裡不是用結論宣告完成，而是把一條仍在生成的路先辨識出來，作為後續公共討論與行動的起點。

第二章 裂縫中的知識：從勞動到行動倫理

我的生命從來不是在安穩的基礎上展開，而是在裂縫中縫補。從小學時撿拾菸蒂、推著回收車穿梭夜市，到工地撿廢鐵、銀樓做工，再到成家後面對債務、扶養與社區責任，我始終在不斷縫補的過程中前行。這些縫補並不是單純的「努力」或「勤奮」，而是一種在有限資源下調度身體、關係與時間的能力，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手工知識」。

它既是生存的智慧，也是倫理的抉擇；既刻在身體的記憶裡，也延展到家庭、社區的行動中。當我回望自己與母親的生命經驗，更能看見跨世代的相似與轉化：從母親將婚姻視為依附策略，到我在社區實踐中將依附轉化為賦權⁵；從家務與債務的壓迫，到社區共生的承擔，這些裂縫中的縫補經驗，不僅形塑了我的生命史，也構成了我對「地方行動倫理」的理解。

在這過程裡，鈞弼⁵的角色更是關鍵。他並不是一個單純「被依附的軍人丈夫」，而是用日復一日的勞動、對家庭的承擔，以及對社區的投入，把我的縫補延展成更大的行動網絡。如果說母親讓我學會如何在裂縫中求生，那麼鈞弼則陪我一起把裂縫縫補成一種共生的可能。他的勞動與信念，讓「依附」不只是生存策略，而能逐步轉化為「彼此承擔」的實踐。

第一節 勞動的身體記憶

1962 年出生的我，從小學時撿拾菸蒂、推著回收車穿梭夜市、在工地撿廢鐵，到後來在銀樓當黃金師傅，我在不同的工作場域裡，學會了如何生存與應對、如何判斷時機、掌握人情、善用自身條件，都是在勞動的現場反覆試錯、慢慢摸索出來的。

在賺錢的過程中，我逐漸形成了一套感知與判斷模式：什麼時候該冒險、什麼時候該撤退，怎樣的利潤值得投入，什麼樣的交易會破壞關係。這些不只是經濟技巧，更牽涉到倫理抉擇，如何在追求收入的同時，仍能保留做人做事的分寸。我的身體就是這些知識的容器。小腿上的疤痕、手指的繭、長時間勞動的姿勢與節奏，都是一部活的勞動史。它們記錄著時間如何被切割、被使用，也記錄著我如何在不

⁵ 我的先生也是牛犁協會總幹事。

同階段調整自己的步伐。

無論是做小販、接家庭代工、還是補習班招生，我都在不同的經濟策略中積累著手工知識。這種知識不是課本上的標準流程，而是在現場邊做邊學、邊錯邊補的智慧。它真實、具身、難以複製，卻在我日後面對社區、面對關係時，成為最有力量的底氣。這些看似零碎的經驗，構成了我的「手工知識」一種在做與錯之間邊走邊學、在不穩定中求生的能力。它不只是賺錢的方法，更是一種身體的記憶與生命的節奏。回望這條路，我才明白，正是這些早年的勞動軌跡，形塑了我看世界的方式，也深深影響了我日後對母親、對社區婦女、乃至對自己生命的理解。

一、 勞動經驗與生命態度

表 一 研究者勞動經驗

煮飯	5 歲時就必須負責煮飯，那時與外婆同住，不知道為甚麼在煮飯時間，外婆老是用竹子打我，因為外婆眼睛看不見，所以我不敢跑掉，擔心外婆會摔倒。
撿拾菸蒂	小學一年級當值日生負責倒垃圾時，我發現垃圾場有許多還剩一大截未抽完的菸蒂。因為看過老人家將整包菸撥開，把菸絲取出放進鐵盒，再塞進菸斗抽菸，我便開始把菸蒂撿回家，也撥開抽出菸絲，再兜售給抽煙斗的阿公、阿嬤們。生意究竟有多好已經忘記了，但至少是供不應求。 為了撿拾這些菸蒂，我不只跑學校的垃圾場，也去公家機關的垃圾場。當時垃圾沒分類，玻璃瓶、鐵釘都混在裡面，因此手指頭與腳掌經常受傷。記得有一次被玻璃割傷食指，流了好多血；還有一次鐵釘扎進腳後跟，痛到難以忘記。由於無力就醫，我只能用扶桑花葉槌爛敷在傷口，甚至連膿瘡見骨時，也只能靠這種方式處理。 大部分傷口都任其自行癒合。也因此，日後看到孩子受傷或生病時，我往往無法立即反應，甚至常要他們自己騎腳踏車去衛生所，或四個小孩互相陪伴去看醫生。因為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根本沒有「看醫生」這回事。

四維路的 工地	小學二年級時，我常在放學後跑去建築工地撿拾廢棄的鐵釘、角鐵。那是高雄都市建設正旺盛的年代，工地裡常遺落著重量十足的角鋼或散落的鐵釘。因為我年紀小、身形瘦弱又黑嚙嚙，看起來既可憐又沒有威脅性，所以常能混進工地。我們小孩還會把好的鐵偷偷踢出工地大門，再撿起來收集。即便被工地大叔抓到，也只是被兇幾句，不會真的責罰，甚至有時他們還會留廢鐵給我，叮囑我快點帶走，別被老闆發現。 我後來才明白，這些小小的「寬容」其實源於我的外貌與身分：八九歲、瘦小、窮困，看起來無害，反而讓人願意放一馬。相比之下，我漂亮的母親卻沒有這樣的「生存資本」在她身上，姿色與年齡反倒常引來更嚴苛的評價與壓力。原來，弱勢的外表，有時竟成為一種討生活的優勢。
六合夜市 撿回收	十歲時，我開始在住家附近的回收中古商販賣撿來的物品。每逢週末的半夜十二點，我會推著幾乎和自己一樣高的木製兩輪回收車，穿梭在六合夜市收集塑膠袋、紙箱、玻璃瓶與報紙。矮小的身影總引來店家阿姨、叔叔們的同情，他們常特別將回收品留給我，使我一晚能賺到約五十元，在 1971、1972 年間，這對比工人月薪僅六百至一千五百元，已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當時我以為這是靠努力得來的成果，甚至覺得只要母親更拼命，就不必依附男人過活。直到後來才明白，這份「豐收」其實來自於他人對我年紀與外型的移情同感，而非單純的勞動效率。可惜夜市只有週末最熱鬧，因此這樣的機會也僅限於一週一晚。
批發抽抽 樂當小販	小學五、六年級時，我開始批發抽抽樂給同學玩，批發商也會教我將大獎先抽掉，這樣我的利潤就比較多。只是我為了多賺一些，總會多拿下幾個獎項，導致他們中獎率不高感覺被騙，小朋友回去跟它們的大哥哥告狀，他們高中的大哥在下課後來算帳，忘記是否有被打，但是被迫在牆邊逼問的驚嚇至今還有感覺，也因為是小學快畢業了，就沒再當小販了，可以去外面工廠工作了。
婦女習藝	小學畢業後，我進入婦女習藝所工作學習（已忘記原因）。有

所的經驗	一次母親穿著紅色衣服，光鮮亮麗的來找我，結果被習藝所的阿姨們取笑說我母親因為這樣的穿著「才會男人一個換過一個」，導致後來對亮色衣服有所排斥。第一次月經是在習藝所上班時發生，年紀大的姐姐們教我如何用衛生紙撕成長條，再用衛生紙包起來，像一個蓬鬆的長條麵包，因此對習藝所印象深刻。
鐵工廠與賽洛瑪颱風	離開習藝所後，我進了鐵工廠上班。當時工廠有許多屏東或台東來的男生，是住在工廠宿舍，與我年齡不相上下，皮膚幽黑力氣都很大，鐵工廠許多租活都是仰賴他們工作。1977 年賽洛瑪颱風摧毀了工廠，同年夏天我轉到銀樓當學徒。
黃金師傅	小學畢業後，我便進工廠做工，隔年又去銀樓當學徒，學習金飾鑄造。到十五歲（1976 年），我已經是技術工，每月薪資高達一萬元（當時一般工人僅三千元），是我收入最高的時期。白天上班、晚上唸書，學費與生活費全靠自己，還要補貼家庭。 母親與最後一任丈夫曾開過小吃店，但很快收攤沒再作，之後便以幫忙大弟帶孩子為由不再工作。於是，我成了家中的主要經濟來源。母親與丈夫定期到銀樓領走我的薪資，家裡有突發狀況，還會要求我向老闆預支。銀樓老闆甚至利用我的處境，請顧客不要殺價：「這孩子靠這份薪水養家，請讓他有生存的空間。」於是，我的劣勢反而成了生存的籌碼，被轉化成一種交易的契機。 銀樓的工作是計件制，我格外拼命。1979 年中美斷交，黃金買賣鼎盛，我一個月能賺到九千元。然而品質稍有落差，就常被老闆責罵，記憶中，他穿著木屐，邊走上三樓邊大聲咆哮喊我的名字。雖然如此，我仍一路撐到考上台南家專才離開銀樓。 那段期間，我也在國中補校就讀。補校大多是年長者，老師們常放水，不太教學，反而耽誤了我的學習。最深刻的記憶，是教官招募國民黨員時，我因「家世不清白」而被拒收。如今想來覺得好笑，但當時卻是深刻的羞辱，也悄悄影響了我往後對婚姻與社會位置的盤算。
同時四份	進入台南家專後，因為學費、房租與生活費大幅增加，每月還

工作	得寄錢回家，因此我只能邊唸書邊打工。雖然如此拚命，卻連一份三菜一湯的自助餐都負擔不起，常常只能吃一菜一湯，再加點肉汁拌飯。為了維持生活，我同時兼好幾份工作： 1.加油站：每天清晨在加油站打工，固定接大家最不願意排的早班。每小時 65 元，還附勞健保，同事們對我特別照顧。 2.安親班：上午下班後，再到安親班顧小孩到下午四點，雖然輕鬆，但薪資有限。四點過後，我便趕著去夜校上課。 3.推銷員：零散時間裡，我還推銷福樂鋁箔飲料。因為能迅速從眼神判斷顧客意願，所以成交率特別高。這份經驗也讓我日後進入家戶做文化普查與居家訪視，都能自然按響陌生人家門鈴，毫不怯場。 4.跨校聯誼：夜二專的女校身份，使我們成為成功大學、高雄醫學院、三軍院校等熱門聯誼對象。我常自辦舞會、郊遊、烤肉，從招募、收費、採購到食材準備全包辦。為了省錢，肉自己醃、竹籤自己串；為了保證活動吸引力，我會挑不同性格、長相、專長的同學參加，例如舞會就一定找會跳舞的女生，甚至設計收費差異「漂亮女生免費，男生費用多一點」。這些小心思，讓活動品質有保證，也意外凸顯女性的角色，有時反而能成為一種「優勢」。 從國中補校到二專，我始終是夜間學生。因為沒有錢參加別人的活動，我選擇自己創造機會。一路走來，雖然拮据，但這些勞動與經驗，培養了我日後在社區工作中的組織力與市場感，也讓我深刻體會如何把劣勢轉換成生存的資本。
補習班櫃台	後來比較正式在專門考研究所、高考、托福的補習班上班當櫃台負責招生抽傭，記得當時補一門要 6500 元(1984 年)，補習班生意還是相當好，我的工作就是印講義、點名及其他雜務工作，收入來源就是招生抽傭，當時只要有一套說辭大概就是只要你進入本補習班，前途、錢途就垂手可及，有補習的人機會就比他人多一些，這些說辭，大都能打動前來詢問的人，連我這種新人安排顧櫃檯的時段不那麼好，都能賺不少錢。

	直到有一天我說動一位年輕人報名參加，繳的是銅板且髒髒的、有一點濕黏，我的心中好難過，總覺得在騙錢，加上發現幾個同事違造學生證而分我一些利潤，擔心越陷越深，我無法接受這種日子，我就離職了。這工作一待就是到了 1985 年冬天，中間從台南到高雄分公司，在高雄離職。
家庭代工	1986 年 3 月結婚，來不及找新工作就已經懷孕，開始我家庭代工的日子，我的家庭代工可不是用閒暇時間，我可是依據上班時間開始工作，8 點到 12 點，中午休息煮個午餐、下午一樣 13 點到 17 點休息，晚上釣粥回來兩個一邊看電視一邊手作，當時 1986 年我連家庭代工，都能領到 1 萬初，釣粥當時才 1 萬 6 的薪餉。
社區工作	後來就到花蓮來開早餐店、洗衣店，正式在社區工作中持續到現在已經快 30 年，我的工作時間超過 50 年，有勞退的話都不知道要領幾回了。

二、從生命勞動史到社區工作的張力與同行

身體記憶是知識的起點：身體不只是勞動的工具，也是知識的載體。從 5 歲煮飯時被竹子敲打的肌肉記憶，到小腿因撿菸蒂、撿拾角鋼留下的疤痕，再到銀樓計件時的手感與速度拿捏，我的身體在長年勞動中累積了對動作、節奏、力量分配的精準感知。這種「長在身上」的記憶，成為我日後在社區工作中時間的安排與流程、設計任務與分配人力的基礎。

勞動觀察與即時判斷是生存與組織的關鍵技藝：推銷飲料時，三兩句話便能從顧客眼神判斷成交可能；跨校聯誼挑選成員時，依人際特質組合最佳組隊；夜市回收與工地撿廢鐵中，知道何時撤退、何時上前。這些即時判斷的默會技藝，讓我在社區行動中能快速辨識誰願意嘗試、誰適合領頭、什麼時候該推進或暫緩，避免在有限資源中消耗過多成本。

情感勞動與關係擺位塑造行動的承载力：工地叔伯護我避開老闆、夜市店家留回收品給我，這些經驗教會我「被誰看見」和「如何被擺放」的重要性。在社區中，我同樣運用這種關係感知，在政府、NGO、居民與婦女之間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位

置，使行動得以持續運轉。情感勞動不只是安撫與陪伴，更是一種穩定集體的策略性工藝。

從被壓迫位置生成的制度敏感與日常抵抗：被國民黨拒收黨員的羞辱、婦女習藝所對母親穿著的階級嘲諷，讓我對「被排除的方式」有極高的敏感度，也深知制度與標籤如何在日常中重複壓迫。這些經驗讓我在社區工作中拒絕單純志工制，因為那排擠了必須靠日薪過活的窮人。我主張「有給職」作為公共參與的入口，將經濟保障納入行動設計，不只為了生存，也是對不公平制度的直接回應。

小勝利的循環是賦權的長期機制：從夜市一晚 50 元的滿足、銀樓高件量的成就，到四份工作並行的自給能力，我學會把零碎成果累積成持續行動的動力。這種方法被我轉譯到社區工作中，用小型有給職專案，讓婦女先獲得第一筆酬勞、第一次公開發言、第一次被看見，將這些具體可感的成果縫成一張網，支撐她們從自我懷疑走向公共行動。這些「小勝利」既是力量的縫口，也是從被壓迫位置站起來、翻轉自我價值的持續循環。

三、從高強度勞動節奏到關係倫理的轉向

我的勞動史教會我一種「精算成本零閒置、高輸出」的生存模式。從銀樓計件、四份工作並行，到家庭代工的滿檔工序，我習慣把時間、材料、人力的閒置降到最低，以確保每一分投入都換回確定的產出。這種節奏被我帶進了社區工作，在有限的資源與有給職專案裡，我精確計算每個任務需要多少人、多少時間、多少報酬，務求每一刻都有效率地推進。然而，這種對我來說是「保命的節奏」，對許多社區婦女卻成了壓力來源。

社區婦女多數肩負著上下兩代的照顧責任，家中長輩需要看護，孩子需要陪伴與接送。她們在參與社區工作時，不僅要學習多面向的知識與技能（行政、專案執行、人際協調、專業術語等），還要維持家庭日常的運轉。雖然有給職專案為她們提供了收入與公共參與的機會，但當工作被壓縮在高強度、零閒置的節奏中，這份「生存的機會」同時也成了壓迫的來源。我原以為，只要她們進入這種高效率的模式，就能像我一樣抓住機會翻轉生活；卻忽略了，我的生存邏輯是被多年邊緣處境與獨立承擔所塑造的，而她們的生活有著更複雜的責任分配與情感牽絆。

在政府專案的指標邏輯下，我曾經把婦女的工作進度、產出數字，當成向外界

證明成果的核心依據。這種「符合績效—換取資源」的模式，和我早年勞動史中的「以件計酬」如出一轍。但一次次的摩擦與抱怨，讓我看見了隱藏在數字後面的消耗：她們在完成任務的同時，也在犧牲家庭時間與自身健康；我們彼此的關係被卡在「完成工作—兌換薪資」的交易邏輯裡，情感與信任的空間被擠壓。

這些衝突，成為我轉向的契機，我開始重新衡量行動的價值不僅在於交出成果，更在於關係能否持續。我學會在時間安排上留出緩衝、在進度之外關心她們的家庭與身體狀況，把專案的成功定義從「完成指標」移向「在關係中保留力量」。這不只是策略調整，而是從符應架化的指標效應，走向尊重手工知識與關係倫理的開始，承認學習與改變需要時間，也需要照顧到行動者的生命節奏。

第二節 母女在裂縫中縫補生活

這不是堅硬、勝利的英雄敘事，是潘玉梅與游雅帆的交織，如何在裂縫中縫補生活。像潘玉梅般的「一再被打敗，但又一再重組日常」。她雖然經歷五段婚姻、孩子問題重重，但她從未中斷照顧的責任，也未選擇完全退出。韌性體現在她「有創傷卻仍選擇前行」的姿態中，是一種日常生活層級的反抗與生存。

潘玉梅，1935 年出生於戰後臺灣的貧困社會，雙盲家庭的長女，自幼承擔照顧弟妹的責任。那是一個女性被定位為家庭內勞動者的時代，教育與經濟資本稀缺，社會起點極度劣勢。1957 年結婚後，她先後歷經五段婚姻，每一次皆以「尋找經濟支柱」為核心策略，卻往往換來伴侶的失業、賭博、暴力與缺乏責任。即使如此，她仍不斷以「為了養大孩子」為理由，選擇再婚這不是出於浪漫想像，而是將母職視為社會責任與生命延續的勞動形式，試圖在性別不平等的制度內尋找生存解法。

然而，這些婚姻並未提供保護與資源，反而推她進入更深的勞動與育兒壓力之中。她的韌性，不是來自一次性的勝利，而是在一次次被打敗後，依然重組日常生活的能力。這種「有創傷卻仍前行」的姿態，是她的生存倫理。女人在那 1960 年代單親要養大 3 個小小孩，如何賺錢去照顧兼顧，我阿母用的是找一個男人來幫忙養家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母親的幾任丈夫就如鄰居芙蓉阿姨說的：「恁阿母真歹命，幾個男人看起來都不錯，但是過恁阿母的手，就壞去了。」阿母經歷幾任老公，對家計一點幫助都沒有，不知道這些男人為什麼都沒有工作，而且還是靠阿母出外賺錢養家：「都是為著恁們幾個，才會安ㄟ」這是阿母經歷幾段婚姻後告訴

我，都是為了養大我們這些孩子，才會找查埔人，誰知道他們都是愛呷嘸愛賺。

阿母有一種深藏在骨子裡的苦命無處可逃，母親的原生家庭本身就站在極不穩固的基座上。外公、外婆皆為視障者，生活仰賴算命與按摩維生，經濟資本薄弱，無法為子女提供穩定的支持網絡。四個兄妹各自背負著難以承受的生命重擔，母親與舅舅皆年輕喪偶，三阿姨與丈夫皆為盲人，生活雖平順卻局限於低收入的生計；二阿姨因嫁給大她三十多歲的老芋仔，加上排行老二的「命格」，被視為逃過災劫。外公常說「家中每人一破」，用命理的語言將喪偶、殘疾、離婚等事件納入「天命」的框架。這種說法或許在情感上提供了一種解釋與安慰，卻同時固化了無力感，使家庭成員習慣將困境歸因於命運，而非去尋找結構性的解法。

對我而言，這意味著母親並沒有可倚靠的原生支柱，她的求生策略只能依靠自己反覆縫補生活裂縫，也讓我從小就見識到「家」並不一定能提供保護的現實。而我的游家我的阿公有 6 個兒子 3 個女兒，其中大伯跟我父親 老二 還有四叔皆在 20 多歲往生，三叔及 5 叔 40 多歲都出家當師父，小叔叔因為過繼他人逃過一劫，而我三個姑姑也是剩二姑持續維持家庭生活，大姑跟小姑皆在婚後出家當師父。

我很不喜歡用命運來解讀這一切，好像我被綁住無法動彈，也不用再動彈了，因為是命所以我很少去談兩邊家人的生命經驗，不想回到命裡去歸因，但是我必須說我也是家中女兒排行老二的位置。我是拒絕被宿命束縛的行動者，卻同時背著家族敘事的陰影與安慰，游走在理性抗拒與情感依附之間的矛盾，在情感上可能有緩衝功能，在面對家族悲劇與生命無法解釋的苦難時，「命」能暫時提供一種心理上的合理化，減少自責或對他人的過度憤怒。也許我正是這樣給內心一個安置的位置。

一、 以下是母親的伴侶順序：

表 二 研究者母親的婚與狀態

甲	1957 年潘玉梅與我父親游得東結婚，生下 2 女一男，1963 年過世。留下大姊與我還有大弟。
乙	1966 年潘玉梅認識了「乙」而同居，但是很快地 因為好賭及暴力關係而分手 「乙」用斧頭砍傷潘玉梅的頭，所幸送醫急救後命還在，潘玉梅很快的與「乙」分手在同一年 1966 年。
丙	1966 年潘玉梅同一年與「丙」同居：很快生下二弟，「丙」也是沉醉

	賭博中，在 1968 年潘玉梅去賭場苦勸未果大鬧之後，「丙」就離開了二弟卻留下與我們同住。二弟因為父母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因此父親欄為「父不詳」。
丁	1970 年與「丁」結婚：生下大妹與小妹，因為「丁」長期無工作家庭經濟仰賴母親身上，因此在 1975 年潘玉梅也與「丁」離婚，「丁」帶走兩個女兒。
戊	1976 年潘玉梅的最後一任先生是「戊」，「戊」在我小學畢業時就進住我家，這位「戊」和潘玉梅倒是有白頭到老，但是兩人並沒有在生小孩，直到「戊」在 2001 年往生。

所有的辛苦總該隨著兒女的長大有所回報，潘玉梅一定是這樣想與期待著，誰知道運命一直不喜歡潘玉梅，總喜歡扼殺潘玉梅的希望，找不到一個好男人之下，子女也狀況連連，潘玉梅的豐華時光就在這樣的歲月中消失殆盡。

二、 以下是潘玉梅所生的子女簡要介紹

表 三 研究者的兄弟姊妹狀態

大女兒	與甲所生的小孩，與游雅帆同一個父親。當大女兒小學畢業當可以在加工區工作賺錢時，卻因為腦膜炎昏迷將近 22 個月，好不容易醒過來時智商僅剩 8、9 歲的樣子、右半邊手腳行動不便、也失去語言能力，當時大姊只有 15 歲而已，雖然是身體有多重障礙，潘玉梅還是不放心家中放著一個少女，因此選擇一位比大姊多了將近 40 歲的老男人嫁出去。婚後也生了 3 個兒子。
二女兒	游雅帆(我)：小學畢業開始白天工作晚上念書，一路從國中補校到夜二專，婚後持續修社工、碩士、到現在博士生，對錢的味道特別敏感，總能聞到商機找到賺錢的機會，但是娘家就像個無底洞永遠填不滿，導致最後從事社區工作賺不了什麼錢，我竟然也甘之如飴。 我到了哪種「沒有，就合理不用給」，很難讓人想像我為了不想再給潘玉梅錢，我讓自己走向貧窮，剛好釣弼想走社區工作我也欣然支持，這是當時我對潘玉梅的一種抗議。

大兒子	大兒子與大女兒、二女兒是同一個父親，18 歲就結婚，育有一子，兒子是重度多重障礙的孩子。大弟老婆生產完，因為大弟因為毒品還在監獄中，所以她就留下孩子跑掉了，潘玉梅就接手帶這個孫子到潘玉梅往生，大弟才接回兒子同住在桃園。
二兒子	二兒子因為他的爸爸「丙」與潘玉梅只是同居，因此證件上為父不詳，兩個兒子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就是狀況連連，車禍、偷竊、吸毒...等，兩人輪流發生，當然也輪流進入監獄。二兒子因為與雅帆不是同一父親幼時就少來往。
三女兒 四女兒	1970 年與「丁」結婚生下 2 個女兒，1975 年離婚時，三女兒與四女兒被「丁」帶走，而「丁」因為欠債不敢讓孩子念書，所以三女兒跟四女兒都沒有將小學唸完，游雅帆經常物資接濟這兩個妹妹，包含寄小學讀本讓她們可在家練習寫字，後來大妹也半工半讀唸完高中，現在也育有 3 個小孩，小妹則念完國中就沒再持續念書，不結婚也沒小孩。

三、潘玉梅與游雅帆：生命交疊與行動倫理

潘玉梅，1935 年出生於屏東滿州鄉的盲人家庭，作為家中長女，自幼承擔照顧弟妹的責任。戰後台灣的貧困與性別不平等，使她的教育與經濟資本極度有限。在缺乏制度性支撐的條件下，潘玉梅將婚姻視為一種生存策略，先後歷經五段婚姻，核心皆是尋找「經濟支柱」。然而，這些關係多數伴隨伴侶失業、賭博、暴力與缺乏責任，未能提供實質保護與資源，反而加重了育兒與生計的壓力。這種在性別結構中尋找縫隙的方式，在外界看來或許是失敗的婚姻，但在潘玉梅生命邏輯中，是在有限條件中反覆嘗試的縫補行動。

游雅帆的童年與青春，正是在這樣的婚姻循環與家庭裂縫中度過。作為二女兒，我提早進入勞動市場，經歷童工、計件工、多重兼職、家庭代工到社區經營，對經濟壓力與生存風險有高度敏感。然而，母親的多次再婚，也讓我承受「身世不清白」的社會歧視，從國中補校被拒絕加入國民黨，到交友與人際關係中刻意隱瞞家庭背景，這些經驗累積成對母親長達五十年的怨懟。

在女兒的位置上，我看見的是一個「不合格的母親」；在母親的位置上，我才

體會到「養大孩子」背後的孤立與無力。這種價值觀的不一致，長期左右了我的情感與行動。我拒絕用「命運」去解釋母親與自己的生命際遇，因為那會凍結行動的可能性；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認，母親的婚姻策略，其實是源於原生家庭貧弱與缺乏支柱的延伸，不論是潘玉梅的盲人家庭，或游雅帆的破碎家庭，都指向同一個結構性貧困的根源。

我很驚訝地發現，自己與母親「在縫隙中求生」的行動邏輯如此相似。母親在沒有制度支撐的年代，把婚姻視為一種經濟策略，藉由尋找「查埔人」填補家庭的經濟與照顧缺口；而我在另一個歷史時期，將這種「外部依附」轉化為爭取政府資源、計畫與有給職的機會，讓婦女透過公共參與獲得收入與社會網絡。這種延續與轉譯，揭示了生存策略在不同結構條件下的變形，它既是家族生存智慧的遺傳，也是在新的制度語境中重新編碼的行動。

然而，策略的轉化並不意味著結構壓力的消失。母親面對的是伴侶的暴力、失業與不負責任，我面對的則是制度性指標的壓迫與時間分配的剝奪。在有給職的社區工作中，高強度、無閒置的工作節奏，與婦女本身必須肩負上下兩代照顧責任的現實交錯，使得「賦權」與「生活負荷」之間出現持續的張力。這些張力有時表現為行動疲勞與資源分配爭議，有時則是我與社區婦女之間的衝突與誤解，特別是當我沿用自己長年累積的工作習慣與效率邏輯時，往往忽略了婦女的生活節奏、身體狀態與情感需求。

正是在這些衝突與不適中，我逐漸意識到，如果賦權只是依附在外部資源輸送的單向過程，那麼婦女的行動終究會被鎖在資源邏輯的框架內，難以生成真正的自主性。唯有回到生活現場，將婦女的默會知識、日常節奏與照顧經驗視為可被尊重與整合的行動資本，社區的力量才可能持續。這意味著，我需要從符應制度與計畫指標的「成果導向」轉向「關係倫理」，在互相理解與共同縫補裂縫的過程中，讓行動成為雙向塑造，而不是單向賦予。

因此，我與母親的相似之處，不只是「都在縫隙中求生」，更在於我們都在與外部力量建立連結的同時，經歷了內部的張力與磨合。不同的是，母親的縫補是以家庭為核心、個人承擔風險；我的縫補則嘗試將風險與資源分散到一個更廣的社區網絡中，讓這張網能在多重裂縫之間延展，並承載更多人的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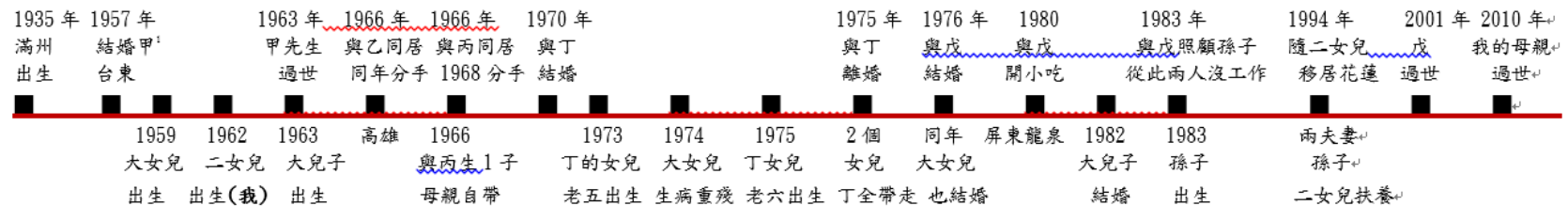
這種跨世代的相似，讓我意識到「手工知識」的核心不在於找到一個萬全的解

法，而在於保有即興調整、邊做邊看、遇破就補的能力。母親在她的時代用關係與體力縫補裂縫，我在我的時代用資源與組織縫補裂縫；我們的工法不同，但都必須在有限的材料與不斷變動的結構中尋找可行的支撐點。更重要的是，這種手工修補術在跨世代的傳遞中，也伴隨著反思與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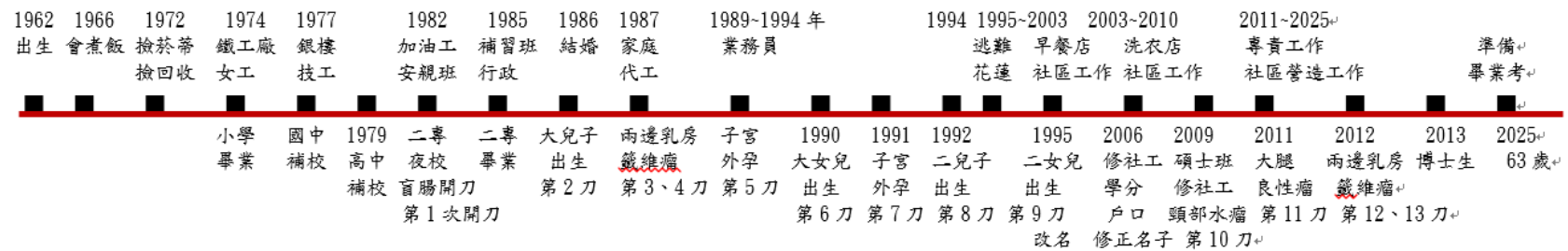
母親的依附策略讓我看見風險與限制，因此我嘗試將依附轉化為賦權，把外部資源分散到更多人的手中；而我在社區行動中經歷的衝突與張力，也提醒我不能只依賴制度化的指標與資源，必須回到關係倫理與婦女的日常節奏，讓修補的手工藝真正貼近布料原有的紋理。於是，「在縫隙中求生」不再只是生存的被動姿態，而是一種跨越時代、能夠主動調度材料與關係、持續修補與重組生活的行動倫理。它既承繼了母親的生存智慧，也融入了我在社區行動中對賦權、關係與生活本身的反思，成為一種在裂縫中仍能延展、守住彼此的韌性工法。



潘玉梅-我的母親生命軸線：上層是母親的婚姻與移動軌跡

潘玉梅²：下層是子女的出生與粗略介紹

游雅帆-我也就是二女兒：上層是勞動過程



游雅帆-求學過程與身體開刀事件

¹1957 年與我的父親結婚，數字代表每一任的伴侶順序²潘玉梅 1935 出生在一個雙盲家庭，身為老大、有二個妹妹、一個弟弟、小妹也視障

圖二 研究者母親/潘玉梅與研究者/游雅帆的生命交疊

第三節 家庭與地方的行動倫理

依附、縫補與承擔，是在這個家庭與地方的行動倫理：在年輕階段，我的婚姻想像是一種縫補生路的策略，是決定要嫁外省人，最好是軍人。這並非浪漫的選擇，而是依附的盤算：為什麼要選擇外省人？因為大陸人在台灣幾乎沒有什麼親戚，如果要被人說長論短，至少家族中不會太多人口說話，加上當時外省家族比較不會對女方要求太高，還有一定要選擇軍人來嫁，是因為軍人是不得離婚的，否則會影響仕途，還可以頂讓官舍不用花很多錢就有房子可住，而且有終身俸可以吃，萬一老公比我早往生，我還有半俸可以養家活口，嫁給軍人有這麼多好處，最重要的還是沒有族繁不及備載的姻親，來對我原生家庭說三道四的。

1986年，如我所願，我嫁給了一位軍人「鈞弼」。公公來自雲南，婆婆來自湖南，兩人育有八個孩子，五男三女，而鈞弼排行老七，是道地的外省第二代。第一次踏進鈞弼的家，正逢除夕夜。公公是回教徒，所以不能吃豬肉，餐桌上滿滿的都是牛、羊、雞肉的料理。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這一桌佳餚簡直驚艷極了。因為在過去的日子裡，我連一碗燒肉飯都捨不得買來吃，更別提這樣一桌豐盛的菜餚了。將近二十人圍坐在一起吃年夜飯，那種熱鬧與溫暖，是我從未有過的經驗。記憶中的除夕夜，我幾乎總是孤零零地躲在工廠宿舍裡度過，冷清又孤單。正因如此，眼前這樣的場景，讓我深深震撼，彷彿從「匱乏」瞬間跨入「豐盛」。那一刻，我甚至以為自己終於縫好了一個可以安身的口袋，這個鈞弼，或許真的我是嫁對了。

然而，縫補總會再裂開。公公曾提醒鈞弼：「娶這樣家世複雜的女人，麻煩不會斷。」事實也印證了這句話。進入社區工作，最初是鈞弼的選擇。我並非主動者，而是因為跟隨與陪伴，才逐漸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利基。從撰寫企劃、整理資料，到與婦女一同勞動，我開始發現：這些看似瑣碎的事務，竟與我成長過程的勞動經驗相扣。原本是依附於丈夫的行動場域，慢慢轉化成我自身的實踐空間。

也因此，鈞弼對我而言，不只是「婚姻盤算的一部分」，更是帶我進入另一個縫補場域的同行者。社區工作不是我的原點，但卻成為我能將「被動」轉為「能動」的所在。依附，因著共織，逐步生成了賦權。

一、裂縫中彼此縫補、共生前行的實踐

母親永遠有著太多意外發生，然後需要我協助幫忙找錢出錢，我的母親在我婚後還是不斷地來拿生活費，加上 2 個弟弟大小事件不斷需要錢解決，每次一接到母親電話就是家裡有有意外發生需要一筆錢去處理，導致日後我很怕接到我母親的電話，這個陰影到我母親過世才慢慢放鬆。

看到母親來找我或聽到從電話筒中傳來家人聲音都令我焦慮跟害怕，這種害怕的感覺到母親已經往生多年還是依然存在，寫到這裡我有一種難以說清楚的苦楚，掉入最深處的「情緒」以為已經被遺忘了，誰知道它會藉由不同的情境，隨時翻滾上來讓我招架不住，有時候「情緒」被收納到第幾層去知道了，但會在某一個撫慰的聲音中被喚醒讓自己悲傷莫名的眼淚流不停，且會說不清楚是為了哪件事流淚，說時又好像都沒那麼嚴重，這樣的情緒勞動與身體的記憶深深刻在肌肉、神經與眼淚中，把「害怕與補位」內化成身體的反射。

有時候我會驚訝的看見自己想去死，很驚訝吧，連我自己寫到「想去死」也會嚇到，還好自己夠忸種不會有這種自殺的荒謬事發生。雖然總是被拉扯、被迫付出，但我也養成一種「隨時縫補破洞」的能力，情緒崩潰，就用壓抑或推遲來度過。這種不斷迴圈的修補，累積一種「裂縫中生存」的韌性。

因為弟弟的債務讓鈞弼無法再當軍人，也因為幫家裡處理債務意外陷入財務公司的黑洞中，我變成見不得光，先生選擇提早退伍，鈞弼在那個時間點，已經失去軍人身份，也因此失去了穩定的薪資、福利與保障。他並不是進入一個已備妥的安全網，而是要和我一起背上來自原生家庭的債務、母親與戊先生的依附、大弟孩子的照顧，以及我們自己的四個孩子。這些重疊的負擔，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公，別人或許可以專心經營小家庭，而他卻必須承擔「兩個家」的開銷。

1994 年冬天一家五口加上我肚子還懷著 5 個月大的胎兒回到鈞弼的故鄉-花蓮，我的母親和戊先生、大弟的多重障礙的孩子也跟著我們來到花蓮另外租屋居住，重點是我們還要肩負養他們這一家人的開銷。先生跟我只好選擇賣早餐過日子，不僅可以兼顧孩子，而賣不出去的早餐也可以讓這兩家 8 口有食物可以吃，因此賣早餐是最好的盤算。

1995 年 2 月 28 日是我準備剖腹生孩子的日子，鈞弼已經不是軍人也沒有任何保險可支付醫院開銷，算一算需要 7 萬多元的醫藥費用，鈞弼根本不敢歇業陪我去生孩子，只好由小學 3 年級的大兒子帶著 5 歲的妹妹及 3 歲的弟弟一起跟我去

醫院，因為鈞弼要做生意無法兼顧孩子，而慈濟醫院的師姐們也願意幫我照顧我的小孩，所以 3 個孩子就陪我去醫院生小孩了，鈞弼必須獨自撐起早餐店努力賺取手術生小孩的費用，無法理解鈞弼當時在凌晨起床市場採購到備料製作小籠包、豆漿、餡餅、韭菜盒子、水煎包....最後販賣結束打掃善後，還要到醫院去照顧我們母子 5 個的勞動的分配與經濟的心理壓力，我常想，鈞弼的勞動，已經不只是「一個丈夫應該做的事」。那是一種用身體硬撐出來的行動倫理。他沒有什麼大道理，也沒有什麼計算，他就是每天凌晨去市場，揉麵、備料、賣早餐，再收攤、打掃，最後還要趕去醫院看我、陪孩子。這種日復一日的縫補，不是單純的責任，而是一種手工知識。

他把沒有保障的生活，一點一滴縫成可以過下去的日子；他把沒有退路的时间，切割拼湊成市場、攤位、醫院與家庭的來回；他把不斷壓下來的焦慮，用陪伴與承擔慢慢縫合。我後來才懂，這不是我過去想像的「婚姻策略」，不是依附一個有終身俸的軍人來過日子，而是和鈞弼一起，在困境裡共織生活的縫隙。他的勞動，讓我看見「共生」的可能：兩個人不是誰靠著誰，而是彼此在裂縫裡支撐著、縫補著，才走到今天。鈞弼的勞動，讓婚姻從一種生存策略，轉化為在裂縫中彼此縫補、共生前行的實踐。

二、 家人的縫補：極限中的分工與韌性

我記得早上 9 點多當身體消毒乾淨換好手術衣的時候，大兒子在旁邊看著我要被推進手術房時眼神是多麼的驚恐，到現在我都無法忘記那個眼神，手術後醒來時已經在病房了，大兒子就坐在病床旁等我清醒，我一醒過來就感覺下體一股溫熱的液體不斷湧出，用最後的聲音叫大兒子趕快去叫護士然後我又昏迷了，再度清醒已經在加護病房看見護士幫我輸血及吊著點滴，醫生則伸手進去子宮幫我清除血塊止住了血崩的情況，都可以感覺醫生整個手腕好像都伸進子宮內了。突然看到吊著的血袋整個灑下來在我白色的床單上，被隔在窗戶外的兒子已經嚇到不知道如何是好，護士更是驚慌，不過是血袋破了而已，只是紅色的血撒滿床單的畫面太驚人了。

那一場經驗，其實最深刻的不是醫生的專業，而是我自己在極限中，如何用最後一點意識調度身體、孩子、還有現場的資源，把一個快要崩裂的場景硬生生縫補

回來。當我叫大兒子去找護士的時候，他雖然年紀還小，卻不得不在那一刻成為「關鍵角色」。他承接下來的不只是驚嚇，而是被迫提早學會照顧與承擔。想到這裡，我常常覺得，那一場血崩，不只是我的生死交關，也是一種母子之間用身體與行動縫合出來的生命拼貼。

再度回到病房時看見我的母親也來了，本來還在想是否可以幫忙照顧一下我那 3 個孩子，沒想到母親先開口說：你的大弟好像要結婚，我必須去台南一趟。就這樣我的母親離開了醫院再也沒有來醫院看過我，這是我跟先生每個月都還要支付 8000 元給她過日子的母親。

在醫院 10 天都是大兒子中午放學(明廉國小在慈濟醫院隔壁)來醫院地下室買午餐給弟妹吃，我的午餐則是等先生收攤備好隔天的料大概下午 2 點多帶來給我吃。每到中午 6 人房的產婦病房就是熱鬧烘烘的，且一直聞到雞酒香，心中真的是非常的悲戚，只能不斷告訴自己有 4 個孩子了要堅強，一定不可以落入母親的命運中，最開心的是 1995 年 3 月 1 日健保開始啟動，我出院時竟然只需要付 6000 多元而已，原本備好的手術費用就變成我逃難的費用。從醫院出來我就跟先生說我要逃離我的母親，我對我的母親已經切心呀。

在我生產大出血臥病在醫院的日子裡，家庭的日常被迫重新編排。鈞弼在凌晨備料、販賣早餐，確保家計不中斷；我則在病床上調度有限的心力，盡量安撫孩子們的不安；大兒子雖然年僅小學，卻每天放學後主動買午餐給弟妹，承接起過早到來的責任。這樣的分工並非事先安排，而是在突發困境中自然生成的「手工知識」，每個人都用自己的身體與能量去補一塊縫隙，讓整個家得以撐住。

這不是單純的「角色互補」，而是一種生命共同體在極限中展現的行動，危機來臨時，沒有誰是旁觀者，每一個人都被迫進場，用力地承擔、用力地調度。正因如此，家庭沒有因脆弱而徹底崩塌，反而在縫縫補補之中生成新的韌性。

第四節 補償到承擔：鈞弼的地方實踐

1995 年 11 月，我徹底與母親斷了聯繫。因為生產事件，我已經對母親切心，不再願意承擔她與戊先生的生活。於是，我與鈞弼帶著四個年紀在一歲到九歲之間的孩子，搬到豐田「隱世埋名」。那一天「1995 年 11 月 23 日」對我而言，是正式脫離母親日子的起點。

我們開始靠著開小吃店討生活，從早餐一路賣到晚餐。對我來說，這樣日夜不斷的勞動並不陌生：自小孩到成為母親，我的人生就是從白天到黑夜的勞力堆疊。然而，即便如此，仍無法填補原生家庭留下的龐大經濟坑洞。

我 1962 年出生，到 1995 年已經三十多年，卻仍深陷在飢餓與恐懼之中。債務壓身，四個孩子要養，前路並不明朗。那種「窮到骨子裡」的日子，使我對物質的渴望幾乎成為無止境的慾望，因為貧窮不只是缺乏金錢，而是一種刻在骨髓裡的匱乏感，讓人無法停止追尋補滿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我對「錢的味道」特別敏感。後來走進社區工作時，這份敏銳成為我在制度與專案縫隙中尋找資源的能力：學會如何把依附轉化為增權，讓婦女能透過「有給職」得到收入與公共參與的空間。

鈞弼在鄉村（豐田）好像過得挺適應的。他的物慾很低，總覺得「過好日子會對不起人」。因為對債務人的愧疚，因為對家庭與國家的責任，因為個人的信仰，他選擇像苦行僧般過日子。即使我們的生活早已清苦，他仍常常把小吃店的時間與收入拿去協助弱勢家庭、維護環境。

我曾不解地問他：不是應該先好好賺錢，讓孩子和我們自己過上安穩的生活嗎？他卻淡淡地回答：「過好日子會感覺對不起人。」這句話讓我至今都記得。回頭看，那時文建會（後來的文化部）正在推「社區總體營造」，可是在 1995 年，我們壓根不懂什麼是「社區營造」，也不知道要成立組織申請經費。但鈞弼卻早早投入到這些工作中，原因不是制度或計畫，而是他內心的愧疚與信仰，他透過「協助別人」來救贖自己。

對鈞弼而言，「拯救自己」與「拯救社會」是交錯的。他不是因為有餘裕才行善，而是因為內在的虧欠感推著他，把小我延伸成大我，把婚姻之外的責任延展到整個村落與土地。這樣的勞動，不只是丈夫的義務，而是一種生命共同體的倫理，透過行動縫補個人的缺口，也縫補社會的裂縫。

我後來才體會到，真正的社區工作往往不是制度設計的結果，而是來自人心底那份「不能坐視不管」的責任感。我的婚姻策略原本是為了脫離階級與污名，卻終究無法完全擺脫原生家庭的創傷；而鈞弼則用他的方式，把這份愧疚轉化為公共責任。夫妻倆各自用不同的路徑，卻在失敗與低谷中交錯出一條新的實踐之路。我的社區實踐不是一個人完成的，而是我和鈞弼在「如何面對貧窮、愧疚、責任與價值的糾結」中，共同縫補出來的生命手工。

第五節 裂縫，就是我行動的起點

我和母親潘玉梅之間，沒有什麼清楚的傳承線。我們不像一棒接一棒那樣順暢，而比較像兩代人，各自拿著破布，在不同時代，用自己的方式縫縫補補。

母親在她的時代，是靠一次次地「找查埔人」來維生。雖然看起來是一種依附，但其實每一段關係，都是她在沒有制度、沒有安全網的情況下，用身體去搏一條出路。那不是從學問來的知識，而是從苦裡拚出來的「手工知識」。而我雖然拒絕她的路，但所走的，也不過是另一種縫補：我依附的不是男人，而是計畫書、政府資源、社區專案。試圖為婦女創造一些「有位置」的公共參與空間，這是一種換一張布的補法。

但後來我才慢慢明白：婚姻、勞動、社區行動，從來都不是什麼浪漫選擇，而是我與家人在生活裂縫中，彼此縫補、彼此撐住的工法。早餐攤的清晨、大兒子在病房裡的驚恐、先生在市場與醫院之間奔波……這些日常，說穿了，不只是分工，而是我們用各自的身體和情感，硬生生磨出來的行動知識。

尤其是鈞弼，他的勞動，讓我看見「補償」如何慢慢轉化為「承擔」。他不是因為有餘裕才投入社區，而是因為愧疚、信仰與責任，願意把小我縫進大我，把這個家，縫進我們所共在的地方。

我越寫越明白：這篇研究，不是寫「怎麼成功」，而是在說「怎麼活下去」，而且活得不孤單。這樣的活法，是靠一次次被打敗後，仍願意開始縫補的勇氣。所謂「縫補工法」，不是急就章，也不是對失敗的勉強修補，而是一種從身體經驗長出來的行動倫理。它不靠指標、不求效率，而是問：這段關係縫不縫得住？這個人能不能留下來？這個行動撐不撐得過？

這樣的縫補，不只是母女之間，也存在於家庭之中、社區之內。我們在生活邊緣交錯縫合，久而久之，那些雜亂的線頭，就成了一張真正能撐住生活重量的韌性網絡。

補得再破，也是活過的痕；縫得再慢，也是走過的路。

我們就是在這些裂縫裡，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法。

第六節 小結

本章以「裂縫」作為理解生命與行動的關鍵視角：我的知識不是在安穩與完整中被教會的，而是在不斷破裂、補位、重組的日常裡，被身體先學會、再由關係慢慢說清楚。第一節回到勞動的身體記憶——疤痕、繭、節奏、判斷、撤退與冒險的時機——它們不是回憶的裝飾，而是一套「活在身上」的手工知識：在資源有限時如何調度自己、如何保留分寸、如何在交易與關係之間不被拖垮。這些具身經驗也讓我明白，生存從來不是單一技能，而是一連串帶著倫理重量的選擇。

第二節把鏡頭拉向母女間的縫補。母親在她的時代，用婚姻作為依附策略，是在缺乏制度支撐下對生計與母職的拼命嘗試；而我在拒絕「命運說」的同時，也承認自己同樣在裂縫中求生，只是換了一種材料與語言：把依附從「男人」轉譯到「資源、計畫、組織與有給職」的可能。這裡的重點不是判定誰對誰錯，而是看見：跨世代的生存策略如何在不同時代被改寫，也看見我與母親之間長期怨懟背後，其實是同一種匱乏處境所逼出的焦慮、控制與補位慣性。於是，「縫補」不只是情感和解的語彙，更是理解家庭與階級如何在日常中留下痕跡的一種方法。

第三、四節則把裂縫推向更大的倫理場域：家庭如何在極限中生成分工與韌性，地方如何在沒有安全網的條件下長出行動倫理。從我對婚姻的現實盤算、到進入社區工作後的轉向，本章特別指出：行動倫理不是先有理念再去執行，而是當生活逼近崩裂時，人如何「不能不做」、如何在責任、愧疚、照顧與資源縫隙中，把日子一針一線縫回來。鈞弼的地方實踐呈現這種倫理的另一種路徑——不以語言宣告價值，而是日復一日的勞動，把「補償」慢慢走成「承擔」，把小我縫進大我，讓共生不再是理念，而是可以被撐住的生活方式。

因此，第五節所說「裂縫，就是我行動的起點」，不是浪漫苦難，而是對方法論確認：關心的不是成功敘事，而是如何不孤單地活下去；書寫的不是完美方案，而是縫補過程中的分寸、張力與代價。裂縫讓我看見：手工知識之所以成為知識，正因它同時包含生存技術與關係倫理——要問的從來不只是怎麼做，而是「這段關係縫不縫得住？這個行動是否能在生活節奏裡延續？」本章為後續討論鋪路：當縫補不再只是個人或家庭的工法，而逐步延展為地方的互助網絡與公共行動時，「裂縫中的知識」便可能成為一種可被他人承接、可被共同實作的行動倫理。



第三章 從培力到手工倫理的「行動的分寸軸」⁶

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是自 1994 年由文建會推動的一項長期、廣泛的社會改造工程。起初，以文化藝術切入社區，希望凝聚地方認同、改善生活環境、建立社區文化特色，進而實現由點到線、到面，打造「新故鄉、興文化」的願景。

2004 年，文建會主委申學庸更進一步將「文化發展」視為社區工作的核心策略，試圖以國家資源重建社會基底。然而，這樣的路徑雖提升了社區議題的能見度，卻也讓「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的界線更顯模糊，社區是否擁有真正的主體性，成為長期爭議。民間學者甚至批評，國家透過社造計畫重新部署資源，意圖建構一種「新國家認同」的文化治理模式⁷。根據王本壯的觀察，台灣的社造歷經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1995–2002）：以個體示範為主，建立觀摩與經驗交換的模式基礎。
- 第二階段（2002–2010）：推動「挑戰 2008：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從「行政社造化」著手，嘗試整合政府資源與跨部門協作。
- 第三階段（2010 至今）：許多社區已超過十年耕耘，具備跨社區支持與在地培力的能力，「地方文化生活圈」的概念也在此背景下浮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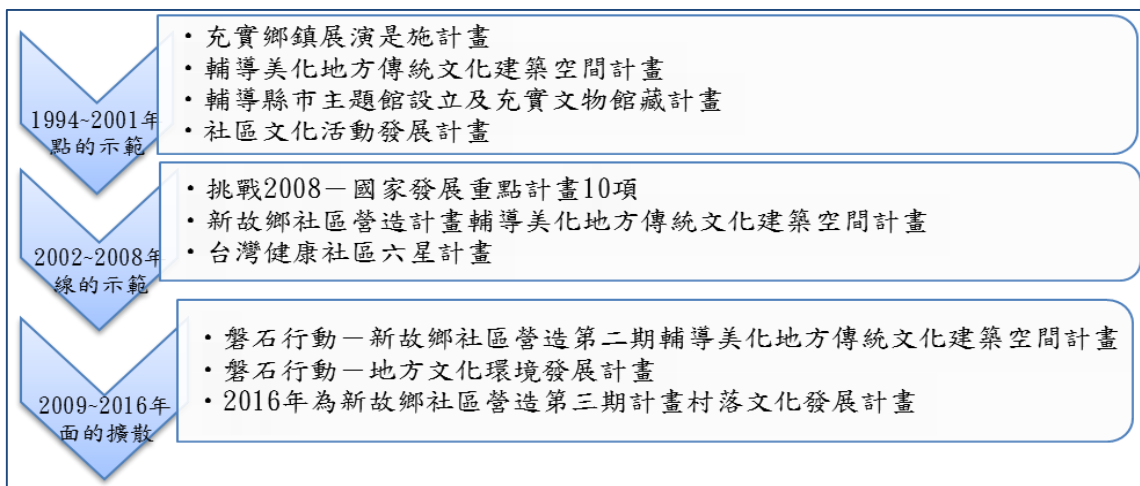


圖 三 國內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發展歷程

⁶ 彰顯「拿捏的藝術」而非技術管理。

⁷ 向家弘（2007）。社區培力，培什麼力？——作為一個公民主體的能力。

<http://47go.org.tw/article/956>。讀取時間：2026 年 1 月 31 日。

而我正是在這第二階段初期，進入社區實務工作。當時我並不是從文化活動或環境美學切入，而是懷抱著一個根本性的提問：一個人，怎麼才算是「健全地活著」？我理解「人」的形成，必須穿越三個層次的交織：

- 「個人層次」上，他需要能掌握自身的生存與安全，有定位生命的能力。
- 「社群層次」上，他需要感受到認同與歸屬，不致落入社會疏離與孤立。
- 「社會層次」上，他必須在一個可實現自我價值的文化場域中，獲得尊嚴與滋養。

這三個層次，對我來說不是抽象理論，而是每日在社區中、在一個個居民生命現場中，具體可見、可觸的現實困境。因此，當我開始設計社區工作時，心中始終盤旋著一個更深的命題：當一個人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無法滿足，他如何可能走出家門、參與社群、持續學習？他要如何進入「認同、歸屬、尊重與自我實現」的那條路？這也讓我看見，所謂的「社區營造」若只是表層的造景、美學、活動，而無法觸及底層居民的基本生存條件，那它終究只是空中樓閣。

所以我轉而問自己：是否有可能開闢一條，讓底層群體在政府資源盤算中，找到可生活、能學習、有連結、有價值的實踐之路？是否能在行政資源的邏輯裡，釋出縫隙，讓那些本來無法參與公共的人，也能進入這條地方的再造路徑？我所參與與設計的社區工作，正是沿著這個問題意識前進，不只是讓社區「被營造」，而是讓人「被看見」、「能參與」、「可以留下來」。

第一節 社區營造與現實矛盾

自 1994 年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來，台灣社區營造政策歷經二十餘年發展，逐漸從環境、文化藝術切入、凝聚社區意識，延伸至社福、醫療、教育、環保、產業發展等面向，期望透過居民參與，建構一個新的社會樣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精神。

陳其南曾以「造人」為核心，指出社區總體營造不只是物理空間的重塑，而是一場從生活價值出發的寧靜革命：強調由下而上的民主參與、公民意識的培養、公共治理的落實，最終讓社區成為一個可自我規劃、自我實踐、自我關懷的生活單位。這樣的願景，不只指向文化與空間的更新，更是要「從人的改變開始」，讓人民在實踐中長出判斷問題的邏輯、面對困境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資源。然而，事情永遠

沒有那麼簡單。

我從社造實務的現場開始發現：社區營造若真的要落實，必須「走進家門」，而不是只在社區廣場、活動中心辦活動。當我開始試圖讓孩子參與社區活動時，迎面而來的不是活動設計問題，而是家庭照顧失衡、經濟貧困、教育資源斷層、醫療需求與隔代教養交織而成的生活困境。一個小孩無法準時出席，不是因為他不想來，而是因為他要幫阿嬤打胰島素、照顧弟妹、或自己就是照顧系統的一環。這讓我深刻理解到：任何一個社區議題，都不可能單獨存在。

因此，社福、教育、醫療、安全、環境與經濟的議題，通通被迫拉進社區工作之中。而面對這些交織的社區需求，單一部會、單一方案、單一計畫往往難以完整回應。更困難的是：政府資源仍以部會邏輯進行切割，而我們卻必須將這些切割過的資源再度整合、翻譯、協商、轉化，才能真正對應居民的處境。

這也讓第一線社區組織如牛犁，承擔起多重角色，既是窗口、也是資源協商者、同時還是關係編織者。居民面對困難，無法分辨來自哪個部門的資源、該找哪個窗口，而社區型民間組織若能有效承接這個角色，不但能補足公部門人力與制度的不足，也能在過程中建立屬於自己的社會網絡與在地能力。

然而，這樣的現場經驗並不總是被理解。有學者建議我們應聚焦單一主題，以利形塑社區形象：例如，桃米與青蛙、白米與木屐。那牛犁的代表物是什麼？但我們知道，牛犁的工作不是從品牌出發，而是從生活的真實困境出發，從居民的痛點出發。我們無法也不願為了配合標準化發展模式而切割問題，而是選擇面對那些交錯、難解、但真實存在的複雜處境。

也有批判聲音指出，社區組織不該替代政府應做之事，否則可能助長政府卸責。這個觀點有其制度正當性，但卻忽略了基層生活的急迫性，生活困境無法等待，也不會因為制度未完備就暫時停止。當我們被居民拉著、推著進入那些沒有答案的日常裡，我們才知道：這絕非志工所能解的工作，而需要長期、專職、且能跨部會語言進行整合的專業團隊。

從社造精神出發，我們理解這是一場「從人開始」的工程；而在實務現場，我們更知道，若沒有承接「人的困境」的能力，社區工作的核心，不在於造景、造產或活動，而在於「人」。真正在社區的行動，是從人出發、以生活為本的倫理實踐。若無法承接人的困境與關係，任何計畫都只是表面功夫。

社區的價值在於「關係」人與人之間願意互助、傾聽與陪伴。在行政化與績效導向的制度下，社區工作更要守住那份「彼此在場」的溫度。社區中非主流人物的行動最能體現這份精神。他們以照顧為行動，串連社區的生活網絡；以勞動維繫關係，讓文化在日常中被再生。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其實是一種以生活為核心的經濟與文化實踐，讓社區重新成為「共好」的生活場。因此，社區行動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以關係為根、以照顧為行動、以文化為魂。讓公共不再只是制度，而是一種生活倫理，讓社區，不只是被營造的地方，而是能彼此支撐的共同体。

一、 分一杯羹：從地方實踐中看見的掙扎

對我而言，走進社區工作，一開始其實是源自一種「妄想」，一種來自原生家庭貧窮與困境中延續下來的執念。我童年浸泡在不安全、不確定與重複的失落中，看見母親為了讓我們活下去，不斷與命運、男人與社會機制搏鬥。她沒有安全網，沒有社會支持，只能靠自己，不斷「找查埔人」來填補生活縫隙。我從她的失敗中學會了什麼叫做求生，也學會了不能讓自己或其他婦女重蹈覆轍。

所以當我看見政府社區營造政策所開展出的參與機會，我開始想：是否可以帶著社區的婦女，擠進這條原本不屬於我們的縫隙？是否可以爭取「有給職」的公共參與機會，讓這些平常領日薪的婦女們，不再只能以志工的方式「義務貢獻」，而能透過系統性的學習與穩定薪資，在工作中建立社會網絡、獲得資源資訊、進而翻轉命運？

這不只是理想，而是我具體的策略與動機。因為我知道，對許多底層婦女而言，參與社區如果無法轉化為生活資源，那她們將永遠無法進場。社區營造如果不能讓窮人分一杯羹，那它就只是少數人的遊戲。

我起心動念本是為了「謀眾利」，不讓其他婦女像我母親一樣被命運壓垮。但當我愈來愈熟悉計畫撰寫、效益語言、跨部會資源協商，當我們開始學會用績效表去回應服務價值，我才漸漸發現，我們其實也一點一點地被這套「計畫邏輯」推進另一個生活方式：從默會的互助關係，變成了對價的照顧機制；從社群關係的延伸，變成了績效評估下的勞務切割。

我與婦女夥伴的關係，也因此的合作中產生張力。她們對我有諸多不諒解，我也對她們有滿腹委屈。我明知這是制度壓力與結構扭曲所導致的誤解，但在那段時

間，我仍然無法站在她們的位置去理解她們，就像我無法理解我母親一樣。我一邊希望婦女能有力地活出自己，一邊卻不斷用行政語言與政策框架要求她們「符合指標」。

而這種矛盾，也逐漸侵蝕了我的行動動力。我曾以為，社區營造可以是一條雙贏的路，既利人又利己。但我沒料到的是：當我們過度專注在「分一杯羹」的戰略中，便可能不知不覺遺落了更根本的事：行動倫理、人與人的關係，以及那份最初想為人撐一盞燈的溫柔。

社區工作，不只是為了資源配置、也不只是政策對位的技術，而是一種活在人群中的「關係責任」。當我們忘了這一點，即使擁有再多計畫，也可能只是在重複另一種形式的壓迫。我曾經妄想，可以用體制幫底層翻身。但現在我慢慢明白：翻身不是替代制度的位置，而是讓人與人之間重新建立互相理解與支持的結構。這條路不能沒有給職，但更不能沒有倫理。

二、被切割的整合：夥伴工作的真實現場

從協會的歷年工作經驗與計畫執行脈絡來看，牛犁社區的發展，是在國家多頭政策的夾縫中長出來的「地方治理實驗」。附錄一〈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簡介〉顯示，協會自 1996 年起以「環境教育學習型社區」為願景，從早期的文化資產守護、社區林業、環保生態，到後期的樂齡教育、新住民照護與地方創生，一步步將社區營造成跨領域的實踐場。它同時是一個行政節點、專業平台與居民互助體系，必須在政策語言與生活語言之間不斷翻譯與協商。這樣的結構，也形塑了「牛犁工作者」的特質。

我們既是政策的執行者、又是居民的陪伴者；既要面對部會的 KPI 指標，也要面對鄰里的生活情緒。我們的行動，在行政計畫裡被定義為「方案推動」；但在生活現場裡，其實是一種倫理實踐，是如何在有限資源裡維持人的尊嚴與互助關係。這樣的「全領域參與」是牛犁最大的特質，也是最沉重的負擔。

跨部會政策的切割與地方承接的繁重：從協會的歷年計畫可見，牛犁在與所有中央與地方部會都有合作：勞動部的多元就業、農業部的社區林業、文化部的社造與地方創生、教育部的樂齡與 DOC 中心、衛福部的長照與失智據點、環境部的環保小學堂與環教設施認證……這種橫跨多部會的承接，讓協會成為「微型政府」般

的存在。每個部會都有自己的語言、格式與期望，報告與核銷流程各不相同。地方組織不只要懂專業，更要懂「行政翻譯」，將政策指標轉成居民聽得懂的語言，又要把居民的生活經驗轉回公文可讀的成果。這是一種在縫隙中求生的專業，也是一種被迫生成的「行動知識」。

繁雜的專業分工與被迫的多工化：牛犁長年以「六大面向」作為社區發展架構：產業發展：從導覽體驗、餐食研發、DIY 手作到綠色照顧園藝療育，橫跨休閒、農業與教育領域。有人文教育：包含文化資產守護、節慶活動、學校合作、志工培訓與數位學習。社福醫療：從 C 級長照據點、新住民服務、兒少課輔到延緩失能方案。社區安全：推行國際安全社區、災後搶修、山林守護與居家安全教育。環保生態：推動社區林業、環境教育、綠美化、人工濕地、生態保育。環境景觀：自力修繕老屋、改善雜亂地點、行道樹植栽、社區景觀營造。

牛犁承接了各部會的計畫，看似是一個「成功的整合型社區」(附錄一)，但對現場工作者而言，卻是日復一日的奔波與重疊任務。行政報表、核銷、成果驗收接連不斷，計畫之間彼此牽制、時間重疊，讓許多在地夥伴成為「永遠在補件」的勞動者。夥伴常笑著說：「我們不是做社區，是被社區做。」這句話背後是一種自我壓迫的語氣。我們學會了寫計畫、報核銷、填績效，但在學會這些之後，也慢慢忘了自己最初為什麼進來社區。當行政流程變成主要任務，關係的經營與情感照顧反而退到次要位置。

在地型組織的角色困境：牛犁是一個以居民為主體的組織，這讓「專業」與「生活」長期糾纏。居民既是被培力的對象，也是被計畫驅動的執行者。她們在文件裡被稱作「社區人才」，但實際上是以最低薪資、最長工時支撐組織的主力。這種半志工、半勞動者的狀態，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逐漸被任務取代。在社區裡，「一起工作」本該是一種共好關係，但當計畫指標與績效壓力進入時，工作就變成競爭。誰的場次多、誰的時數高、誰的報告被採納，成了衡量價值的標準。夥伴之間的合作，常被不自覺地拉入績效比較的邏輯中。這種看不見的壓力，使得原本的互助關係逐漸出現裂痕。

我們從「被協助」到「協助別人」，在角色轉換間學會報表、會議、口頭簡報與政策語彙。但隨著業務量擴大，專業分工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外部的社工、規劃師、建築師、醫護專員等陸續介入，居民的聲音與在地的生活節奏，常常因此被技

術邏輯壓縮。這樣的過程，讓我們面臨雙重挑戰：一方面要維持專業要求，一方面要保有人情與地方的溫度。若沒有內部的協調與反思，夥伴容易被排擠出自己原本參與的場域。因此，牛犁必須不斷地在「專業化」與「地方性」之間協商。如何讓外來專業成為助力，而不是主導；如何讓夥伴不只是執行員，而能成為思考與決策的行動，正是地方社會組織的長期修煉。

居民作為執行者的挑戰與學習：對於居民而言，「執行計畫」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學習。這份簡介中能看到，每一項計畫幾乎都需要居民參與執行，從環境整理、導覽解說、餐點烹飪，到行政報告、核銷整理，都是由在地成員親自完成。我們在一次次的實作中，學會了時間管理、文件處理、會議協調與跨部門溝通。這些能力不是培訓課教出來的，而是從挫折中慢慢磨出來的。但這樣的「自學體制」也有其極限。當業務越來越多、報告越來越繁、政策要求越來越精細時，夥伴會感受到「疲勞與無力」：既要顧家庭、照顧長輩、支撐生活，又要面對計畫時程與審查壓力。許多在地成員因此進入情緒耗竭的狀態。這樣的疲憊，不是個人能力不足，而是體制與人力比例失衡的結果。

專業介入與倫理失衡：當外部專業者；社工、建築師、學者、計畫顧問，進入社區後，他們帶來了技術，也帶來了新的權力關係。這些專業語言往往成為決策依據，而我們的在地經驗被視為「可補充」的素材。久而久之，我們開始模仿專業者的語氣，說出「符合計畫語言」的話，只為了讓計畫能順利通過。這種被迫學習的過程，使社區內部的語言逐漸失去生活的溫度。倫理的偏移在這裡最為明顯。當「做事」成為唯一可被評價的指標，社區原本的倫理；彼此照顧、傾聽、陪伴，就被壓在績效的底層。牛犁的行動者並非不明白這點，他們只是被逼著在「完成任務」與「維繫關係」之間選擇。當資金與生計都綁在計畫上時，倫理的選項變得奢侈。

從衝突中學習，行動的再覺察：在這樣的矛盾現場，衝突已成為日常。居民對夥伴、夥伴對管理者、理想對現實，彼此都在拉扯。有人因為壓力離開，也有人在崩潰之後回來。這些起伏雖痛苦，卻也讓牛犁慢慢學會了「覺察」，學會在疲憊中問自己：我們為誰在努力？做這件事的初衷還在嗎？這樣的自我追問，成為牛犁重要的行動倫理。她們知道制度不會改變得那麼快，但可以在縫隙裡維持一點人的溫度。每當有人願意停下來聊一句「你還好嗎」，那一刻的對話，就重新喚回社區工作的靈魂。那不是 KPI 能衡量的成果，而是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共感。

從關係出發，重新定義工作：牛犁的經驗說明，繁雜並不是問題，真正的危險是當繁雜被簡化成績效表。社區工作需要多專業介入沒錯，但更需要一種能守住倫理的共同體智慧。居民不是工具，而是知識的生產者；社區不是計畫，而是一種關係的修練。當我們能再次從關係出發，不以成果而以理解為核心，也許就能讓社區重新成為有呼吸的地方，一個既能工作、也能相互照顧的生活場。

第二節 從「地方培力」到「知識體」的生成

回頭看這二十多年在牛犁的實踐，我以為自己是在「讓窮人能進場、擁有實踐機會」。這個信念曾經如此正確、充滿理想，但回望起來，它也充滿「助人」的階級位置與控制感。那時候的我，是帶著使命感、甚至帶著一種拯救式的情懷去行動的。然而，在現實的互動裡，這種姿態很快變成了情緒的消耗。助人的善意被誤解為管理的壓力，熱情被體制的冷漠稀釋，關係在委屈與誤會中逐漸僵化。

後來我才慢慢看清：這不只是情緒問題，而是一整個「專業化體系」與「資本治理邏輯」在滲透。當我用政府計畫的語言、績效報表的格式去爭取資源，我也一步步學會了那些行話、報表、審計規範，我以為自己是在「讓地方分到一杯羹」，但同時也被那個機器吸納，成為它的延伸。二十年的培力與學習，讓我更懂制度，也更被制度綁住。當「有給職」成為唯一能維繫組織的途徑，助人的理想就慢慢滑向服務的服從。

〈牛犁女性社區工作實踐與學習歷程〉從附錄二的資料可以清楚看出，當我以為自己在「培力婦女」時，其實也在被制度形塑、被資本邏輯吸納。回望這些年的社區工作經驗，我越來越明白，「專業化」不只是制度的要求，更是一種滲透在生活裡的權力結構。婦女由臨時工、家庭勞動者、保姆、小吃攤老闆等角色出發，在十多年之間逐步跨越到「產業講師」、「方案管理者」、「社工員」、「據點督導」等專業位置。這個轉變過程，反映出底層女性在地方學習場中，是一場非甘願的被再社會化的歷程。

制度化培力與生活倫理的衝突：然而，這樣的學習並非沒有代價。婦女們在「培力」的過程中，面對的不只是知識的學習，更是角色的撕裂。她們要同時處理家庭照顧與社區責任，一邊是政府要求的報表、會議、成果，一邊是孩子、長輩、病痛與家務。這種雙重勞動，使得「社區工作」成為一種延伸家庭責任的第二輪班。〈女

性實踐歷程〉的表格顯示，多數婦女在「社區學習」與「家中主要經濟來源」之間反覆擺盪。這讓她們的「參與」同時具有解放與困境的雙重意義，她們透過行動獲得了社會連結與成就感，但也在過程中被制度化的「計畫邏輯」消磨了自由度這就是牛犁現場中最真實的矛盾：「社區培力」原本要讓人有力量，卻常讓人被消耗。

以余雲楚、梁志遠、謝博齊、丘延亮，(2004：2-8)〈生業、職業、專業與志業〉的脈絡來看，我的歷程其實是一場「從生業出發、陷入專業、再尋回志業」的循環。生業的起點，是為了生活與共生，婦女們在家務、照顧與社區互助中早已有自己的知識系統。當政府資源進入，這些行動被轉化成「職業」，必須有制度、有管理、有報告。接著，當資格、技術、培訓被強化，它又進一步成為「專業」，一個需要認證、需要學歷、需要符合指標的體系。而我真正想尋回的，是「志業」那種為了人、為了關係、為了地方而行動的內在召喚。

簡單說，我走過的是一個「被制度改寫、又想把它拉回來」的過程：原本我們在做的是生業，為了生活撐住，婦女在照顧、家務、互助裡早就有一套方法，只是外面不一定承認那叫工作。後來計畫資源進來，事情變成職業——開始要名額、要薪資、要分工，關係也被放進雇傭與分配的規則裡。再往下走，評比、訓練、證照越來越多，就變成專業——看起來比較「像樣」，但也更容易被制度拿來管理與控制，而且能不能成立，往往還要看政府與既得利益買不買單。所以我想找回的志業，其實是：不要只剩制度與指標，而是回到「我為什麼做、我跟誰一起做、我想把地方撐成什麼樣子」的那個內在選擇。

三、在裂縫中看見價值

以下這三個事件（紅包、音響、薪資）看似瑣碎、日常、雞毛蒜皮，實際上卻深刻揭露了社區工作中「價值如何被實踐與扭曲」的現場矛盾。它們不是單純的行政、物資或溝通問題，而是理想與生計、制度與情感、專業與生活倫理之間的張力現形。我逐漸體會，專業不是高高在上的知識，而是一種從混亂中慢慢摸索、用手感去調整的能力。制度、流程、報表，都是為了讓工作可持續；但若沒有對生活的敏感、對情緒的理解，這些制度就成了新的壓迫。

而「生活」也不再只是私人領域，它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實踐。當我們學著在有限資源中協調、在衝突中傾聽、在規則中留白，那些微小的取舍，其實都在重新定

義「專業」的倫理。在這樣的工作裡，我慢慢學會，理想不能取代生活，但理想也不該被現實吞沒。所謂的手工知識，不是技術性的技巧，而是一種面對矛盾仍能保持溫度的能力。它提醒我，制度為秩序設計，卻要靠情感維持；助人是共生的勞動，而非施捨；專業不是距離，而是讓人能繼續呼吸的秩序。

这三件事共同指出：專業不在於擁有知識，而在於如何讓知識回應生活的困境。制度不是為了防人，而是為了成全彼此。當制度變成防衛，就失去了合作的可能。理想必須容納不完美的現實。「助人」不再是一種高姿態，而是一種與他人共處的生計政治。

（一）紅包事件：在有限資源中看見集體的裂縫

2014 冬天的年前，協會有 20 個工作人員及 4、5 個工讀生，可是隔年的財務跟通過的計畫只能有 12 個專職人員，可是這長期的工作下來雖然衝突不少，我還是沒辦法叫誰不要工作，剛好有 3 個媽媽的子女在年後生小孩，就決定回家帶孫子，稍稍解決沒有經費的困難。但是問題還是存在著，組長及幾個核心幹部隱約清楚的，只是大家也不知道怎麼辦，所以都默默的不提這問題。

但是年終紅包還是需要跟組長討論，我就找四位組說明：「今年紅包的總經費僅剩 26 萬比去年少一半，工作人員名單在這裡想知道大家今年要如何包大家的紅包。」我就發現在那個當下我真的是很失望，我會認為我在財務不足的狀態下，我原以為組長們會自動提議平均分配，可是沒有，那時候我真的很訝異，沒想到每個人都在盤算自己的部分。

晚上回到家，我就跟我先生講說：「你談的什麼理想，你以為你這樣做人家就會跟著你走嗎？沒有，每個人看到利益的時候還不是往自己身上拿，而且這四個人的經濟狀況還比這些人還好，所以楊先生你想太多了。所謂幫助弱勢的人每個人都有房子有地的，只有你們楊家在這裡沒有房子沒有地，你還在想甚麼。」我記得我談的很多，我先生也非常地受傷，他一直認為做一個榜樣（我跟鈞弼沒拿協會薪資），然後大家可以跟進，可是沒想到在利益糾結的時候大家還是很自私，我說：「自私是很正常，你老婆從頭到尾都自私阿，不然這個家庭怎麼維持下去。」

也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所說的「助人」裡藏著階級的距離。年度的計畫在面臨重新的挑戰，當時這種個人的指控和情緒都輕易的流轉出來，當下是沒有能力辨

識彼此的差異，那時每一個人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什麼？我都沒有貼進去聽就直接下了註解。到底那是什麼？我是踩一個甚麼樣的位置在和這個群工作？回頭看我與夥伴的相處的恩怨，大概都是在一個國家制度下，知識變成獲得證照、如何獲得學位學歷的這種訓練課程，那也在課程化了這群社區工作與夥伴。

後來我才明白，那不是誰的錯，而是結構的產物。當我們靠計畫案維生，每個人都被迫在有限資源中盤算生存，「助人」本身也成為一種勞動求生。這個事件揭露了「助人」作為一種情感勞動的真相。它不是冰冷的制度實踐，而是必須不斷調和理想與生計的手作倫理，一種在有限資源中手感式摸索「公平」的能力。

（二）音響壞掉：在「制度化語言」中失落的信任

2016 年 0 月 23 日，一大早夥伴 1 說需要音響高齡上課用；夥伴 2 就說：「音響全部都壞掉了」。夥伴 1：「壞掉了怎麼辦，那我現在該怎麼辦？」現場大家七嘴八舌的說：「是誰用壞了、都不說、就說要有管理人、我覺得以後要訂借條、每次都這樣……」大家就放下工作加入在這紛擾事件中而於事無補。

我當下內心就在想到底要借哪一種音響？小蜜蜂、手提式、推拉式音響，到底是哪一種音響，全都壞了嗎？我受不了大家的混亂，嘗試介入釐清，我在詢問時自然而然用主管的口氣對著夥伴 2：「你說音響全部壞掉，是哪些音響？」

夥伴 2：「就那些音響呀。」

我再度詢問：「哪些音響？我們有不同款式音響，一個說不清楚、一個又不聽清楚，然後大家就亂成一團，而且壞了就該送修。」當我這樣對著大家說話就惹人嫌了，可是我的身邊周遭經常發生這種，經常大家的對話不清不楚。

然後又有人冒出說是因為我的規定：「不能隨意花用 1000 元以上的支出，是要經過確認的。」例如有一件物件壞了要修理，那不修理是不行的，就有人說：「喔那不行，要修理要經過確認，因為那個維修是超過的（預算）」夥伴說：「不，不能修，因為要經過確認。」1000 元零用支出上限事件，協會是所有支出是預支制無須自己墊錢（預支是需要經過審核的），1000 元以下是可以先花用回來再申請（無須經過審核），會有這樣的規定是因為有 1~2 個人的花用是先斬後奏型，且是浪費型的花用，並常常不寫預支單。為了 1~2 個人的問題不想破壞和諧而去訂了規矩，還讓人拿來堵我的嘴，或是變成推卸責任的理由。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設備問題，而是一場關於權力與信任的測試。我從這件事學到，制度化的語言（如「報修流程」「物件管理」）常常遮蔽了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溝通需求，協會規定支出超過一千元要經主管核可，原本是為了防止浪費，卻讓許多小事成為怨懟的起點。有夥伴抱怨：「要修理還要等核可，真麻煩。」

這個規則為了管理少數人，卻讓多數人覺得被不信任。在這裡不是修理音響，而是修補關係。那天的我過於急著「讓事情有秩序」，卻忘了「人有情緒」。制度理性壓過生活語言：規則（借條、報修）原為管理所設，但在社區現場，這些「制度語言」取代了關係語言（信任、互助、協作）。權力位置無意間強化階序：當你用「主管語氣」說話時，雖是出於焦慮想釐清，但在平行的社區工作者之間，卻重新喚起了「上對下」的支配感。制度為少數人設、卻影響多數人：為了防止浪費的「1000 元支出規定」，反而成為「不信任」的證據。充滿情緒、臨場性與模糊地帶的工作，形成彼此拉扯式的溝通影響關係，而這卻是我與我們的日常。

（三）支出規則與薪資借支：制度理性與生活倫理的衝突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薪資結算。曾有位同事要離職，所以就要馬上領薪，平常他工作就來來去去不太穩定，愛來就來，不來就不來，後來他決定要離職了，可是他馬上就要跟我們領薪水，協會的依據是隔月 5 日才可以讓大家領薪水。可是他的理解是：「我就做完工作，你就該給我領薪水啊。」當時總務好心的說：「我們不能這樣，我們的規矩就是下個月會匯給你。」當那位同事反覆提出工作已經做完就應該給薪水的話語，當下我們的總務就說：「要不然你先用借支好了，只要寫一下借條就好。」這位同事有一些不解跟情緒：「明明就事我的錢為什麼我要用借的？」雖然後續是由我直接給了錢就沒簽借條了，隔月匯款薪資後要請他繳回，也是花了一些口舌才說清楚，也破壞了一些關係。依照制度要到下個月五號才撥款。她的不滿很真實——明明是我的錢，為什麼要用借的？

好意變成衝突源：總務想維持秩序，也想幫忙，但制度無法處理的「人情」只好靠折衷，最後卻傷了關係。「理性」並不總是合理的：當制度僵化，理性反而失去人味。這是「專業化」帶來的倫理盲點。我最後選擇先付現，才平息爭端，但也讓我陷入反思：在強調「規則」的背後，我是否忽略了生活的節奏與尊嚴？我開始理解，「制度化管理」與「生活倫理」之間，存在著持續的拉扯。在這裡，是如何

在矛盾中找到可行的折中，如何讓規則仍有人情，讓秩序仍能呼吸。

自我覺察：助人者如何成為管理者，也被制度化：那幾年的我，總覺得要撐起整個協會的氣勢，每當出現問題，我第一反應就是「要怎麼解決？」而不是「可不可以不做？」這種戰鬥姿態讓我撐過無數難關，也讓我逐漸失去傾聽的耐性。我成了那個我最不想成為的人，以專業的名義要求別人，卻忽略了夥伴們的情緒與疲憊。

我曾以為培力是讓婦女有力量，但在實踐裡，它也成為消耗的源頭。我們為了爭取「有給職」的尊嚴，卻被迫學習政府語言、績效報表、成果邏輯。我學會了制度的語言，也同時被制度馴化。在現場感受到，行動者不是超人，而是有情緒、有侷限的勞動者。真正的學習，是承認自己的脆弱，也承認制度的暴力。

重新理解志業：在關係的裂縫中學習同行：經過一次次衝突，我開始學會「鬆動」，鬆動對控制的渴望，鬆動對完美的追求，也鬆動那種「助人者要堅強」的假設。或許志業不是戰鬥，而是陪伴；不是領導，而是共學。在紅包的失落裡，我學到誠實；在音響的混亂裡，我學到傾聽；在支出的糾結裡，我學到柔軟；在制度的綁架裡，我學到放下。這些看似混亂、痛苦、瑣碎的事件，其實構成了我最真實的學習歷程。它們讓我重新理解「培力」不是讓人變強，而是讓彼此有機會面對真實、修補關係、重新生成。

從生業出發，我們進入職業的框架，被制度要求成為專業，卻艱難的在一次次現場中尋回志業的初心。這樣的歷程不是線性的進步，而是一種反覆修補的手工勞動，是一種在人與制度之間縫合、拆解、再縫合的生命實踐。真正的專業不是效率，而是理解；真正的培力不是改變他人，而是看見彼此。這些年來，我在牛犁的學習，讓我體會到知識的生成不是被教出來的，而是在共事、衝突、誤解與修復中慢慢長出來的。這，就是手工知識。

第三節 從「培力的正義」到實踐知識的學習

進入社區工作 30 年，我將 1995~2014 這近 30 年，定義為第一代的社區工作，為何這樣劃分，首先是我碩士論文 (2013) 產出後，進入博士班的時期，更重要的是第一代的婦女陸續退休，第二代的婦女及年輕人開始進場的時間點，而 2015 年之後我訂為第二代的社區工作，我回頭用碩論去進行自我的檢視第一代的工作視角。

我的碩士論文中對鄉村婦女學習的有個人、社會兩大方面去提出困境：

(一)個人部分：生計與家庭的因素；鄉村中的工作環境及照顧系統均缺乏可近性及普遍性，底層必須承擔家庭照顧及生計的責任。要如何談學習與公共參與，又如何去累積社會資本，改變社區或自身的可能性。

(二)社會因素：環境的壓迫帶來個人的限制；弱勢不見得全來自自身的條件，鄉鎮、交通、教育、醫療、就業、日常生活用品採購.....都是生活困境。政府的培力課程雖然是免費，生活困境卻無法出門學習，培力增能課程與他們無緣，換取的是更多汙名而已。(游雅帆，2013，頁 163~164)

當我回望自己碩士論文裡的文字時，總有一種複雜的心情。那篇論文曾是我最努力的作品，我用盡全力為鄉村婦女發聲，指出她們學習的困境、家庭與生計的壓力、交通與教育的限制，也疾呼政府應該提供更多「培力」的機會。當時的我深信，只要透過學習、培力、知識的獲得，弱勢就能翻轉命運。然而，今日重讀那些文字，自己當年其實「看錯了問題、開錯了處方」如今的我更願意承認，碩論不是錯誤的研究，而是一場誠實的見證，見證夥伴如何在知識體制裡，被專業主義制約，學會「看見自己的殖民位置」，並且練習從那裡慢慢走出來。

一、從「揭露不公」到「重製權力」

對於我在碩論中提出個人或社會因素的困境是用在乞求有學習機會的訴求，現在看來當時的我還真的很努力推大家進入主流的學習路徑，我在抱怨我們生活困境的人與學習無緣，我無視我們生活實踐是一種知識，反而擠破頭去跟政府哭訴，拜託教導我們、培力我們吧，那時我以為自己在為弱勢發聲，但其實是在用主流的語言「重新訓練」她們。

我將學習視為進入主體的門票，將知識等同於力量，將培力當作一種進步的象徵。於是，我不斷推著婦女們進入一場又一場的政府課程，勸她們拿證照、學技能、成為有用的「在地人」。而我引以為傲的「批判性思考」，不過是更精緻的馴化術。

那是一種以好意包裝的殖民。我剝奪了婦女們生活知識的合法性，把「懂得自己生活」視為不夠學習、把「生活裡的智慧」視為落後與無知。我忘記了，她們早

就在生存中學會了判斷、分寸、協調與堅韌。我把她們「推進培力」，還以為進入學習就擁有知識與主體，將獲得知識就可以獲得權力視為與主體相同，想來還真的在進行自我消失的工作。

二、從「培力的正義」到「實踐知識的學習」

今天聽見小默⁸在和洋洋⁹通電話，兩人談到星期日餐的安排。從對話的內容聽起來，洋洋又在抱怨些什麼。似乎因為人手不足的問題，洋洋故意在語氣裡多添了幾分刁難。

小默耐心地解釋說，她早就通知星期日要上班的事，但洋洋卻堅持自己沒收到訊息。這場對話來來回回，最後，小默的聲音顫抖了。她崩潰地掛掉電話，整個人沉默下來。

其實，這樣的場景並不是第一次發生。每次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辦公室的夥伴多半都選擇當作沒聽見，繼續各忙各的事，既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也不敢貿然插手。

我也總是那個靜靜離開現場的旁觀者。但這一次，我不想再逃避。當我看見她獨自一人躲在角落掉眼淚的樣子，心裡湧起一股衝動。我決定走過去，拍拍她的肩、說幾句安慰的話。我不知道這樣做能不能真的幫上她，但我知道，如果換作是我在那個位置，孤單又委屈，我也會希望有人能靠近，而不是讓我一個人獨自面對。

後來離開辦公室時，我邀她一起去吃中餐。一開始氣氛有些尷尬，話題也不太順，但至少，我讓她知道：她並不孤單。也許這樣的陪伴不算什麼，但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學習，學著在別人的痛裡，伸出一點溫度，而不是轉身離開。小翠¹⁰，2015/03/22，記小默的那一天¹¹

小默的故事讓我學會把論述重新落地。她在家裡是次要經濟來源，白天在學校代課、課後回家幫母親的小吃攤，還得一肩扛起哥哥三個孩子的照顧。1996 年她以兼職之姿進到牛犁做田調與行政支援；2004 年，因多元就業計畫正式受聘為專

⁸ 化名，牛犁第一代工作人員。

⁹ 化名，牛犁第二代工作人員。

¹⁰ 化名，牛犁第二代工作人員。

¹¹ 阿翠在牛犁工作第 2 年，小默 1997 年就進入牛犁工作，2017 年離開。

案經理，成為會計、人事、方案管理與對外接待的重要夥伴。

那天電話裡，洋洋用「人手不足」的口氣暗暗施壓；小默一再解釋已事先通知，對方卻堅稱未收到。來回幾輪後，她的聲音發抖、掛電話、默默流淚。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結構在日常的再現：在職務圖像裡，她是「排班的人」；在社會分工裡，她同時是代母、女兒、姊姊、同事與教學者。在管理語言裡，這叫「職責與溝通」；在身體語言裡，這是長年承重後的壓力身體化。

三、小默的工作內容記錄節錄

在 2000 年認識小默時，她是在學校當代課老師，也在家中協助母親的小吃店。家中還有大哥的三個上在小學、國中的孩子，是由小默及母親負責教養。當牛犁社區資源調查的工作需要人手時，小默就陪著研究生協助豐田的資源調查工作。當牛犁 2004 年需要多元就業的專案經理時，專科畢業 25 歲的小默當然是第一人選。也因為小默未婚、家又距離牛犁辦公室近，因此當由子需要幫忙行政的業務時，小默常常和我工作到半夜才回家。行政工作兩人完全不懂，連公文、資本門、經常門、業務費……都是一頭霧水。有一天兩人問承辦人員什麼是「會計科目」時，還被承辦人員諷刺：「小姐妳問我『會計科目』是什麼？我可是念了四年才學會的東西，我要怎麼告訴你呀！」

多元計畫的專案經理是必須每一個月都要作核銷、每一季要做報表、人事工作安排、班表……當初牛犁沒有電腦時都是小默用手寫出來。當時小默母親未生病，家中小吃店生意忙碌，哥哥的三個小孩正值青春期的牛犁又一堆行政工作，連電話都要小默負責接。因此，經常看到小默在晚飯過後，再來辦公室處理業務，繼續忙到 11 點多才回家。

……工作量表交回、簽到表確實簽寫、收據抬頭要寫正確，火車票來回票要注意金額……解說用麥克風請充電……27 日要 40 份軟陶材料。950726

……鄉公所教學的課程要派人去教學。8/3 下午……鄉公所做父親節活動的場佈。8 月 5 日國際哺乳週的活動……當天到場支援，工作人員如果有調動的話，麻煩請先告知。20060801

8/11 春風旅行社有 120 人要來參觀，需要軟陶及單車。煩請小毅於 8/8 下午

將軟陶材料準備好。8/9 向豐裡活動中心及富麗漁村租借腳踏車加上文史館
共需 70 輛，並檢查是否故障。六星計畫資源調查本週開始，每人 12 份問
卷.....等負責 950808

.....還剩下林務局未完成.....本週一外籍配偶正音班已經開始上課。...各組
每週的人力配置表要交出來，這邊才可以掌握工作狀況。20060912

每次小默的工作報告總是一長串，這樣短短不到一個半個月的時間，小默不僅
人事需要安排之外、也必須負責活動的人員調動、三個核銷、外包二場活動場佈、
二次旅行社參訪、還要備課幫新移民上中文班、問卷調查的回收確認等。工作人員
這麼多，都要一、一確認，大家必須在正確的時間點出現，其實大家手上還有自己
的業務正在焦頭爛額中。因為小默負責的工作，如需要動到夥伴來支援，是牛犁的
自營收入的工作居多。這才是工作夥伴每月薪資的重要來源。因此夥伴手上業務再
忙碌，也必須先擱著，以小默安排的工作為優先處理。

16 日民視採訪、花師教授訪視請總幹事負責。

17 日有大華社區兩台遊覽車來訪，麻煩小毅跟嫻子接待。

18 日萬事達 80 人，已經跟導遊講好，單車數量還是一樣請邱大哥不然就是
請小毅協助檢查運送，葉子姐、小默、小毅、嫻子、玉梅、豐霖、小雄、宏
政負責解說，如果下雨的話就大家做軟陶。

19 號春風旅行社 40 人，要做 DIY，因為不敢再麻煩大家出來上班，只有小
毅值班請備好軟陶材料包，請由子、小雄、豐霖、宏政支援。節錄 20061115

20 日花師課程由小毅負責、溪口課輔小雄負責、聖誕節嫻子負責。

22 日點心請陳先生幫忙，23 日南澳來參訪由豐霖、宏政負責。

24 日旅行社二部遊覽車，由小毅及 5 人負責，22 日及 23 日葉子姐、由子、
總幹事、小雄、小默均在台北活動。節錄 20061219

每個工作夥伴被安排任務時，總會抱怨：為什麼是我？口氣與態度每每讓小默
心情下滑。明知牛犁需要自營收入，但是週末、日不能休假，自己負責的業務也未
完成，彼此討論到工作安排時都是矛盾爆發的衝突點。經過數度的討論，漸漸訂出
標準，如社區參訪是以業務主題來安排，如環保業務嫻子負責接待.....依此規劃。

在旅行社部分，就按照輪流的方式，如果被輪到而自己又無法出來，就自行與夥伴交換，再向小默知會即可。長官或學術研究的部份再請總幹事或由子負責。慢慢訂立出來的標準也使得小默的工作逐漸順遂。但是事情總有意外，雖然已有明確的派人方向，還是有些模糊的灰色地帶，而這些瑣碎的雜事，總讓小默常常眼淚往內吞。由子常在想，小默是否需要將那憤氣爆發出來，也許會傷人，總比內傷好吧？由子又怕那些憤怒會轉嫁到小默生活的其他層面。誠如莫藜藜、張菁芬對弱勢下了定義「弱勢的概念指出缺乏物質資源及社會服務給付、社會支持等交互作用」

在排班時當然是希望各位能六、日都能休假，但小毅提到有提到，文史館的假日只排一人班會人手不足，如果其他夥伴覺得假日確實人手不足，那我在排班時就會做更動，你們假日休假的機會就會減少，變成平常日休。請各位確認好方式，我就好排班。僅接著小默又將這週的5場社區、旅行社的參訪詳述了負責接待的夥伴。這次的參訪需要較多的前置工作，又是讓工作夥伴唉聲嘆氣。20070116

夥伴間的相處的時間，有時還超過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因此大家建立相當的情感，當假日遊客多的時候，文史館的值班人員常常忙得暈頭轉向的，當然就希望多一個人力支援。這個情況夥伴常常向小默提起及抱怨，小默非常兩難，不知如何是好。我則希望小默將問題公開，由大家去決定，其實我的說話是不太優雅——「哪有這樣，好人我也會當，不是只有說好聽話而已，你請他們想清楚，大家來輪班你就真的排兩人工作，那小默你就依大家意願排班，到時候搞得大家沒假日不要抱怨，你也不要當壞人。」我在實務的經驗中已經清楚，有人工作受到不平等待遇時大家會幫忙講話，然後工作就是回到由子及小默身上，由子透過經驗理解必須將工作回到大家身上處理，才会有正確的承擔。

.....3月4日（日）文化局有元宵活動，秋燕要準備200份的軟陶書籤材料，當天的活動由小毅、小雄、豐霖負責到場教學。.....3月10日（六）門諾辦的園遊會，牛犁五小組長可能都要來上班，.....3月12日（一）植樹節活動，目前班表...隨時都有可能變動，若有改變會再跟大家連絡。20070228

.....這幾週我都在處理社教站的核銷作業，目前已經做好三個交出去了，接下來要進行的是多元就業和老人據點的核銷。明天肯納園有訂 50 人份的晚餐。花蓮教育大學請我們幫他們找 10 位耆老接受訪問，...麻煩提供給我資料，.....。20070727

每次小默報告完時，沒有人會記住，因此小默都會製作一張工作分配表給大家參考，像七月第一週的 5 天就有 8 場活動要辦理。做餐的、DIY 的、單車的、研習的.....。連是否可以休假還要小默確認才可以，就算是休假還是會被找回來上班。夥伴的相處真的必須相當的容忍與體諒，才有辦法走過每一個年頭。

而大家的普查工作、環境維護、老人業務、移民姐妹辦丙級證照研習、社區林業.....等都是在進行中。要讓大家都在軌道上前進之外，自己也有業務必須完成，移民中文班要備課、核銷、協助學術研究的安排.....等工作。有時小默在家時，也是電話響不停，上班與下班好像沒差。

.....然後那個發下去的那個這個麻煩一下，是我們牛犁那個參訪價格，那麻煩各位夥伴看一下，有接到電話的時候你們就可以用這個報價給他，...是說她們沒有經費的公益團體，那是不是可以不要收錢，如果有這個問題就先不要回答，...就說；會報給牛犁再跟她們繼續連絡這樣，不管是公益團體或是社區我們一定要收，這是我的報告，謝謝.....。20080328

牛犁這幾年的經驗制定了參訪的費用收取，因為大部分是計畫案出來觀摩，來花蓮不參觀牛犁，計畫很難通過。因此交通、住宿、便當都有費用，為什麼解說就沒有編列？明明是便當費，大家還不是在用桌餐，這時核銷又沒問題了。所以我會堅持收費，沒編列是他們的錯，不該牛犁來承擔。如果是來學習的，請下次 3、5 人來，牛犁還會請吃飯並依照其需要，讓協會的資料給與複製、參考，甚至將我們的計畫書帶回去都沒問題。因此小默就必須從中去協調，讓賓主盡歡。如碰到這樣的團時，大部分會由總幹事或由子接待，也導正參訪者的觀念，民間組織要永續經營就必須就自營收入的機制。

我負責的工作主要是星期一、四晚上外籍配偶的上課。參訪團體的接洽。

簽到表請注意事項說明.....大家的工作日誌請寫出大項目，背面再詳細寫出時間、地點、數量.....請以多元工作內容為主。20090106

這幾年來小默所接的參訪活動，每年都有 150 團之多，平均每月就有 12 團的參訪，電話的聯繫，會造成小默的聽力受損及精神緊張，長期下來連吃飯、睡覺、洗澡都會被干擾。小默還有自己的移民業務需要進行，還好有葉子姐、宏政的幫忙，三人之間形成工作體系。小默也在這麼忙碌中為了移民業務去修了社工學分、為了教學去修教研所的學分，目前都還在東華大學修學分中。在 98 年學會開車，讓牛犁多了一位能夠開車的夥伴，也代表工作多了一份。小默甚至把媽媽、姪子都拉進來牛犁幫忙，小默的媽媽還是小毅的小幫手之一，有時一家人的居家生活好像牛犁的小縮影般，為著牛犁的工作在忙碌著。

2011 年的春天，牛犁的各小組已經可以獨立運行，許多的人事異動、工作安排、上班與休假方式，都已經讓小組決定。只是大家的習慣性都會問小默。而小默也就習慣性的回覆，這樣的來來回回到了 2012 年才改善過來。社區的問題是如此多元性，需求人力的專業也非單一專業可以解決。

表 四 小默社區工作實踐與學習歷程：以領到證書為依據

圖像 姓名	進入 牛犁前	牛犁的 工作歷程	業務學習學分、證書的 學習	工作能力所轉換身分及 能力養成	牛犁位置
小默	小吃店、代課老師 家中次要經濟來源	人文教育 → 產業發展 → 社福照顧 → 社區安全 → 環保生態 → 景觀維護	2005 台灣省農會木棉花社造講堂研習 2005 門諾醫院青少年教育訓練 2006 花蓮縣府志願服務研習 2006 社區照顧據點研習 2008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研習 2011 海棠文教基金會方案管理主管班研習 2011 第五屆園藝療法國際研討會 研究所學分 9、社工學分 15	產業講師 2010-2013 小學多元文化講師 2012~2014 豐山國小飲食文化鄉土教學講師 2011-2013 環境教育種子講師 2006-2015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講師 2012 台灣社區安全推廣中心 →外部資源連結→方案管理能力→實事求是的精神→領導人物的養成 →問題評估能力	1.會計 2.人事安排 3.產業經理 4.社工員

從小默：社區工作實踐與學習歷程：對她「晚間仍回辦公室處理、假日人手不足的兩難、被迫在「收入自籌」與「公共服務」間調度的日誌式紀錄，讓我讀懂：

她的眼淚不是無能，而是現場在她身上尋找出口的方式（多則工作紀錄列舉：週末多場參訪、臨時材料補充、跨點支援；同時還要備課新住民班與協助核銷）。情緒在這裡不是應該被排除的雜質，而是讓我們聽見「制度與生活錯接」的警報器。

外人眼裡，那只是「行政效率」；在我看來，那是一種以身體承接的社區能力：把衝突分配成可承受的序列、把模糊地帶變成可溝通的彈性、把一次次「誰來支援」翻譯成「讓誰被看見」。這些都無法用學分證明，卻是活的能力（附錄二亦以社區能力的構面描述她的歷程：參與、領導、組織、問題評估、資源動員、實事求是、人際與外部連結、方案管理）。

四、彼此需要被理解、被成全

在前面的 20 年工作當中（1996~2015），夥伴為了能夠在村落上班，做一份能照顧家庭又看似社區能有發展的工作，應該是一份最「恰好」¹²的工作了。但是必須忍受這多重的壓迫，有時工作夥伴彼此之間是相當火爆的場面出現，甚至吵到大家哭成一團。反正就是你氣我、我氣你的境界，卻也相處了 20 年。對小默而言：社區女性在長期的壓迫與扮演多重角色下，最終心理與情感承載超限的崩潰現象。她不只是工作者，更是代母、家庭照顧者、姊姊、夥伴，還是一個從小就背負家庭責任的女性。「喃喃自語」、「不由自主地流淚」不是單純的情緒反應，而是長年壓力在身體與精神層面的自我保護與逃逸表現。眼淚不是脆弱的表現，而是社會與制度沉重壓力透過身體發出的語言。只是當時我沒看懂。

把小默放回來，我更清楚自己早年的失誤：我努力把入推入一條可測量、可驗收、可複製的學習路徑；而她在做的，恰恰是不可簡化的「手工知識」，在場感、關係感、臨機判斷與韌性。同時也展現了她如何把「生活裡的做」連結到「制度化的語言」：她去修社工與教育研究所學分、兼任多元文化／環境教育講師，把經驗翻譯成課堂與方案管理的能力（歷年研習、講師資歷、學分修習）。

因此，真正要修正的不是她的「仍待培力」，而是我對知識的想像：知識應該是在協作中生成的能力。而主體也不是我學會了什麼，而是在做與被需要中讓彼此成形。更不是把人訓練成「更好用」，而是讓人能在關係裡被支撐住。

¹² 恰好：表示工作不好也不壞，往上找的工作是沒那個條件（生計與家庭都要兼顧），往下找壽豐都是餐飲及民宿的觀光業工作，假日都要上班且薪資低。

五、責任的內化與關係的倫理

小默的工作幾乎涵蓋整個組織的「看不見的支柱」：她同時是行政、會計、人事、接待、核銷、教學與家務照顧者。每日的工作流包括：核銷、報表、人事安排、場佈、租借、採買、備課、接聽電話、處理參訪團與旅行社接洽等，且「上班與下班好像沒差」。週末常被召回、電話在深夜響不停，連洗澡與吃飯都受打擾。若以勞動倫理來看，這是一個高度剝削卻又充滿情感義務的工作場域：剝削並非單純的薪資壓榨，而是一種情感綁縛與責任內化。

小默因「家近」「未婚」「能幫忙」而被自然地納入過度勞動的範圍。「能者多勞」被合理化為「理所當然」，她的多工能力與責任心反而成為組織倚賴的理由。她被賦予的「信任」與「核心角色」事實上取代了制度的照顧，使整個組織以她的勞動作為潤滑劑。組織的夥伴關係帶來情感的支持與社群的歸屬，讓她感覺「不能倒、不能離開」。她被視為組織的核心象徵，擁有高度的實務權能與被信任的位置。但這種「友善」是以個人犧牲換取集體運作的穩定。她的「責任感」成為壓榨自身的力量來源。

小默的「撐」不是單純的職業精神，而是一種深層的倫理實踐。這倫理不是書本的規範，而是從家庭、性別與地方生活脈絡中生成的：自幼協助母親攤販、照顧侄子，養成「不辯解、先做完」的習慣。在牛犁，她只是把「照顧家」延伸成「照顧組織」。她的努力，既是愛與責任的體現，也是結構性壓迫的內化。她撐起的不只是工作，而是整個組織對「女性耐勞」的期待。

牛犁對小默而言既是成就也是枷鎖。她的工作環境在結構上確實「不友善」、長工時、責任過重、缺乏界線；但在倫理上又「過度友善」、情感綁定、互助壓力、道德責任。這種矛盾正是社區工作最深的困境：在共好與剝削之間沒有清楚邊界。真正的知識生產，始於承認那些看似卑微、卻讓世界得以延續的手。

當年我們以為在為弱勢發聲，實則用主流語言重新訓練她們。我現在會補上第二句：學會把自己從「訓練者」挪到「同做者」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小默不再是被動「受培力」的人，而是和我們一起定義「何以為知識」的共同作者。她的日常、她的分寸、她的眼淚，都是社區知識體系裡不可替代的節點。而我們的寫作，應該成為讓這些節點彼此連上線的方式。

第四節 從生業到志業的回返——重讀貧窮文化後的培力轉向

這一節我想把焦點放在：我如何在近三十年的實作裡，慢慢看見自己從「再製」走向「批判」的路徑。更精確地說，我想釐清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當制度與資源進入後，原本的生活互助如何被改寫，而我又如何在其中學會重新校準「培力」的意義。要說的不是「我變得更會管理」，而是「我終於開始學會不把生活當成阻礙」：培力若不能讓人活得下去、讓關係撐得住，那再完整的訓練與指標，都只是另一種把人推進體制的方式。

在五個結論中，充滿似是而非的訴求，整個來說就是推向先順從政府政策再在順從框架中尋找翻轉機會，還沾沾自喜我有批判性，其實我進在培力一群符合市場機制的夥伴，壓迫工作夥伴朝向政府的需求去培訓，怪不得歷年來有 3 位進入鄉公所、1 位進入小學、5 位獲得縣政府工作，且表現優良，現在公部門都知道跟牛犁挖腳。以下是游雅帆（2013）碩論中提到的 5 個結論。

在社會貢獻的議題上培力：培力必須持續性、有系統性的訓練，更需要有願景的組織內訓練。藉由社會參與的場域，運用「實踐社群」方法，受培力者會在組織願景薰陶之下調整行為及信念，帶給個人及社會廣泛的影響。

培力是在實境的場域中學習：依據實境的業務需求導入訓練課程，無論是配合政府的計畫訓練，還是組織提供的專門科目訓練，都必須是可以回到場域中，並且有實際性業務可操作，因為必須透過實作才能真正獲得技能及知識的累積。

正視每個人都有其獨特性，並且擁有自我成長與改變的潛能：當不斷累積正向的成功經驗時，可除去內在的無力感與社會或個人的權能障礙，循著此軌跡而付諸行動，日漸改善自己的生活。

穩定經濟支持的培力方式：藉由生計的穩定讓底層家庭的能力可以提升，降低社會福利的支出。必須藉由「有給職」的學習方式，給於求知、社交、社會貢獻的工作，從做中學、學中做，提升個人能力而影響家庭，也帶來社區發展。

牛犁提供有願景與目標的學習歷程與場域：牛犁雖然以有給職方式讓這一群女性，有如中產階級的婦女般學習也像是在作社交、求知、社會貢獻的工作。但是牛犁是一個組織團隊，我們的學習就不會鬆散及漫無目標，牛犁是有明確

的三大工作目標及組織成立的核心價值，所以學習是有目的性的，必須有成效的要求與承諾責任的承擔。這樣的實踐是積極的、多面向的學習且是有層次的成長，也會同理及包容夥伴的困境與限制，有結構的組織學習及實踐就會帶來成長的機會與成效的展現。(頁 172~173)

當年我在結論裡寫下「持續性、有系統的訓練」「組織內訓」「穩定經濟支持」「有給職的學習」……這些論述看似進步，其實全都循著政策與市場的邏輯：「讓底層變得更有效率、更能產出、更好被管理。」那時我深信這樣是在「讓婦女晉身」，卻沒有意識到這樣的晉身，是以犧牲自我生活節奏為代價。那些被我培力的婦女，後來真的進入了體制——公所、學校、縣政府。我以為這是成功，但現在看來，這其實是最深的自我反諷。

我把她們推進體制，而體制再回頭把她們推向行政化的專業規範。她們學會了報表、成果、績效，也學會了不再說出自己的困難。我卻在我的碩論 (2013) 中批判我的社區婦女：

眼看著剩 3 天的交貨期，小毅負責車縫、拼接的工作卻遲遲未完成，後續要將拼貼好的布黏貼在書上還需要 4 個人 3 天的工作天，因此小毅不能再延宕，身為上頭是因為小譯在上班中負責人的我只好使出殺手鐮，要求小毅在明天一定要完成，否則就熬夜來完成它……小毅是抱怨技術性太高所以造成延宕。

(頁 61)

當時會如此強硬地請小毅要完成，我的內心是對她上班的偷雞摸狗不爽，上班中不論跟女兒聊天，還教導在豆腐工廠上班的女兒用上廁所來閃躲工作、上班中去買家用菜跟菜販聊天、接孫子放學…平常就算了，趕工作依然如此，這些沒在文本中呈現。我在碩論文本中提出的是「不教而戰」游雅帆 (2013)：

牛犁夥伴的辛苦，有來自能力的不足、技術面的困境，非師徒制的學習……常常為了一個小問題，讓工作停頓，忽略了時間的流逝，但是時間一到依然必須得產出成效，大家是要共同承擔責任。因此大家就在衝突、無奈中完成工作，痛苦的是在不同事件時我們還是再衝突、再無奈一次，觸類旁通的能力變成了

我們最需要學習的。(頁 66)

我還是不斷的回歸需要學習及培力的議題，忽略我的情緒所產生的張力，然後無情地去往菁英推進，沒有去面對人的真實生活處境，在哪個時候我是無自覺的，我在文本裡寫著「不教而戰」，說我們要學會共同承擔、學會觸類旁通。但那只是我「以制度為名的暴力」。

丘延亮在翻譯「貧窮文化」的導讀中提醒，若「貧窮文化」只被讀成窮人的性格缺陷（懶散、低企圖心、逃避、只求享樂），就很容易落回汙名化的道德評分；但若把它放回結構匱乏的脈絡，它反而指向一種在無力條件下維持尊嚴、降低挫折、讓生活還能運轉的生存理路與防護機制，這些提醒，讓我重新回看自己早年在「培力」「專業化」「成效」語言裡的自信：當我以為自己是批判者時，我其實也在替制度說話，並在不自覺中把夥伴推向更可被治理與衡量的位置。

以小毅事件為例，在趕工壓力下，我以「效率」與「責任」的語言要求她必須如期完成，並在游雅帆（2013：66）碩論中把她的延宕解釋為「技術不足」「抗拒學習」甚至「不教而戰」的結果；當我只看見交貨期限與產出焦慮，我就看不見她所背負的照顧網絡、家暴陰影、家庭疾病與育兒負荷；我把她的求生節奏誤讀成工作態度，並用制度化語言（責任、成效、共同承擔）合理化自己的強硬，形成一種「以制度為名的暴力」：不必大聲斥責，也能在日常裡把人推向更沉默、更自我壓抑、更像體制要求的樣子。換言之，這個事件真正暴露的不是「她學不會」，而是我當時拒絕學習：拒絕把生活處境與生存理路納入理解，因而把培力窄化成把人推進更有效率、可被管理的路那不是「她學不會」，而是我拒絕學習；拒絕學習「生活的知識」。

這個回返之所以可能，來自我重讀丘延亮譯（2004）的《貧窮文化》後，對「行為」與「學習」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些曾被視為懶散、無效、消極的行動，其實可能是一種生存理路。我卻在游雅帆（2013）碩論裡把她們寫成「抗拒學習」、不懂合作、缺乏責任感；如今看來，那不一定是反社會，而更像是對過度介入的自保，她們對建制的不信任也不只是問題，而是一種抵抗。

回望這二十年的工作，我因此更確定：真正的培力不在於「教會別人什麼」，而在於「讓彼此都能在生活裡繼續活下去」。所以即使我仍會在紅包事件裡失望、

在音響事件裡想掌控秩序、在薪資事件裡急著解決問題，我也比以前更能辨識：那些情緒不是單純的個人脾氣，而是制度與生計拉扯下的訊號；提醒我把人、關係與生活放回行動的核心。

第五節 社區行動中的關係、倫理與覺察

社區工作的真實現場，從來不是理論上的理想空間。它充滿了人的情緒、關係的糾結、行政的壓力與結構性的矛盾。我在牛犁二十多年的行動中，經歷過許多相似的故事，有人被接住、有人受傷離開、也有人在一次次的磨合裡慢慢長大。這些事件，不只是工作的紀錄，更是我與夥伴彼此學習的軌跡。從阿美姐的絕望，到小凌的焦慮，再到自己在結構與愛之間的思辨：社區工作並不是「幫助他人」，而是一次次學著「如何一起活」。在這過程裡，我從「做給別人看」的角色，逐漸學會與夥伴共處、共學，讓關係本身成為行動的養分。

一、關係的修練：從危機到連結的行動

這是一段關於「如何讓人被接住」的社區實踐故事。以 2018 年的阿美姐¹³事件為例，我當下的第一反應不是把她立刻推進通報或程序，而是先在關係網裡找到一個今晚就能落腳的地方：讓她先有住處、先過年、先活下去。這種「先把人接回生活」的判斷，看似不夠制度化，卻更貼近邊界現場的真實：在邊緣處境裡，人的羞愧與絕望往往先於制度可接住的語言，而邊緣也不只是匱乏的位置，它同時可能成為能動性重新長出的基地——當人先被安放，才有可能慢慢恢復站立的力量。

（一）阿美姐事件——關係織成的網

2018 年 2 月 12 日(農曆 12 月 27 日)下午特地送一些鈞弼大姊滷的牛肉、牛腱、滷蛋、豆干、海帶，還有二姊的臘腸、臘肉給獨居的阿美姐(1954 出生) 在大年夜可以享用，意外發現阿美姐準備高粱酒、木炭、繩子，細問之下才知養子在台北經商不順，房子已抵押明天就要來查封了，僅剩的棲身之處化為烏有也不知道要去哪裡。阿美姐忍住眼淚還跟我說：「不要告訴別人，真的很見笑、沒臉在社區走踏，

¹³ 化名，牛犁第一代工作人員。

明年就無法再幫忙了、真歹勢……」。我整個人傻住不知如何接應。

我當下聽到的訊息是：明天房子就要被查封，阿美姐無處可去。我直覺意識到，她其實是想用「死」來結束一切。那一瞬間，我的身體比我的思考還快反應，開始尋找「怎麼讓她有地方去」的可能。我快速分析眼前的資源，想到與她同在樂齡班的阿宜姐，兩人平日關係親近，常一起吃飯、聊天。阿宜姐的房子寬敞、子女不在身邊，也許能暫時接納阿美姐。

我用這樣的判斷去行動，先讓她有住的地方，過完年再一起找租屋，先解決眼前的危機。事後回想，我發現自己動用的是一種「手工式的判斷力」。那不是制度的 SOP，而是一種從關係出發、靠經驗縫補的應變。我沒有太多時間「想清楚」，但那種生活累積出的敏感度，知道「誰信得過、誰能幫忙」，成為我當下最實用的工具。

只是，我也知道自己避開了最困難的部分。我沒有陪她進入那個「要死的念頭」，沒有碰觸她的羞愧與絕望，只是趕著讓事情看起來有路可走。在弱勢處境裡，生存與情感往往交纏在一起，我選擇了先穩住她的生活，卻也感受到那份未竟的悲傷，隱約還在那裡撕裂中，社區行動不只是幫人「撐過去」，還要學會在關係中看見那個仍在受傷的靈魂，並尊重阿美姐是有能量自己縫補。

我徵得阿美姐的同意後，立刻去找阿宜姐¹⁴協商。阿宜姐聽完我說的情況，沉默了一下，就轉頭和女兒商量。沒多久，她點點頭說：「好啦，先讓她過來住，不然年也沒法度過。」那一刻，我感覺整個心放了下來。阿宜姐願意伸出手，讓阿美姐有了可以暫時落腳的地方。

阿美姐的消息一傳開，樂齡班幾位平時與阿美姐要好的阿嬤也主動加入幫忙。隔天，她們就一起來幫忙阿美姐整理及搬家；辦公室的年輕人開著協會的貨車去載東西，我們先搬了幾箱衣物與生活用品，家具太大，就先暫放在另一個倉庫裡，等過完年再慢慢整理。那時大家都要放年假，但在村子裡的生活不會因為「協會放假」就停下來。這裡的社會網絡像是一條線，拉一下，整個人群就跟著動起來。

我同時得在放假前和組長們討論接下來的安排。阿美姐已有申請了勞退，每月約有一萬二，平常生活就是靠這份勞退金生活，但是現在要支付房租與生活費就顯不足。我們盤點協會的資源，看能否在預算裡擠出一點空間。最後大家決議讓阿美

¹⁴ 化名，牛犁高齡服務站學員。

姐先做部分的老人照顧據點或廚房工作，提供一萬元左右的月薪，加上她的退休金，至少能讓她維持生活、重拾安全感，一種重新站起來的能量。

過了年後，阿美姐漸漸走出低谷，她常對我們說：「我很感恩，不能再讓大家操心。」她越做越主動，也越投入社區的照顧工作。在高齡組組長崇育的建議下，我們協助她在協會支持下報考照服員課程，順利取得證照後，2020 年正式成為協會的全職照服員。回頭看，那個過程不是一場「救援」，而是一場集體的關係修復。一個人陷入絕望時，是整個社區的網絡被啟動，從鄰居的支援、夥伴的手，到協會的制度空間，一層層把人接回生活。所謂社區行動，不只是「找到資源」，而是讓一張平常看似沉睡的關係網，在事件來臨時能夠張開接住掉落的人。

（二）煮菜的裂痕-關係倫理的修練

在社區的現場，沒有誰能一通百通，更沒有永遠相親相愛的劇本。真正的行動，多半是在矛盾與磨合中，一點一滴學會共處。2023 年，阿美姐在牛犁工作已進入第四年，負責三個高齡服務據點的午餐。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卻是最難的一環。每天都在面對味覺、習慣與人心。那段時間，豐坪據點的長輩對菜色不滿，嫌太鹹、太淡、太便宜，甚至有人氣得脫口說出「連狗都不吃」。那些話像刀子一樣，一層層劃在廚房裡的空氣中。

雪霞身為婦幼組長，試著溝通、協調、陪煮，卻越說越僵；阿美姐覺得被冒犯，反而回話：「不幹了！」這時候，廚房裡的問題早已不是「菜怎麼煮」，而是「人該怎麼被對待」。我知道，雪霞的疲憊是真實的，阿美姐的受傷也是真實的。阿美姐從絕望中重回工作，用勞動維繫尊嚴，而這些抱怨，讓她再次覺得自己「不夠好、沒價值」。這是弱勢勞動者最脆弱的時刻，一旦覺得自己被嫌棄，她就會想逃走。

而我又一直跟雪霞的時間兜不攏，讓這事情一拖再拖，而衝突在沈默中發酵。直到雪霞情緒崩潰，想同意阿美姐離職一事。鈞弼提醒我：「我們不能這麼無情。」鈞弼提醒我，社區工作不只是解決問題，而是要學會「如何不讓人被拋下」。於是我重新盤點現場，發現問題不在菜，而在氣。我們決定用「年底結束豐坪班」作為策略，讓阿美姐覺得這是「最後一場仗」，不必被否定，而是「完成一段任務」。我告訴她：「我們就拼到年底，把這班做到最好，讓他們知道，沒有我們是一件可惜的事。」阿美姐沉默片刻，點點頭說：「好，我就拼這口氣。」

從那以後，每逢星期四，雪霞就進廚房陪著阿美姐，其實就是多放幾顆蒜去爆香，有些菜加些肉絲提升香味。菜的味道慢慢變好，氣氛也慢慢變軟。那不只是烹飪的改變，更是關係的修補。我們並不是「解決」了問題，而是「熬」過了問題。在那個過程中，我再次體會：社區工作裡最難的，不是找資源、不是執行計畫，而是如何在破碎的情緒裡，仍不放棄彼此。這種現場的知識不是技術，而是一種在場的敏感。懂得什麼時候該說、該停、該陪；懂得讓一段關係有時間呼吸。2025 年 12 月，豐坪班因為學員人數長期不足而結束了，但阿美姐還在。她繼續在協會煮飯，也繼續被需要。我知道，我們沒能讓每一道菜都被喜歡，但至少，我們守住了那一份人味，在最複雜的人情與疲憊之中，仍願意彼此留下，繼續一起生活。

社區工作難免會擔誤下班時間，有一次跟阿美姐商量要派誰去林田山送便當的事，阿美姐說了一句話讓我好感動：「這咱家己去就好，耽誤時間比較沒要緊。」所以就由阿美姐去送便當，雪霞在旁邊聽了事後也跟我說：「聽到阿美姐這麼說真的很開心，雖然平常就知道是這種人，但是從嘴巴說出來感覺很不同」。我們如何跳脫政府機器下的工具性的互助，在豐田如何彼此關懷互助，我需要擁有「愛人」的能力，有看到一些光，期許自己加油。

回望這幾年的社區行動，我愈來愈確定，社區工作並沒有「成功」的劇本，也沒有一通百通的方法。它是一場關於人性的修練，在情緒、疲憊、誤解與勞動之中，學會不放棄彼此。知識不是制度的替代品，而是一種從關係中長出的智慧。我們透過一次次的行動，學會辨識人的需求，也學會等待與包容。所謂的社區韌性，並非來自計畫或資金，而是來自那份「願意留下」的心。當人願意互相接住、互相理解，社區就不再只是工作現場，而是生活本身的倫理實踐。

二、在矛盾中同行的社區行動——小孟

這不是個案，而是一條行動者回家的路：從現場的情緒與壓力出發，在行政理性與人性倫理之間反覆拉扯；從「把人變成問題」到「把彼此變成我們」，一路學著慢下來、看見、對話、同行。每一次衝突與疲憊，都是一次縫補關係、修整慣性的機會。社區工作的價值，不只在完成任務，而是在矛盾中仍選擇不放棄彼此，讓關係成為行動的依歸。

（一）行動中反思：在行政與人性之間學習傾聽

2021 年 12 月 29 日早上，小孟¹⁵走進辦公室找我。她的臉色很沉，說想離開這份工作，承受不了壓力了。小孟是失智據點的承辦人，1990 年次，大學畢業後就在協會工作，到這一年已經第三年。過去多半在支援性任務，這是她第一次獨立負責一個專案。年底的評鑑、明年度的計畫書、簡報、送件、開會，一切都壓在 12 月，讓她幾乎喘不過氣。

我聽著她的話，心裡五味雜陳。按理說，她已經跑過一年的流程，應該能逐漸上手才對，但實際上，她的理解與應變能力仍顯吃力。為了讓進度能上軌道，我臨時協調其他組員支援，整個過程中，我的語氣與焦慮應該讓她感受到，我嫌她「不夠好」。那份隱約的指責，也許比壓力更重。

當她提離職時，我問她：「如果有更好的機會，我不攔你；但如果只是因為覺得自己不行，那不一定要離開。你已經走過一次流程了，明年可以做得更順。把擅長的部分多做一點，不擅長的請夥伴支援，學會怎麼在團隊裡進退。」我也告訴她，我自己在要求上太急太緊，忽略了她的處境，也沒看見她的焦慮，承諾我會學著修正。

她聽著聽著，點點頭，最後說：「好，我再試試看。」我以為事情就這樣暫時平息。沒想到兩天後，凡萱（我的女兒，也是協會人員）轉述小孟問：「那幾天加班能不能補薪或補假？」我聽完，心裡忽然一陣不平。腦中第一個念頭是：「她的工作能力不足已讓大家花那麼多時間幫忙，還來問要不要補薪水？」那一刻，我的情緒比理性先衝出來，覺得自己被挑戰，也覺得不被理解。剛好富民（我的兒子，同在協會工作）在旁邊，他靜靜聽了一會兒，只說了一句：「萬惡的資本主義。」我愣了一下，然後回他：「我真心同意。但我的困難是，小孟的不足誰來承擔？那些加班背後的時間與費用，該由誰來負責？」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其實是帶著情緒。那不是反駁，而是一種疲憊的自問。

這一幕讓我看見自己也被卡在兩個結構之間。一邊是「人」，我理解小孟的焦慮、她的努力、她的羞赧；另一邊是「制度」，計畫有期限、報告要交、預算不能超。我想當一個有溫度的主管，但同時也得成為一個能撐起責任的人。這兩種角色

¹⁵ 化名，牛犁第二代工作人員。

在我身上相互拉扯，讓我在情緒與行政之間來回擺盪。富民那句「萬惡的資本主義」，其實提醒了我另一層事實，我們自以為在做「非營利工作」，但資本主義的邏輯早已滲進我們的日常：計畫、績效、產值、時間、工時、預算，這些詞語構成了我們的工作框架，也慢慢影響了我們看人的方式。我以為我在理解一個人的脆弱，但某個瞬間，我也成了那個用制度衡量人價值的人。

事後回想，小孟並不是要爭取薪水，而是在尋找「被理解」的方式。她其實是在問：「我的努力有被看見嗎？」而我在那一刻，選擇了用管理者的角度去回應，沒有用人的角度去傾聽。社區工作不只是幫居民重建關係，也是讓我們在行政理性與人性倫理之間不斷學習。原來，我們不只是組織的管理者，也在學著怎麼做一個更柔軟的「人」。而這份學習，正是社區工作的行動本身，在資本邏輯裡守住人的價值，在疲憊的現場裡，仍試著不放棄理解彼此。

（二）結構中的覺察：從個人責任到體制倫理

小孟的問題不新鮮，牛犁協會第一代工作者，就是我們這一批媽媽們，常常發生這樣的事情，總是認為 8 點來上班 5 點半下班，時間夠了就應該給薪資，工作沒完成不關她的事，這過程少不了許多衝突與張力，造成彼此傷痕纍纍，小孟的問題與過去夥伴相差不了多少，不過是這條歷史的延續。二十多年來，我學習了各種助人的方法，同理、包容、移情、敘事團體、優勢觀點，希望能用更溫柔的方式與夥伴同行。然而，即使學會這麼多「方法」，矛盾仍然反覆出現。我漸漸發現，自己不斷在「個人責任」與「結構壓力」之間搖擺。

我朝內看，檢討自己與夥伴；卻忘了往外看，那個無處不在的資本市場與國家機器

終於明白廉兮說的順從管理者的意思，透過順服取得資源讓窮人雨露均霑，看似好事一件，那看似是社會的善意，實則是體制的馴化。透過「符合規範」的外衣，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制度的執行者，也在順服中，助紂為虐地為難自己人。甚至回頭去質疑我的工作夥伴不夠努力。小孟的事件發生在去年 12 月，兒子用了「萬惡的資本主義」來註解這事件，讓我回想起 20 多年來與夥伴的衝突與張力，我的行動好像沒有變化太多，我應該要走進我們的夥伴。

廉兮讓我回頭再去問問富民為何用「萬惡的資本主義」來形容，富民說：「她

真的是學習上比較慢，在面對政府的評鑑術語就是比較無法進入狀況，並不代表他對失智長輩沒有照顧好呀！而且每次的評鑑就是工具性的評估方式，你私下也抱怨很多呀！剛好在寫其他計畫的執行效益，有感而發……」。

這 20 多年來我在這政府評鑑或輔導體系之下，我們只能照著做符合規範標準，當不符合規範時就回頭修正我和我的夥伴們，因此這些年來我的行動有幾個層次的過程：

第一層：早期將夥伴的狀態視為個人問題時，就會有無盡的提供學習、培力，的資源，如果成效還是不彰時就會對這個人給予抱怨和譴責，將一切歸咎個人責任。

第二層：當我轉換視角將問題視為社會結構時，我還是無法解構這個系統，就用同理心去包容夥伴的處境，回頭讓整個團隊去承擔個人不足之處，形成更多衝突與壓迫，還抱怨大家為何不體諒、不互助。

第三層：我壓回自身看見自己用「助人」的觀點與位置在協助夥伴，因此過程中就會充滿犧牲、委屈，相對情商就降低、衝突還是不斷的發生，因為彼此是上下、也是你與我，並沒有「我們」的存在，所以還是存在著主流知識掛帥的態度，還沒真正貼近去看見與尊重土地長出來的知識。

社區行動最終不只是情緒管理或勞動分配，而是一場面對制度的倫理練習。我們既是被體制壓迫的人，也是它的延伸者。學會覺察、學會停下、學會一起承認這份矛盾。

（三）成為我們：從助人位置到共同學習的轉化

我現在的看見：無論是歸咎個人和社會結構，甚至助人位置都還是一種將夥伴推向「他者」的看待，並沒有誠心的想要成為「我們」，好像整個問題都與我無關，丘延亮說：「你要改變原來的這種慣性、生存的邏輯以及思維，……比較希望你能夠慢下來，那一個是跟自己的經驗，能夠有一個再去對話，但是這個對話的憑藉不是直接讓自己的經驗再說一次……。」

去年小孟事件之後，今年夏天小孟需要設計一套我們自己可以帶領的失智課程，是以「敘說表達」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我也參與其中，透過 2 天的小組互動，

讓我多一些認識工作夥伴。

小孟分享她在牛犁的心情：

我感覺自己像泥土，什麼都沒有，工作上不是只有單單一件，要管理、執行、還有要跟失智長輩家屬互動，隨時報告跟提醒失智長輩的狀況，還好有夥伴的協助跟幫忙，也都不嫌棄我，謝謝阿玉跟阿美姐每當失智長輩將排泄物弄髒時，都會幫我清洗。

過去：剛來時還未結婚的心情很不錯，很多事情都是需要重新學習，所以吸收了很多知識，每天過得很充實，行動力也很好。

現在：現在因為結婚了也有小孩，每天很多大小事，加上家庭、小孩，讓人措手不及、焦躁，但是現在都跟長輩相處在一起，多了同理心，會覺得我們該看到的不只是表面而是該用不同的角度跟方式去了解，在彼此的互動下視野更開闊了

未來：希望未來可以能平穩順利，家庭、工作可以更順暢，想學會如何去表達心裡的想法、也想多學一些手作來教長輩，也可以教教自己的小孩。

難忘的事：剛來牛犁時，雖然有駕照，但開車經驗非常不足，不過因為工作需要，所以必須硬著頭皮上路，每次到巷弄靠牆停車都要貼牆到只有幾公分，就這樣來來回回停了好幾次才成功，非常緊張又要鎮定不能慌，還要常常開車到從沒去過的地方上課。還有一件難忘的事，有一次開車載長輩，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阿妹阿嬪在路途中竟然把車門打開！只為了吐痰，嚇到我有點慌張大喊阿嬪你在幹嘛很危險！這件事讓我反思到身為開車的人，應該要更注意安全，入門也一定要鎖及要注意長輩的一舉一動。

透過這樣的工作坊當中我更認識了小孟，同時也更清楚在照顧失智長輩的日常是怎樣的在過一天，有一點汗顏。我忘記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求生存的能動性，我並不是對資本主義沒有察覺的人，也不是無情無義，只是碰到權與利的選擇時會流於我的慣性再度順從其中，如果第一次進入社區工作是為了取得主流的市場，那樣的辛苦我都熬過來，，第二次的進場是讓為了找出在地的互助系統，不再視政府資源為唯一的入徑，與夥伴學習成為「我們」的可能，現在我的條件更好了，是有機會得

藉由一次次的思辨，幫助自己成為一個能真正愛人也愛自己的人。

三、臨界的邊界：從危機照顧到關係治理的倫理

小雄¹⁶事件的發生，讓我們再一次直面「情感與制度的邊界」。當人處在生死臨界點時，所有的行政規範都顯得蒼白，但當危機逐漸平息，組織卻又不得不回到「誰負責、怎麼算」的現實。那是一場考驗，不只是對生命的關懷，也對關係的治理。在非營利組織中，情誼與制度往往交錯、重疊，我們一面想守護人，一面又要維持組織的公正。如何不讓愛流於濫情，也不讓制度變成冷酷？這件事提醒我：社區行動不只是救人與分攤，更是一場倫理修練，學習在臨界中仍看見人。

（一）沒有邊界的愛會傷人；沒有愛的邊界會傷心

2022 年 7 月 28 日小雄在家昏倒沒來上班、手機也不通，鈞弼早上感覺不對勁去租屋處叫人也沒回應，後來破門而入發現昏迷在地上，請救護車緊急送醫，是血糖太高併發敗血症，有生命危險、插管治療。醫院也已經通知家屬了。要能夠撐過當晚才会有希望，我下班過去陪鈞弼等待小雄家屬到達我們才回家都已經 8 點多了。從早上到下班後我過去時，鈞弼才有喝水跟去上廁所，疫情關係喝水要脫口罩必須到院外，而不敢上廁所是因為小雄一直處在急救中，醫生隨時要找家屬問問題，所以不敢離開現場，早上通知時小雄母親說要晚上才能到。

小雄昏迷了 8 天共計在加護病房住了 12 天，從肝跟腎功能衰竭需要換肝洗腎，到轉入一般病房請了看護也住到 20 天後返家租屋處休養身體慢慢恢復，到 31 天後正式上班。因為小雄是環境組組長，工作跟鈞弼有許多的互動也在協會待了 20 年之久，所以在醫院及小雄母親、舅舅們的探訪住宿都是鈞弼負責，還包含豐田、慈濟的每日來會送 2 餐，返回豐田租屋處時夥伴們輪流送三餐，鈞弼必定每日去看望一回。

鈞弼每天都會將小雄訊息用 line 在群組告訴大家。以下是鈞弼每天在 line 群組告訴大家的訊息：

7/29：至少撐過了昨天晚上，狀況有稍微穩定，但是仍然沒有脫離危險期。小

¹⁶ 化名，牛犁第一代工作人員。

雄這三天會做血液透析，如果復原的狀況好的話，未來康復的狀況就會好很多，也不一定需要再做血液透析。但現在還是處於危險期。

各位夥伴，小雄目前已渡過最危險期，但還處於危險期中，就看這禮拜他能不能自己清醒過來。住慈濟第一加護病房（10 號），每天會客時間 11：30-12：00，限 2 人，這兩天我都會陪雄媽進去看，也順便了解病情。大家如想去關心，等週一再去看，去時要附當日快篩照片（名字、日期要寫上），還要戴 N95 口罩。

7/30：小雄慢慢有好轉，已經自己會動，但還沒有清醒，目前確定有 B 型肝炎治療中。

7/31：小雄已撤掉洗腎機，身體功能慢慢恢復中，因為肝病引起毒素還未全部排除，所以還昏迷中，不過已經自己會有一些動作，就要靠他自己努力醒來了。

8/1：小雄慢慢恢復中，目前有點發燒，呼吸也慢慢的正常，過兩天就可以拔管。不過還是沒有清醒，但自己動作已越來越大。

8/2：小雄今天由雄媽及舅媽進入探病，雄媽說已好很多，只是身體內有地方發炎，所以發燒中，還在找原因，雄媽要我轉達謝謝大家對小雄的關心。

8/3：小雄跟他對話已會點頭回應，身體各器官也都慢慢恢復運作，現還有點發燒跟黃膽。

8/4：小雄呼吸器已拔掉。明天應該就可以說話。目前病情穩定。過 2 天就可以轉一般病房。

8/5：小雄今天可以對話了，只是還是氣音，加上神智還未完全清醒，聽起來好像是說要回豐田養病就好。預定週一就可以轉一般病房。

8/6：小雄目前已能喝水跟吃粥，只是說的還是氣音沒能知道他想說什麼，頭腦大致清楚，所以有幫大家轉達關心。

8/7：小雄今天評估沒問題的話，明天就可以轉普通病房，目前講話還不是很清楚，過 2 天才會好一點。

8/8：今天小雄媽跟他的表妹來看他，說話有比較清楚，還交待房租跟水電要繳，目前等通知轉一般病房，不過需要請看護照顧，等轉好病房再跟大家說。

8/9：小雄昨晚已轉普通病房 2811-3（8 樓），要看他要先快篩並到慈濟一樓入出院服務處辦看護證，目前還不能隨便吃東西，所以不要帶東西去。小雄最近

會拿到手機，大家關心他可以用手機跟他聯繫。

小雄好很多了，小雄媽媽說謝謝大家的關心，手機已經交給小雄了，小雄已有手機了。

小雄前後休息將近 2 個月，多了一張重大傷病卡，小雄跟雪霞說他在昏迷中出現我兩個小孫子的模樣（凡萱的小孩每天帶來上班，都會賴在小雄身邊聊天，因為小雄會上網購買許多奇怪玩具給他們），辦公室所有人都在他昏迷中一一出現過，連鈞弼的大姊、二姊也都出現過，小雄說：很奇怪的是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卻沒有出現過。小雄自己也說從上班到現在，除了生活費用留下其他都寄回家，早期逢年過節都會回家，漸漸地只剩過年才回家，所以牛犁的人反而相處時間更多。

小雄生病事件也引發我跟鈞弼的結婚近 40 年未曾有的絕望，甚至在債務跟三餐不繼時都沒有如此心寒。小雄生病期間的醫療費用加上個人卡費及電話費用加起來 10 萬多，其中醫療費用 8 萬多，2 萬多的是卡費及電話費用（綁遊戲所以蠻高的）。

鈞弼會認為牛犁協會完全承擔此費用，但是忽略小雄本身有私人保險可以理賠，加上卡費及電話費用是私人行為也不應該由協會支出，我如何跟夥伴交代，重點是未來如有類似形況如何因應，是列入規範嗎還是特例，這都需要說清楚的，鈞弼卻生氣，認為這些繁雜的行政是我應該去處理的。

我只好找組長討論，但是我說不出鈞弼的原始想法，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保險理賠（所以清楚是因為：小雄當天送醫時，醫生說明如當晚沒醒就是植物人，因此所有有價證明全部啟動，萬一生死交關時，看看是否可以幫助甚麼）。我跟組長的說明是：小雄的醫療費 8 萬費用由鈞弼跟我來出，2 個月的餐費及雜物開銷由協會承擔，卡費及電話費的 2 萬多必須從小雄薪資分期繳回。組長也認為合理，因此由雪霞去處理這些事務及 2 個月休養的三餐、生活雜項協助。

與組長決議後必須跟鈞弼報備，鈞弼對我們自己負責 8 萬多沒什麼意見，只是對於分帳的方式很生氣，認為我們在小雄生死交關搶救回來時，還去計算、分攤由誰來負責費用，認為我太苛刻跟計算，不聽我的解釋，還提起我就是這個樣子，長期用盤算、計較、算計的在過日子。我也翻臉：「你他媽的王八蛋，楊先生不要討了便宜還賣乖，你要牛犁承擔 10 萬多的非公務醫療，況且他母親還有保險理賠

之下，我如何跟組長討論。但是小雄替代役後留下工作，有 20 多年的情誼，我能理解，所以我來承擔 8 萬多，卡費及電話費完全由小雄支付，到底還有甚麼好跟我生氣的。」我在一氣之下接者說：「這馬恁祖媽咧袂爽，我一先錢都無欲出，予牛犁出，我就講是你的主意。」

隔天當然跟組長說明新的承擔方式，其實組長們非常肯定鈞弼對協會長期無償的付出，所以不會有什麼太大意見（所以全部由協會支出，是看在鈞弼的長期無償付出的情份，只是鈞弼的情份可以用多久），當下我就把這個事件當特例簽出處理，由協會全責支出。

（二）事件的核心矛盾

1. 急難救助 vs. 組織治理

當下需要「立刻做、先救人」，但很快就碰到「錢怎麼算、誰該付」。救援的溫度與會計的冷度必須同時存在，情感—制度的雙線操作沒有被事前設計好。

2. 私人情義 vs. 公務邊界

小雄是 20 年夥伴、像家人；同時他也是受僱者。我與鈞弼把「家人義氣」與「組織規範」混在同一張單上處理，導致價值與分工混淆。

3. 領導者愛與嚴的角色衝突

我負責守制度、交代團隊與未來案例的可複製性；鈞弼站在義理、關係與即刻照拂。兩人分別承擔了「正義（公平）」與「仁慈（關懷）」的面向，缺乏交換位置的對話儀式，轉成「我算計 / 我無情」的指控。

4. 非營利情感勞動 vs. 財務正當性

大量情緒與照顧工作（陪護、通報、送餐）由人際網路吸收，但一旦牽涉費用，就需要可被團隊理解的原則。此處暴露了「非營利不等於無上限共擔」的底線設計缺口。

（三）有呼吸的手工倫理

我與鈞弼之間的分歧，其實各自守著一種價值。我守的是「財務的正當性」，鈞弼守的是「關係的無條件」。這兩者缺一，都不是牛犁。真正要修補的，不是帳上的數字，而是讓團隊明白：我們會救，也會算；我們先愛，也講理。救援的衝動與治理的原則，不能互相取代，只能彼此平衡。這次的「特例」是必要的，它讓我們看見什麼叫做「臨界的邊界」。

但我也知道，如果不把經驗沉澱成可以被學習、被複製的原則，下一次的特例就會變成新的衝突起點。社區行動不只是救人與分攤，更是一場倫理的修練，學習在臨界中仍能看見人。所謂治理，不只是制度的維持，而是一種對關係的回應責任。我們不能被資本主義的效率邏輯綁架，把每一次的支出、分攤、工時計算成冰冷的數字；也不能陷入制度的框架，讓愛與義氣變成制度漏洞的替代。

真正的治理，是在情與理之間找到一條倫理的中線。那是一種手工式的倫理，需要對人保持感覺，也對原則保有敬畏。它不是要否定制度，而是去轉化制度；不是拒絕規範，而是讓規範能夠呼吸。我越來越明白，「關係治理」的核心，不是在分配誰該負責、誰該付錢，而是如何在一次次危機裡，仍不忘彼此的人樣。當我們能在愛與理之間，找到那條溫柔的界線，組織就不再只是工作機構，而是一個有情、有義、能彼此接住的生命共同體。

第六節 小結

回望這一章，從社造政策的制度邏輯，到牛犁的現場倫理，主題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如何在制度與關係之間維持人的完整。這條線索，從「讓底層能進場」的培力政治，一路走到「讓人在場」的關係治理。

我們在行政、照顧與情感勞動的交錯裡，看見社區行動的兩難：一邊是政策與資源的框架，一邊是日常生活的紋理。當制度愈發精密，人卻可能被稀釋；當情感被無限放大，治理又容易失序。牛犁的經驗提醒我，真正的課題不是選邊，而是在兩端之間，持續摸索一條能讓秩序與溫度並行的「行動的分寸軸」。

一、「行動的分寸軸」的意涵

我稱這條軸為「行動的分寸軸」。它不是中庸的妥協，而是一個倫理取向的拿

捏點：在人與制度兩端之間，讓行動不失溫，也不失序。社區行動裡，制度的邏輯追求效率與正當性，關係的邏輯依靠信任與情感；兩者若失衡，就會出現兩種極端，只有制度，治理會冷；只有關係，治理會亂。

「行動的分寸軸」的提出，是為了使治理回到本意：不是管人，而是回應關係；不是維持制度，而是維護彼此。當現場出現張力與困境，這條軸提供可循的拿捏：制度不凌駕於人，但能保護人；感情不取代制度，但能修補制度。也因此，治理不僅是行政技術，更像是一種關係的調音術。讓「愛與理」同台，讓「會救、也會算；先愛、也講理」有可持續的做法。

二、從手工倫理到可參照的經驗

第三章的幾個片段：紅包、音響、急難救助，都讓我重新感受到「手工倫理」的必要。所謂手工倫理，並非反制度，而是當規範無法涵蓋現場時，人們仍願意以感覺、經驗與信任，維持一種可以繼續共事的秩序。在那些不確定與模糊之間，我們邊做邊學，也邊調整出一些能夠被沿用的經驗。這些經驗暫時整理成幾個可參照的方向：日後再依據現況判定。

- 人命優先序：在任何決策前，先顧及生命與尊嚴，再思考程序與效能。
- 特例可回溯：每一次的破例都留下情境、理由與成本，為下次討論保留參照。
- 信任預算：在有限資源中，仍保留彈性，讓信任可以運作，而非被懷疑耗盡。
- 情感勞動可見化：將「陪伴、安撫、修復」視為工作的組成，而非額外的善意。
- 雙語翻譯：在政策語與生活語之間持續轉譯，讓外部聽得懂、內部也能接得住。
- 修復機制：當衝突發生時，不求立刻和解，而是循著「看見—說清—補回—記錄」的節奏，讓關係得以重整。

這些並非定義好的原則，而是一種「可以被再討論的共識」，它們會隨情境變化，也需要被不斷修補與更新。若有什麼可貴之處，大概在於：我們願意留下討論的痕跡，而不是急著給出答案。

在這些反覆的嘗試與學習中，我逐漸感覺到，社區營造的重點不在「做出成果」，而在讓人得以留下。留下在關係裡、留下在被尊重的感覺裡，也留下在一個可以持續修正的制度裡。「行動的分寸軸」因此不是固定的方法，而是一種實踐的姿態：在制度與人情之間不斷調音，讓我們仍能在現實限制裡看見人，也在制度邏輯裡，為人保留餘地。這樣的學習沒有終點；每一次矛盾、遲疑或改動，都是社區倫理在當代被重新發明的過程。



第四章 在關係中重新理解「成功」與「成長」

在社區實踐的過程裡，「成功」往往被視為克服困難、完成任務的結果。然而，當行動者不斷在現場面對張力與不確定，若僅以個人知識與能力的「解決」作為成長的指標，往往忽略了行動本身所蘊含的關係性與倫理性。知識固然能夠整理經驗，但若缺乏對他者的回應意識，知識也可能成為權力的延伸，使行動者在自我確信之中失去了傾聽的能力。

因此，社區行動的「成功」不應僅被理解為問題的終結，而更是一種能持續讓對話發生的能力。行動的價值不在於是否找到了答案，而在於人與人之間能否在矛盾與差異之中維持共存的空間。這樣的實踐指向一種從「我」到「我們」的轉化，「我」不再是知識的擁有者或解答者，而是在互動之中被改變的主體。「成功」在這裡，不再是自我實現的高峰，而是共學共作的延伸；「失敗」也不再是挫敗的記號，而是一種使群體得以再思、再行動的契機。

唯有當行動者願意將個人的理解與成果放回集體的討論中，讓知識重新被社群吸納、辯論與修正，行動才可能持續生成。如此，「成功」才不會成為停滯的阻力，「失敗」也不會導致喪志，而是共同成長的養分。這樣的社區實踐，並非通往解答的過程，而是一場關係中的修煉，在持續的對話中學習，如何與他人一起成為「我們」。

第一節 從遷移的女孩到成為夥伴——雪霞

雪霞嫁來台灣已二十餘年。十八歲那年，她離開家鄉，帶著「為了家庭」的使命遠嫁台灣。那時的她仍是個少女，卻被夫家視為「應該什麼都會的大人」。初到異鄉，語言不通、文化不同、生活方式全然陌生。她的先生是瘡啞人士(前夫)、婆婆因信仰忙於廟務，長時間不在家，家中除了電視聲便是一片寂靜。雪霞形容，那是一段「沒有聲音的日子」，從此進入一種孤寂的學習狀態。

在被禁止外出與工作的環境裡，雪霞靠著誦念佛經學會辨認文字。懷孕期間，每天誦《大悲咒》百遍，雖然艱辛，卻意外成為她識字與專注的起點。當孩子出生、進入學校後，決定與孩子一同求學：先完成國小學歷，再考取資格，如今仍持續在補校就讀。雪霞說：「我不想讓孩子問我問題時，我答不出來。」這份學習的動力，

不只是母職的責任，也是一種拒絕被歧視的宣言。

早期在學校，雪霞是唯一持續認真學習的新住民學生。成績優異反而引來同鄉的排斥與誤解，被指責「愛現」雪霞再度陷入孤立。然而，這段孤立學會堅持，把孤單轉化為前進的力量。雪霞說：那時候學習的真正目標，是「讓自己不再被看不起」。這份堅持構成了最初的「成功」，一種以個人努力對抗命運的成就，也讓自己過了一段自我懷疑與孤獨的日子。

與牛犁協會的相遇，是雪霞生命的第二個轉折。起初，她只是協會的服務對象，接受訪視與課程邀請。她在軟陶與手工藝課程中展現天賦，於是被邀請擔任 DIY 講師、文史館助理，最後成為新住民學習中心主任。雪霞說：「那時候我半天只能打一行字，雅帆姐說沒關係。」這句「沒關係」，讓她第一次感覺到被信任、被容許學習的空間。這樣的陪伴，成為雪霞後來培力新住民的核心方法，不像培訓，比較像陪伴。

在協會工作後，雪霞不僅習得技術，更重新定義了學習的意義。也開始反思制度與人的關係：「每年為了經費重開課，對姐妹沒幫助，我想要的是長期、漸進的課程。」為了維持班級而寫了三份計畫，也為了解決上課時孩子無人照顧的問題，另寫陪伴方案。這樣的堅持，雪霞也逐漸理解社區工作的難題不在於資源不足，而在於如何在體制內持續生成關係。

近年，雪霞的思考更趨成熟與批判。她開始擔心「文化展示」是否成為另一種框架：「我們想打破刻板印象，會不會又造出新的刻板印象？」雪霞開始與我們討論說出心中看法：「不能只有給，要想自己收到什麼。」這樣的反思，雪霞也協助夥伴及我一起思考，在從事「推動新住民文化」的行動者，轉變為「思考關係生成」的教育者。

同時，她開始關注未來的新住民老化議題，當這些姊妹變老、語言不通、身體退化時，台灣的社會體系是否準備好接住她們？雪霞說：「不能只讓她們講文化，要讓她們學會生活，懂得台灣，這才是陪伴的意義。」這樣的洞察，已超越個人或族群身份，進入「社區共生」的倫理層次，雪霞也帶領我從另一個視角看見及理解不同位置的人的「思考」。

對雪霞而言，協會不只是職場，而是「第二個家」。她說：「我從不會開機到會寫計畫，從不會說話到能主持課程。協會讓我在台灣重生。」這句話背後，蘊含的

是一種「關係中的成功」，不是自我修煉的成果，我們是在共同生活中被看見、被支撐、被改變的歷程。

雪霞的經驗，正是社區實踐中那個深刻的提問的具體回應：成功，是否只能被理解為個人的努力與成就？還是應該被放回到「我們」的對話與互動之中？

雪霞以她的行動證明，真正的成功不是一個人抵達的終點，而是群體在相互學習中的變化。從被教育者，成為教育他人的同行者；從孤立的學習者，成為關係中的行動者。她的生命，讓我們看見「我」如何在實踐中被轉化為「我們」而這，正是社區行動的倫理之所在。

她的生命經驗與行動歷程幾乎與我相似也同行了二十四年。這段關係的長久，不僅來自於她的韌性，也與我在早期的過程相同，試圖從「助人者」轉向「夥伴」的過程有關。早期我以輔導與教育者的角色介入新住民工作，但隨著時間推移，我開始理解到，唯有當我願意放下「教導」的位置，誠實地面對自身的不確定與偏見，夥伴關係才可能真正生成。這樣的態度與真誠讓雪霞還願意與我持續往下走，早期一起工作的媽媽們已經失去這樣的契機了。

一、行動中反思

2022 年的 1 月辦理一個教案設計的訓練課程，我安排雪霞帶領一組工作人員一起設計教案，雪霞在這一次教案設計課程時，她在她們那一組表現出一付漠不關心的樣子，雪霞從不是這樣的人，且這次教具是她們新住民組研發的，組員也有將教案寫上去了，然而在教師提問「為何要設計此課程」與「教學理念為何」時，她顯得異常沉默，甚至表現出對教師的不耐。雪霞在老師提問時，好像跟這組無關的樣子，讓其他三位組員去面對老師的詢問無法回答的困境，雪霞一直是我們協會的核心成員，擔任新住民學習中心的主任，我在現場也有一點不舒服，就詢問雪霞怎了，她回答：「有點累，所以無法專心」我也只好默默接受。

雪霞漠然的表現讓我訝異與不舒服，我猜想應該是無法回覆老師的提問，組員也困住，所以退縮嗎？否則雪霞在新住民面前是自信滿滿的，這次的老師是我評估過，是一個能過經過對話協助釐清的老師，且真的手把手的教，我跟小君都能夠接受是因為我們學到技巧。可是雪霞下完課回到辦公室跟凡萱說：不知道老師在上甚麼，這個老師不好，我看到雪霞對老師的排斥。對於雪霞的現場表現還是讓我心情

有一些起伏。

晚上跟凡萱討論時，凡萱提醒我雪霞的感覺是真的，我必須去了解那個感覺是甚麼。也有可能是無法聽懂老師的話語，因此沒法帶動他的小組，所以退縮到他的舒適區，否則會在組員中沒面子。如果這件事到這裡就結束，我會將雪霞的狀態去對照我的經驗，就跟我當時的情況很像，又將雪霞安在一個因為不懂而退縮的位置，我沒有藉由這機會再去對話，還好當時沒有啟動對話，因為我當時已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在對話中就會形成質疑式的問話而不是對話。

回溯走過的路徑書寫出來透過對話再度的移動視域，我真的很習慣貶抑夥伴，用助人方式對待，2022年5月透過廉兮的「行動研究課程」，重新去看見母親的位置時，也同時看見我對雪霞與夥伴的視域轉變有點難，原有的價值時不時的跑出來影響行動，當我覺察時加上廉兮的提醒：「用庶民的角度來看事情，不是把庶民拿來變成當作對象……如何理解雪霞的觀點，向雪霞觀點學習用她的觀點看見了甚麼？而不是去將雪霞問題化。」社區行動的核心不在「教會他人」，而在「與他人共學」。唯有當我願意承認自己的慣性、錯誤與侷限，行動才會真正進入關係之中。「成功」不再是我能否解決問題，而在於我們是否在對話中成為更能共存的「我們」。

二、再行動：在南香事件中的共學與鬆動

社區工作如何成為「我們」的實踐之路，要更有開放性的對話，需要怎樣的進行我是需要練習的，剛好雪霞提出一個議題「新住民在台灣如何的老化」，於是找到資源開了工作坊，藉由這議題雪霞帶領新二代小寧¹⁷規劃整個活動，我將自己放在一個學習者的位置，讓自己不要干涉太多，都交予雪霞負責（我有一個安心是雪霞一定會找廉兮跟慧絢進場），安排了兩天的活動，就是如何啟動對話，學習要如何看見不同人的觀點是基於怎樣的價值導向、學習資料如何分析。

然而，在執行計畫時，我仍不自覺地以「達成計畫目標」作為思考主軸。當活動焦點轉向越南姊妹南香的生病經驗時，我開始焦慮這樣是否偏離了「課程主題」，擔心執行方向不符工項。這一刻，我再次看見自己「被體制內化」的慣習：焦慮於

¹⁷ 化名，牛犁第二代工作人員。

可被量化的成果，而非關係中的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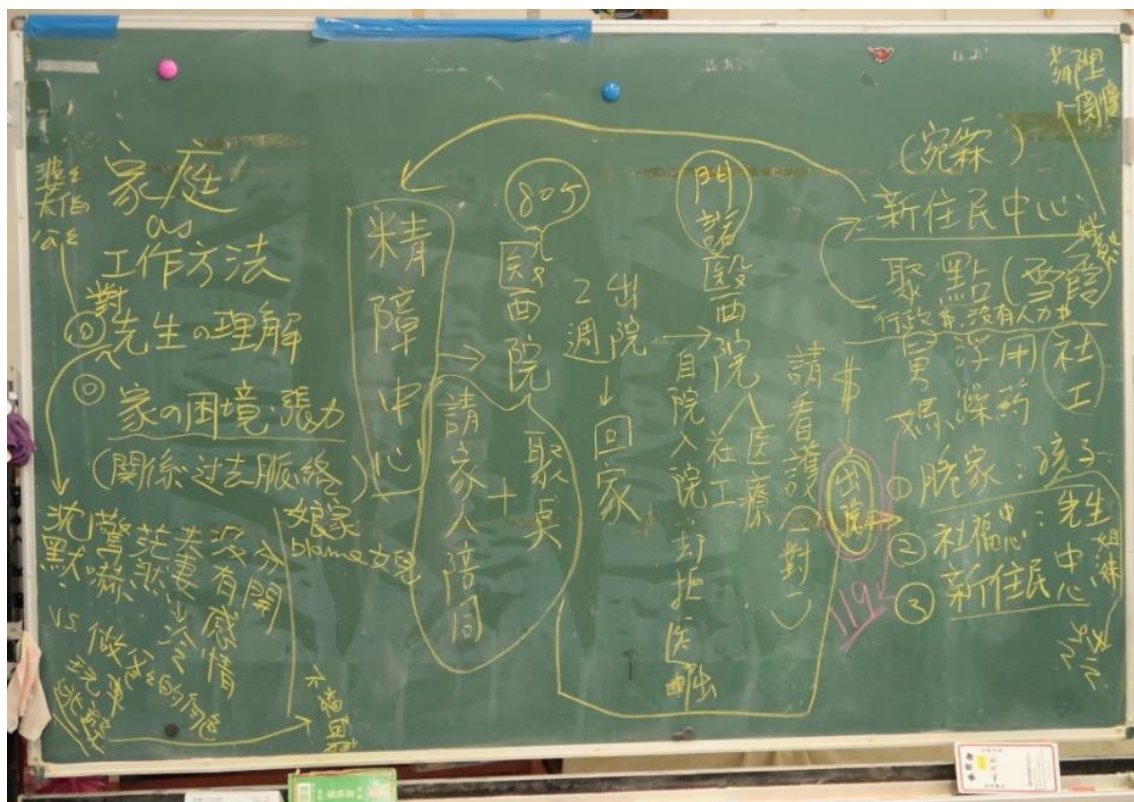


圖 四 當天慧絢與廉兮帶領大家討論的書寫

南香從 6 月發病到 8/17 被我們拿來當案例討論時，都還在忙著南香的問題，所以造成雪霞與協會的困擾。廉兮與慧絢很快接住這個議題，帶領大家將南香的事件抽絲剝繭細緻的梳理清楚，透過廉兮提問，我們的回答，慧絢寫在這黑板上，從一來一回的整個處理南香的方式與流程我發現：一般執行預防方案的社區組織一碰到個案就是通報，如果開案就是啟動正式資源介入，但是這些正式資源也需要家人或是案主願意配合，否則還是卡住資源無法使用，除非涉及生命安全才能強制執行。過程中案主在醫院及家庭來回進出時，社區組織需要許多的資源連結協助整個家庭，讓我們不斷的耗損能量(近年來都會有不同類型的個案出現，耗去許多工作時間與心情)。

南香在 6/27 (2022) 認為自己生病，舅媽跟朋友協助請救護車幫忙就醫後沒有特別狀況就回家了，6/28 南香她認為自己已經死了，不斷的去電給他的越南姊妹及舅媽、阿姨們，因為南香是新住民所以其他越南姊妹先通知牛犁，雪霞當天就通報新住民家庭中心，南香在 805 醫院及門諾分院不同時段住院，從醫院回來期間狀況還是不穩，無論是花蓮縣新住民家庭中心、醫院都是有區域的距離，回到家庭中

產生各種問題時，社區中的關係人還是政府部門的社工，大家都會期待我們的雪霞能夠幫忙協助南香的狀況，過程中還有小孩、公公、先生的問題，雪霞必須承擔起這錯綜複雜的問題壓力還蠻大的。

廉兮老師協助釐清整個脈絡，也盤點家庭與社區的資源，廉兮舉了一個學生家長的例子：談到精神疾病的污名、正式資源切割親情、患者從此與家人是平行世界，讓我非常震撼：

.....母親的那個所有的病例都出來了。每一週的檢驗報告說她母親的狀態不好，然後一直要回家。一直想打電話給家人，可是都聯絡不到，然後後來他母親甚至把自己的眼睛挖瞎，這樣子就是那個藥已經壓不下來，有時候變呆掉，她是不想吃，就拒絕吃藥，然後她在裡頭就會像是活死人這樣，然後她很痛苦，她一直想家人，可是家人沒辦法接她回去，所以她後來把眼睛挖掉了，以後她還是想回家.....

廉兮分享學生家長在精神病院的狀態，讓我非常震驚，因為南香不想住在醫院堅持回家讓我感覺很麻煩，還在想如何勸他好好的接受治療。我們太習慣通報後轉介、啟動正式系統的資源，如果正式資源使用不順我就指責政府的分門別類的分工不當，去批判政府就以為我有反思與抵殖，廉兮說：「這種方法就是視她為病人就該住院隔離，有藥吃、有醫療挹注我們就安心了這是一種社會隔離和治理的方式，還真是一針見血，不知不覺地將彼此關係制式化而不知，還在期待這樣工具式照顧要更完整些。」我完全忘記社區的力量，而社區中我能想像的資源也被補助下限制了思維，總以為這是牛犁的責任、是雪霞的新住民組的所以由雪霞負責，居民的互助系統是在的，我們需要如何促發引進，全民社造不是用政府資源讓全民參與，而是不在政府資源下我們也能擁有群的力量彼此互助。如廉兮所說：

這是來自一種社會關係，來自於一種家庭的這種群的關係，從家到群的關係。這個部分是一個希望，就是說，如果各位想想看，如果沒有這個群的關照的話，這樣子一個人跟這個社會隔絕的人，他還能去哪裡？他恐怕就要在某些這種公共的機構裡頭，要麼就是默默地消失在社會的眼光。...但是他還活著...也可能是甚麼狀態我們不知道，...現在他還有一群人關心他.....也就是這個社會

性的關係還在的時候怎麼樣用一個集體的方式去撐住這一個人，或者是撐住他的家……那這個崩解當然不是只是他一個人發在他身上，但是其他家人全面的都是在那個關係中的變化，所以它是整個家在承擔的這個困難。

如何拋開執行計畫的框架，就像南香的問題就在擺在這了，我還在想計畫如何完成，將南香視為病患就是住院就醫病好再回家，孩子就是尋求中區家庭中心跟學校協助，安排妥當之後我們就是結案，光是這樣病理化的處理程序流程也讓我們雪霞非常的內耗能量，如果回到社會關係中如何發展一個群的工作方法，和南香的越南姊妹群的情誼、舅媽、阿姨、孩子、南香老公的親情加上組織間如何創造一種可能性，讓南香在這個群當中被接住，依然生活在這社區、家庭中。

都還能夠再活在我們之間被我們看見被我們支持，被我們理解，在這個好好壞壞之間，不斷的想辦法去找方法，這裡頭就是一種很重要的社區的力量。……今天社區夥伴們介入的時候，就提供了一個社會集體的力量，那我覺得今天我們的討論的意義就在於說，如果沒有這個社會性的關懷的話。只是所謂的系統性的處理的話，可能他去了哪裡也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夠照顧得了他了（廉兮）。

南香 8 月 29 日不想住院回家，精神狀況還可以，我們開始用姊妹的網絡進行輪流叮嚀吃藥，中區社工也會在下班回家前路過進行關懷，也訓練小孩幫忙照顧媽媽，9 月 6 日與農場雇主討論是否讓南香再回去上班，因為南香擔心家庭生活費不足，所以用好好吃藥身體恢復就可以去上班當誘因讓南香安心，9 月 14 日，農場老闆開始讓南香做半天班。南香到目前 2025 年還是持續正常上全日班，也不會亂說話了，但是精神上有點不集中之外（可能是吃藥的關係），對話時眼神會閃避並且話不多（感覺不太願意說話），對家裡的大嫂一直很不滿，也會說大嫂人前人後說話不一，南香從出院後每個星期二晚上也都會到牛犁協會上課。

三、持續鬆動的「我們」——行動中的再學習與倫理生成

從南香事件回望整個行動歷程，我開始理解：社區工作的「成功」，從來不是靠某一個人的理想、策略或技術所完成的。過去我常認為，有鈞弼的理想作為支撐，

加上我靈活的應對與策略，牛犁的行動才能持續運轉。然而，透過廉兮的對話與雪霞的行動，我逐漸看見「我們」如何同行，其實遠比「我如何完成」更為關鍵。若沒有這些關係中持續的相互提醒與牽制，我可能同時是推動者、也是破壞者。

我深刻體會到，當社區工作被納入政府計畫的制度邏輯之中，我們所依賴的資源，同時也可能成為限制創造力與互助關係的枷鎖。名為「雨露均霑」的資源分配，往往以公平為名，卻在無形中規訓了行動的方向與想像，使我們在執行中不自覺地再製制度的框架。這種現象並非單純的「對」與「錯」，而是一種深層的習性，它讓我不斷在「制度化的助人」與「關係性的同行」之間搖擺。這種矛盾，也正是社區行動的日常。

Albert Memmi (1998)¹⁸指出，追求同化的慾望，其實是為了洗脫被殖民的形象；但那痕跡與教化，仍深深刻印在行動者的身上，也就是說；想要擺脫被壓迫的形象，卻不知不覺地活成壓迫者的樣子。廉兮在行動研究教學中強調：「庶民觀點不是把庶民當作研究對象，而是從庶民的眼光重新理解社會結構與知識權力。」，許多看似反抗的實踐，其實仍沿用殖民者的語法與思考方式。這樣的提醒讓我更明白，自己的抗爭、思考與工作技巧，也都深受治理邏輯與制度化思維所滲透。即使我渴望與夥伴共學共作，但那份「掌控」、「完成」、「負責」的慣性，仍會不時浮現。

也因此，我更願意承認；社區行動的學習，沒有終點，也無法一步登天。它不是一場「去殖民化」的宣言，而是一段不斷「邊走邊喬」的歷程。每一次的衝突、挫折與失敗，都是讓我們鬆動習性的機會。這樣的自我認識，或許才是真正的學習起點：學習如何與夥伴共學、如何在制度之中仍保持關係的彈性、如何在專業語言之外重新傾聽他人的經驗。

這樣的實踐，不僅豐富了我的研究書寫，也讓我逐漸發展出一種更貼近人、貼近生活的工作方法、一種能理解他人與自己家庭處境的行動知識。在這裡，「我」不再是知識的中心，而只是「我們」中的一個行動者；「成功」也不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種在互動中生成的倫理。

¹⁸ 阿爾貝·梅米 (Albert Memmi) 著，黃建宏譯 (2002)。《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台北：麥田出版社。

第二節 兩代工作者——阿玉與小明

第一代的夥伴阿玉在 2015 年離職因為要幫女兒帶孩子，加上老公中風需要照顧，所以阿玉決定在家幫忙帶外孫又可以照顧老公，女兒也會給於費用補貼生活開銷，也就可以解決阿玉跟老公的生活問題，免於有經濟上「有出無入」的焦慮。2016 年阿玉兒子小明¹⁹大學畢業服完替代役也來協會，承接母親阿玉的工作 2019 年成為高齡組組長。

小明在 2020 年夏天工作時常常丟三落四的，也會常常請個 1~2 小時回家，後來了解因為姊姊小孩已經念小一了，已經不再需要阿玉幫忙帶小孩了，因此阿玉就少了收入。因此阿玉就去西瓜田工作，而老公的復健接送或是要去看醫生阿玉就顧不上了，小明就必須跑一趟幫忙，而阿玉不僅膝蓋不好、脊椎腰骨也不好，工作時一週都要打一次止痛針。我跟小明提醒是否有些居家訪視的臨時工要給阿玉去做家訪，可以多一點收入且不會那麼勞累。

社區實踐不僅是一種技術或經驗，我雖然有一種能感知他人處境的心，但是能有調節關係張力的能力是行動中學習而來。透過對小明工作狀態的觀察，我學習到如何以「手感式」的理解進入他人的生活脈絡；而阿玉母子的互助，讓我看見了照顧倫理的可傳遞性，照顧不只是愛的延續，更是一種社會性的學習。看見這樣的關係倫理後，社區行動的核心漸漸不在於制度如何完善，慢慢轉向人與人如何在生活縫隙中彼此撐持。

與阿玉聊天時她提醒我：「幫忙帶孫子千萬不要跟女婿拿錢，會被瞧不起，女婿以為他的錢有多大，竟然說我兩老都靠他養，真的好氣。」2021 年請阿玉擔任專職工作，協助失智據點的業務，阿玉小學畢業，1960 年出生，當年工作為了學電腦搞得月經都亂了，這次回來需要協助失智班級是協助帶課程的，目前帶失智長者課程：「不敢說信心滿滿，但是不害怕了」。阿玉這樣說，我清楚阿玉真的好努力。

阿玉：「早期在牛犁要訪視、普查、煮餐、帶 DIY……等，甚麼事都做過，甚麼事都要會做，過去因為要做的事很多，不會的也很多，所以很辛苦。對於現在的工作內容已經很習慣了，懂得如何安撫老人、照顧長輩，也做得越來越好，希望未

¹⁹ 化名。小明跟富民是國中同學也加入青少年服務隊第三梯隊，所以回來工作負責高齡組，對阿公阿嬤都自稱為我是阿玉的兒子，大家就會快速認識。

來能平平順順就好，希望能賺很多錢，可以沒有煩惱的到處玩。」下圖是阿玉的心情敘說：心情從陰天變成大晴天，原本快枯掉的小草上完後後變成了開花的小草了。



圖五 阿玉透過自繪圖象敘說在牛犁工作的感受

阿玉這一期回來工作脾氣變得較暴躁容易起衝突，新的夥伴不太適應這樣的阿玉，做事方式也常常說：我們以前都這樣。但是礙於是小明的媽媽，大家也就加減忍耐，在 2021 年的「敘說藝術——生命拼貼」內部訓練中，阿玉透過三媽卡的桌遊說出心裡的感受：因為老公中風、大兒子獨善其身、老二酗酒無法工作、老三是小明最乖（所以壓力都在她身上），大女兒已經結婚很孝順沒錯，但嫁人了。過程中阿玉說了許多細節，邊說邊哭。

今年 11 月（2022）阿玉老公 COVID-19 確診往生了大家都很錯愕，陪伴過程中阿玉提到，去年在牛犁最難忘的一件事，「敘說藝術——生命拼貼」說到哭的那件事，因為：「說完之後大家都對我很好，有感覺像一個家的樣子。」失智據點的長輩偶而需要把屎把尿的工作，阿玉對照顧失智長輩很有愛心也不嫌棄，是我們整個團隊唯一不嫌棄這工作的人就是阿玉，連阿美姐都說：「我沒法度像阿玉這樣弄屎弄尿。」也讓阿玉可以安穩的在失智據點工作，大家不會跟他計較（因為整天僅照顧 5~10 名長輩）。對阿玉而言單一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是能夠讓自己靜下心來且

收入穩定。心中多了回饋的心。老公喪事辦理中還不忘交代夥伴，失智長輩的照顧眉角，同時也讓小明的的工作穩定下來。阿玉的故事使我重新理解，社區工作的「成功」不應被簡化為能力的展現或任務的完成。她從退出職場、重返家庭，到再度成為失智據點的工作者，看似重拾穩定，實則經歷了無數衝突與掙扎。她的暴躁與眼淚，都不是失敗的符號，而是關係重新生成的痕跡。在「敘說藝術」的桌遊活動中，她哭著說出自己的壓力與委屈，那一刻，她不再只是被輔導或被安排的人，而是以自身經驗與情感重新進入群體的學習者。

她說：「說完之後大家都對我很很好，有感覺像一個家的樣子。」當下我真的被感動，也感動我自己願意學習改變。社區行動的核心，「成功」不是在於問題是否被解決，而在於人是否在關係中被理解。阿玉的成長不是知識性的「學會」，而是情感與倫理層面的「被看見、被接住」。而我們這些與她同行的人，也在她的經驗中逐漸學會看見，這會產生一種有溫度的關係，讓照顧不只是工作，而是一種共生的倫理的氛圍正在擴散中。

在這樣的脈絡中，社區工作的意義重新被界定：它不是建立在個人努力或技術改進的成功之上，而是在彼此的互動中，讓「我」逐漸成為「我們」的過程有了溫暖的關係。這種關係是自然的相互關懷，是共學與共存的起點。

第三節 不同時間的視角看見

這是同一事件 2024 後與 2021 的我有視角有一些撐開後的書寫：為了達到工作的效率，運用了策略制定機制，並透過權力(主管位置)讓工作夥伴在時間內有效地將工作完成，農場是一個可以全場凝視與觀看的場域，加上工作的分配機制、時間與人性的交叉運作之下，人們不由自主地順從這樣的結構性工作，在閱讀「規劃與懲罰-監獄的誕生」時，心中浮現出此畫面，雖然還未完整的閱讀完，先將這有感而發且有具體圖像的工作過程分享心得。

看似一場想要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工作，透過分配機制達成目標，身體帶來的自我管束的工作方法，也在工作崗位上運作，閱讀文本後感受到有一種監獄的壓迫及權力運作的工作方式。理解之後，工作如何在解構與結構之間移動，在生活中滋潤彼此的關係、在關係中「共創」社區工作的生活態度，才是後續的挑戰。後續有更多的理解，將放在計畫考中書寫，目前有感於有如監獄的管控的工作法，先書寫記

錄一下。閱讀前心得：2021 年 12 月書寫

一、 工作紀錄

以下是 20160726 田園拔草書寫記錄，工作從 16：15~17：15：00 完成，20 個人僅花一小時的時間。這是記錄當天的工作流程及圖片佐證，這是我對人性認知的工作分配法，確認每人都有一塊工作區範圍，就會產生責任與壓力，跟上課要考試的道理相同。，而且我排定 16：00 出發去拔草，也是認為大家如果想準時下班，就會努力在 17：30 前完工。



因此每人分配從兩邊開始工作，目前兩邊的人開始靠近中，你可以看見往中間靠近時，每一個人的工作速度與品質。



在這樣的互相觀看的空間下，個人行為行成無法逃遁



速度快的人會去支援未完成的夥伴



雖然有許多農務的門外漢，但是我們一個小時內真的完成了工作



不僅準時下班，還有時間吃點心

圖 六 現場工作的責任分工機制

這樣的工作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想法

雅帆的想法：這樣的工作對農務組的大哥、大姊們，都會用 1 天去執行，但是農務組的大哥、大姊們在時間緊迫上，沒有時間可以完成，需要全體人員支援，一般會用半天時間來完成，但礙於排不到可以共同工作的時間，所以我就用一小時的策略及分工分責任策略來安排工作。這樣的計算方式：2 個務農組是一天工作時間，換算下來等於 16 小時，16 個人不就是每人一小時就可以完成了，所以我就用一小時的工作時間來計算。

部分夥伴認同：「認為工作不用拖到第二天再來，也不會有人摸魚，感覺很好。」

有些夥伴認為：「太嚴肅工作有壓力，好緊張。」

一些人：「不清楚有被操作的感覺，就是依據指令工作而已。事後詢問」

小雄說：「鈞弼不喜歡是因為會看出誰在摸魚，會讓人難堪。」

總幹事（鈞弼）：「很不喜歡，太權威及人被壓迫的感覺，監控感，鈞弼最不喜歡我這種工作模式，但又辯不過我，常常採取不與我共同工作的方式。」

但是現在 2024 年的端午節前夕，我看到的不僅是用策略與權力來嚴格監視的方式，讓每一個凝視目光都將成為全面施展權力的一部份。在 2021 年還很得意地找出工作策略，沒有火藥味的讓大家有效的完成工作，那 5 分地是真的還蠻大的除草工作。現在有覺察這樣的操作會產生一種身體的慣習，不知不覺「馴服的肉體」的產生，更無法擁有自己的思考與主體的產出，而慣習在指令工作的養成，重新壓回我的身上，更讓我疲憊無法擁有夥伴關係。

2024 年，鈞弼也回應這件事：

很強調每個協會的成員，都是「夥伴」，請勿稱其為「同事」；我們並非大家共同工作而組成，更應該是彼此的理念、價值觀互相吸引而組成。或許大家一開始並非是相同的原因而進來協會工作，但也希望大家記得這樣的精神。我們應該也必須允許每個夥伴們犯錯，在每一次的犯錯中成長，而組長們更不要將自己變成「糾察隊」，以抓包、抓漏、緊盯著自己的組員作為自己的工作，我們更要做的事情，是幫助每一個人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同時也希望大家，務必在不同的工作中適時的「求救」。

當然現在鈞弼的回應我能懂，但當時處境我應該也聽不進去這樣的言語，鈞弼當下也識時務的不說，僅表示無奈。現在我必須有意識的理解，生活是受困於階級、

受困於無盡的剝削，在社區營造路途上，不再是複製另一個階級。

二、 我在不同階段的「工作價值」變化軸線

表 五 研究者工作價值的轉變

階段	時間與情境	工作價值核心	隱含的知識位置
第一階段：效率與策略導向 (2016–2021)	田園除草工作、農場分工紀錄	以「效率、責任、成果」為導向，強調計畫管理與「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工作」	我站在管理者 / 策略設計者的位置，強調「制度性運作」的合理性，忽略了關係中的感受。我稱之為「有效率但帶壓迫感的成功」。
第二階段：反思權力與控制 (2024 回看)	閱讀傅柯 (1992)《規訓與懲罰》後的重新詮釋	重新意識到權力如何滲入日常，「工作分配」原來成為「凝視的技術」；認知到「馴服的肉體」與失去主體性	從「我如何讓大家完成工作」轉為「我是否在再製權力結構？」；我開始從知識者轉向行動的倫理反思者。
第三階段：關係倫理與共學 (現在)	鈞弼對同一事件的回應 (2024 年)	「工作不是控制，而是陪伴彼此成長」；強調夥伴、容錯與互相求救	我與鈞弼形成一種「互為鏡像」的學習關係，我的策略讓我學到權力的侷限，而他的回應讓我看見「夥伴」的可能。我開始練習「放下控制」，回到「我們」的行動。

鈞弼的態度其實補上了我的「從策略到關係」的缺口。

表 六 鈞弼的工作態度

時間	鈞弼的態度重點	對應意涵
早期 (2016~2021)	「不喜歡太權威的工作模式」、「太有控制感」	他在實踐中對抗「效率的壓力邏輯」，試圖維持「情感與倫理的工作

		空間」；他反對將社區轉為管理機器。
近期（2024~）	「每個人都是夥伴，不是同事」、「不要變成糾察隊，要幫助彼此變好」、「允許犯錯與求救」	他提出一種去管理化的社群哲學「社區」不是執行團體，而是理念互吸、互信共生的場域。這是他對你「策略治理式工作」的倫理回應。

鈞弼的話讓「成功」重新被定義為「關係可持續」的成果，而非「任務完成」。他將我的「策略」轉化為「共學」，也使我意識到：我們以為的「成功」若只留在制度或效率上，就會不知不覺複製權力結構。

第四節 留一點餘地：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學習分寸

我並不想否定績效或管理，也不想將「效率」與「倫理」劃為對立的兩端。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在現實運作與人性關係之間，找到那條可以站得住腳的行動分寸軸。這條軸線並非抽象的道德平衡，而是在每一次具體行動中不斷被試探、調整、修補的尺度。

它提醒我：做得太滿，會變成控制；放得太鬆，又會失去責任。太快，會壓過他人；太慢，又可能錯過時機。在這些緊張與取捨之間，我才慢慢理解，社區工作的倫理不是拒絕制度，而是學會拿準那個分寸。績效不是罪惡，它只是需要被關係重新界定的工具，不是用來衡量服從，而是用來衡量「我們是否還能一起工作」。

這幾年回望，從權力的策略、到關係的生成，再到學習如何在中間調整分寸，我才看見「成功」其實是一場持續的協商，它不是結果，而是一種不斷調整的行動態度。能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留一點餘地，讓人能被看見、被信任、被允許，這也許才是在社區行動中最想守住的「成功」（暫用這個用語）。

在長期的社區實踐中，我逐漸發現，「我」並不是單一的行動者。我是一個被生活層層包裹的人：既是母親、女兒、妻子、學生、主管、債務人，也是正在老化的身體。這些角色交織成一張日常的網，拉扯、矛盾、彼此牽制，也在其中形成了我對「行動」的慣習與偏好。

若不先看見這樣的自己，我所說的「理解他人」就容易成為抽象的同理，而非真實的共感。因此，這份〈多重置身的我〉的羅列，並不是自我敘說的清單，而是一種社會實踐的解剖。透過逐一梳理各個角色的渴望、困局與行動，我開始看見：原來我對「成功」「責任」「愛」「自由」的理解，都是從這些經驗中長出來的。這些身分既限制了我，也支撐了我，讓我在矛盾中學會行動的分寸。

更重要的是，當我能誠實地看見自己是如何在角色之間切換、如何被制度與關係牽引，我也就能打開理解他人的門。雪霞、阿玉、小明，以及「同一事件」中的每一位夥伴，我們在工作現場的語言、情緒與反應，也都是多重身分交織的結果。我們不只是工作人員，而是同時背負著家庭、疾病、債務與夢想的人。

這樣的書寫，是一種學習，讓我在理解自己時，也學會以更開放、更細膩的眼光去看見他人。唯有如此，社區行動才能從任務走向關係，從制度走向生活。這樣的書寫，延伸到前面的雪霞、阿玉與小明、以及〈同一事件 2024 後與 2021 的書寫〉。它們不只是不同的個案，而是我在理解「人」的路上一次次的學習：從觀看他者，到被他者影響，再到學習與他者共在，最終，我在他們之中，也看見了自己。

一、游雅帆的多重置身

表 七 研究者的多重置身分

角色	經歷	是渴望也是 困局	行動	目前嘗試努力的方向
女兒	垃圾堆撿食、母親數嫁、被認定家世不清白被排除、生活中屢感不公平對待	不想被瞧不起、努力想成功，渴望豐盛物質。	為了證明自己的價值，日夜不斷地學習與工作，就為了想成功，這也是我後來做社區工作的動機，看見可以獲取各種資本及晉身的機會。	看見：這些經歷形塑了我的價值觀和人生方向，這樣的價值觀也影響著行動。 嘗試：去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和價值觀，應該尊重並理解彼此，不要輕易地對他人進行歧視或刻板印象，嘗試進入他人的生活中。

母親	4 個孩子加上債務，窮和家世不清白，卻循環再製的發生在我身上	不想跟母親一樣，讓孩子恨一輩子，以及沒有被疼愛的童年，其實也渴望孩子更多的愛我	堅持讓自己不成為孩子的負擔。因此壓抑自己的情緒和負擔，努力提升學歷與學習各種專業證照去接各種課程及計畫，讓自己夜以繼日的勞動。當被邀請上課時，到底懂不懂都是先接了再說，備課的焦慮就從接課就開始了，從如何度過 2 小時、3 小時到 6 小時，甚至大學一整學期的課程，努力用文化資本換取經濟資本，不能讓孩子因我而自卑，必須讓孩子引以為傲的母親。	看見：對「母親」這個角色的期待，不僅怨懟著母親，也讓我對子女有一種內疚與自我的壓抑，母親光環如同一件衣服很難脫下，同時桎梏著我對母親與子女的期待和付出。 現在：努力走出母親光環的形象，嘗試將「母親」的衣服脫下，不再囚禁「母親」這角色，與子女走出彼此舒適的關係與自由。
妻子	先生為我付出	社造也是為了成就先生的夢想，帶來生活的困窘，	雖然是為了成就先生的夢想，但是原生家庭的經歷及身為母親的角色，不得不在這份工作上創造出我的生路，先生沒有完全理解我的動機，有時會視為我是一個貪念物慾的人，為了實現我的價值觀和追求的目的，我吃盡苦頭還備感委屈。	也許生活條件改善，對外在物慾貪念並沒有那麼渴望與執著，或者是堆疊出來的價值態度轉變，開始朝向與先生靠近的路上。有一個更重要的想法隱隱地浮現，就是不再去猜測鈞弼是否會認同我的作為。
學生	2006 開始唸書到現在 17 年，	公關、快速篩檢有用的來當話術	去年 7 月到現在才開始用腦子，僅思考一件事；如何有愛人的能力	1. 創造好的關係 2. 「敘說藝術-生命拼貼」：對話與協商空間
主管	我害怕無法達標，恐懼意外降臨、	原生家庭讓我沒有安全感，害怕人	長期用監督方式進行控管，夥伴卻擔心被抓包。對話真的非常重要，年輕人	嘗試理解；每人都會搞砸的時候，是需要彼此互相幫助的，可以坦承自己的

	害怕太閒就會出事的記憶讓我無法輕鬆下來。	生再度失控	「放縱」的說出，工作沒感受到價值、也能對我說出我所謂的福利，其實是本來就是該給的，怎能說是增加福利。 我漸漸聽進去了，從腦羞成怒到試著站在一起，到有了一些羞愧及氣勢放軟，說話也溫暖些(夥伴對前同事說的，我變很多了)。	害怕與安全的求救。感受溫度與愛，發展能夠互助、安心坦承需要幫助的友善環境，而不是譴責與害怕被抓包的環境。 人：存在的意義、讓無愧在日常中進行取捨，有時抵不過物慾時情緒會反彈，不硬來免得反效果。不小心還是顯露內心的不安全與防衛。
62 歲的身體	膝蓋退化、頻尿急常發言、牙齒、眼皮無力、脊椎滑脫	無底洞的錢坑，行動受限，心理無法適應，疼痛與焦慮常在	這 2 年內經歷： 1.膝蓋退化：西醫 PRP 已經打了 8 針(要再加碼中)、物理治療、中醫復健每週 2 次(持續) 2.植牙 1 年半：每 2 週一次，2024 年 9 月完工。 3.尿道炎及漏尿：門診手術 3 次(進行中)。 4.高血壓：認了，開始吃處方簽	需要適應 每天晚上 30 分鐘的運動，飲食控制，能夠養長一個習慣，就知道我真的被逼急了，所有的中、西醫療程，最後都要回到自我復健之路，並要與病共存，病不是會被治好，而是暫緩衰退。
債務人	怎努力都不夠還 鈞弼的朋友/相挺、我的朋友/利息，開始償債也開始心	社造是好去路，各種行動都被支持，也含吃喝玩樂甚至出國都合理，不會讓	還不起債務時，是讓自己窮到底的，但是又不想窮生活，參與社區工作是我當時最好的選擇。獲得好的名聲及擁有各種學習，也是晉身的機會。 這是我較能面對債務人的生	1. 債務關係也創造了協會，制定一個嚴謹的財務管理機制。 2. 當生活改善時良心開始不安，具象的生活還是不敢太舒適，只敢在無形的物慾讓自己更舒適，開

	安	我良心不安。	活方式	始有小偷的感覺，開始面對債務時讓自己開始心安，也稍稍改善居臥室的空間，開始感受像人一樣的生活。
--	---	--------	-----	---

我過去寫「多重置身的我」，原本只是想釐清自己身上那層層疊疊的角色，女兒、母親、妻子、學生、主管、債務人、行動者。但在逐步梳理之後，我才發現，這樣的書寫並不只是自我療癒或認識，而是一個方法，讓我有能力看見他人也是如此多重。

當我回望雪霞、阿玉、小明，甚至「同一事件」裡的每一位夥伴時，我們一邊工作，一邊也在經歷家庭、健康、經濟與情感的波動。在每一次的對話裡，看似討論工作，其實也在處理生命。我曾經只看到工作現場的「語言」與「成果」，卻忽略了那語言背後的情緒、恐懼、渴望與不安。所謂「觀看他人」，不是解釋他們的行為，而是理解他們在多重身分之間如何努力維持平衡的那個狀態。這樣的看見，也讓我重新定義「理解」這個詞。理解不是去歸納別人為什麼這樣，而是願意在自己的經驗裡找到共鳴。

當我以母親、主管、學生的多重身分去看雪霞、阿玉、小明，我看見她們在角色之間的拉扯與不安，其實和我是一樣的。我不是站在外面觀察她們，而是透過我自己的多重角色，與她們共同構成了現場的關係。這讓我意識到，社區工作的核心其實不是角色分工，而是角色流動。我們在行動中不斷切換身分：從教育者變成學習者、從照顧者變成被照顧者、從主管變成需要支持的人。這樣的流動雖然讓人疲憊，卻也讓我們更接近人性。

所以，當我再回頭看「多重置身的我」，我不再只是理解自己，而是學習如何透過「我」的經驗，打開對他人的理解。因為每一個人都在不同角色間求生，也都在那樣的流動裡尋找平衡。而真正的理解，不是替他們說話，而是在多重身分的交錯中，學會共感與同行。

這樣的學習，讓「多重置身」不只是自我觀看的鏡子，而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提醒我，每個人都不只是一個角色，每段對話都不是表面的語言，而是一場情緒、責任與渴望交織的行動。理解他人，其實就是學會看見人背後的那份多重性，

也因此，我在他們身上，看見了我自己。

二、我的 24 小時：在生活的節奏裡學習理解他人

好險跨領域學習老師們²⁰提早 15 分下課，讓我可以慢慢走過去「東華育成中心」開會，路上還可以回個幾通電話。中午在「東華育成中心」跟「育田基金會」邊用餐邊討論：如何跟 20 個社區據點開設「敘說藝術-生命拼貼」懷舊治療貼布畫課程進行方式，也把材料及課程時間敲定。

還有一點時間可以不慌不忙回到協會進行內部工作人員集訓課程，因為臨時插進來「地方文化館輔導業務」必須在 17：00 之前去花蓮市美崙工業區，跟蜂之鄉蜂蜜蛋糕談生態教育館的業務，所以必須在 16：30 以前下課，所以將下午的內部訓練提早 13：30 一上班就上課。

從教育學院下課去育成中心路上，我就 LINE 在牛犁群組希望大家 13：30 一上班就上課，因為 5：00 跟蜂之鄉有約我跟夥伴要趕到美崙。結果凡萱馬上在牛犁 27 人群組標註我說：「請下次約人還是要看一下『牛犁記事本』²¹來跟人家答覆，不要造成別人的麻煩，感謝。」當下看到有點不舒服，但是我還是在牛犁群組回覆：「抱歉造成困擾，不同組別有些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必須完成，又無法自己掌控時間，必須跟外人協商，而我們也在盡力可以準時下班，又可以處理好自己組的業務了。也希望大家多體諒。也謝謝凡萱提醒。」

之前會因為凡萱這樣不留情面的話，特別不舒服跟委屈緊跟著會惱羞成怒，這種次數多了也提醒自己要多注意一些免得一直被洗臉。也漸漸發現凡萱是一個橋樑角色，夥伴們會因為凡萱先發飆後就息事寧人，而我也有機會解釋並讓大家看到我的好意及思考的邏輯。以下是 2017 年 2 月 14 日~2 月 15 日的行程。

表 八 研究者一天行程

時間		工作內容	地點
第一	19：00~21：00	買工具書/假日擔任美和社工的兼任講師備課所需， 買書當中同學來電催我繳交隔天跨領域專題報告。	花蓮市 拜託鈞弼開車

²⁰ 週三是跨領域專題研究的課程(105-2)，有 4 位老師侍候著 4 位研究生一起上課因此稱老師們，真的很幸福的時段，雖然當時壓力很大。

²¹ 牛犁夥伴各種業務必須動用人力的登記，以防夥伴工作重疊分不開身。

天			帶我去
	21：00~	將明天要繳交跨領域作業收尾送出	家中兼辦公室
	22：00~24：00	1. 準備與育田基金會合作的資料 基金會希望採用「敘說藝術-生命拼貼」懷舊治療貼布畫課程的整套教案及材料，輔導花蓮 20 高齡據點，有 3 年的合作意願。 2. 準備隔天高齡的內部訓練簡報	家中兼辦公室
第二天	9：10~11：45	跨領域專題研究的課程（老師提早 15 分鐘下課）	東華教育學院
	12：00~13：00	與育田基金會討論合作方案(討論順暢)	東華育成中心
	13：30~16：30	內部訓練/高齡業務，原本訂 14：00 上課，原本以為我早上有 2 個行程會來不及，所以定 2 點上課，現在已經來得及就馬上更正時間 13：30 上課。這樣下午另一個行程也可以趕得上。	豐山村中興街
	17：30~18：30	1.地方文化館輔導/生態教育館方向 2.回家路上幫忙孩子買東西	美崙峰之香總部
	21：00~	跟地方文化館委員討論地方館的退場機制如何評分	在家中兼辦公室
	23：00~	教富民怎麼做經費分攤表	在家中兼辦公室

有時候，我會回頭看自己那份〈我的 24 小時〉。那是一段看似平凡的兩天，但仔細回想，卻幾乎是我這些年生命節奏的縮影。那 24 小時裡，我在不同場域之間不斷切換：學生、工作者、母親、協會負責人、講師、同事、被質疑的人。每一個角色都是真實的我，也互相牽制著。

早上，我在學校上課、準備報告；

中午，我在育成中心與基金會代表邊吃飯邊談合作案；

下午，我趕回協會帶內部訓練，又要提前下課去工業區開會；

晚上，還要在家整理簡報、回覆夥伴訊息，教人填經費表。

過程中我一邊 LINE 群組、一邊道歉、一邊解釋，也在被誤會與被提醒之間調

整呼吸。這份 24 小時的行程表讓我看到：「多重置身」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們每天都在經歷的事。我之所以容易焦慮與疲倦，不只是因為任務太多，而是因為每一個場域都要求我成為不同的人。

在學生的身分裡，我要表現出認真與學習；在主管的身分裡，我必須堅定與果斷；在母親的身分裡，我又得溫柔與包容。

這些角色之間的拉扯與情緒的轉換，讓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成功」與「理解」其實是一場協調與練習。我過去總是急著讓事情有效率、讓工作順利進行，因此忽略了夥伴的情緒與壓力。但當我開始看懂自己這樣的節奏，也就比較能理解他人。原來每個人都在各自的 24 小時裡奔波、切換、掙扎。當我以為他只是「同事」時，他可能正是焦慮的家長、受挫的孩子、擔心健康的照顧者。我們都在多重身分中行動，也都在那樣的混亂裡尋找平衡。

這樣的體悟讓我對社區工作的理解變得不同。我開始學會在看似平常的會議、討論或爭執裡，看見那份「多重置身」的真實。有人情緒激動，或許他剛從家庭的混亂中走出；有人沉默，可能他正背著經濟的焦慮；有人堅持，或許只是害怕再次被忽視。

所以，理解他人，必須先從看懂自己的 24 小時開始。當我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匆忙與混亂，就比較能溫柔地對待別人的不完美。我嘗試不再急著追求完美的協作，而是學習怎麼在彼此的節奏中留下空間，讓每個人都能喘口氣、被理解、被容許。或許這就是「多重置身」的真正意涵：它提醒我，所有的關係都建立在行動與情緒的交錯之中。而學習理解他人，並不是要消除矛盾，而是要練習在矛盾裡彼此靠近。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 24 小時裡，而「社區」的意義，就是那些 24 小時交疊時，我們仍願意對彼此說：「我懂，我也正在經歷。」

三、在多重置身之中練習理解

寫完〈多重置身的我〉與〈我的 24 小時〉後，我才更清楚：多重置身不只是把自己「有幾個角色」說清楚，而是把我放回制度與關係的結構裡，看見我在不同位置上，如何同時承受要求、也同時對他人施加要求。若只是把它當成敘述框架，它會變成一份身分清單；但把它當成分析的鏡頭，它就會逼我回頭看：我身上承載著哪些權力關係，又在什麼時候被那些關係推著走。

例如，我作為母親，常被期待無條件承擔、把孩子放在最前面；作為學生，我被學術制度評量、被期待有「可說清楚」的論述；作為主管，我握有資源分配與工作評斷的權力；作為債務人，我又處在必須求助、必須維持信用與人情的依賴位置。這些位置不是並排的，而是互相牽動：我在某個位置上越想控制，可能正是因為在另一個位置上太無力；我在某個位置上要求別人配合，可能是因為我背後被另一套制度時程追著跑。

因此，多重置身最有力的地方，是它鼓勵我做一種反身的提問：在「此刻這個位置」上，我能決定什麼、不能決定什麼？我需要誰、也在要求誰？我是在保護誰的安全、維持哪一種秩序、交換哪一種資源？這些問題把「理解」從情緒拉回現實：不是我願不願意同理，而是我願不願意承認自己也在權力網裡，甚至有時正在複製我討厭的那套規訓。

當我願意這樣看自己，矛盾就會浮出來，而且那正是多重置身的張力所在。比如：我渴望被理解，卻在焦慮時用監督去逼近成果；我想做一個「不讓孩子辛苦」的母親，卻又必須用過度勞動換取經濟安全；我希望夥伴能自主，卻又害怕一鬆手事情就失控。這些矛盾不是要被消除，而是要被看見：看見之後，我才有可能選擇把權力放軟一點、把說明放慢一點、把責任分出去一點。

所以，在多重置身之中練習理解，對我而言不是練習「更善良」，而是練習「更誠實」。誠實地辨認：我此刻說的話、做的決定，背後是哪一個位置在發聲？我是在用主管的便利去解決自己的焦慮，還是在為了共同的節奏做協商？我是在用母親的道德期待壓住自己，還是在和孩子討論一種更可持續的生活？當我把這些區分說清楚，理解就會從判斷走向協商，從單向的要求走向彼此可承受的安排。

也因此，我開始把多重置身當作一個「行動中的提醒」：每一次衝突或卡住，都先回到位置與權力的關係，先承認矛盾，才談怎麼走下一步。這讓社區行動不必靠宣告共好來撐，而是靠一點一滴的調整來生成：我們如何在制度的壓力下，仍替彼此留一點空間；如何在各自的多重置身裡，練習成為能理解、也能被理解的人。

第五節 敘事作為方法：從自我書寫到對話與協商

不論在什麼年代，也不論身處哪個地方，只要家庭生計陷入困境，女性幾乎都會成為最先被推上勞動前線的人。在我們阿嬤的年代，她們為了活下去，翻山越嶺

來到花蓮豐田，以雙手換取一家人的溫飽；數十年後，東南亞的新住民姊妹同樣背負著家庭的重擔，飛行千里來到台灣，以婚姻為媒介進入新的生活。

這些跨世代的女性移動，看似不同，其實都織在相似的勞動邏輯與情感結構裡，在語言不通、文化不熟、照顧責任沉重的情況下，她們的身體成為支撐家庭與社會的基礎。

然而，這樣的經驗卻長期被主流社會的語言遮蔽。阿嬤與新住民姊妹之間的張力與誤解，不僅是文化差異，更是階級與性別秩序交錯的結果。當社會結構不斷強化「誰是外來的、誰才是本地的」界線，那些女性在生活裡承受的情緒、羞辱與孤立，往往難以被說出口。我們無法辨識那些情緒的糾結究竟來自哪裡，也因此失去了理解與改變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境中，我開始嘗試以「敘事」作為工作方法，讓女性能以自己的語言，重新拼貼生命經驗。

透過「敘說藝術—生命拼貼」的工作坊，我們邀請不同族群、年齡與經驗的女性，在共學的場域裡敘說、傾聽、對話，讓個人的故事成為集體反思的起點。這不只是記錄經驗，更是一種「介入」，在敘事的交換中，我們逐漸從自我書寫走向對話，從對話走向協商，從協商走向理解。

敘事讓我重新認識「理解」的意義。它不只是同理心的展現，而是一種社會實踐：在他人的故事中重新辨識自己的位置，在差異中尋找同行的可能。這樣的工作坊，開啟了一個時間與空間，讓被忽略的聲音有機會被聽見，也讓說話的人學會傾聽。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與集體、特殊與普遍重新被連結，差異不再是分隔的理由，而是共生的起點。

我相信，唯有讓差異得以並存，平等才有可能被實現。而敘事工作，正是這樣的倫理實踐：它不是替他人說話，而是創造一個能讓他人說出自己、也讓我們彼此在故事裡相遇、協商與理解的空間。

一、敘事的社會位置：在圖像與故事之間聽見彼此

我之所以會開始設計「敘說藝術—生命拼貼」的工作坊，其實來自於自己在不同工作場域裡所感受到的語言落差與沉默之間的張力。2004年，我白天在高齡照顧據點服務阿嬤們，晚上承辦外配生活適應班。白天的阿嬤會對我說：「你愛共外籍个教好，既然嫁過來就是咱的人，袂用得寄錢予您兜。」晚上，新住民姊妹卻對

我說：「他們不要以為我聽不懂，我看表情也知道他們在說我不好。」她們請我幫忙轉達：「我寄錢回家是自己賺的，又沒花他們的錢！」

那時我突然發現，自己像一條橋，橫在兩代、兩個世界之間。阿嬤們的年紀和我母親相仿，新住民姊妹又幾乎都能當我女兒。她們之間語言不通，卻共享著極為相似的生命軌跡：為了家庭生計而早早投入勞動、無法決定婚姻、承受長期的思念與責任。只是，當她們在台灣相遇、成為一家人，卻因誤解與差異而彼此防衛。

我常問自己：為什麼明明生命這麼相似，卻不能好好地一起老？這個問題成為我啟動「敘說藝術—生命拼貼」的起心動念。我想創造一個場域，讓不同族群與世代的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說話、用圖像來敘事。於是我開始收集廢棄布料、二手衣服，重新裁剪、拼貼成生命圖像，讓參與者在圖像上說出自己的故事。圖像，成為一種非語言的翻譯，當語言隔閡讓人退縮時，圖像讓記憶浮現，也讓情感有了出口。

在課程中，我看見了動人的對話。有一次，雪霞談到自己嫁來台灣已 17 年未能回印尼探望家人，提到妹妹過世與親人生病仍無法回鄉時，邊說邊落淚。當天在場的金蘭阿嬤，聽著聽著忽然站起來抱著她哭說：「唉呦，伊嘛是人哩，咱逐家攏嘛全款。」那一刻，我感覺「敘事」不只是說話，而是一種跨越結構的情感通道。語言、布料、眼淚與擁抱，在那瞬間形成了一種新的理解。

後來，這樣的圖像敘事慢慢發展出新的形式。我們將阿公阿嬤及移民姊妹的貼布畫作轉化為桌遊「三媽牌卡」，內容聚焦於高齡與族群議題，讓人透過遊戲再次講述生命。豐田是一個多族群移民的村落，而「移動」與「勞動」正是這些女性共同的命運。使用廢棄布料拼貼的圖像，既象徵著貧困與再生，也反映出她們的生活智慧。這樣的創作方法，不只是藝術行動，更是一種社會敘事的實踐。

我後來才理解，這樣的「生命拼貼」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它把被切割的生命重新縫合，不論是被語言切割、被階級切割、被歷史切割，都能在敘事與圖像中重新被看見、被理解。這樣的過程，不只是女性在表述自己，更是社會在聆聽那些長期被忽略的聲音。

因此，「敘事」在社區行動中的社會位置，不只是溝通的工具，而是一種倫理，一種讓彼此能被理解、被看見的生活實踐。我相信，當人願意以故事相遇，差異就不再是距離，而是開始對話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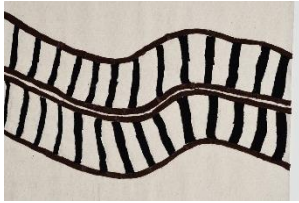
			
每次仰望滿天的星空，點點繁星都代表我的思念，為什麼同在一片天空，我們卻相隔如此遙遠	我遠在家鄉親愛的爸媽	思念，就像川流不息的列車交會、再交會。	你們怎能知道？思念就像路旁不起眼的小石子，雖然小小的，蛋鴨在心底面，就是沉甸甸的。

圖 七 雪霞的 4 格敘事圖像

	阿嬤說著剛嫁來豐田時如何跟先生去山上搬石頭的經驗，先生跟我說山上揸石頭很好賺，那天傍晚我把孩子餵飽了，一點都不好賺，我走到腳底起泡、還跑給警察追，結果石頭也不見了.....，但是後來這些石頭是真的不錯，先生過世後，是石頭讓我養大小孩
	阿公看到草寮的牌卡時，想到 11 歲時父親往生留下懷孕的母親及幾個弟妹，而當母親要生產時也因為不順利而往生腹中的弟弟也沒存活下來，身為老大的阿公及幾個弟妹被分配在不同親戚家當童工，而阿公就是去幫忙顧橘子園換來有得吃跟住，一大片橘子園只有阿公在顧，白天還好，晚上就是住在草寮中.....看到長得很像橘子園草寮的牌卡，讓他想起母親跟弟弟往生時，是如何一邊躲空襲一邊抬屍體去埋葬的情形，也想起如何跑去追產婆回來救媽媽的情形。80 多歲的阿公說：不要再說了，再說就要哭了，停頓了好一會兒空氣凝固下來.....。
	玉圓阿嬤說這一雙手從來沒有休息過的勞動經驗，並伸出自己的一雙手，那 10 隻彎曲的手指頭都歷歷證明著無停止的工作，一雙手在童年時無止盡的工作，農作、家事、各種勞動...從沒停止的彎曲工作，因此就再也直不了，這樣的勞動還是無法維持生計，甚至需要去偷地瓜來渡一餐，阿嬤想說的是「細漢偷挽瓠，大漢偷牽牛」對她是很過份的批評，在她小的時候這樣說她。

圖 八 阿公阿嬤的敘事圖像

敘事的社會位置：從藝術表達到關係倫理：回望這段以「敘說藝術——生命拼貼」為方法的歷程，我漸漸理解，「敘事」並不只是故事的呈現，而是一種介入社會關係的方式。當阿嬤與新住民姊妹共坐一桌，透過布料、圖像與故事拼貼各自的生命時，她們其實也在重新拼貼社會的結構與情感的邊界。這些圖像讓她們不必先找到語言，就能進入記憶與感受；讓過去被壓抑、被誤解的經驗，有了被說出的可能。

這樣的工作方法回應了女性主義知識論的核心命題：知識不只是理性思考的產物，而是源於身體、情感與關係的經驗。透過圖像與敘事的交織，女性的生命不再是研究對象，而成為知識的生產者；她們在說話的同時，也在重新定義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這種以關係為基礎的知識生成，正是「手工知識」的精神——它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在生活勞動、身體記憶與集體互動中，一針一線縫補出來的理解。

在這個過程裡，「敘事」不再只是回顧，而是行動。它讓人們在講述與傾聽之間，練習理解，也學習如何在差異中協商。這樣的理解，不追求同一，而是承認彼此的複雜與多重；不消除張力，而是在張力中尋找新的共存方式。

因此，敘事的社會位置，其實就是關係的倫理位置。它提醒我們：知識必須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回到生活的縫隙裡，去傾聽那些微小卻真實的聲音。在這樣的傾聽裡，社區行動不再只是政策執行，而是一場持續的共同學習，在講述中被看見，在傾聽中被理解。

二、 生命拼貼作為方法：在手工與敘事之間生成理解

在長期的社區行動中，我越來越確信：理解不是說理，而是經驗之間的相遇。「生命拼貼」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方法，正因為它讓「敘事」從語言的框架中被解放，透過手的觸感、布料的纖維、色彩與形狀的組合，讓那些難以說出口的生命故事得以重新被看見。

對我而言，「拼貼」不只是藝術創作的形式，而是一種知識生產的隱喻。它像在縫合那些被撕裂的生命、家庭與工作、地方與他鄉、過去與現在。每一塊布料都帶著前一段生活的痕跡：有人穿過、洗過、破損過；當它被剪下、再度拼合時，也重新獲得了意義。這個「再生」的過程，就像社區工作者在行動中不斷修補關係與自我，讓看似不相容的片段，有機會重新共存。

（一）從三媽的移動與勞動出發

在這樣的脈絡下，「三媽故事」逐漸成為拼貼行動的主軸。「三媽」的概念來自於移動與勞動的連結：「三」象徵族群、時間與空間；「媽」代表照顧的能力與情感，並不限於性別。「三媽」因此指涉——不論在何時、何地、何族群，只要生活陷入困境，人們就會啟動身體的移動與勞動，用雙手換取照顧家人、守護家屋的力量。

以「三媽故事」為主軸，我帶領高齡者重新找尋自我。透過不斷的敘說與拼貼，她們在回憶中肯定生命；而在傾聽他人故事的過程中，也慢慢學會看見差異、尊重彼此，理解他人背後的掙扎與努力。這樣的學習，不是課程設計的結果，而是一種關係生成的過程，從「我說」到「我們聽」，從「自己」到「共在」。十二個單元的敘事場域如下：

1. 重新擁抱生命：方案介紹與破冰，讓參與者透過遊戲重新感覺自己的身體與記憶。
2. 遷徙的足跡（腳印）：回顧自己曾經走過的地方、勞動與移動的經驗。
3. 關於我的家：拼貼記憶中最深刻的家庭場景與地方印象。
4. 汗水的結晶（手掌）：透過手的形狀表現做過的工作與勞動痕跡。
5. 得意的事：講述讓自己驕傲的一件事，強化自我肯定與價值。
6. 家人的家人（族群）：探索自身家族中多重族群的組成與文化連結。
7. 習俗大不同：分享不同族群的祭儀與生活習慣，認識文化差異。
8. 思念也是一種病 I、II：以拼貼與敘事面對離散、懷念與無法回去的親情。
9. 同 8。
10. 期待 I、II：描繪對未來的想像與共好的可能。
11. 同 11。
12. 饗宴：以共餐與展覽作結，重新調度關係，促進彼此理解。

每一個單元都連結了身體的動作、情緒的記憶與群體的互動。參與者在拼貼的過程中，不只是「做作品」，而是在剪貼之間回望自己、在顏色的搭配中與他人產生對話。有時一句話、一張布料、一個共鳴的眼神，就能讓過去的傷口鬆開，讓「理解」變成身體能感受的經驗。

這樣的「生命拼貼」不只是課程設計，而是一種具身的敘事方法。它讓敘事從

語言走回手的動作、走回人的關係。這樣的手工實踐，呼應了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在地知識」與「手工知識」，知識不是高懸的理論，而是被生活磨出來的感知；不是為了分類差異，而是為了在差異中共處。

因此，拼貼成為我理解社區行動的關鍵隱喻：它象徵著在分裂與不完整中尋找連結，象徵著每一段生命都有重新被縫合的可能。在這樣的行動裡，學習不是獲得新知，而是被他人觸動、被自己改變。「生命拼貼」最終讓我們看見：敘事不是結束於說話，而是開始於關係。而社區行動的真正力量，也正是在這些一針一線、一言一淚之間，慢慢縫出彼此理解的可能。

（二）生命拼貼作為教育與集體學習

我理解，拼貼的行動其實是一場集體教育。它不僅是創作活動，更是一種讓人「重新學會如何相遇」的社會學習過程。每一次的拼貼，都牽動著回憶、再現與關係的重構。當參與者在回溯記憶、選擇布料、重新排列的過程中，她們同時在反思生命價值、重整家庭關係、並重新定位自己在社群中的位置。

這樣的歷程，呼應了「追憶明日記憶」的策略，透過回望過去、重組經驗，預備下一次與他人共生的可能。因此，「生命拼貼」不只是為了完成一個作品或課程，而是一場「共同生成知識」的歷程。知識在這裡不再是理論的成果，而是來自參與、傾聽與共作的生成。它使學習成為可感知、可被手觸摸的經驗，也讓社區成為一個學習如何彼此理解的場域。

故事的層次與在地知識的轉化：在長者與新住民的創作與敘說過程中，我逐漸看見「故事」的層次。有些是沈默的故事，那是尚未被說出的經驗，仍藏在身體裡等待被看見；有些是會說話的故事，在傾聽與共感的氛圍中，慢慢找回表達的力量；有些是在地知識的故事，當個人經驗被群體回應後，轉化為共同的生活智慧；最後，有些是傳頌的故事，當這份智慧被代間傳遞，成為集體記憶的養分。

這樣的故事層次，也正是「生命拼貼」作為方法的深層結構。它讓個人敘事逐步走向公共意義，讓每一段生命經驗都能在社群中找到被理解與被尊重的位置。而這，也正是社區行動中最細膩的部分：在講述與傾聽之間，人與人重新被連結；在布與線的縫合裡，社會關係被慢慢修補。

（三）拼貼的倫理：在手與關係之間生成理解

回望「三媽故事」的發展歷程，我越來越確信，拼貼並不只是藝術形式，而是一種方法的隱喻。它讓我們重新學習如何面對彼此的碎裂與不完整，如何在勞動與移動的歷史中，找到可以互相理解的縫隙。拼貼的過程，就是敘事的具體化。語言有時會排除、歸類、冷卻情感，而手工讓記憶變得可被觸碰。在手的節奏裡，個人經驗逐漸被他人理解；在佈料重疊的層次中，不同世代與族群的女性得以同桌共在。

拼貼的倫理在於，它不尋求統一，而是讓差異並置；不強調完美，而是接納不完整。因此，「生命拼貼」不僅是敘事的延伸，更是一種手工知識的生成場域。它讓知識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被身體記憶、被情感觸發的理解。在這裡，學習不是被教導，而是被觸動；不是為了效率，而是為了理解。

我漸漸發現，這樣的拼貼方法提醒我，社區行動的核心，不在於完成計畫，而在於陪伴人重新看見自己與他人。我們縫補的不只是作品，更是一段段斷裂的關係；修復的不只是過去，而是重新想像「我們如何一起生活」的可能。拼貼的力量，在於讓理解變得可以被手感知、被心記住。那是一種緩慢的學習，一種在手工中練習倫理、在關係中重建信任的學習。當我們願意以這樣的速度與姿態同行時，「生命拼貼」便不再只是方法，而是一種態度，一種在人與人之間，持續縫補、重新理解、並且願意再愛一次的行動方式。作品分享如下：

單元一：破冰、桌遊三媽牌卡

透過三媽牌卡桌遊，帶領學員尋找屬於屬於自己過往經驗相連的牌卡，並能夠用選出的牌卡拼貼出自我生命故事。



單元二、遷徙的足跡（腳印）

透過回顧從小到大的遷徙歷程，喚起記憶，並分享移動的軌跡。



單元三、關於我的家

從個人移動軌跡中延伸對家的記憶，重新思考家的定義並與其他學員分享。透過生命故事拼貼的方式，拼貼出家的人、事、物，並呈現對於家的深刻回憶。



單元四、汗水的結晶（手掌）

透過手的觀看與製作過程，一一敘說曾經勞動的經驗、喚起記憶，將過往的汗水成為美麗結晶，重新用不同視野觀看辛苦的回憶。受傷、種稻、水泥工、種甘蔗、種西瓜...



單元五、得意的事

敘說人生當中得意事蹟，並完成相關拼貼畫布創作。



單元六、家人的家人（族群）

接續第一周課程，在粗略梳理自我生命的脈絡之後，本周藉由爬梳自我家族根源與族群，進而了解所謂族群（家族）的多元性。客家+閩南+外省、噶瑪蘭+客家+閩南、客家+閩南+印尼、外省+客家+閩南



單元七、習俗大不同

透過不同族群的生活，產生多少文化與習俗的趣味與張力。



單元八、單元九：思念也是一種病 I、II

帶進入深層的情意調動，希望學員說起對過去生活中最思念的人、事、物，並釐清思念的原因，及對自身最重要的片段與回憶。思念飲食、思念兒時玩伴、父親、母親、老公....



單元十、單元十一：期待 I、II (團體創作)

帶領學員分享並回憶之前的作品，並透過先前所敘說的生命故事，發展出學員對於未來的展望並藉此重新肯定自我。



單元十二、饗宴

分享與被分享者同理每個生命的不同，更讓地方人以認同的心態，重新 看待人、事、物，共享彼此緊密的社群網絡、在追憶共同記憶的過程 中找到存在的價值。





圖 九 敘說藝術-生命拼貼——懷舊模組

三、從自我書寫到對話的學習：靠近的艱辛

這一路的書寫，並不是一段「我學會了」的歷程，而是一場「我還在學」的過程。從雪霞、阿玉與小明、同一事件，到「多重置身的我」、〈我的 24 小時〉、再到「敘說藝術」，其實都是我在嘗試靠近的練習。靠近他人，並不只是情感上的同理，而是對自己慣習的鬆動，學習放下那個總想解決問題、總想撐起全場的自己。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明白靠近並不浪漫。靠近是磨的，是會痛的。那種痛，來自現實生活的壓力、計畫的框架、與自我期許的矛盾。我常在行動與反思之間拉扯，一方面希望被理解，一方面又急著維持秩序。

我告訴自己要開放心胸，卻仍在面對衝突時不由自主地想「管理」他人。我以為理解是一次領悟，其實它是一場場反覆的失敗。雪霞的退縮，阿玉的脾氣，小明的困惑，還有那場讓我疲憊不堪的同一事件，都讓我看見自己在關係裡的侷限。我總想用理性分析事情，卻忘了人不是計畫表的一部分；我總想讓行動更有效率，卻忽略了「慢」本身也是一種倫理。這些年我在現場裡學到的不是方法，而是「節奏」，如何在情緒升起時不急著評斷，在衝突發生時仍能留住對方的聲音。

有時我會覺得，自己的「求生盤算」仍深深地影響著我。貧窮、責任、現實的重擔，早已刻進我的性格。我太習慣去算「怎樣做比較值得」、「怎樣做不會浪費」。這樣的盤算讓我在社區行動中靈活、有效率，卻也讓我不容易放下控制。我仍然在學習，如何在理性與情感之間找到那個不至於耗盡的中線，一條能讓我既能繼續做事，也能繼續做人、繼續愛人的線。

「多重置身」與「我的 24 小時」讓我看見自己；而「生命拼貼」與「敘事」則讓我重新看見他人。這兩條路交錯地進行，沒有哪一邊比較成功。我仍然會被誤會、會焦慮、會懷疑這樣的努力到底有沒有用。但當我在課堂上，看見阿嬤抱著雪霞說「伊嘛是人啦」，我知道，理解不是口號，而是一次次真實的碰撞。如今我明

白，所謂「靠近」，並不是走向一個答案，而是願意留下來。留下來，和人一起面對不確定、誤解與情緒。靠近不是「懂得更多」，而是「更能忍受模糊」；不是變得完美，而是願意讓別人的複雜與自己的脆弱並存。

這一章的每一段書寫，都是我在學習如何與人同在。靠近，從來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是一種長期的修練。它讓我學會不再追求「做對」，而是努力「不斷嘗試」。社區行動對我而言，不再是要解決什麼，而是如何在矛盾裡仍能相遇、在失敗中這情份仍然能在。或許，這就是我此刻能說的唯一確定：理解，不是一種結果，而是一種生活方式。而我，也仍在學習，如何不只活著，更能與人一起活。

第六節 小結

本章想做的，不是再為社區工作補上一套「成功指標」，而是把我長年習慣追逐的成功，重新放回關係裡檢驗：當我以為自己把事情做完、把任務達標，真的就代表現場更好了嗎？還是我其實只是更熟練地運用制度語言、效率與權力，把人推進一種可被管理、可被交代的秩序？因此，本章以雪霞、阿玉與小明的生命路徑，作為我重新學習的鏡子——讓「成功」不再只是個人能力的展演，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提問：人在差異、匱乏與壓力之中，關係是否仍能被撐住、對話是否仍能發生。

一、從個案看見：成功不是成果，是關係能否繼續

雪霞從孤立的學習者走向能帶人、能提問、能批判制度框架的夥伴；阿玉在照顧與失去之中反覆進出工作現場，她的暴躁與眼淚不是退步，而是生命被逼到極限時仍努力要活、要被理解的訊號；小明在家庭與工作責任之間不停補洞，他看似「丟三落四」的節奏，其實是一種被拉扯的照顧倫理。這些故事共同提醒我：社區行動若太快把人寫成「問題—解方」，就會看不見人是如何在縫隙裡維持尊嚴、在不被看好的處境裡慢慢長出能動性；而真正的「成長」，往往不是變得更有效率，而是更能承受複雜、更能把他者放回主體位置。

二、從重看事件學分寸：留一點餘地，才有可持續

同一事件在不同時間被我重看，把提問推得更深：我曾以分工、凝視、時間壓

力換來「一小時完成」，也曾為此沾沾自喜；但當我開始意識到那份成功可能伴隨「壓迫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馴服了身體與關係，我才懂得——成功若只被定義為成果，就會把人變成工具。於是，「留一點餘地」不再是放任或鬆散，而是一種倫理選擇：在制度要求與人之常情之間，學會調節、協商、求救、容錯，讓我們還能一起工作、一起活著。

三、從多重置身回到權力：理解不是善良，是誠實

在本章後段，我更清楚意識到：多重置身不是角色清單，而是把我放回制度與關係的權力網——我既承受要求，也施加要求。透過反身提問與矛盾辨識，我開始辨認：我此刻的焦慮，是不是來自被制度時程追趕？我要求別人配合時，是不是正在用主管的權力處理自己的不安？我渴望被理解，卻在焦慮時用監督逼近成果；我希望夥伴自主，卻又害怕一鬆手事情就失控。這些矛盾不是要被消除，而是要被看見；看見之後，我才可能把控制放軟一點、把說明放慢一點、把責任分出去一點，讓理解從判斷走向協商，從單向要求走向彼此可承受的安排。

四、敘事作為方法：靠近他人，讓知識在互動中生成

因此，本章最後把敘事拉回方法：自我書寫不是抒情收尾，而是把那些難以被制度語言安放的感受、矛盾與卡住，變成可以被討論的材料；「生命拼貼」與對話協商的設計，讓理解不再靠誰更會說，而是讓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節奏把經驗放上桌面。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與實踐，其實構成了一條「靠近」的知識軸：從雪霞、阿玉與小明，到同一事件的重看，再到多重置身與生命拼貼，每一次書寫與對話，都是在修練如何在現實的張力中仍保持理解。這樣的理解並不來自理論的推演，而是從身體與關係的勞動中生成。



第五章 行動與韌性的倫理：在破裂中織回關係的力量

成功是把我們推離彼此？還是能讓我們重新靠近？

而知識能「解決」的是問題，卻無法解決人與人的關係。

在不同部會與政策體系的推動下，「社區營造」逐漸成為整合文化、福利與地方發展的重要語言，帶動了許多地方行動與公共討論。然而，隨著制度化的進程，它也被框入各自的行政邏輯：指標、期程、成果表與核銷機制。這些結構保障了資源與可見度，但也讓行動逐漸被語言化為「可管理的事件」，更是陷入部會資源的框架中。同樣地，「社區工作」作為社會福利體系的一環，強調專業倫理與服務權益，卻也可能在實務上形成某種慣性：上位者設計，下位者配合；專業主導，居民回應。

然而，我在社區中看到的，從來不是這樣。真正撐起地方的，往往不是計畫，而是那些沒有被寫進計畫的事，鄰里間的照顧、臨時的幫忙、為了誰而多留一會兒的體貼。這些行動沒有預算科目，也沒有量化指標，卻構成社區最核心的能量。它們不是「被管理的服務」，而是關係倫理的自然展現。

因此，我更願意用「社區行動」來命名這樣的實踐。「行動」在這裡，不是任務的執行，而是人與人之間基於關係、責任與情感所發生的實際作為。它是一種由人出發的「行動」，不被外部框架規訓，而是從生活脈絡中自然生成的回應。「社區行動」的重點，不在於「達成什麼目標」，而在於「如何相互成就」。

它讓行動回到最初的倫理基礎：不是為了效率與發展，而是為了連結、共生與修復。在這樣的理解下，社區不再是被建構的空間，而是一個持續被實踐的關係網絡；而「行動」也不再只是手段，而是人與地方彼此維生的方式。

它讓「活著」本身，成為一種公共實踐；讓地方的力量，不是來自完整的制度，而是來自不放棄修補的關係網。社區行動與韌性倫理交織而成的，是一種溫柔的堅強：它不以抗衡為姿態，而以相互支撐為方法；不追求永不破裂，而是在破裂中不斷織回。這正是我們在花蓮、在地方、在此時此地，仍願意相信的那種行動。

第一節 第一代社區工作的行動模式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社區實踐中，我們習慣以「個人的能耐」來定義成功，並以「個人的不足」來承擔失敗；然而，當我重新檢視協會第一代的工作紀錄時，卻清楚看見另一條更深層的線索：無論是豐田三村的環境維護、老人送餐、客家普查、社區林業、文史館經營、到參訪接待與活動推動，這些看似「日常且成功的運作」，其實都是眾多夥伴在高壓、多線、無縫接軌的體制中彼此托舉才得以完成的成果；相反地，所謂的「失敗」、延誤、衝突或疲乏，也從未真正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往往源自制度性負荷、計畫型工作邏輯與情感勞動的反覆消耗。

在這些交錯的經驗裡，我可以理解：社區工作的成功若只被放在「我能解決什麼」的框架下，它就會成為壓迫的槓桿，越能者越多做，越多做越孤單，最終成功反而成為束縛，讓制度得以持續運轉而無須面對結構性問題。同理，失敗若被歸咎於個人，它便會讓承受挫折的人退縮、羞愧，或在疲累中相互埋怨，落入「弱弱相殘」的循環。

在 1956 到 1970 出生的這一群女性因為家庭因素皆必須留在豐田，我們面對工作沒著落、孩子功課落後一大截、先生為家計情緒鬱悶、公婆或父母又年高體弱……種種的因素，我們在面對自己生活困境時，又要參與這些社區活動，雖然每人心中各自有對價的衡量，但是長期下來也會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來，而無法持續支持這樣的社區參與，2002 年立案成為協會，夥伴開始擁有薪資的工作，不再是志工性質。當時鈞弼跟我說：只要我總幹事一天不領薪水，大家就不會來談加薪或加班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不會計較誰多做少做的問題。我希望工作是依能力做分配，希望大家不是以金錢多寡來看待工作，而是以一家人的概念看待這個團體的夥伴，家人是不會計較誰多做與少做的。所以我跟鈞弼都沒領協會專職薪資，在工作中的方向決定時也多了許多自由度。

一、我們親身走過的「作用力衝突」

協會在 2006 年~2009 年每週固定開會均留下紀錄，目的是為了彼此了解各自進行的工作，也是為了讓每一個人能夠表達的機會。附錄三：2006~2009 年每週會議紀錄摘要。

從以下工作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工作方式：

- 每一個人的工作室多線同時開展（老人送餐、環境維護、普查、導覽、訪視...）
- 工作量巨幅超載（例如普查一天 8 票、每週 80 票的要求/依據計畫的預算編列）
- 業務橫向串接，彼此互相依賴
- 計畫書由少數人負責，執行卻壓在所有人身上
- 情緒累積難以排出，終於在 2007 年普查時集體爆炸

在這種結構下，「我靠知識找到一個方法」≠問題就能解決。問題不是技術，是「人跟人的關係」卡住，表面上，看起來問題好像是「票太多、工作太重」(客家文化普查，調查一一戶算一票)。但真正卡住的是：為什麼大家累到不行都沒講？為什麼要忍到家裡也吵架、老公發飆才爆出來？為什麼彼此明明都有感覺，卻都不敢說？這代表問題不是「工作技術」沒做好，而是彼此之間：不敢麻煩別人、不好意思講困難、語言難予言說、怕造成衝突、怕破壞現場的氣氛、生活壓力。

這些都是「關係問題」：信任不足、情緒累積、壓力沒出口。而這些背後又有「制度壓力」在推：大家都覺得「案子不能掉」「工作要做完」。所以，看起來像是票太多，但本質是大家的關係承受不了那種沉默與壓力。

二、用「個人的能力」來看成功，其實會把人越推越累

現在回頭看這工作的時間安排，是一種無縫接軌的方式將人當作滾軸方式的馬不停蹄的在軌道上轉換，安排每一個人都可以銜接到不同人的業務中，看似每一個人都能負責也能討論工作，但卻在一個龐大機器下運作，有一種逃不出去又無法理解發生什麼事而形成困頓。就如面對客家文化普查工作，夥伴們終於爆炸 2007 年 6 月 5 日午餐會報時，當下每一個人口氣是很差的，顯然醞釀很久忍不住了：

阿梅²²：我想提一下，因為剛開始，……大家也知道這個是過渡時間所以就嘗試的做……真的是很累……因為普查就已經要結束了，當然我們就要多接一點做餐服務，這個可能以後會變成我們的後續發展，不一定要仰賴政府，這也是我們可以瞭解的。可是因為這樣，工作

²² 化名，牛犁第一代工作人員。

量還是一樣，所以就會覺得無法接受，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而是我們幾個都發現說，負擔太重。……是不是說可以將工作量減少，這並不是一個心情的問題，而是要花多少時間去完成這個事情，……把調查票的量減少一點，不然我們的身心真的很累。

葉子²³：最直接就是要減票啊！就是要減票才對我們有實質上的幫助，因為我們有嘗試過，一天要寫 8 票真的很難。講真的，我們有嘗試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是帶團兩天，是不是這個禮拜就可以減票，那下禮拜如果七天都沒有帶團，那還是如原訂的八十票，這樣是不是比較合理一點？我們還是盡量去完成這個事，我們要說的是這樣。

鈞弼：所以你們可以提出解決方案，比如說阿丹姐剛剛講那個方式也不錯，假設今天有接團的工作，好，那當週就減少票數。

嫻子²⁴：對阿，現在最主要一個問題，像我老公那天也在發飆了，講實在話，像我們這樣子，那時候我們做的時候，幾乎每天都到十一、十二點，要趕票出來幾乎每天都做到那麼晚……那一天老公有在發飆了。

雅帆：我聽得出來，願意一個禮拜八十票，但是多活動就要減票就對了，他們不要算加班，比較願意算減票。

葉子：對啦。

小默：阿丹姐的意思就是如果今天出來一天，那就直接扣掉一天的票。葉子他要簡單一點的算法。

雅帆：好啦，可以啦，就先用這種方式。小默，你就注意，以後排班的時候票要重新算。就剩六月份而已，既然你們已經提出來了，短時間之內就用這種方式來解決。

當一個組織習慣用「誰比較能幹、誰做得多」來看成功，會出現一種隱藏的規則：做得越多的人，越會被要求做更多。久而久之，制度就默認：

²³ 化名，牛犁第一代工作人員。

²⁴ 化名，牛犁第一代工作人員。

- 你可以嘛，那就給你多一點
- 你也可以啊，那就請你再撐一下
- 大家都做得到吧？

所以早期看起來很厲害：能接案、能跑活動、能接 10 團參訪、普查票能跑完。但這些「成功」反過來讓制度更快速、更無縫，讓人沒有休息的空間。

「滾軸式馬不停蹄的軌道」就是這種狀態：成功反而變成另一種壓力，推著大家一直跑、不能停。一個人自己硬撐，會讓真正受苦的人更孤單。如果面對困難，我們習慣：再努力一點、再學一些技術、再提升自己、再撐一下就好了。看起來很積極。但久了會變成：「你可以啊，那就由你繼續扛。」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制度在壓人，而是人與人之間開始互相壓：A 撐住了，那 B 比較不好意思喊累、B 沒說話，那 C 更不敢講、大家越來越沉默，最後變成「弱弱相殘」，真正受苦的人反而更孤單。在第一代工作會議紀錄中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樣：有些人已經累到哭了、家庭失衡了，但還是覺得自己不能拖累大家。

三、這不是能力問題，是孤單的問題

問題不是做不來，而是大家都太怕彼此受苦，所以什麼都往自己身上撐。撐久了，成功會變壓力，失敗會變羞愧，最後變成制度不用壓，大家自己互相壓。所以真正要處理的不是技術，而是彼此的關係。

回頭去看 2006~2009 年的每週的工作會議紀錄中，看到工作夥伴的工作項目是多面向的，要跟各公部門單位接洽收集資料有關安全資料、需要進入家戶收集文化普查的資料、關懷高齡者的居家安全、幫 5 個村的獨居老人慶生、社區輔導工作、新住民考駕照、適應班、老人送餐、環境維護、接待社區參訪(協會最大產值每年 200 多萬，也代表每月都有 10 團左右，協會一成立就開始有自營收入的機制).....如果仔細的去看工作報告的細節，就會看到非常忙碌跟多面向的工作，我們這些大叔、大嬸們還真的很有能耐，為何我還會跟夥伴們恩怨這麼多。我在思考當時究竟發生甚麼事：

是因為第一代的工作方式從計畫書的撰寫到最後的成果都是我跟鈞弼，還有 2~3 位年輕人協助。當時夥伴們在自己家鄉工作面對的是左鄰右舍，計畫中的工作

項目本就難切得清楚，最後要撰寫計畫期程報告時，就會發現計畫該作的沒完成，而夥伴們則是造成困擾跟衝突？當時許多計畫是沒有人事費用的，所以除了要完成申請的計畫外，還要想辦法有獲利的機制及開發產業的方式，所以造成壓力？還有當時大家電腦能力稍弱，為了完成紙本及電子檔的紀錄及核銷我們常常下了班，回家料理家人後，再回來辦公室工作，讓我們疲憊不堪。

因此，在社區工作中，成功與失敗都不應被視為個體的產物，而是群體關係、制度條件與共同行動的生成結果。真正的學習，不在於提升個人的知識技巧，而在於理解每一次成敗如何指向「我」與「我們」的緊張、裂縫與可能。在社區工作裡，「成功」不是能力證明，而是關係的結果；「失敗」也不是個人不足，而是制度與群體尚未調頻的訊號。

所以真正的解決，不在知識，而在把「我」重新編織回「我們」。當我將視角從「個人能否解決問題」轉向「群體如何透過對話調頻」，我開始看見另一種倫理「手工倫理」：透過慢慢摸索、互相扶持、共同承擔而織出的實踐方式。成功如果只放在「我」身上，它會變形；失敗如果只讓「我」承擔，它會傷人。也因此，核心意旨是：唯有把成敗重新放回關係之中，成功才不會成為下一次壓力的來源，失敗也不會讓人丟盔棄甲，而能成為群體再次調整、再度出發的契機。

而所謂學習，並不是變得更厲害，而是變得更願意靠近彼此。而社區工作的意義，也不在於「我們做了多少」，而在於「我們是否仍願意一起承擔、一起修正、一起往前」。這樣的理解，為下一節「滾動中修正的工作方法」奠定基礎。因為唯有當成敗回到「我們」的脈絡中，滾動修正才不是補破網，而是使一個社區組織能長期維持生命力、自我調整與彼此成長的關鍵能力。

第二節 從初衷到勞基法

這一節是想談談牛犁在世代交會中，如何重新學習「一起工作」，衝突不是分裂而是一種想要如何一起工作的協商。

一、牛犁成立初衷

鈞弼在去年(2023)年底與年輕一代的工作夥伴開會，談到牛犁成立的初衷在

1950 年代以後系列的國家經濟政策發展下，農村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導致大量人口外移，甚至國家資源也因為政策的緣故，並沒有投注到農村之中。當時的豐田，雖然早期有精鍾商專（台灣觀光學院）、豐田玉產業等地存在，但村子仍然逐漸蕭條，孩童的教養、青年的就業，以及高齡人口的老化都使得村落面臨到相當困境。因此協會自 1996 年組成，2001 年正式創立。

所以當時四個家庭組成，名為「牛犁工作群」，並非正式的立案組織。最初目的是帶領孩子們在逐漸沒落的農村中，能夠健康快樂的長大；當時並不期待孩子們在村落中大人們的照顧下能完成什麼遠大的目標，只是期望每個被照顧的孩子，不至於在成長的過程中走上了歪路。然而，時間來到了 2001 年，牛犁工作群最後仍是組成了「協會」，背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立案成人民團體，才能更有效的取得資源，建設整個村莊。但為什麼我們的名字是「交流協會」，而不是「○○社區發展協會」？背後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個，是因為豐田地區涵蓋三個村莊，若以單純的某個村或區域為命名，恐怕難以概括我們想要實踐的行政區域。

第二個原因，則是當時成立協會的第一代工作者們發現，協會最初希望每個孩子在這裡的成長路程不要走歪，實際上很難透過當時的作為完成。因為這些孩子每天經歷社區課程、課輔後回家時，仍然面臨到家暴、父母吸毒、酗酒等等的問題。於是也發現，若要改變一個孩子，我們必須從家庭開始著手；但若要改變一個家庭，我們還要面臨整個村落的環境；整個村落的環境，卻又受到國家大政策的影響，一環扣著一環。

當時立案名為「交流」的原因也在於此。因為第一代的工作者們發現，我們或許有經歷改變一個孩子、改變一個家庭，甚至改變一個村莊。但我們肯定沒有辦法改變無數個村莊，改變整個國家的環境。於是「交流」最大的意義跟目的，是在於協會期望能夠把我們的社造經驗、理念，不斷的與不同的地方工作者們對話，甚至一起跨區域的陪伴，逐漸改變整個花蓮乃至於東部、國家的環境與社會。

社區營造，造的不止是地，更應該是人。因為我們也相信，每一個良善的公民，他們去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能為每處所在帶來更美好的可能。這也是協會「牛犁」的精神。

協會成立至今將近三十年，有些事情已經被我們說到像是傳家故事：鈞弼總是最初那個念頭說起「只是希望孩子不要走歪路」。那是一種再直覺不過的情感：

一個地方開始沒落，最先受影響的永遠是孩子。可是，隨著工作的深入，我們很快就被迫明白：要讓孩子不走歪，需要改變的不只是孩子自己；要改變孩子，得先能支撐家庭；要支撐家庭，又得面對整個村落的環境；而村落的命運，又被國家政策與大經濟系統綁得死死的。

於是，最初的「帶孩子長大」，一步步拉成了一張更大的網。那張網最後把四個家庭綁在一起，成了「牛犁工作群」；再從 1996 到 2001，從一群人互相補位的情感行動，走向一個必須立案、協作、爭取資源的「交流協會」。

「交流」之名正是從那個時候誕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或許能改變一個孩子、一個家庭、甚至一個村莊，但我們沒有辦法改變整個國家的結構。能做的，是把一份經驗、價值與信念，透過交流，傳給下一個做地方的人。讓每一個人到哪裡，都能在那裡繼續把事情變好。這就是「社造不是造地，是造人」的核心精神。

二、從「像家一樣」的協會，到「組織化」的協會

鈞弼談及協會成立的最初目標是「讓孩子不要走歪路」，是一種情感驅動的行動起點；這三十年來，我們的運作邏輯始終很像「家」：家裡誰有空誰做、誰看到問題誰補位；誰狀況不好，其他人就稍微撐一下。這些都是第一代自然形成的「手工倫理」，靠彼此的體貼、默契與做不完的情感付出，把無數沒有經費的工作、必須自籌的支出、不固定的案量撐了起來。這種做法支撐了牛犁二十多年，也讓協會在沒有太多制度的情況下長成今天的樣貌。

但到了第二代，情況開始不同了。年輕人不再把「情感＝義務」視為理所當然；他們開始用另一種語言說話：

「我的勞動有什麼保障？」

「這個制度能不能讓我們長期留下來？」

「我們想做社造，但也要先活得下來。」

這些問題不只合理，而是必要。因為年輕世代面對的是更不穩定的經濟、更脆弱的勞動環境，也因此他們對「保障、權益、制度」的敏感度和理解，與上一代完全不同。我必須去理解與轉譯這不是反抗，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情份：他們希望留下來，

但希望能在有保障的環境裡留下來。

當社區工作逐漸制度化、被政府資源結構綁定後，如何保有初衷與情感？而第二代工作者，如何在「勞工身分」與「社會實踐者」之間取得平衡？這不只是一場「是否遵守勞基法」的內部管理爭論，而是一場世代交接下的社會組織轉型辯證與勞動倫理覺醒，它深刻牽動了幾個層面：牛犁協會的誕生是出於「情份與補位」，一群人對地方、對孩子、對家庭的牽掛而行動，長期運作仰賴的是情感交換、無償付出與道德責任。但 30 年後，年輕世代不再以「情感等於義務」為理所當然，他們開始從制度的角度問：「那我的勞動有什麼保障？」

這是一種由「父母式管理」轉向「公民式契約」的轉型過程：

- 過去的領導者像父母，把組織視為家，員工視為孩子
- 當代則要求作為平等的合作夥伴，要有可預測、可討論、可保障勞動條件

而這正是在過程中，「手工知識的組織情感模式」首次與「制度性的權益保障邏輯」產生了正面衝突。老一代的焦慮是實的：雅帆與鈞弼 30 年來未支薪、為人補位，仍背負自家與夥伴生計的責任。我對於「年輕人爭取勞動權益」的反應，不僅是經濟層面的焦慮，更是情感資本枯竭後的孤獨感與被背叛感。

（一）社會組織公司化——勞基法的糾葛

2024 年鈞弼的態度以及我不斷在工作修正自身的態度，年輕的工作夥伴們跟文化組組長富民（也是我們家的老三），對協會工作的權責有了一些討論，期待協會應該符合勞基法的工作方式，尤其是特別休假日、生理假、原民歲時祭儀假時。

附錄四——《牛犁勞動契約 20250422》：

1. 依照勞基法規定，勞工在固定雇主工作滿一定期間應給予特別休假，也可以換成薪資給付。
2. 依據性別平等工作法，女性受雇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3. 依照勞基法規定，原住民族受僱勞工，於所屬民族歲時祭儀當日應放假 3 日，無須以請假方式處理。
4. 病假每年可以有 30 天僅能扣半薪

5. 工作間的交通時間可以補休或是加班計算(例如台北出差開會 4 小時，因為火車時間有可能必須算 1.5 天的班。國定假日、颱風、地震、水災如有公佈休假均必須給假，否則必須以加班計算.....

富民在 2024 年年初就私下與我討論，剛開始我無法適應這議題，就用拖延戰術來避免關係僵化。當時我內心真的情緒高漲。目前協會的方式：超時工作要補班、出差有旅程假可抵、碰到假日辦活動可提早下班、22 個工作天、準時 17:30 下班、有年終獎金、薪資三級跳能力好的 2 年內調到近 4 萬，目前組長級都是 45,000~48,000 元，協會最低薪資也是 3 萬 2 起跳。雖然不是最好的待遇，但是以社會組織而言，已經超越計畫提供的薪資與待遇，也不會因為計畫終止就結束關係，協會一樣撐起有薪的工作，讓大家有一份安全穩定的工作。

於是我對富民說：我的重點是協會能給大家的福利都已經給了，無法再付出，有一種無底洞的焦慮，更何況我跟鈞弼在這個協會未支領薪資、30 年中只有這後面 10 年我才加入勞健保（第一代的工作人員都可以領勞退了，我才開始而已），我跟鈞弼的工時比別人還長，認真要算應該會被我跟鈞弼用完經費。

富民回應：你不能老是用社會組織以及上一代的工作方式來說話，也不能說誰、誰、誰不值得這樣對待.....

這樣的討論從 1 月到 3 月中旬，幾乎每兩三週富民都會找我思考了如何，我們也先找組長開了會議，幾位組長也紛紛提出看法，但就是明顯的分為新舊兩派的立場，這件事情就這樣一直被拖著，富民最後火大，就很清楚及具體的告訴我：「牛犁就是違反勞基法，夥伴是可以告牛犁的」富民就用「法」來嚇我。

最後富民問我到底擔心跟害怕什麼？我跟組長們提出我的焦慮，權利與責任之間的失衡誰來承擔？2014 年曾經面臨斷炊危機時，大家拍拍屁股一翻兩瞪眼說走就走，因為許多服務是志工型工作，甚至有些還須自籌款，我不再年輕了，沒有能量再撐起這份重擔。富民及組長們給了肯定句，說會承擔起來的，其實我無法十足相信，但是違反勞基法讓我鬆動同意重新制定工作的規範，在組長討論下很快的訂好工作守則，在 3 月 18 日就開了會議公開討論這件事。

當天會議還算順暢，我不小心開啟了組織管理人的模式：「希望在擁有好的福利的工作環境中，期待大家能夠將工作盡心完成.....」一說完我們其中一位夥伴回

應我：「這不能算是福利，這是我們應得的權益。」當下我有些羞愧再度回應：「自己的慣性思維，期待跟大家一起前進……」也將富民及組長如何勸說及我的焦慮自我揭露出來，也感謝大家願意理解我之類的話。其實我內心非常多不滿，但礙於他們是多數我認了。

在廉兮的課堂與同學分享這事件，透過對話自我釐清，看見自己將夥伴是為勞資雙方的關係，也因此困在一個錯認位置中說話，自身也困在牛犁的艱困歷史中進行情感剝削，忽略我們是同一陣線。後續我也將這樣的聲音與協會年輕人對話，真的有感受到被接納與包容，從 3 月到現在 6 月份，工作該完成的、該掉落的...都依然在發生中，工作守則的規範後許多事項及業務都回到小組去處理，不再被依賴與決定權也逐漸消失，焦慮、幸福感、壓力降低錯綜複雜的情緒交叉編織，有時難以適應，但放下不用再撐，不害怕自我修正，比較像人樣發自內心的真誠。

其實這樣的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在 2022 年書寫第二次資格考中，也有這樣經驗書寫出來。當時是為了超過時間要補休、出差的交通時間要算上班（例台北、台東開會，需含交通時間加起來超過 1 小時就要補修）、原本 1 個月 23 天班變成 22 天班、年假必須依據政府規定，勞基法產假協會要給付兩個月薪資、婚喪假的規定等……薪資也從 3 萬 2 到 4 萬多的薪資。

2022 年的那一次過程中無數次的與凡萱跟富民大小聲，我連「你他媽的王八蛋」都罵出來了，無數次的協商與退讓，富民問我：「你擔心甚麼，你不就是擔心工作沒人負責，又會像以前阿媽媽們一樣落在你身上，如果我們現在各組長跟你承擔下來，你就開放一下。」因為年輕人人數比我多，我不得不逐漸開放，只是過程中孩子們太不給我面子，咄咄逼人的言詞屢屢讓我惱羞成怒。

那一次的會議中開放了工作天每月 22 天（原本 23 天）、出差的旅程假、勞基法產假協會要給付兩個月薪資、婚喪假的規定等……薪資也從 3 萬 2 到 4 萬。但是年假、生理假、族群假在當時沒有沒有開放，才会有現在的再一次爭取權利會議的產生。

協會在這 30 年來，夥伴撞壞車輛時，不管維修還是報廢（3 輛）都是協會全額承擔，還有其他設備如：相機、錄影機、音響、筆電、空拍機……有老舊的、人為操作不當的，也是協會全額承擔，人為因素讓計畫被罰錢的亦然。還有每年年終紅包，可是 50 萬左右，現在回過頭來工作夥伴跟我談勞基法，情何以堪。慧綸說：

「勞基法可以是一個彼此權益的保障，但不必然是工作關係，如何在有權益保障下創造有溫度與價值的工作關係。」這也讓我在社區工作的適應與轉換過程更加拉鋸一段時間。

富民、凡萱等人主張依《勞基法》調整休假制度與工時分配，不是對舊制度不敬，而是他們身處一個更脆弱的勞動環境，無法再用「理想主義」去支撐生活。他們其實在說的是：「我們也想像你們一樣長期做社造，但我們必須先活得下來。」

（二）真正的衝突：語言與視角的差異

情感額度的枯竭與制度語言的崛起，組織靠感情、義氣、補位、互相體諒、默契與道德責任來運作的方式。它不是制度，而是一種：我看到問題我就撿起來、雖然沒錢，但我願意先做、雖然沒規定，但我不好意思不做。牛犁協會的第一代，就是靠這種「情感資本」，是靠人的情感，支撐起一個村莊的行動工程。而當「靠人撐」超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強的情感也會被掏空，「情感資本」是會枯竭的。現在必較清楚我們的委屈從何而來，靠人撐住的工作會沒有界線、是一直在付出、不談休息與否、且是默默承擔、它不允許說「不」、把「愛」當成無限制的義務，長期下來，最後不是熱情不見，而是人先被磨掉了。大家的疲累、委屈與恐懼，就是我們彼此「情感資本枯竭」非常典型的徵兆。

現在年輕夥伴使用的語言：權益、保障、勞基法、特休、工時、加班費、生理假、族群歲時祭儀假。

老一代的焦慮是實的：在沒有資源的年代，「情感」是唯一能讓事情開始的方法。我與鈞弼 30 年來未正式支薪、為人補位，仍背負著經濟與工時責任。他們對於「年輕人爭取勞動權益」的反應，不僅是經濟層面的焦慮，更是情感資本枯竭後的孤獨感與被背叛感。

新一代的要求是結構性的：在高風險、低保障的年代，「制度」是唯一能讓事情持續的方法。富民、凡萱等人主張依《勞基法》調整休假制度與工時分配，不是對舊制度不敬，而是他們身處一個更脆弱的勞動環境，無法再用「理想主義」去支撐生活。他們其實在說的是：「我們也想像你們一樣長期做社造，但我們必須先活得下來。」

真正的衝突：語言與視角的差異：一方說「這是福利」，另一方說「這是權益」、

一方用「撐起」、「犧牲」的手工倫理語彙，一方用「保障」、「制度」的現代勞動語彙。

這不是價值對立，而是兩種世界觀的交會與碰撞。所以衝突不是因為誰對誰錯，而是因為：你們靠情感才能走到這裡；他們靠制度才能走得更遠。這兩條路不是互相否定，而是彼此需要。第一代給方向、給經驗、給精神；第二代給架構、給保障、給可持續性。「情感資本枯竭」代表第一代的力量已到極限；「制度語言崛起」代表第二代準備接棒。

慧絢所說：「勞基法可以是彼此權益的保障，但不必然是工作關係的全部。如何在權益中創造有溫度與價值的關係」這正是「手工知識」的再當代表述：在標準化與制度化的過程中，如何仍保留關係的可感性、彈性與人味。一個組織能否從「家族式情感組織」，走向「可持續的社會組織」，就在於能否把這兩種力量整合起來：

情感 → 讓我們願意彼此托住

制度協商 → 讓我們能長期站得下去

牛犁現在面臨的，不是危機，而是一場必要的轉骨。從「我來撐」慢慢鬆開到「我們一起承擔」。在這一連串拉扯、爭執與協商的過程裡，我其實也重新學會了一件事：當我把自己只放在「資方 / 上一代」的位置上，我也同時把夥伴推到了「勞方 / 下一代」的位置上，我們不知不覺複製了外面世界的對立關係，而忘了牛犁一開始其實是「一群人為了同一個地方、同一群孩子在一起想辦法」。情感資本的枯竭，讓我不得不承認：再用過去那一套「我來撐、我來補位」的手工倫理，已經撐不出一個三十年；而制度語言的崛起，則提醒我們：如果真心希望有人接棒，就必須讓他們能在一個安全、有尊嚴的勞動現場裡，慢慢長出自己的位置。

於是，我們所談的並不只是牛犁內部一場關於勞基法的爭論，而是地方組織如何在情感與制度之間，手工縫出新的「我們」：一個不再只是靠少數人犧牲奉獻、也不只是冷冰冰按表操課的「我們」，而是在權益被看見之後，仍願意彼此托住、願意一起承擔的「我們」。這樣的轉骨，正是我在社區工作中走出的那條社會路線，從「我來撐起這個地方」，慢慢學會「我們一起照顧這個地方」，也在互相調整彼此分寸的過程裡，看見每一個人都作為主體，被接納在這條通往鄰里的共同路上。

三、教育政治²⁵視角下的社區組織轉骨

在這場由情感資本走向制度語言的組織轉骨中，我愈來愈能理解夏林清所提醒的：「唯有特定社群中的個體與群體在真實的互動過程裡，發生意識與情感的變化，社會的轉化才可能被推進。」牛犁這次圍繞勞基法的辯證，看似是勞動條件的爭執，然而從教育政治的視角來看，它其實正涉及社區發展中三個關鍵價值的重新定位：資源的重分配、身分的肯認、以及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

首先，「重分配」不僅是財務或工時計算的技術問題，而是工作量、休息時間、照顧責任與安全感在不同世代之間如何重新被調整。例如第一代習慣用「情感關係」來支撐整個服務的缺口，第二代則強調工時的界線與應有的休假。這些不是要求過多，而是對「怎麼分配人力、怎麼讓每個人能長期留下」的制度性提問。重分配不是削弱組織的熱情，而是讓熱情不再只消耗少數人的生命。

其次，「肯認」涉及的是世代之間彼此生命處境的理解。第一代的語言是「情、補位、撐起」，因為他們在沒有資源的年代裡是以情感為燃料；第二代的語言是「權益、保障、可持續性」，因為他們面臨的是高度不穩定的勞動市場。當我願意承認年輕人並不是「不講感情」，而是在說「我們也想留下來，但不能靠透支身體與青春留下來」，那是一種新的肯認：肯認不同世代的脆弱、限制與期待。這種肯認本身，就是教育政治意義上的學習事件。

最後，「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也在這次對話中得到第一次真正的打開。過去的牛犁像家，由一、兩位核心人物負責「界線」「節奏」「方向」；但在組織走向制度化後，年輕世代要求共同參與工作規範、休假制度、工時計算等關鍵規則的討論。這個過程雖然伴隨衝突，但也意味著：他們不只是被動接受社區工作，而是開始把自己視為社會實踐者，願意與我一起「決定牛犁怎麼走下去」。這樣的參與，本質上就是社會轉化的動力。

站在田野第一線的我，也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深刻的意識變化。從一開始把自己看作「撐起大家的人」、到逐步理解自己其實也被困在舊有的情感倫理裡；從用「家」的邏輯管理組織、到願意讓組織成為一個可以共同討論權益、共同設定分工

²⁵ 我對「教育政治」的理解，不是指學校的權力鬥爭，而是：在一個社會、社區中，人們如何透過「學習—意識轉變—參與公共生活」去改變資源分配、身份地位與制度規則。

的場域，這些轉變都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衝突、協商、揭露與對話所累積而來。

因此，這一節並非只是描述勞動條件的調整，而是揭示：當社區裡的個體與群體的感受、位置、語言與理解都真正移動時，組織才有可能朝新的方向前進。也因為如此，牛犁的世代交會不僅是管理問題，更是教育政治層次上的學習事件：它讓我們從情感性的「家族型組織」，逐步走向能夠談制度、談保障、談共同承擔的「我們」。這樣的轉化，也正是下一個三十年的基礎。

第三節 社區中的看不見的邊界線

在前兩節我回顧了牛犁協會在三十年中逐步形成的工作方法、情感倫理與制度轉骨。本節則把視野從「組織內部」再度拉回「社區生活世界」，聚焦在常常被捲入結構性困境的群體：高齡者與新住民、孩童。他們是社區中最容易被看見、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

在長期田野工作中，我所理解的「被迫形成的生存實作」，不是一種文化屬性，而是一種被反覆要求自行承擔制度缺口的生活狀態。我們長期被要求用有限的資源，回應一個從未為我們設計的制度。老人、新住民與孩童，還有我的母親之所以長期承擔較高的生活風險，並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而是因為現行的社會制度與資源配置，往往無法回應我們實際的生活節奏、語言方式與照顧責任。

在社區生活中，由文化、制度、語言、資源差異與權力關係所形成的那條無形線。這條線沒有被畫出來，也沒有人明說，但人人都在被它區分、限制、框住，他就是讓人過不去的界線，弱勢不是因為不努力、不爭氣、不認份，而是因為我們站在邊界外面。例如：制度的複雜性本身就是邊界，語言與資訊的落差也是一道界線、社區內部的文化期待與道德框架也是、資源的分佈方式本身就是邊界，更不用談到參與公共事務更是一條大的門檻。之所以稱為「看不見的邊界」，是因為弱勢者不是住在社區之外，而是在同一個社區中，卻無法跨越語言、制度、文化與參與的無形門檻。這些邊界沒有被畫出來，但深深地規定了誰能活得好、誰必須忍著。

從教育政治²⁶的觀點來看，「被迫形成的生存實作」所展現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延續性結構壓力的結果：它同時反映了資源分配的失衡、身份被否認的失語、以及

²⁶ 我對「教育政治」的理解，不是指學校的權力鬥爭，而是：在一個社會、社區中，人們如何透過「學習—意識轉變—參與公共生活」去改變資源分配、身份地位與制度規則。

參與公共事務的門檻。如果這些結構性因素不被辨識與對話，社區實踐就很容易落入「幫助」與「被幫助」的二分，甚至不自覺複製弱勢者原本想逃離的失能位置。

我在陪伴這些群體的過程中漸漸能夠明白與理解：真正的被迫形成的生存實作並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選擇。因此社區工作不能只提供服務，而是要打開「可選擇的空間」包括資訊、學習、社會連結、制度協商、身份肯認，以及能夠發聲與被聽見的機會。

一、從邊界看到主體性：能力未被看見的小卡²⁷

小卡來自菲律賓因此英文還不錯，原以外籍看護身分受僱於一位因高壓電事故而截肢的身障男子。四肢僅存一腳可活動的雇主，原有母親協助照顧生活起居；然而在雇主母親過世後，小卡基於長期照護關係所累積的情感，選擇與雇主結婚，並定居台灣，育有一子。孩子自出生後即罹患氣喘、鼻炎等慢性疾病，經常需要去基金會急診，家庭交通主要依賴計程車，使得生活開銷大幅增加。所以小卡努力考汽車駕照，之後就可以載家人出門看病，雖然家裡的狀況讓人同情，可是案主相當的樂觀、進取，待人友善、溫柔。

家中經濟以政府補助為主：包括中低收入補助、身心障礙補助及兒童補助，三口之家每月總收入僅約 14,200 元。由於丈夫身體限制及孩子健康狀況不穩定，小卡無法外出工作，只能負責全家照顧與家務。然而，她並未因此封閉生活；相反地，她展現高度的積極性與社會參與能力，投入社區及學校當志工、學習中文與電腦、繪畫抒發生活情感，並且鼓勵丈夫以右腳作畫，使其成為口足畫家。其樂觀、溫柔與堅韌的生命力，小卡常常帶小孩去小學當志工媽媽，小卡說：希望以後小孩上小學前，就跟這些大哥哥、大姊姊認識，日後就不會被欺負。因此也藉由故事媽媽期間煮好吃的義大利麵給學生吃，小卡笑說：現在就是先打好關係。

我認為小卡是有努力的學習力的女性且又是會英文，也想培養小卡成為牛犁的夥伴，成為新住民的典範，因此邀請小卡進入牛犁工作，但是小卡拒絕了，寧願在種草皮的農場工作。小卡說：

²⁷ 化名，新住民姊妹，社區居民。

雅帆姐，不好意思啦，在牛犁工作比較像上班的人，服裝要求比較正式、好看。我在種草皮這裡工作，每天清晨 5 點就必須把頭包好，穿著圍裙、袖套、耐髒的衣服去農地。這樣我的老公（身障）才不會每日擔心我有可能會跑掉。又加上草皮工作是清晨工作，10 點就回家，我還可以料理家務，我覺得很適合我現在生活，雖然身體很累，但沒關係。

每次跟小卡聯繫都要透過小卡老公的電話，我好心的送小卡一個二手智慧手機，讓小卡更方便與外界聯繫。小卡說：

我有手機呀，平常是家人互通，且重要時候才會使用。你們外面的人來電化要先透過老公，是因為想讓老公也清楚。我是跟誰在交往，都是在做什麼事，是要讓老公安心，他身體不好，不想讓他心情也不好啦。

（一）結構性匱乏所形塑的日常策略

在牛犁協會的陪伴歷程中，小卡不僅是服務對象；她以義大利麵料理、生命故事分享、繪畫作品展示等方式積極參與社區與學校的互動，並期待孩子在進入幼兒園與小學之前，能先被社區「看見」，進而在求學過程中獲得同儕的支持。這些細緻的行動，反映她作為外籍女性、照顧者與母親，如何在社區生活的邊界中不斷創造連結。

（二）細膩而成熟的日常治理能力

小卡深知；在一個高照顧負荷、弱勢而脆弱的家庭裡，她的工作並非只是賺錢，而是維持家庭整體不崩壞的關鍵支點。同樣，在手機使用上的自我節制，也透露出她對關係治理的高度意識。當我提出贈與她手機，希望提升其外界聯繫的便利性時，小卡回答：

我有手機，只是重要時候才用。外人來電要先透過老公，是讓他安心。不要讓他身體不好、心情也不好。

這段對話呈現了弱勢家庭常見的「透明化策略」：透過行為公開、社交透明來維持

伴侶的信任與情緒穩定。這不是情感受制，而是一種關係協商的智慧。她理解丈夫的殘障與不安，也知道不透明會造成家庭衝突與心理壓力，因此利用「讓他看見」作為維護家庭秩序的方式。這種以情緒作為治理對象的能力，是典型的「手工知識」：它並非學院教導，而是從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與關係互動中積累而成。

（三）小卡的能量與主體性

小卡的時間運用是在照顧責任與生計需求之間找出可行組合。在跨文化婚姻中以體貼、節制與公開來維持信任。透過料理、繪畫、志工服務建立社會連結與自我價值，展現生活的技術。小卡更有一個生存判斷的智慧；選擇「家庭能承受的工作」，而非「社會認為較好的工作」。這些能力並非弱勢，而是弱勢者在邊界中仍能保持主體性的重要證據。透過小卡的例子可以看見：

小卡的故事不只是弱勢案例，而是顯示在看不見的邊界內，人們如何以手工倫理編織生活、維繫家庭、保持尊嚴，並在有限的空間中創造可能。「」不是使人失能，而是迫使人以更細緻的方式治理日常生活；手工知識不是低技術的象徵，而是弱勢者在無選擇世界中自我保存與維繫關係的高度智慧。這樣的理解，使社區工作不再是「協助弱勢」，而是看見他們原本就擁有的知識、能量與主體性，也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何謂真正的陪伴與社區實踐。

小卡的故事提醒我：弱勢並非主體性的消失，而是主體性必須在更窄、更受限的縫隙中運作。從照顧身障丈夫與病弱孩子的家庭日常，到她在語言、制度、交通與文化邊界之間的穿梭，小卡展現的並不是被動承受，而是一套在困境中持續調整、判斷與選擇的生活技術。她拒絕看似「更好的」牛犁工作，選擇清晨農場的高勞動環境，不是退縮，而是對家庭節奏、伴侶情緒與自身能量的敏銳判斷；她有限度地使用手機，透過透明化維持家庭信任，也不是受制，而是以細膩的情緒治理技術維持家內穩定。這些都是她在邊界中所磨出的現場知識，一種從生活中長出、以關係、身體與時間精準編織的智慧形式。這都是我在這計畫考後的重新理解與看見。有時會喜悅我看懂了、但又害怕真懂了嗎？現在較不擔心，因為我有清楚了，事情永遠們這麼簡單，就一步一步看著走吧。

在小卡的行動裡，我們看見被迫形成的生存實作並不只是再製弱勢的結構，更是弱勢者以不同方式作出選擇、縫補生活、維繫尊嚴的場域。她透過語言學習、社

區參與、料理分享、藝術創作與跨文化互動，重新分配社會資本、重建新住民的身份位置，並為自己與孩子打開一條能夠被社區看見的道路。她的每天早起、她的透明化策略、她對關係的維繫、她在公共空間裡的自我呈現，都是主體性的展演。

因此，小卡並非「弱勢者」的典型，而是顯示弱勢如何在有限的可能中，以自身智慧實踐主體性的生活。她的生命經驗讓我們理解：不是無能，而是在無選擇的位置上持續創造選擇；生活中的技術不是低度技能，而是弱勢者得以維持家庭與生活的深層技藝；主體性不是自由條件下的自主，而是受限條件下的堅定與細膩。邊界雖然存在，但在小卡的實踐裡，我們看見了跨越邊界的可能性。這正是社區工作中的教育政治，在陪伴弱勢者的過程裡，不只看見困境，更看見他們在困境中所召喚出的知識、韌性與主體力量。

二、兩位榮民的生存戰術

在社區工作現場，我們往往以為「協助弱勢」就是幫他們走向向上流動、脫離困境，但真實的生活比政策語言複雜。弱勢者並非只是需要被拯救的對象，他們在自身限制與殘缺的資源中，仍然發展出一套自我治理、維繫關係與保持尊嚴的策略，這正是中的「生存戰術」。兩位獨居榮民的故事，使這個現象格外清晰。

社區中一位獨居榮民已經 80 多歲，是牛犁的到宅送餐戶，送餐中發現每個月初都會有一位 60 歲左右的婦女來住一星期多又離開，鄰居也紛紛來告狀，希望我們讓這位爺爺清楚這個婦女是來騙錢的。我決定去與爺爺談這位婦女的意圖。

這位爺爺告訴我：

是又如何，大家都說為我好，但是沒人來陪我，就算你們牛犁協會的關懷訪視也只有一點點時間，這些鄰居還嫌棄我這位手上刺著殺朱拔毛、反攻大陸的榮民呀。

而這位婦女還不錯每月來住一星期，基於生活經濟需求，爺爺願意兩人互相幫助，而且每月的退休俸沒用完：「將來死後也是被政府收走。所以給她沒關係，至少每個月陪我一個禮拜。」

還有一位眼睛看不見的榮民，也是將退休俸請一位單親媽媽協助煮三餐，這一

位單親媽媽在三餐時間內，就去煮飯及打掃一下，按照三餐的時間去，每月也是付不少錢。牛犁還好心的想要幫忙送一餐，以減輕視障榮民的經濟負擔。

但是同樣道理就是為了讓家中每天有人來走動，如果意外時也有人可以照料，這一位爺爺會答的也是：「錢留著要幹嗎？幫忙一下這位媽媽跟孩子很好呀！」這些都不是我們社區工作者可以細緻到如此的工作。

（一） 盤算的背後，是孤獨與需要的陪伴

對獨居高齡者而言，陪伴本身就是資源。鄰里、政府、志工都無法補上這個情感匱乏的縫。榮民很清楚：婦女需要生活費，他需要陪伴、需要有人在家活動，退休俸花不完對他沒有實際意義。所以他選擇：以經濟換取情感與生活支持的社會情懷。這不是被騙，而是策略性的交換，針對鄰居的投訴與及牛犁的好心，但事實上我們都無法提供陪伴，社區裡有一條看不見的線：有人覺得這樣「不正當」、有人認為「老人被利用」、但沒有人願意有穩定的時間陪伴、這條線不是道德，而是「誰能提供什麼」的差異邊界。鄰居能提供勸告，婦女能提供陪伴，而榮民在這些邊界之間選擇了最能讓生活不崩壞的方式。

（二） 生存戰術不是剝削，而是弱弱相扶

第二位視障榮民每月付一筆不小的費用，請單親媽媽每日到家裡煮三餐與簡單打掃。牛犁想幫他減輕支出，但他回答：「我留著錢要做什麼？她帶著孩子來，我覺得很好。」家裡也有人走動，有事也有人看得到。同樣地，他不是被剝削，而是在實踐一種弱弱相助：互相扶持，而非單向施予，榮民失去視力，但擁有穩定退休俸，單親媽媽貧困，但擁有勞動力。兩人互補，形成中的「共同體式互惠」。

這是弱者在強大的結構中找縫隙生存的方法，弱勢者既然無法改變結構，但他們能透過微小、靈活的「戰術」在強勢系統的夾縫中生存。他不能改變失明、不能改變孤獨，不能改變制度資源的不足、也不能補足完整的照顧體系，但他們都能每天讓家裡有腳步聲、有談話、有鍋鏟聲。這是一種微小卻巨大的「戰術」讓生命依然被看見。

（三） 看不見的邊界

正式制度無法照顧的「生活細節」，政府可提供低收補助、身障津貼、居服服務（有限）、但無法提供每日三餐的溫度、家裡被走進來的感覺，若他跌倒時「有人會剛好在場」的安全感，這些「生活的細節」既不在政策中，也不在正式服務中，但卻是他生存的核心需求。這就是制度與生活之間的看不見的鴻溝。而弱弱相扶也正是中的人性行動。如果只用道德或資源配置的視角，上面兩個榮民都會被誤讀成：「老人被利用」、「弱勢被騙」、「需要介入保護」，但真正的現場聲音顯示：弱勢與弱勢之間，也會創造能一起活下去的方式。這不是可憐，而是智慧。不是剝削，而是互補。這就是中最關鍵的特質，在沒有制度保障的時候，人仍會用身體、關係與微小資源互相扶持。這些互助不是浪漫化，而是，面對孤獨、面對身體衰弱、面對資源不足、面對制度空缺。所發展出的 生命自主地策略。

社區工作需要看見的不是流動，而是「流動中的選擇」，這兩位榮民讓我們看見：對弱勢者而言，活下去從來不是直線式的「向上流動」，而是在結構壓力下，以手工式的方式做出能夠承擔的選擇。裡的「盤算」不是冷血，是情感、孤獨、安全感、對人的信任、對生活的需求，綜合後的生命行動。不否認這是盤算，也是生存戰術，更是弱弱相扶的人性光輝。這正是社區工作者所需要看到的，不是弱勢者為何不「更好地」過生活，而是他們已經在「有限的結構裡」活得如此聰明、如此堅韌。看不見的邊界不是弱勢者的限制，而是制度的限制。在邊界之中展現的韌性與互助，才是真實的社區行動。

三、 被忽略的位置與社區邊界的再生產

記得 2000 年時第一次去宜蘭參加社造培力研習的課程，每個社區需要派 4 個名額參加，連哄帶騙得拜託另外 3 個媽媽與我一起去參加培力研習。當時我們 4 個媽媽願意參加研習，是因為可以免費的住飯店、搭火車、又有社區觀摩，因此就分別各帶著孩子參加研習，其中一位媽媽還說：這是結婚 10 幾年後第一次搭火車住飯店。在火車上小孩子們非常雀躍不止，身為母親的我們猶如度假心情，我還特別去買了一件新的上衣，還有一位媽媽跟朋友借了行旅箱，那時我就默默地想日後有錢我也要買個行旅箱，因為看起來很專業。

因為孩子的加入卻在研習的課堂上被提出來當問題看待，有一位中年男士竟然舉手發言：「帶孩子上課完全不尊重課程與他人的學習，且孩子們還一直進進出

出的走來走去、並發出聲音。」當時 4 個媽媽真的超尷尬又生氣、還多又一種哀傷的感覺，我當然也要捍衛自己的權利也回覆說：「一個家中總有人要負責生計，另一人出門研習，那學齡前的孩子給誰顧？我們當然要帶出門呀，憑什麼照顧孩子的人不能來上課。」記得當時承辦單位還算有良心，但是也處理不了現場，僅能說下次研習，如有需要會安排專人帶小朋友。

晚上用完餐入住飯店時我們 4 個媽媽跟 3 個小孩住同一間房，當天晚上我們開心的聊天，孩子們在乾淨房間白色床單下興奮得到處摸摸，乾淨的棉被與床鋪也讓孩子顯得很有規矩不管亂動，白天被一語戳破窘境的媽媽們雖然不開心，也只能默默地讓它過去，連惱羞成怒的情緒都無法產生。鄉村資源與支持體系的不足，連情緒都不知道要如何說出來，更不用談自我的覺察。我們必須在生計與孩子、家庭間奔波、勞動，連參加活動的都在想著至少是換一餐飽食及免費交通與住宿的女性，在政府的社區營造政策之下，處在鄉村的我們再度被弱勢了。

協會未立案 (2001) 前曾經和知名的公益基金會合作辦理兒童活動，每週六下午基金會提供點心、活動帶領、人力支援，我們團隊只需要將村落孩子發落過來就好。每次活動都吸引近 40 多位小朋友，幾次之後基金會師姊們開始討論要使用者付費，要養成孩子的責任感，因此每次每個孩子酌收 20 元，提供吃、喝、玩樂，是超划算的，基金會提出沒有要對價，只是要孩子養成責任感而以。

對我而言：4 個孩子都參加要花 80 元，是當時一斤豬肉、一把青菜加上豆腐的錢，我怎犧牲全家晚餐的菜錢去參加這有的沒的活動，對其他孩子而言，如果有那 20 元就去網咖就好，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自身的處境能夠移情同感其他家庭的條件限制，在此階段這一群孩子不適合用使用者付費來養成責任感，因為我自己窮困不想繳這筆錢，所以那樣的發聲的話語就非常薄弱無法據理力爭。不就是為了不要讓孩子去網咖、不要去河川戲水、不要到處趴趴走.....讓孩子安全長大，還要計較這麼多。

因為我們拒絕收費制，也提不出專業理由，當然也就是結束這系列活動。後續我們就自己帶孩子去整理環境、雜亂空間、也進行育苗、種樹活動....我們也僅能帶體力活的活動，孩子人數依舊不減，我問了孩子：「這麼累又辛苦，為何還要來？」孩子們有不同的回答：「因為我的朋友在這裡。因為沒地方去。這裡有午飯吃（家長給的午餐費用被拿去打網咖了）。」我們的活動好玩嗎？竟然沒人說好玩。

（一）被忽略的位置

這兩段經驗正顯示，中的行動並非「不努力」或「不重視學習」，而是弱勢者在其階級位置、照顧責任與鄉村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所能做出的最佳選擇。二十多年前，四位媽媽帶著孩子參加社造培力研習，並非不懂「課堂規範」，而是因為在每天為生計奔波、缺乏托育支援的家庭裡，「帶著孩子上課」本就是唯一可能的參與方式。然而，研習現場的男性學員卻以「干擾課程」「不尊重他人」的角度出面指責，反映出的不是媽媽們的問題，而是社區中一個被忽略的位置，那些必須同時照顧孩子與勞動的女性，雖然人就在場，但她們的生活條件、被迫背負的責任，卻不曾被視為理所當然應被納入的現實。

我們婦女不是不存在，而是沒有人真正把他們算進來。課堂中「理想的學習者」預設的是能全心投入的人，卻忽略了弱勢者必須帶著現實一起上課，帶著孩子、帶著疲累、帶著責任與焦慮。當這些需求沒有被納入活動設計時，弱勢者雖然「在場」，卻只能站在邊邊角角的位置。

原本社區內就存在的差異，誰有資源、誰能放下照顧責任、誰懂得活動規則，在研習活動中再次被強化。規則並沒有明講「弱勢家庭不能參加」，但它自然地讓某些人更容易進入核心位置，而讓另外一些人只能站在外圍。看似中立的學習空間，其實在無意間重新劃出「誰能學、誰難學」的界線。

（二）社區邊界就這樣畫出來了

同樣的狀況也在基金會的兒童活動中再度出現。使用者付費 20 元的制度，在中產視角中象徵「責任培養」，但在弱勢家庭的日常裡，20 元是晚餐是否多一道菜的現實考量，是必須拿來折抵孩子的飢餓、不是用來「培養責任感」的工具。孩子們也用自己的語言說明：若有 20 元，他們更可能選擇網咖，而不是活動教室。當活動收費後，一個原本提供安全與陪伴的空間，就成了需要經濟能力才能跨越的門檻，社區邊界又被重新畫出來。

（三）社區邊界中再生產

值得注意的是，弱勢家庭拒絕收費、或只能帶著孩子參加活動，並不是「不願

意配合制度」，而是下的行動智慧。媽媽們參與研習，是把照顧與學習合併的生活戰術；孩子們願意參加體力活動，是因為那裡有朋友、有安全、有食物、有陪伴，而不是活動本身是否有趣。這些行動不是退縮，而是弱勢者在有限的條件中努力維持家庭、維持關係、保持尊嚴的方式。

因此，的核心並非失能，而是在匱乏中仍努力編織可行生活的能力。而社區邊界的再生產也提醒我們：制度或活動若未能看見弱勢者的現實，就會讓他們即使身在社區，仍然難以進入「被看見、被承認、被包含」的空間。社區工作者的任務，不只是提供服務，而是要看見這些被忽略的位置，理解邊界是如何形成的，並在可能範圍內鬆動邊界，讓弱勢者得以以自己的方式參與、發聲與存在。

以上這些生活片段，帶著孩子參加研習的媽媽、用退休俸換取陪伴的榮民、用每日三餐維持家的視障長者、選擇清晨農場工作的小卡，以及那些因缺乏空間而渴望在一起的孩子，都共同揭示了最深層的事實：弱勢者從不是沒有行動能力，而是在縫隙中以最節省成本、最務實、最能維繫家庭和尊嚴的方式活著。也因此，我們能看得更清楚：弱勢者之所以「看起來退縮」，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向上，而是因為社區中早已存在的看不見邊界；照顧責任、階級預設、語言能力、經濟限制、情緒脆弱性，都一一的限制了他們能跨出去的方向。而這些邊界不是由弱勢者畫出的，而是制度、資源與主流文化共同建構的。當活動規則、學習空間、責任要求未能把弱勢者的生活條件算進來時，排除便再次發生，邊界便再次被強化。

然而，正是在這些邊界的縫隙中，我們也看到了最具韌性的手工知識：小卡以透明化、節奏調配、跨文化溝通維持家庭；榮民以有限的經濟資本換取情感資本與安全資本；媽媽們以集體行動爭取孩子的陪伴與安全；孩子們用友誼與陪伴抵抗孤單與匱乏。這些都是弱勢者在裡所展現的生活治理技術、關係倫理與生存智慧。它們不是制度中的知識，但卻是真實支撐生活的能力。因此，社區工作的任務並非要求弱勢者「更用力向上」，而是：看見他們早已在努力；看見他們行動背後的邏輯與限制；看見邊界如何由制度與文化重複生產；更看見弱勢者之間彼此扶持與縫補生活的力量。唯有如此，社區工作才不會只是「帶領弱勢起飛」的想像，而是能真正與他們同行，在縫隙裡、邊界內，一起把生活撐下去的一種實踐。

第四節 小結

不斷地從做中學到學中看，回頭整理這三十年來的社區工作紀錄，對現在的我來說，最強烈的感受之一是：當年的我其實看得很近，卻看不深；現在的我可以看得更深，但也更清楚自己曾經看不見什麼。在立案前後的牛犁工作、第一代的會議紀錄、與小卡、榮民、媽媽與孩子們的故事，最初都只是我「做事時順手留下來」的紀錄，為了交差、為了記憶、為了知道下一步怎麼安排工作。直到進入博士班，開始系統性閱讀「」、「敘說、對話、協商」、「日常實作」與「手工知識」、「行動研究」、「差異同在」……等的相關理論，這些舊紀錄才慢慢變成我眼中可以被重新閱讀的知識文本。

一、從「工作紀錄」到「知識文本」

二十多年前的我，是一個每天在村子裡跑的實務工作者：早上送餐、下午普查、晚上開會寫計畫；跟夥伴吵架、被家人抱怨、為了經費焦慮、為了服務對象心疼。那時候我所理解的「問題」，大多停留在「事情怎麼做得完」、「夥伴之間怎麼分工」、「活動怎麼辦得起來」。我的視角主要是「實務的維生」：怎麼撐過今天、怎麼顧好大家。

現在再回頭看第一節的工作會議紀錄，我才看懂那個「滾軸式馬不停蹄的軌道」不只是忙碌，而是一整套「成功＝能撐」的隱性規則；我也才看懂第二節裡，自己在勞基法爭議中卡在「資方／上一代的位置」，其實是在用舊有的情感倫理壓住自己與別人；第三節裡那些當年只是「做紀錄」的案例，像小卡、榮民、媽媽與孩子們，原來都蘊含著裡非常精準的生存計算與主體性。

同一批紀錄，當年是「工作證據」，如今成了「社會知識」。差別不在文本，而在我站的位置不一樣了：從只想把事情做好的人，變成試著理解「事情為什麼會這樣發生」的人。

二、閱讀之後

進入博士班之前，我懂的字眼是：「辛苦、撐住、弱勢、可憐、有需要的人」。開始閱讀之後，我慢慢學會用另一套語言來指認同樣的現場：「、教育政治、情感資本、制度語言、看不見的邊界、手工知識。」差別不是變得比較「高級」，而是：

這些概念讓我有能力說出，過去只能用心情感受、卻說不清的那一層東西。

例如，以前我只會說：「這些家庭很辛苦」「這些老人很孤單」「這些媽媽很可憐」。現在我可以說：他們其實在運用「生存戰術」，在結構壓力下做出最穩定、最能承擔的選擇；他們之所以一再被卡在邊界，是因為資源分配、身份肯認與參與規則的門檻從來沒有以他們為出發點設計；他們的「手工知識」，如何安排工作時間、分配退休俸、維持家庭情緒穩定、運用透明化來治理關係，其實都是高度成熟的生活治理技術。

理論沒有取代我的田野，而是讓田野多了一層被看見的可能。當我用、教育政治的語言再看一次自己的社區工作，我不只是替別人詮釋，而是也在詮釋過去的自己。

三、在破裂中把「我們」織回來

本章從一個看似簡單、其實很刺痛的提問出發：所謂「成功」，究竟是把我們推離彼此、推進更可被管理的秩序；還是讓人重新靠近、讓關係有機會被撐住？我在重讀「貧窮文化」與「庶民視角」的提醒後，更能辨識：弱勢／邊緣之所以常被寫成「問題—解方」，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只剩問題，而是治理語言太快、太想把生活收成可交付的成果。於是，本章選擇把衝突、爆炸、委屈與卡住寫進來——因為只有把破裂寫進故事，修補才有被看見、被討論的可能；也才能在政策、制度與學術語言裡，替那些總被擠到邊緣的人，多留一個位置，而不是替他們貼上新的標籤。

第一節回到第一代的行動模式，我看見「成功＝能撐」如何在高壓、多線、無縫接軌的工作裡變成隱性規則：越能者越多做，越多做越孤單；而所謂失敗也常被誤認為個人不足，讓羞愧與沉默取代了對結構的辨識。第二節把世代交會放進來，讓「像家一樣」的情感倫理，與「權益／保障」的制度語言正面碰撞；我逐漸理解，這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情感資本到了極限、組織必須轉骨：從少數人犧牲補位，走向可協商、可承擔、可持續的「一起工作」。在這裡，「勞基法」不只是規範，更是一種把人重新算進來的方式；而真正困難的，是如何在制度框架裡仍保有溫度，讓權益成為關係的底板，而不是把我們推回資方／勞方的對立。

第三節把視野拉回社區生活世界：新住民、高齡者、母親與孩子身上那些「看不見的邊界」——語言、資源、照顧責任、參與門檻——如何讓人身在同一個社區，

卻總被擋在「被看見、被承認、被包含」之外。小卡與兩位榮民的故事提醒我：所謂盤算、退縮、選擇「看起來沒那麼好」的工作，往往不是性格缺陷，而是被迫形成的生存戰術；在缺乏制度支撐的地方，人仍以手工式的方式調節時間、情緒與關係，做出「家庭能承受」的選擇，並在縫隙裡維持尊嚴。第四節則把這些片段重新編排成一條視角轉換的路：我從「把事情做完」的人，慢慢變成「願意承認自己也被現場教導」的人；從想用知識解決問題，轉向更誠實地面對——知識能處理的是問題，但關係需要的是願意再靠近一次、再調整一次、再縫補一次的倫理。

因此，本章所說的「行動與韌性」，不是永不破裂的英雄敘事，而是一種在破裂後仍願意織回「我們」的能力：把成敗放回關係與結構中理解，把權益放回可持續的共事裡協商，把弱勢放回其主體性的生活理路中看見。當我願意放慢一點、拆細一點、留餘地一點，行動就不再只是完成工項，而是一次次把人留下來、把關係撐下去的練習——這也正是我想守住的社區工作倫理。





第六章 調整中的社區路徑——家園經濟

我並不是走在一條早已想清楚的路上，而是在行動中，一邊承受、一邊調整。許多時刻，我必須不斷停下來回看：我們究竟是如何一路走到這裡的？這樣的回看，並不是為了替行動下結論，而是為了理解，在一次次具體事件中，行動是如何被推動、被修正，又如何現實的限制中逐漸成形。

在這裡我嘗試從幾段實際的行動經驗出發，觀察行動者如何身處於關係、制度與災難交錯的現場之中，慢慢長出一種方向感。這種方向感並非來自預先設定的模式，也不是清楚可見的答案，而是一種在行動過程中逐步浮現、得以繼續走下去的可能。

同時，我也試圖理解：行動者並非憑空出現，而是在被撐住的條件下生成。正是因為曾經被關係接住、被制度縫隙暫時允許，行動才得以展開；也正是在一次次事件、衝突與失序的情境中，行動者逐漸學會回應、調整與承擔。這條路從來不是預先規劃好的，而是在行動中不斷修正、在關係中持續學習的過程。

第一節 「後台建設」：從被撐住到撐住他人

在不斷書寫中，我逐漸意識到，一個行動者的生成，並非來自個人道德意志的提升，也不是因為「足夠善良」或「足夠努力」，而是來自一條更為隱微、卻更為關鍵的路徑，後台如何被建構，進而生產出行動的倫理。

2025 年夏天，我與慧絢在回豐田的車程中，有過一段長達四十分鐘的對話。那並非正式訪談，而是一段在行動之後、在疲憊與反思之間自然展開的回饋。慧絢以她長期在不同場域中的觀察，點出了我自己長時間未能清楚命名的狀態，她讓我看見，我所投入的「後台建設」，其實是在當下制度匱乏的條件下，被暫時允許出來的一種狀態。

在這個意義上，倫理並不是個人修為的結果，而是一種需要被制度條件允許出來的狀態。當基本的生存風險被承接、當人不再被迫在恐懼中行動，倫理才有可能轉化為對他人的關照，並逐漸走向公共性的實踐。這樣的理解，也重新定位了行動者的生成，它不是英雄式的出現，而是在後台被撐住之後，才慢慢浮現的可能。

慧絢的回饋之所以直擊我的痛苦，正是因為她將問題拉回到一個我長年反覆

面對、卻難以言說的命題：「這個世界，到底有沒有讓人好好地活著？」回望我為何選擇進入社區工作，為何長時間停留在看似緩慢、瑣碎、無法量化的陪伴之中，其實都與這個命題緊密相關。社區並非只是工作的場域，而是我試圖回應這個問題的方式之一，透過創造一個暫時不那麼殘酷的空間，讓人有機會先站穩，再談行動。

在這個意義上，倫理並不是個人修為的結果，而是一種需要被制度條件允許出來的狀態。當基本的生存風險被承接、當人不再被迫在恐懼中行動，倫理才有可能轉化為對他人的關照，並逐漸走向公共性的實踐。這樣的理解，也重新定位了行動者的生成，它不是英雄式的出現，而是在後台被撐住之後，才慢慢浮現的可能。

一、行動生成的軌跡

慧絢指出，我長期在處理的，不只是自己的物質生存條件，更是在形構一種集體可以存續的勞動條件。這份處理，並非單純的資源調配，而是一種關係設計。指我在意的不只是自己「能不能活下去」，而是身邊一起工作的人「能不能一起活得下去」。當下我有一種被理解的眼淚想要掉下來（「想要一起活得下去」，是需要調度許多不同內外部的資源，就像雪霞想讓中文班持續穩定上課的道理一樣的複雜）。

以雪霞為例，她不只是「協會的成員」或「穩定的工作者」，而是一個在穩定後台支持下，逐漸長出行動能力的實踐者。慧絢明確指出，這種穩定條件讓雪霞不必在每一件事情都斤斤計較工時、金額、對價關係，進而得以將心力投注於社區姐妹的陪伴與培力工作上。這份條件，來自牛犁為她穩定設計的月薪機制、任務邊界、情緒承接，讓她不被臨時雇用邏輯牽著走。

慧絢讓我理解當一個人不用為了生存焦慮，她才可能長出倫理。雪霞不是「天生物欲低、無私奉獻」的人，而是在這份後台中，逐漸培養出一種不急功、不盤算的專注氣質。這份「大姐的高度」，不是個性養成，而是條件所塑。

慧絢的觀察其實是提醒：制度條件，形塑行動倫理。這意味著，若無穩定後台，任何照顧工作都會被裂解為案子與工時，被吞沒在日常碎裂的拼貼與奔波中，無法專注，也無法陪伴，更無法產生公共性。在現今許多姐妹的工作現場，我們看到的是「來者不拒、案案不推」的疲憊工作者，一早上備餐、中午講課、下午開會、晚上再出席一場說明會，所有人都在「不能辜負」、「不能說不」的倫理中耗盡自己。最終，沒有人能真正完成一件事，也無法真正陪伴任何人。

這樣的安排不只是管理上的手段，而是一種政治。它重新定義了我們怎麼看待「協會」的性質：不是公司，也不是政府部門，而是人民的共作組織。這個組織中，我不是老闆，她不是員工，而是彼此協力、共謀生存的夥伴。我們並不靠績效獎金來激勵人，也不靠責任分工來壓迫人，而是透過「讓人可以穩定生活」的條件安排，來支持每個人各自的陪伴位置。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雪霞不是我「帶出來的成果」，她是我們一起「活出來的同伴」。這份成長來自她的選擇、她的投入，也來自我們願意為她撐出的條件。慧絢提醒我，要看到這份照顧背後的物質性與制度性，而不只是情感或靈性的連結。

這樣的關係，不只是個人之間的感情，而是社區組織能否真正成立為「人民共謀生存的場域」的關鍵基礎。照顧者的勞動價值被低估、被剝削，也無法累積社會資本。因此我們的照顧政治是要讓照顧的價值被看見、被計算、被承認。後台建設，是照顧政治的地基，這一點，也許是我們在談社區工作時，最容易忽略、卻最需要深耕的部分。

二、匱乏中形成的生存邏輯

這是在 20220126 對雪霞的訪談。雪霞說：

1995 年剛來台灣時，我只有十七歲（證件十八歲），婆婆雖然有拜拜的習慣、身體健康，卻大多不在家，我其實是長時間獨自面對一個安靜無聲的家。因為語言不通、對鄰居陌生、也不知道去哪裡找同鄉，儘管花蓮有許多新住民，我卻感覺沒有朋友，也沒有可去之處。

夫家不讓我出去工作，認為「出去會學壞」，尤其因丈夫是喑啞者，更讓婆婆擔心不安全，加上害怕基因遺傳，因此也不願讓我生小孩。但是我堅持想要孩子，因為從小帶弟妹已習慣照顧，也相信丈夫的狀況不是遺傳問題。而且我還怕太安靜的家，希望有孩子可以有聲音的機會，而且我也喜歡孩子，所以第一胎後意外懷上第二胎，便不再生育。

那時候其實不喜歡外面的人，就是因為對這臺灣人沒有很好的印象，從相親開始就沒有好印象，因為我覺得臺灣人很容易，到了國外之後就把自己當大爺，

然後把相親的對象當作物品來選擇，這個是很很討厭的一件事情。後來婆婆年紀漸大，我開始代替婆婆出席村莊的婚喪喜慶，幫忙備料、煮菜、端菜。語言不熟，但婆媽們會介紹「這是某某人的媳婦」，讓我逐漸被看見，也在村落裡慢慢建立起與婆婆媽媽的關係。然而那段時間，我依然沒有真正的朋友，只是在地方的日常互動中默默被接住。

（一）第一個行動位置：雪霞的學習作為生存策略

對雪霞而言，學習從來不是向上流動的象徵，而是一種避免身分羞辱向下一路滑落的防衛性行動；她是在為孩子，也是在為自己，先站穩一個不被看不起的位置。

雪霞說：

後來去豐裡國小念補校 2004 年，讀書之後就碰到很多同鄉了，那時候我兒子 6 歲了，臺灣算第 8 年了才去學校應該就對呀，我們這樣蠻晚的，我就正式跟兒子一起去豐裡國小一年級，兒子白天上課、我是晚上上課。原來這個村莊那麼多新住民，那時候一個教室 50 幾個人欸，超多的，可是你知道嗎。我去讀書的真正原因，是害怕孩子因為「媽媽是新住民、爸爸是喑啞人士」而被瞧不起，因此我堅持一定要把中文學好，不讓自己的身分成為孩子未來被看輕的地方。所以我很努力學習，從那時候開始，同鄉對我就有一點排擠，我也排斥他們，我就覺得我沒有想要跟同鄉交朋友。那學習一直都是我最大的心願，那就是抱持著說我不想被人家看不起。

我一直都很內向，我現在應該也是。但是工作的時候就不會，可是其實我回到家是非常宅，你可以問我老公我很宅（第二任目前住在一起，只差證書的老公）。從近期協會工作之後，因為從學會工作慢慢的你要接觸的人。很多，其實我早期不會這樣一連串的講話，因為協會的工作，所以我必須要變得很會講話。然後要很親切的跟別人打招呼，跟別人互動。可是其實你會發現，其實我是安靜的。嗯，我沒有很喜歡跟別人說：好久不見，這種噓寒問暖，其實對我來說很彆扭，哎，我真的做起來，有時候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假。

說到牛犁，我到底何時跟牛犁有關係的，應該是 2000 年協會都還沒成立，那時候雅帆姐開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訪視。我就是被訪視的對象，因為是新住民嘛，他就會告訴你，因為我們協會後開了什麼樣的課，你要不要來參加，我就參加那個軟陶製作啊，還有那個檳榔娃娃，那一些全部都是我做的，那我學會了以後呢，雅帆姐就說要不你在家裡加工做好這些東西，批給協會，協會就拿去文史館賣，雅帆姐就一個多少錢跟我收這樣。那時候就是做這樣的一個最簡單的手工，賺點零用錢。偶爾他們就很多小學的戶外教學團來 DIY，他就會叫我出來當講師。我記得那時候一個小時 80 塊，然後有時候也沒有錢的，可是其實也無妨，反正就出來，然後就帶課程、帶小孩。剛開始當然很挫啊，很怕啊，可是就是多次以後，其實它就變成習慣了，而且小孩子是很好帶的。我只要把那個製作軟陶的順序講完就沒事了，我是不用做社區導覽。

（二）牛犁後台如何形塑雪霞的行動倫理

對雪霞而言，在牛犁的工作並非一條職涯發展路徑，而是一段將「被陪伴的經驗」轉化為「陪伴他人的制度設計」的過程；她所做的，不只是新住民工作，而是試圖在制度匱乏中，撐出一個允許人慢慢長出來的空間。

1. 從邊緣勞動到被承接的工作位置

雪霞說：

後來 2008 雅帆姊又問我要不要當文史館當顧館人員，負責打掃、清點架上的東西、擦拭展示、整理空間。館裡有舊照片展示，我也會向遊客解說，講豐田的老故事。那時顧館的工資是一小時 100 元，一天從下午 1:30 到 4:30，，就這樣一段時間顧好這這份工作，我一直做到我離婚。

然後 2013 年就變成正職的員工，就是我結束了我的婚姻生活之後，我就正式加入協會，那時候就是新住民組。那時候我印象深刻，我的組長她就是丟了一本新住民學習中心的核銷給我。他給我很多單據，跟我講說去用這些東西做出這樣的東西，天啊，這什麼東西？我就從核銷開始做。表格，他就跟我說，哎在哪裡自己去找。找到表格要對應去做，就這樣我就這樣開始去做做做。

早期牛犁還是才剛起步，連訪視都是手寫，牛犁的工作夥伴多是中年婦女。中年婦女，是不會電腦的，他們只會手寫，所以我印象中是那時候的方式全部是手寫，沒有所謂的系統登錄這件事情。

大多的單據全部都是用手寫居多，包含那時候他叫我訪視我回來，全部都是用手寫。我加入的第3年嘛，他開始架設了那個新住民的那個訪視系統，後來就是凡萱跟富民這一批人年輕人進來，所有一切才會變得更有系統化。那時候我是做新住民的相關的業務，我知道的嘛，一個是新住民學習中心，一個是民政處的生活適應班，然後另外一個是他們申請了聯勸的那個，可是它不算，它就是給了人事費，然後生活適應，那時候還有考照班考照。

應該是我入協會兩三年以後的事情了，那時候我就跟雅帆姐講說，因為當初他們對我的培訓，我覺得可以複製到更多的人身上。因為他也不像一個培訓，比較像一個陪伴。想當初因為我的婆婆不想讓我出去工作，可是孩子大了，只好在婆婆午睡跟拜佛時間去工作，就是13:00到16:30的顧館工作。雅帆姊看到我一些困境，然後給了我這樣的一個方便，又讓我自己有一點收入，那時候就是她很願意去陪伴。

2. 從被陪伴者，成為陪伴模式的設計者

對雪霞而言，在牛犁的工作並非一條職涯發展路徑，而是一段將「被陪伴的經驗」轉化為「陪伴他人的制度設計」的過程；她所做的，不只是新住民工作，而是試圖在制度匱乏中，撐出一個允許人慢慢長出來的空間。

雪霞說：

進了協會也是一樣啊，那時候我一個半天只能打一行字的人，他也無所謂啊。然後就說，沒關係啊，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陪伴很適用在新住民們身上，其實是很有用的，而且是真的在陪伴這樣子。

可是這樣要很多的時間也要給我們薪水的，因為你是讓一個人在那沒有效率的工作。我是這麼覺得啦。之後很多在新住民的工作，我就會比較套入這樣的一個模式進去，我會想想，我當初的一些困境怎麼運用在現在的新住民身上。

也因為這樣我就後來就會計較、會堅持我們中文班要開，我也會堅持中文班是漸進式的課程。這個當初我覺得是對我來說是有用的。嗯啊，那每年因為經費結束而沒有開課或者每年都重來一次，其實都是為了把經費消耗，它是不對的，對新住民本身其實沒有幫助的，所以我那時候才會跟雅帆姐討論說，我想要一個漸進式的，而且是長年、常態開的課程就是比較類似學校的模式。可是因為這樣的代價就是我光要寫一個中文班，我就寫了 3 個地方的計劃。要一直寫計畫，然後不停的核銷，因為要湊滿湊足了那個經費。

那辦了以後，慢慢發現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姐妹來了，有孩子在現場也會很吵，我又開始再次寫另外一個陪伴計畫，讓這群孩子有個人照顧他，所以我就會多寫一點計畫，然後讓這件事情可以被解決。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要存在的啦。我也看到說，哎，我真的這樣做。愛婷、露媚、秋豔這一群人，他也因為我這樣子做，他們現在可以去讀國中，所以我覺得我的努力是有會有看得到的，我覺得我很願意這樣努力了，甚至秋豔現是在空大念書。

3. 一段行動中的自我質詢

如果只是「現在好一點」，那老了怎麼辦？如果只是「文化被看見」，那人真的被接住了嗎？，學霞不斷的在行動中看見：我們以為在打破刻板印象，會不會其實只是換了一種刻板印象？新住民被永遠放在「新」的位置，永遠只被期待給出故事，卻沒有看見保障、制度跟未來，雪霞開始要求「雙向性」，不是只有給出，也要能累積。

我看見的是雪霞與我都是，一個真正從貧窮中走過來的人，開始拒絕只做「讓人感動的事」，而選擇去問那些沒有人想問、卻決定一生走向的問題：我們到底有沒有為彼此準備未來。

雪霞說：

其實以前我們我還沒結婚的時候，其實生活非常的辛苦。活到就是你無法想像就是你可能明天要吃的餐在哪裡都不知道，這樣的一個生活，小時候就會一直想要逃離的家庭。就覺得那個家庭這樣生活下去以後怎麼辦？這樣然後來到臺灣之後，其實我是還蠻知足快樂的，因為我覺得這一切，都比以前好太多了，

然後其實我也覺得人嘛，只有是我身體健康好手好腳的，我永遠會比以前好，我這麼覺得，所以其實還好啦。

那新住民的一塊，應該是說我從中文跟陪伴一路走到現在的話有比較不一樣，是因為新住民現在已經有自己的意識了，然後有自己想要做事情了。你說新住民本身對新住民本身，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就是我會覺得說，就像早期的我可能就是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知道，可是現在的我可以去帶別人的能力，所以其實你會發現新住民其實他是有能力，而且這個能力是可以被栽培，甚至他可以當一個領導的能力者。

所以我身邊裡面有三種人，有一種人；安穩的過現在的生活靠勞力賺錢，那另外一種人；就是我很想要做些什麼，可是就是能力尚不足，最後一種人；就是他這一切都有，可是他缺少了那個陪伴。只是很多東西還是不懂，可是他是願意學習的陪伴這樣。那你看到其實這些都不一樣，那可是現在的很多的政府單位公部門，他們給的東西都是一樣，而且是而且還是以前的樣子。嗯，他沒有看見了這個新住民的這些變化已經不一樣了，不能一直用這樣的方式，所以在我們中心裡面，在我的計劃裡面，很多都會有微調，因為這時候很多的陪伴跟給予的舞臺很重要。

應該是 2019 年前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嗯，可是今年我忽然覺得會不會因為我太關注這一塊，然後因為現在新住民，大多都是會去分享自己的文化。應該是 3、4 年前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嗯，可是今年我忽然覺得會不會因為我太關注這一塊，然後因為現在新住民，大多都是會去分享自己的文化。

我突然覺得會不會我們原本是要帶領一群臺灣人，脫離對新住民的刻板印象，可是我又覺得說，在我們的分享過程中，我又把這一群人帶到另外一種刻板印象。我很擔心說，比如說，我們不想讓他看不起我們，所以我們就會講了很多東西跟他們做一個分享，可是會不會這一群人之後，他就開始想我原來新住民就是怎樣、怎樣，就是另外一種的刻板印象。

會不會延伸以後就是另外一種刻板印象進來，然後新住民本身我就開始想他如果一直去到各個地方講自己文化的同時，對這個新住民的未來，他到底有沒有一個叫做幫助存在？如果像這個文化走到一個盡頭，比如說任何人說我自己好了，如果我是一直推新住民這一塊啊，推文化這一塊，如果他走到盡頭，會是什麼樣子？如果說臺灣人都好，他都了解了，他都知道，難道刻板印象就不在了嘛？然後就算好，就算大家真的都不在了，那我在這裡，我個人到底得到什麼？我只有講我家鄉的事，然後之後呢，我得到什麼？這是我擔心的，就是新住民本身我又回過來，我會想說我是不是應該要對新住民做一些要求，他必須融入臺灣。而不是只有把自己的東西分享出去給別人。

我開始去反思這件事情，我相對就要求我的一幫姐妹，在很多分享的時候，我就會想要引導他們去看見他們的未來，你給他們分享他們東西，可是你看你把你的文化分享給臺灣人。其實臺灣人對臺灣的文化是根深蒂固的，頂多是多了另外一個不一樣的認知。可是對新住民而言，在臺灣是你未來的生活的地方。嗯，你這半後半輩子都在這裡，甚至連死亡也在臺灣，那當你一直在講自己文化的時候，那你自己得到什麼，那你對你後半輩子在臺灣有什麼樣的幫助？所以我會覺得說，會不會你一直分享之後，結果你自己卻沒有任何收穫，那你的為自己的未來？怎麼辦這樣？

所以我開始跟他們跟姐妹她們做一個分享，你們不能只有給。那你們收到什麼東西？我現在開始讓他們在執行課程時候，我就跟他們講你們得到什麼？我現在開始讓他們去想你透過這樣，你們得到什麼？可是我發現，即使這群人是我帶的，他們得到的東西還是很新，新住民的東西就怎麼說呢，他沒有說在這個文化交流當中，或者在這堂課中，在對臺灣的那種認知更熟悉，他沒有把他放在心裡，因為他還是想要握住他自己擁有的東西。就有點像新住民，一直都是新住民，以後還是新住民。就是他把東西推出去了，但是他還是在。這是我開始擔心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這一群人很棒，可是如何讓這一群人更有另外一種的不一樣的成長。這應該是我在思考的問題，只是說很多時候這種東西就是你要不斷的去跟別人

做一個分享跟討論，可是其實跟新住民之間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一個討論，因為他們聽不懂我說什麼。

其實有時候我也在想，嗯，我要怎麼表達這樣的一件事，讓人家聽得懂，我要表達什麼，我就是不要讓他們一直是告訴我，任何人還是自我自己的認定，我就是新住民，然後永遠都是新住民，可是你沒有想想你的未來，你是臺灣人，你當然你的文化分享，那臺灣都交流，他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也不用忘記了你，你自己終究生活在臺灣。那你之後我相信你慢慢的應該也會把家鄉放一邊吧，當你父母不在了，還是會因為空間的問題，只會有隔閡距離的。啊，你在這裡，你的孩子在這裡，你的朋友以後也在這裡，你總是要問你的，以後做一個打算在這裡如何讓自己真正融入，然後成為臺灣人，不要等你老死了，人家還說你是新住民。那我又開始想，臺灣人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三、身份認同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新住民願不願意成為台灣人，而是台灣社會從未提供一個位置，讓他們能夠說出「我是來自印尼的台灣人」。雪霞提出：我的認同從來不是問題，是社會不問、也不在乎，尤其來自南島語系的新住民。這是一種誰值得被問、誰不值得被問的權力結構差異。

（一）被消音的認同

雪霞說：

其實我不會去討厭我新住民的身份，我對我身份的認定，其實我沒有很很 care 任何一個說詞。他只不過是對我來說是個名詞。應該是這麼說吧，不會有人在乎他們是不是真的認同臺灣這件事情。想想看囉，在你周遭的新住民們到底有沒有臺灣人去問過他？他說，你會覺得臺灣是你的家鄉嗎？或者說你會認同臺灣嗎？

我在想啊，很少有臺灣人會去問你一個新住民這樣的一個問題，不是不問，是不問南島語系的新住民這件事情。臺灣人有一個對我覺得就是從以前，其實他

會覺得歐美跟東南亞是兩回事，得到歐美的肯定，以及得到東南亞的肯定，是兩回事。

我可以去問歐美這些人，你有沒有喜歡臺灣？連美國人都喜歡臺灣了，你東南亞有什麼好稀奇的，你們不是靠臺灣賺錢的嘛賺到錢嗎？所以這兩者來自于哪裡？來自于臺灣的人給他們的感覺跟定義。你認同臺灣嗎？不會有人對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我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新住民願不願意成為台灣人」，而是台灣社會從未提供一個位置，讓他們能夠說出「我是來自印尼的台灣人」。

（二）成為「我們」：放在關係與承接裡

從雪霞並不抗拒「新住民」這個身分，真正的問題在於，台灣社會極少為東南亞新住民提供一個可以被詢問、被承認、也能被回應的認同位置；她的成為，並非來自身分轉換，而是來自一個允許她留下來、慢慢長成的空間。認同協會作為第二個家，雪霞讓我再次知道，只有當一個人被承認、被培力、被留下來，她才會開始對這個地方負責。

雪霞說：

我如果沒有進協會，我就不會做這份工作，我不會做這份工作，我就不會有這些看見。對這些看見是因為從自己身上，開始去想像的。應該是說的成長都在協會，說實話，嗯，牛犁感覺像我第二個家，因為我嫁來之後，除了原本的家庭之外就是結婚，那後來就是一直在協會。他比較感覺比較像是我第二個家，所以我很多東西很多重心也會放在協會，所以我有時候會對同事之間有一點機歪的要求，就是我會覺得說我會視它為我的一部分，所以我比較會有一些要求，就比如說髒亂好了，我會覺得我看不下去，我就會覺得是另外一個家庭的感覺。

甚至從我什麼都不會，從我不會開機，從不會用電腦到我會打字、會寫計畫書、寫成果報告，然後到從我不會說話到會說話，不會交際變成會交際。然後 20 年從沒有學歷到有學歷，因為我的學歷是協會協助我完成。對除了烹飪以外不是。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協會好像就是第二個媽媽，讓我在臺灣。重生，然後

重新學習。我應該說今天所有的一切應該都是從協會來的。應該可以這麼說。所以我會很討厭協會夥伴們如果真的是沒有好好在協會，我覺得我會因為我認為他是家的一部分。應該就是我剛剛講的，其實我從什麼都不會，從什麼都沒有開始。20 年就過去了，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做這麼久。

（三）雪霞行動視角的轉換點

當雪霞意識到台灣的高齡政策是用「族群分類」來處理照顧時，她第一個直覺反應其實很銳利：「難道我要來一個印尼站、越南站、泰國站？」，清楚雪霞不是反對照顧，而是反對這樣的邏輯，永遠用他者來看我們，就像南香²⁸事件，不是去爭取被納入政府服務資源的制度中，而是應該發展我們自己的關係與照顧的網絡。雪霞不同災難後，做的不是「救援」，而是視角的轉換。

雪霞說：

在玉里有一個很老的新住民，60、70 幾歲，她坐輪椅，他還是只會講印尼話耶。就很妙的一件事，而且他一個人生活欸。那我就覺得說，那我難道我們以後也變成那樣嗎？那他之後那老了，自己也不懂什麼都不懂，然後他永遠就是一個新住民？

雪霞開始意識到台灣的老化政策中，在台灣健康與亞健康老人有社區照顧據點服務²⁹，又擔心不同文化下的老人無法有適切的照顧，因此農民有綠色照顧站³⁰、原住民有文化健康站³¹、客家人有伯公站³²等的服務進場。那新住民？這就很好笑了，雪霞接著說：難道我也要來一個印尼、越南、泰國...的文化照顧站？雪霞並沒有再提起這樣的話題，但是開始關心新住民在台灣要如何老化的議題。

在第四章〈再行動：在南香事件中的共學與鬆動〉提到 2022 年的南香事件，也讓我跟雪霞理解到不是去爭取被納入政府服務資源的制度中，而是應該發展我

²⁸ 化名，新住民姊妹，社區居民。

²⁹ 衛福部社區照顧據點服務 <https://ccare.sfaa.gov.tw/home/community-point>

³⁰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農村社區綠色照顧計畫
https://www.ardswc.gov.tw/Home/News/news_more?id=ee42fb3ca6d04556812471d199b14837&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³¹ 長照 2.0—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推動情形
<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7a34f5fa-1ad7-4a4b-96a8-7b69aba5bcd>

³² 客家委員會伯公照護站 <https://www.hakka.gov.tw/chhakka/app/folder/91>

們自己的關係與照顧的網絡，因此 2024 年 0403 花蓮大地震對東華大學造成嚴重衝擊，其中最主要災情是理工一館 D 棟因實驗室化學品掉落起火，延燒 20 多小時，導致整棟建築全毀。

對國際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無法回家，圖書館和學生宿舍也受損，造成近 1700 床位受影響，台灣的學生均紛紛回家，而國際生卻是無路可去、加上豐田的家庭移工們也無災害意識，雪霞透過廉兮開始將關懷的視角打開，台灣的新住民是否有可能成為家鄉姊妹的娘家氛圍，而能進一步作些甚麼……埋下種子。

後來透過廉兮的引線下，進行了兩場的用飲食文化來交流，促進彼此情活動。在整個過程中雪霞也累積了對用飲食當文化來互動，更往深層去看見未來行動的可能。

雪霞在 2025 年初在豐田地區開啟家庭移工的協助，透過中文班讓移工進來與新住民姊妹一起學習(雖然不符合計畫規定)，隔年 2025 年我們的移工們紛紛知道我們有開中文課程，越來越多的移工加入，雪霞找我商量要另外開一門課程時，曾經討論應該要向他們的雇主收取費用，可是又擔心雇主好不容易願意讓移工晚上來上課，會不會因為要收費，而不讓移工來上課。所以討論完就先用牛犁經費支撐，並邀請越南姊妹進駐幫忙，也感謝廉兮的學生王又甯³³及田嘉慧來幫忙帶課程。從註腳 25 中又甯的說明中，又看見，一個行動的前進，是這麼多人在推著、撐著與連結，更顯示關係（情份）的重要性。

雪霞的做為也同時讓我看見：如果規則會讓人失去學習的機會，那就先撐住人。其實我如慧絢所說的，一個行動者在經歷貧窮、學習、制度邊界與災害之後，逐漸放棄「被納入」作為唯一想像，轉而用關係、陪伴，嘗試為未來撐出一條尚未被命名的照顧路徑。

四、在洪水之中撐住彼此：制度啟動前的行動能力

³³ 又甯 12/16 來訊息：「姊姊：中文班的部分：我想補充一下我的視角的脈絡。上學期末，在行動研究課程期末報告後。廉兮老師提醒我：參與過牛犁的幾場活動後，是斷掉了還是有持續。打了電話給雅帆姊，想要有機會多接觸新住民姊妹，然後轉由雪霞接住就，說牛犁有中文班要拆兩班，我很想承擔下來，可是我知道自己目前還沒辦法。而那時，大呆」田佳慧剛好已經有經濟壓力，所以我就找了有在小學教書經驗的大呆一起工作。雪霞姊姊有跟我說，希望補充這個脈絡是因為：我覺得不是「我答應幫忙」。而是 你和雪霞給了我機會，但不是用旁觀的方式。而是進入一種互相支持的關係。——然後也因為移工中文班，大呆整個人的情況開始慢慢好轉，也開始參與進手工知識合作社」。

雪霞在長期與新住民與移工的互動中，逐漸形成一個緊密而低調的關係網絡³⁴。這些關係並非建立在制度分工或正式角色之上，而是在日常陪伴、彼此照應與長時間信任累積中慢慢生成。這張網絡，也在災難來臨時，成為最先被啟動的行動力量。例如：透過網路訊息，才發現移工家屬正在四處尋找女兒。大家動用印尼姊妹的人脈，一個找一個，才終於確認這一為移工的下落。

2025 年 9 月 23 日，強颱樺加沙重創花蓮。馬太鞍溪上游形成堰塞湖，潰堤溢流後沖斷馬太鞍溪橋，夾帶大量淤泥與樹幹的洪水，以重力加速度直衝光復鄉，下游聚落災情慘重。面對突如其來的災變，雪霞迅速號召新住民姊妹前往光復支援救災。而美君(新住民姊妹)提出，希望能先到光復幼兒園。她說，有一位印尼移工的家人已經四天找不到人，昨晚才終於確認她被安置在收留中心，希望我們能去看看，讓這位移工至少能與家人報個平安。

當我們見到這位印尼移工時，她先是禮貌地向我們打招呼，隨即急著撥打電話。電話一接通，她情緒瞬間潰堤，忍不住大哭，斷斷續續地向家人訴說自己經歷的一切：

美君³⁵轉述：

她當時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有颱風，只知道外面一直下雨。突然間，一聲巨響傳來，屋內開始淹水。她想帶著照顧的阿嬤往二樓逃，但阿嬤無法上樓，只好把阿嬤安置在沙發上。水勢迅速升高，她只能緊緊抓住沙發，不讓阿嬤被沖走。後來沙發竟然浮了起來，兩人就這樣在水中漂浮。只要聽到外面有聲音，她就不斷大喊：「救救阿嬤！救救阿嬤！」整整撐了 11 個小時，直到救難隊發現她們，才被順利救出，送到收容所。

對有些人來說，災難最大的風險不是水，而是沒有人知道你在哪裡。這位移工來台灣才兩個多月，人生地不熟，語言仍在學習中。洪水一夕之間奪走了她的手機、居留證與所有重要物品。她想聯繫家人，卻不知道該怎麼打電話；在災難中，她唯一能依靠的，只剩下她所照顧的阿嬤。

³⁴ 這裡面也有慧絢或不同社群都在支持的姊妹群體，讓事件來臨時，不同群體可以即時互聯及行動。

³⁵ 印尼姊妹：長期協助新住民及移工的翻譯

牛犁的凡萱擔心我們離開後：「她是否又會再次陷入孤立與緊張？」於是，我們做了一個極其單純、卻極其重要的決定：先讓她有一支手機。美君姐也細心地為她辦好預付卡，並親手寫了一封信。信中除了安撫與叮嚀，還放了一隻安撫娃娃，以及幾樣家鄉的糖果與餅乾，希望能帶給她一點熟悉的味道與安心感。信裡也留下了聯絡方式，讓她在需要時知道，有人可以找。

後續雪霞開始與新住民姊妹們，用他們的網絡連結更多人加入關懷小組，用家鄉食物讓大家一起來吃飯，讓這一段餘災不斷的日子中，可以聚在一起吃家鄉味道、用家鄉話聊天，讓每一個人邊吃邊分享當晚的處境。

移工姊妹說：「我人在二樓，水在腳下，是看不到一樓的……」另一個姊妹說：「跟你們吃飯是對我最大的幫忙了……（邊說邊眼眶紅）」還有一個姊妹帶大家去看她家：「這就是我說的空空的呀，真的甚麼都沒有了……」一位移工則邊說邊掉淚：「我沒辦法說……」另一位移工則接下去說：「水都淹到脖子了，水來得太快了，雖然有警報，但是水已經到胸部高了、我跑走了阿嬤怎麼辦、甚麼都沒有了、也沒有訊號，聯絡不上任何人、只好一切交給上天……」大家七嘴八舌地說。其中一位移工說：「阿嬤跟我說：你死在這邊也沒關係。但是我不想，我要死也要回印尼……」

這一連串看似零碎、反覆、難以收束的敘述，並非用來證明災情的嚴重程度，而是一種尚未被整理的創傷語言。在洪水退去之後，恐懼、無力、失序與尚未被說出口的經驗，仍然停留在身體與關係之中。面對這樣的處境，雪霞與美君、愛婷等新住民姊妹們，其實同樣感到無力。她們並沒有足以「處理」創傷的專業工具，也無法為災後帶來立即的解方。在這樣的限制之中，她們所做出的選擇，並非來自計畫設計，而是一種源自日常生活經驗的判斷：先讓人坐下來，一起吃一頓飯。

食物在此並非文化展示的媒介，而是一種最基本、也最不需要語言的關懷方式。情緒得以暫時安放，創傷不必立刻被說清楚，但至少能被承接。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並非「解決了什麼」，而是確認彼此仍然在場、能夠被找到，也不是孤單一人。

從這場災後行動中，我所看見的，是一張長期在日常中被編織的關係網絡，在洪水來臨時成為最先啟動、也最能撐住人的行動基礎。這張網絡在災難之中實際承擔了連結、翻譯、陪伴與暫時治理的功能。它不以效率或成果作為評量標準，而是以「有人在、能夠互相撐住」作為行動的核心。在制度尚未能完全接住、也來不及回應的時刻，這樣的關係行動，成為一種低調卻關鍵的社會支撐形式。

第二節 從承擔到共生：一段不再孤立的生命敘事

這不是在描述鈞弼撐不住的故事，而是一個讓人只能用「撐住的結構」被看見的過程，「承擔」不再只是值得讚美的美德，而是當缺乏分攤時，會轉化為內耗的做事方式。這樣的理解不是為了解決，而是為了彼此的陪伴。更不是要求犧牲，而是想辦法讓每個人都有位置的共同生活方式。

鈞弼是 1960 年出生在花蓮，1986 與雅帆結婚，育有四個孩子。為什麼有這個訪談（20251211），是透過前一天與廉兮、陳光興、王又甯（廉兮博班學生）三個人在談精神病的議題，鈞弼也在現場。我邀請鈞弼分享一下，兩位老師對又甯說的內容有何想法，結果鈞弼分享了一些他的看法，才会有隔天 12/11 的訪談，再加上我的論文已經要寫到最後章節了，擔任口考委員的慧綯，從學期的課程中到每一次的口考，都會關注鈞弼都沒現身，可是我也不知道鈞弼該如何現身才自然，用何種議題才是適當的。透過這難得的契機，我跟鈞弼就這樣自然的訪談了。以下是鈞弼談他自己「生病」的這件事。

為何必須訪談，並不是為了診斷，而是為了不再彼此失語。鈞弼的生命生成過程，長期在創傷與不安全感之中度過。這些經驗並未在當時被理解、被承接，而是在生命不同階段反覆回返，最終在中年被他以「生病」作為一個總結性的說法。這樣的說法，一方面為他自己提供了一個暫時可說出口的解釋，另一方面卻也無意間將生命經驗封裝成一個封閉的標籤，使得身為家屬的我們，反而更難進入他的世界。我想嘗試為彼此重新看見的可能。想讓親密關係中長期無法被說出的部分，得以被理解、被對話。

唯有如此，個人才能不再被一次又一次地推回那個孤立無援的黑洞之中。如何在彼此都脆弱、都可能受傷的狀態下，練習相互扶持，而非互相消耗，學習讓痛苦不再孤立，讓理解成為一條仍可繼續行走的路。以下是我在（20251211）晚上 8 點訪談鈞弼的內容：

一、不安與承擔的生長史

鈞弼說：

要談我的情緒壓抑的問題，這個要從小時候來講，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從小到青年時期，過得都不是很快樂，那從家庭因素到我去念書，跟社會上所接觸的時候，都是讓我對人產生懷疑的，還有一些恐慌的事情產生，那先從對妥瑞氏症的看法，以前我們都不知道有這種病，因為小時候就會無預警眨眼睛、脖子抽動、喉嚨隨時都會發出乾咳的聲音。父母認為長大交女朋友就會好了，不認為是生病。可是乾咳在夜間就很麻煩，小時候因為同睡一個房間，就會影響到大家睡眠，所以爸爸有時候會生氣，就把我一個人丟到客廳的地上睡覺，可是我就害怕、寂寞、恐怖，又怕爸爸媽媽不高興，就一直忍耐。

因為這樣我就想，我不要給家庭製造更多麻煩，所以有很多委屈都忍耐下來，或是說求學也盡量說把功課念好，那另外一個打擊，就是說，當我慢慢懂事的時候，媽媽開始會出去打麻將(1976)，會耽誤回家做飯，那爸爸發現他去打麻將，兩個就會吵起來，就會打架。造成我每次到放學的時候，如果媽媽沒有回來，爸爸又快下班，我就害怕.....

[鈞弼心情受影響，訪談暫停.....]

鈞弼稍休息後再度說：

我說不下去，就這樣從懂事以來就是這樣，所以產生我一直從小，就想離開這個家，所以從國中開始就想去念軍校，找到自己認為可以解脫的方法，被大姊阻止後沒去軍校，後來考到花商補校，因為自己要賺錢來半工半讀，幫助這個家。

說到在國中時(1973)有一段對我很不好的影響，就是因為鄉下長大，到國中是在花蓮市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得罪了同學，結果同學竟然找他的哥哥，五六個人把我圍起來，這樣霸凌我，那讓我當時心裡的產生對於都市的人就會很反感，認為這個社會怎麼這樣子，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流氓，才知道說原來這個社會還是有流氓的，所以國中 3 年我都過得很不開心，就是想趕快畢業去念軍校。這是另外一個因素，要脫離這個不正常的社會。

高中去念花商補校(1976)，又碰上媽媽被倒會，也是要幫家裡解決一些問題，那又受到另一個打擊：我第一個，工作是在一個大理石工廠上班，結果上了半天，本來做得好好的，有一天，發現那個老闆的兒子竟然是我國中同學，看到我，我很熱情想跟他打招呼，他又不屑我那種感覺，讓我心裡受到很多的傷害，就乾脆不要在那邊上班。後來經同學介紹就去水電材料行上班，負責送貨。那時才十五六歲，可是做的工作還蠻粗重的，要騎單車還要單手扛粗重的很長的水管去送貨。所以我那時候就腰就被壓傷就有癱瘓的疼痛感，在家裡養傷，養了1個多禮拜。其實我那時候心裡有點想跟家裡講說：能不能休息一段時間，可是當我跟家裡，提出來的時候，我就發現家人好像，很為難的樣子，我就知道。我有講過，我從小就是聽話的兒子，也不想再問了，我就要忍痛，那個腰傷都還沒有完全好，就要繼續去工作。

就是我在高中半工半讀的時候，因為前面有講過媽媽愛打麻將，會將午餐放在電鍋中。所以我每天中午我都會放心不下8、9歲的小弟跟智障的大哥。我都會跟老闆請假，中午要回家一趟去看他們。那種心裡，它就會一直困擾著我，好不容易就是終於熬到了高三了。終於可以去念軍校。

在軍校中(1979)感覺家裡還是對我很多的期望，那時候我領的錢雖然不多，我都不敢亂花，省吃儉用給家人貼補一些家用，或是給小弟買一些他要的東西，就是那種放不下心的焦慮。一直沒有辦法改變，甚至長大一點，爸爸要做牙齒、換冰箱，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兄弟姊妹，他都不會找，一定要找我，一定要找我，我認為是從小到大就是聽話，而我就被壓抑著完成家人期待。

念了軍校有很大的突破，從不擅於發脾氣就是乖乖牌。可是很有趣，我雖然是外省二代，但是我驚訝，還有一大群來自眷村的外省二代，我們雖然是同樣的外省人，可是我們的觀念、思維都是不一樣的，反而我會排斥他們，那另外就是說，我也開始學會想要保護自己，因為其實眷村出來的人，他們是有背景的，所以同學有一些人也蠻怕他們，他們也會對幹部很不禮貌。當我已經離開我的家庭，我很有一種想要保護自己，也會與他們對衝起來，甚至嚴重到要被開除。

[鈞弼再度情緒低落，訪談暫停.....]

二、從承擔內化成一種價值而內耗

鈞弼說：

我記得 2014~2015 年為協會人事變動很大，我開始覺得開始有一種孤單寂寞、無力感那種感覺，那我們在第一代專職人員他們的行政各方面能力都比較弱，每天都擔心他們會發生什麼狀況，或是什麼時候就是要離職做不下去，跟我之前那種恐慌症就是差不多。隨時會擔心這個走、那個走。那果然不錯，終於剛好碰到資源不足的打擊，就是一下子，讓人都解散掉，那讓我又產生一種危機感，就是一下子，沒有辦法接受這現實狀態，那大家一個一個就想離開。我認為不是叫憂鬱症，其實就是一種恐慌症，產生一種沒有辦法的心情、沒有辦法解脫、也沒有辦法跟人家講我的心情的事情，那只好用一種很莫名其妙的方式（害怕失控，因此強迫自己用時間分配來調配自己的行動，例如：下午 1 點去濕地、4 點餵狗、5 點煮晚餐、5 點半吃飯、8 點進房間運動、10 點睡覺，時間節奏被破壞情緒就會上來），去處理我的情緒上的問題。

2015 年當時協會想要發展艾草，我想協會需要，那我就去種，每天去田裡種艾草、颱風下雨也去種，而且也不知道到底會怎麼樣，只是那種像是有一種在逃避的心理，或是說想在那邊找到一些安全，主要因為協會需要種艾草，那那時候一直想要滿足大家的想法，大家提到什麼，那我能做的就盡量去做，都是牛犁提到的，我才去做。也是一種想把大家的心拉回來的那種感覺，所以做的就很莫名其妙，但是從中覺得說自己至少還活著的那種感覺。只要讓自己覺得自己還活著，大家還可以繼續運轉運作下去就好。

甚至我覺得那是最可怕的一次，是大姐把我找去罵一頓，我以前對大姊，我都很尊重他，因為他的兒子也要離職的事件，大姊狂罵我。我突然間發現，我不認識我大姊了，我就這樣直接跟大姊講，我說：我真的覺得你不像我大姐這樣子。那種恐怖的。記得當時我還有勸大姊兒子，再隔一段時間再走，不要這個

時候，大家都跑掉了這樣子，我還要被大姊罵。所以那種感覺就是眾叛親離，那種感覺就是還是我回歸到那是一種，恐慌，就是無助的感覺這樣子。

雅帆提問：對你的症狀開始的時候，你的生活跟工作上有讓你有什麼樣的影響
鈞弼說：

其實影響不大，我剛剛跟你講，我有一個時間定律，就是我開始會每天都會緊張，但是我就會心中有一個時間表，會規定每個時刻要做甚麼，但是沒有在那個時間去做，我就會害怕會緊張，就是讓自己有一個按表操課的時間，如果我什麼時間做到了什麼事，然後都順暢，我就安心。

就像我們怪手壞掉一樣，我的心情就開始差了，我就會沒有安全感，就會害怕，還有更恐怖的跟你講，就是有一些症狀我會莫名其妙害怕起來，你看我去演講或是講課，幾乎都很正常。可是有時候會莫名其妙，我就緊張起來，手會抖，然後講話就不自然，也不知道害怕什麼、在擔心什麼，這個可是我常做的事情，我去報告時不自覺就會產生這種症狀出來，就是那種恐慌症，不知覺就會跑出來這樣子。最嚴重的就是做濕地那個事情，我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沒有人贊成我去做濕地的事情，好像就是我一個人想做，就像早期在做社造一樣，我的一意孤行把大家拖下來，可是那個是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回歸來講，我好像一輩子都沒有在做，我可以主導的事情，你知道嗎？

都受到很多的牽制，讓我很難去發揮我想做的事情這樣子，我的想法就是我在牛犁做了很多事，都是一直在幫別人圓夢，對，那但是我好不容易有一個夢想，但是沒有人要支持，一談到要花到錢，你們都很反對，認為那是沒有意義的事情。可是對我來講，我不在乎的是錢，我在乎的是那種價值的東西。所以去年時候有一些恐慌的狀況開始發作的比較密集，就是因為這樣才發作，那種狀態讓我就被困在那邊，去年就會有想去走「絲路」就在那裏一走了之（死亡）。

[鈞弼第三度的情緒低落.....]。

這次哭比較久，我想起夏林清說的，不要打斷他的心情，讓他好好的沉思一下。

鈞弼休息一下後持續說：

我覺得我一直被關在那邊，好像小時候到現在，從來沒有翻轉過，然後一直被困在那個洞裡面，一個黑暗的屋子，被關在那邊，一直走不出來，然後都沒有人要理解，然後，已經長大了，竟然還沒有逃離那個黑洞，所以就想放棄，才會想去死。

三、共同性的崩解——再次孤獨

鈞弼說：

我是覺得應該要把我們為什麼要做社造，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先說一下：我跟你結婚的時候，有個重點，因為家庭當作父母吵架的關係，所以我很重視家庭的那種概念，不要有夫妻去爭吵、打鬥或是離婚，家庭要完整在一起，所以我們幾乎結婚三四十年，我們都是日夜都在一起，工作跟生活都在一起，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生活方式。

那是因為小時候害怕，在那種家庭長大的時候，那種恐慌，所以我也擔心我長大以後，我的家庭我就不能再面臨這種問題的產生，這樣子，那當然我們也投注於社區工作，其實也是在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從以前的孤獨寂寞，藉由公共事務來取得心理的平衡，取得自己的價值性，所以我為什麼講 2001 年協會想立案那段歷史，也是給我們很大的打擊，因為我一直認為我比較單純的想法，因為我當初跟大家談做社造的時候，大家都談的很好，那我認為這是大家的共同理想，可是當到 2001 年，面臨一些事務越來越多時，可是你們每一個人告訴我，是因為我想做，所以大家來支持我做社造，對我是一種很大的打擊，就是說我把大家拖下水的那種感覺，好像是我害了大家一樣。連我的老婆（雅帆）也是因為我的想法而跟進的。

記得當時我還說：

你要感到驕傲，因為一個人的理想，然後可以夥同大家一起來加入社區營造，我覺得在談這樣的精神，對我來講，我覺得是驕傲的。為什麼對你來講卻覺得很悲傷？

鈞弼回應：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群眾一起來大家參與才是共同理想，不是由一個人來主導懂嗎？那才是我悲傷的地方，所以那個難過就是這樣，被人家放棄那種感覺，所以會累積很多的心理的痛。

四、濕地：一個可以呼吸的地方

鈞弼持續說：

好，那我現在回到濕地的這件事情(2022年開始)，其實溼地對我來講，它是一個，怎麼講就是，說應該是說，就是讓我在那邊可以，解脫的一個場域就對了，雖然前面講的是沒有錯，我們是為了生態保育，在做這個工作，其實我有一種反骨，就是我從青年期進軍校之後，就有一個反骨的性質，就是說我們做的事情不要侷限在政府的一種框架之下。也要印證一個人與自然環境，怎麼樣共存共生的一個議題，在溼地裡面，藉由一個平衡發展，讓它營造成一個最符合大自然生態環境的一個領域，這樣子當然是在教育領域中。對我個人來講，就是說我可以藉由這個領域裡面去體驗到，就是我個人的一種精神的寄託，就是我跟自然環境可以共生共存，包括那個外來種跟原生種，甚至我們判定不好的物種，你都覺得他如何在這個環境可以共生，所以你在看到那樣的型態出現的時候，其實對我的內心來講，是一個得到，解脫跟平靜的，比較能夠有平靜的心情。

其實那個地方本來很不適合做溼地營造的，可是台灣各地每個場域都有危機，那怎麼樣面對這個韌性就是被沖毀被壞了，我們到底有沒有辦法、有沒有能力恢復起來，或接受這個現實跟狀態，重要的是，我個人在那邊投入這個工作的時候，我可以得到，我享受與它們共生的價值亦在那邊，對我來講，就像我跟

你講，我怪手壞了，他就會影響到我的心情，那我這幾天怪手壞了，你知道我在幹嘛嗎？我一樣會去做工啊。我去撈垃圾啊、砍樹枝呀，有的沒的要弄的，還是要去整理、去處理他，可是很累，你不知道這個是很累的一個工作，可是你會在那邊得到，你心靈上的一些寄託。

因為現在有在談共生跟韌性的這種理念進來，你們才會比較聽懂，不可以一人獨行、也不是英雄式的社造、是應該是大家共同來做，所以當時我的悲傷，現在是否比較能夠聽得懂。

好我們現在回歸談濕地這件事，為什麼會輪到我一個人去做的道理，那個就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了，你懂嗎？我終於找到一個，我從年輕到老，我好像都在服務人迎合家裡的期許，迎合長官的期許，迎合家庭對我的期望，而我很想做的東西，就是溼地營造，那我不需要別人來幫忙，那是我可以從裡面找到我身心靈、可以在那邊創造我生命價值的東西，所以我願意投資我的生命在那個地方。我也認為牛犁的財力是可以支持這件事，但是你們卻拒絕我，所以我才會想去走絲路去死的。

所以你們說夏林清老師說要還我一個公道時，你們有聽進去，也同意我這樣做，前面確實花了近 100 萬，但是後面我花的不多，我練習開怪手習作維護工作，僅是維修與油資。我是說，我不知道，因為就是長期，對錢的應用，在我們協會裡面，我都處於那種，就是，弱勢那個人，甚至每天我的女兒會念花多少錢時，造成我那種心理壓力，也是不是很好受的知道嗎。所以我也都是就忍耐了，自己可以處理，就自己處理，也不想跟協會去提啊。

我覺得牛犁支持我，只是因為自然生態對牛犁是有幫助的，所以才支持我。為什麼會這麼想，是因為如果真正的支持我、還給我一個公道的話，不應該念怪手壞掉或是需要再花一些錢的時候，讓我產生困擾，也讓我覺得花錢好像不對，那說好的支持其實是只是為了牛犁的名聲，並不是為了真正的支持我，我是感覺說，認為這個地方對你們對外宣傳來講，就是說我們有認養一個濕地，然後怎麼樣怎麼樣，人家來會覺得很尊重我們在尊重環境，可是對我真正投入的心

意是什麼，我還是感受不到你們的在意，因此雖然外表上看起來是好了，其實還蠻委屈，做一個我認為我真心想要做的一件事，但是每每碰到財務的時候又會讓自己壓到一個委屈的狀態。

[鈞弼說到這裡，情緒已經低落]

鈞弼說：

為何要讓我再想起這些事？我又開始感覺不舒服，又想掉眼淚。

[我也不知道如何接住，只能靜默，隔了一小段時間。]

鈞弼就說：

就這樣。

鈞弼就起身將錄音存檔，然後就回房間去了。

（一）濕地募資：在爭吵中重新協商

最近有一個募資公司來協商，想協助我們協會進行募資，認為我們做的事情很值得跟大眾募資共同參與。

20251212 訪談完的隔天，我問了鈞弼，那濕地是否願意用募資來進行，鈞弼沉默許久，認為不好。我說好，那就不用進一步去談了。

沒想到當晚半夜鈞弼又哭了，鈞弼問我：「為什麼要募資，如果濕地造成你們這麼多困難，我寧願不要做。」真的把我從睡夢中嚇醒。我說因為你覺得跟牛犁拿錢很痛苦，那就募資來做也許對你比較好一點。我絕對是真心對你的，你不用去受委屈。結果鈞弼就重述他的想法，嚴肅地請我記住，鈞弼說著說著怎又哭了。

鈞弼在心情不舒服下說：

這個濕地最大筆的錢都花完了，只剩下他去做工跟開怪手，那他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又沒有給我們多少壓力，然後牛犁的財力也可以做得到，那我為什麼要逼他去做募資這件事。

我說「好」，我也會去跟子女說清楚。但是鈞弼還是認為我沒有真心，認為我支持的只是一個「對牛犁有好的名聲而已」。

聽到這裡我真的快瘋了。我內心也突然爆炸，我就大尖叫約 3 秒鐘之久，然後我說：

為甚麼無法接受我的解釋？然後我就告訴他，不要一直這樣看我，我說誰不苦啊。每個人都很苦，好嗎。在你眼中看起來，我好像很愛錢，很現實、很勢利，可是從結婚到現在，你說要種福建茶樹可以賺錢，我就讓你中了一整個後院，然後一毛錢也沒賺到，我有說什麼嗎？你說要養鬥犬，可以可以生很多隻，一隻就可以賣很多錢，然後一隻也沒賣出去，樹跟狗都是送人的。我也沒說。

為甚麼你都用這種，認為用錢跟好名聲來跟我說話，認為這樣，我就會讓你去做這些事情，事實上都沒有獲得啊，我也沒跟你算帳啊，可是你就一直認為我是這種人啊。

鈞弼當下還叫我說話小聲一些，然後我就跟鈞弼講說：

我們那天晚上（20251209 丘延亮讀書會）讀的《Working》裡面的³⁶〈教育的心聲：從 Rose Hoffman 到當代教育現場〉。Rose Hoffman 這個老師，1937 年開始當老師，教了 33 年，Rose Hoffman 經歷大蕭條 → 戰後 → 民權運動 → 美國城市變遷，一路從白人中產社區教到族群貧困、社會流動快速的社區。她是猶太移民的孩子，自己來自破碎家庭（母親早逝），她靠努力向上、她相信紀律、努力工作、靠自己，熱愛當老師，認為「教育」可以救孩子。

認為孩子要乖、聽話，長大以後就算個收銀員，她都覺得成功了，只要好好，安全長大就好了，所以他就控制孩子在教室要有規律、不要亂來....然後我們那天討論，大家就認為這個老師真的太糟糕了嘛。他都不知道，問題不是出在孩子身上，是出在那個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嘛。

³⁶ 《Working》。作者： Studs Terkel 芝加哥作家史塔茲特克爾原文出版社：New Press 出版日期：1997/02/28

我跟鈞弼說：當天對我來講，我早期就像那個老師一樣，那我現在有機會可以看見這件事情是我這 10 幾年來唸書，然後有辦法把視野打開，我有那個機會，而這個是要透過對話的。例如：現在你說了「你的」，我告訴你說「好」，我以後會記住。要給別人機會。

我告訴你，我以後有可能不會記住，因為我的習性，會帶來我可能會再冒犯你一次，那你就再繼續跟我說呀，我應該會再持續修正，不是現在在這邊一番兩瞪眼，然後你，哭得很傷心，然後我也很委屈。這輩子大家都苦，不是只有我們二個苦，但是我們很好命，可以在這裡對話，我希望這樣的方式要持續下去。

說完，我的腦筋閃過，我也算是很會吵架的。

（二）濕地與社造的共生實踐

烈日炎炎總能看到鈞弼，正開著怪手努力將 14 公頃土地上的銀合歡及象草翻起再覆蓋入土地中。這樣的工程必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重複的來回著，有一種無止境感。

鈞弼跟我分享：

只因為銀合歡及象草都是入侵性強、易抑制其他植物生長，且造成土地的單一化的外來種植物，會影響耕作與排擠其他植物空間與養分。

壽豐懷客橋下土地已經被大量銀合歡及象草覆蓋，鈞弼想要再度營造成生物多樣性及水雉可以棲息的地方，必須恢復植物多樣性的樣態，首先必須請銀合歡及象草騰出一些位置讓其他植物進來，我問鈞弼為何不直接移除，

鈞弼說：

每一物種均有其功能，是要保持生物多樣性，不是用毀滅或移除的方式。

這跟我們在進行社區工作道理是一樣的，不是將不理想的人通報轉介出去，而是思考怎麼讓每一個人都能在這片土地、在這個社區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當每一個人都能彼此約制、互相理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共好」。在懷客橋下，鈞弼不

只是「清除」銀合歡與象草，而是在與土地協商，進行一場微妙而深思的空間調整。他沒有選擇將這些被視為「入侵」或「蔓延」的植物一網打盡，反而採取鬆動、騰空、讓位的方式，正是因為他理解：每一種植物都有它曾被留下的理由與功能。

鈞弼的話：「不是毀滅或移除，而是讓每一個物種適得其所」不僅是對生態平衡的深刻認知，也對照了社區工作的本質。就如同我們在社區中，不是將不合時宜、行為脫序、或被視為「問題人物」的居民排除或通報，而是設法透過對話、陪伴與重新安排角色，讓每個人找到自己可以站立的位置。這樣的工作方式，不只是維持表面的秩序，而是在追求一種深層的共存與互相約制的關係。

銀合歡能快速固氮、象草擔任演替的先驅物種，這些都是在某一階段土地貧瘠、裸露時的自然回應，是生態系在受傷之後自我療癒的過程。但當人們期望恢復更多元的生物樣貌、讓像水雉這樣對環境敏感的物種得以棲息，就需要這些「先驅者」稍稍退場，給其他植物與動物「進場」的機會。鈞弼對土地的實踐，其實就是一場關於「共生社區」的對話，銀合歡與象草不是敵人，而是社區裡那一類需要被理解與調整位置的存在。水雉的棲息，是目標的象徵，也是一種對土地恢復多樣性與健康的指標。怪手不是工具的暴力，而是溫柔的介入，是幫助舊有秩序鬆動與讓出空間的手勢。而鈞弼，是那個在制度與自然之間，堅持用理解、勞動與尊重介入的人。

而社區的重建，也是如此不是強制排除，而是調和並重新安排關係，讓每一位社區成員都能「共生、不被排除」。理解多樣、容納差異，並讓居民在這同一片土地上找到各自的位置。每一株植物、每一隻生物，都是我們要學習共處的對象，而鈞弼的這場土地工作，正是一堂最美的「共生社區」實作課。

（三）家園經濟——韌性的基礎

為了能夠理解鈞弼更多，我去閱讀鈞弼的家庭史，這一份是從將他的爸媽從「富國島」撤離前、後的故事，記錄成為它們家在臺的家史。是夏林清及廉兮老師，一直鼓勵鈞弼書寫的，為何要參考，因為鈞弼談的是：來臺後他們家庭與同時撤退來臺同袍情誼間的故事為主。這裡我看到：分工讓人們彼此需要、交換讓人們彼此安全。

在空間上因為沒有廁所就去用隔壁養豬家的廁所，鄰居還很開心的歡迎，因為可以變成肥料，而菜園、竹林、麻竹都是可以大家共享的生活資源。鈞弼他們也會

去幫忙鄰居洗採摘的青蔥、白、紅蘿蔔，有時去鄰居農田幫忙。鈞弼家有養羊，也會送羊腿分享鄰居。

在小小十五、六戶人家，有理髮的、靠退休金生活、送報、打雜工、紮掃把、林場工作、氮肥廠、木瓜林區管理、務農、土地仲介、開雜貨店。有隨軍來臺的、西部過來的客家人、日本時期過來的閩南佃農。可能因為只有十幾戶人家，很容易形成一家親，鈞弼多障的大哥也在這裡安全長大，單身的榮民會來一起吃飯，榮民在颱風時也會幫忙修繕房子，這一種沒有正式福利，薪資也不夠用、更沒有好的公共設施，就靠著大家分工與交換互助下，生活下來。從這份家庭史可以清楚看見，一種以鄰里互助、勞力交換、空間共享與食物流動為核心的家園經濟實踐。在分工中提升效率與創造價值、在交換中促進資源流動與互惠。

鈞弼在溼地的營造中習慣的是「共存」，不是「清除」，鈞弼對溼地營造的價值態度，是深植於其成長過程中所經驗的家園經濟與家庭互助氛圍。在一個資源有限、需依靠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互助與調適的生活世界中長大，使他較不傾向將政府制度視為唯一解方，而更重視多元共生、韌性回復與長時間陪伴的價值。這樣的生命經驗，也形塑了他對溼地營造的理解，不以排除、清除為優先，而是嘗試在原生種、外來種，甚至被視為「問題物種」之間，尋找可能共存的平衡狀態。溼地的價值不僅是生態的實踐，更是一個能讓人重新體驗人與自然共生、接受不完美與變動的生活世界。

於是，他選擇留在一條較為緩慢、也較為脆弱的路徑上：讓多樣性的動、植物能夠在這塊其實並不適合溼地營造的場域中，自行摸索出共享空間與韌性的可能。多次颱風帶來的損傷，並未終止這條路，反而成為他反覆調整、重新理解「如何一起活下來」的過程。在這樣的實踐中，他逐步找回的不只是場域的生機，也包含自身重新定位行動節奏與力量來源的可能。

回顧鈞弼的生命敘事，可以看見一條在長期不安中逐步形成的承擔路徑。從成長過程中反覆經驗到關係的緊繃與不穩，到很早就被放進需要回應、需要補位的位置，再到成年後在家庭、組織與社區之間持續接手，他學會以承擔回應關係的需要，也藉此維繫日常得以運作。這樣的承擔並非單純出於犧牲或被迫，更像是一種深植於生命歷程的做事方式：不願讓他人為難、不願成為麻煩，於是把能做的、該補的、該撐的，先放到自己身上。

然而，當承擔長時間缺乏可分擔的結構、缺乏可以一起扛、一起商量的共同性時，它就容易被困在「只能由他撐住」的形式裡。鈞弼並非不知道需要夥伴，而是常常在現實時機與關係條件尚未到位之際，一邊看見「可以一起」的希望，一邊又得在失望中繼續往前走。那裡頭有很深的孤單，也有不肯放棄的等待；有曾被群體接住的經驗，因此更相信「一起」的可能，卻也更容易在共同性鬆動時感到受損。於是，身體與情緒的失序不再只是個人的狀態問題，而像是一種邊界的顯影：提醒我們，當關係無法成為支撐、承擔無法被回應與分攤，再堅韌的人也可能被推回到孤立之中。我必須說鈞弼是一個；在關係不穩時，仍把「一起」留在心裡的人，這是他在社區工作的韌性所在。

五、讓「一起」站得住的實踐知識社群

如果說鈞弼的生命敘事，讓我看見的是在關係反覆鬆動時，仍願意把「一起」留在心裡的可能，那麼，接下來我必須誠實指出：這樣的「一起」之所以沒有停留在意志或美德層次，而能在家庭關係與社區實踐中被撐住，並非只靠任何一個人的韌性。它來自一個長期存在、卻常被忽略的條件——一個能在關鍵時刻共同回看現場、拆解困境、校準行動的實踐知識社群。正是在這樣的共作關係中，我與鈞弼才得以不被各自的承擔耗損，而能在修復、誤差與再嘗試之間，重新理解彼此、調整節奏，並讓關係繼續活著。

對我而言，這個社群並不是提供標準答案或即時解方的支持系統，而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共作關係。在我與鈞弼面對家庭張力、社區衝突與組織耗損的過程中，正是這個小型知識社群，反覆把我們從「個人撐不撐得住」的焦慮，拉回到「關係如何被使用」「承擔是否有出口」「節奏是否超過可承受範圍」等更具結構性的提問。這些提問不是抽象反思，而是會直接推動行動選擇與組織調整的判斷支架。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實踐知識社群」，並非一種情感支持或同行陪伴的描述，而是一種具體的知識生成條件。它使卡住、衝突與危機，不被快速收編為個人情緒或能力問題，而能被重新定位為關係與制度層次的課題；也使行動者得以在失序時暫停，在回看中辨識分寸，並在共作中把原本只能獨自承擔的重量，逐步拆解、分攤與重組。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與鈞弼才得以在修復、誤差與再嘗試之間，重新理解彼此，也讓家庭與社區關係不至於被長期消耗所壓垮。

（一）回看現場：知識如何在行動中生成

我想用一個具體的現場事件來說明：那一晚的 LINE 對話，對我來說不是單純在記錄情緒，而是一段可追溯的行動過程——我們怎麼在狀況不穩時，一邊做、一邊調整，試著把人留在關係裡。之後回頭整理時，我不是把它當成回憶，而是把那串訊息、時間點、每一步怎麼回應與怎麼轉彎，當成可以回看的線索：哪些判斷是在什麼時刻長出來的？哪些動作避免了關係直接斷掉？廉兮與夏林清的介入，也不是給我答案，而是讓我在快要用慣性硬撐時停一下、換個視角，幫我校準當下的分寸：此刻重點不是把道理講完，而是先降低失控風險、先守住聯繫、先保留尊嚴，讓關係還有機會繼續。家人們的協作同樣不是情誼而已，而是在危機裡立即形成可行的分工與分攤：有人守位置、有人回報訊息、有人陪伴撐過最危險的時段，把原本可能全落在某一個人身上的承擔，拆開、接手、輪替。也因此，這些後來看起來很關鍵的判斷，不是事後補上的說法，而是在行動中被磨出來、又能被回看與檢視的實踐知識。

這份社群對話的可參考性，建立在它的可追溯性：它不是抽象回憶，而是包含明確時間點、對話脈絡與後續行動回應的紀錄鏈。具體而言，至少包含三個關鍵節點：

2024/12/26：與廉兮的對話（我在事件爆發前，已經在思考如何讓「鈞弼的承擔／耗損」不被當成個人問題，而要回到組織與制度的視角來理解）。

2024/12/31：鈞弼對牛犁及生活不滿的情緒高漲、離家出走的 LINE 紀錄（凡萱、雯安等家人共同協作找回、安置與陪伴的過程，呈現我們在危機裡如何用節奏、分工與分寸把人留在關係裡）。

2025/01/09：與廉兮、夏林清的進一步對話與進場，並出現關鍵轉折：夏林清提醒牛犁必須回到「公義」的尺度：鈞弼要的不是更大資源，而是他能承受的節奏與關係，牛犁要「給他一個公道」。而這句話不是停在道德勸說，而是推動牛犁召開組長會議，重新釐清責任分配與組織回應，嘗試把分擔機制做出來。

對陌生讀者而言，這裡最重要的不是「誰說了什麼」，而是：這串對話如何把

我的行動推進成一種更可檢視的知識。它至少完成三件事：

把個人危機重新定位成關係與結構問題：鈞弼離家不是單一情緒事件，而是長期承擔、缺乏分擔、節奏過快的累積結果。對話把「病理化」的解釋暫時放下，逼我們回到：組織如何用人？如何分工？如何讓犧牲有出口？

把「公義 / 公道」具體化成可行動的調整：不是喊價值，而是回到制度與組織：重新開會、釐清責任、調整節奏、建立分擔。也就是把倫理從宣告變成做法。

把「我在現場的拿捏」變成可追溯的路徑知識：像我說的「是否能一起活下去、關係會不會斷、關心會不會把人用壞、土地會不會被過度使用」，這些不是靈感，而是在對話映照下被逼著說清楚、拆開、落到行動選擇上的判斷。

因此，在論文方法上，我會把這些材料明確標記為「知識社群對話紀錄」（含日期、媒介、參與者角色、後續行動），並放入資料說明中，使讀者能追索：這些判斷從哪裡來、怎麼被提出、如何被辯論、又如何被實作回應。這樣，它就能作為一種可參考的知識來源：不是取代學術文獻，而是補足文獻難以提供的，在真實生活與組織關係裡，知識如何被磨出來、如何被檢驗、如何被承擔。知識在行動中如何生成

我想把那一晚的 LINE 對話，當成一個很具體的例子，放進「知識在行動中如何生成」這段論述裡：夏林清提醒我，敘說不是事後補上的說明，而是一種「回看—辨識」的知識生產；卡住與衝突也不是雜訊，而是同行學習的關節；而路徑知識更是把「做法的細節」看成手段與結果的同一件事，不能切成純工具。這些話如果只停在概念很容易漂，但在 2024/12/31 那晚，知識其實直接在我們的動作裡成形。

鈞弼不滿情緒高漲離家去公園不回家時，我沒有先追問理由，而是先守住「關係不中斷」：我對女兒說「再 10 分鐘我再打電話給他」，也說「每隔一段一定要打電話」，同時女兒及兒子也都隱在公園旁邊守護。這不是控制，而是在危機裡把聯繫維持住，避免他掉進更深的孤立。

接著，凡萱與雯安不是在旁觀，而是立刻形成一個小型的行動小組：回報位置、分工照顧孩子、一起找人，最後確認他在 KTV、車也在那裡，並決定「留一個看他」、先把人放在可見、可守的地方。

更關鍵的是，找到人後我們沒有硬拉回家；他「不走、說要唱歌」，我們先付

費、先陪著，先把最危險的時間撐過去。

就是我理解的「分寸」：此刻的重點不是說服他、也不是立刻討回道理，而是降低失控風險、保留他的尊嚴，讓關係有機會繼續。回家後吵到凌晨三點，他把痛苦翻成「活不下去」與「我在這個家像勞務工人、不被珍惜」，我一邊承認他在意的是家務勞動的尊嚴，一邊又把濕地工作拿出來肯定他的付出，讓他能從崩裂邊緣回到「我仍有價值、我仍被看見」的位置，爭執才停下來。

所以我引用廉兮與夏林清，不是要把理論套在這段家庭事件上，而是用他們的提醒回頭辨識：那一晚我們如何用「節奏、分工、陪伴、肯定與自保邊界」把人留在關係裡，並把裂縫裡的做法拆開、寫細，讓它從私密的驚險經驗，變成可被理解、也可被承接的實踐知識。

因此，這份「知識社群對話」對我的研究意義在於：它把危機中的 LINE 紀錄與後續對話，轉化為一條可追溯、可回看的知識生成路徑。透過反覆回看時間點、對話脈絡與行動回應，我在現場的拿捏不再只是直覺，而能被說清楚、也能被檢視：例如「關係能不能不中斷」「怎麼保留尊嚴、降低失控風險」「關心會不會把人用壞」「土地會不會被過度使用」。更重要的是，社群的提問把焦點從個人狀態拉回組織與關係：不要再讓承擔變成長期無出口的犧牲，而要做出分工與分攤的機制，讓人回到可承受的節奏。這些判斷不是事後套上的理論，而是在對話映照下被迫命名、拆開，並推動牛犁召開組長會議，重新釐清責任與調整節奏。作為方法論的一部分，這份對話既是支持網絡，也是校準行動的支架，使經驗不被制度語言快速收編。

（二）取回「詮釋權」：不再被快速命名

2025/01/10 晚餐的看似日常對話，其實是夏林清用一種有意識的敘事介入：透過對家庭史的提問，將鈞弼從「事件中的當事人」拉回到「有歷史、有位置的人」。隔日鈞弼以〈奠立在地認同〉發文回應自身族群與在地性的質疑，並以多年保存地方史蹟的實作細節，重建其公共論述位置。這顯示小型知識社群（廉兮—夏林清—雅帆）並非提供資源或答案，而是提供一種讓經驗得以被整理、被命名、並進入公共討論的支架：使「個人壓力事件」轉化為「組織公義與可承受節奏」的議題，進而推動牛犁啟動內部釐清與調整，嘗試給鈞弼一個公道。此過程呈現知識如何在行動與對話中生成：從關係的修補、位置的重建，到可追溯的判斷形成。鈞弼臉書〈奠

立在地認同〉這篇貼文，正是詮釋了「廉兮連結夏林清」的意義。

鈞弼要的不是更大資源，而是他承受得起的節奏、以及關係不要再被用壞。晚餐的對話看似日常，但夏林清其實把焦點放在「家庭史」，因為家庭史會把人從「工作表現／情緒事件」拉回到「一個人如何活到今天」的脈絡。這正好回應夏林清後來那句「給鈞弼一個公道」：公道不是補一個方案，而是承認他的承擔史、修正組織的節奏與分擔。

從「私人痛苦」走向「公共可討論的論述」：鈞弼的回應也很關鍵：他不是只說「我很委屈」，他開始談三件公共化的事來回應他的看法：首先自我定位：外省二代、從花蓮市遷居、家族撤退史（富國島—1953），來說明深愛這一片土地，他不是外人。也提出概念：所謂在地認同，不是血統或出生地，而是內心的認同與投入。他也用自己多年保存、登錄、搶救地方文化資產的行動來回答自己對地方的投入。這正是廉兮常說的那種轉向：把「卡住與疼痛」轉成「我們可以一起談的公共問題」，而不是被制度語言收掉。

取回「詮釋權」：不再被快速命名：鈞弼的回應最像夏林清的地方，是鈞弼在做「自我敘說探究」：他不是在辯解，而是在把自己如何形成視框（我怎麼理解在地／多元文化／歷史用字）說清楚。更重要的是，他在把自己做過的「細節」說出來（五年做登錄、搶救五位屋、整修文史館、研編教案）。這些細節不是操作工的流水帳，而是他用來證明：手段與結果是一體的、路徑本身就是知識。換言之，他用「我怎麼做」來回應「你怎麼說我」，這就是把詮釋權拿回來。

第三節 豐田會：從制度失能開始

本節書寫的，不只是一場颱風夜的救災經驗，而是一個社區行動主體如何在制度縫隙中被逼著出現的過程。長期以來，防災被視為政府的責任，社區往往只能在災後被動配合；然而，在極端氣候逐漸成為常態的當下，這樣的分工假設，正不斷在現場失效。

2023 年海葵颱風夜，豐田三村成為平地孤島。那一夜，並非沒有人努力，而是既有的通報、指揮與救援節奏，無法即時抵達村落。在救援尚未進場的空白時間裡，撐住村子的，不是任何一個正式單位，而是彼此早已存在、卻平時不被視為「防災系統」的關係網絡。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豐田會」開始被命名、被辨認，也

被反覆啟動。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豐田會」並不是一個正式成立的組織，而是一個由在地居民、青年、小農與行動者所構成的自主團體。它沒有章程、沒有職稱，也沒有預算線，卻在關鍵時刻能迅速動員、分工與回應。本節將透過一場颱風夜的經驗，說明這樣的自主行動如何被觸發，又如何在此反覆的災害經驗中，逐步累積為一種社區的行動能力與治理可能。

因此，以下的敘事，不只是為了回顧「那一夜發生了什麼事」，而是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制度暫時失靈時，社區如何不只活下來，還能開始學會彼此接住。

一、海葵颱風那一夜，發生了什麼事

海葵颱風夜，官方救災全面失靈，豐田三村成孤島。青年自發駕吉普車救人、開道送醫，撐起整個村落，整體事件，讓我們發現社區中自救更為重要。民間才是反映災害最快的單位。大型災害發生時，政府救援需 6~12 小時組成。換而言之——災害發生時，將有一段時間，我們只能自救。我們能不能組成自己的防災隊？也促成「豐田會」的誕生。不是為了取代政府，而是為了確保下一次災難來時，村子不會再孤立無援。

2023 年海葵颱風來襲，適逢月圓大潮。豐田地區 24 小時雨量突破一千毫米，為全臺最高。當晚，鄉長帶團外出考察、村長出國，豐田派出所警察雖應值班卻未值班。沒有村長通報，鄉公所未啟動災害處置，通報派出所亦無人回應。晚上 11 點起，豐田三村開始全面淹水，直到隔日清晨，外界才從新聞上得知豐田受災。

平地成孤島：救援進不來的現實：中興街積水最深處一度及腰，多輛車輛拋錨。救護車幾乎無法進入，壽豐消防隊雖接獲通報，卻因水勢過高無法進村。幾戶長輩受困家中，行動不便。在沒有任何官方救援進場的情況下，村裡的青年們自發穿上短褲、脫掉上衣，開著吉普車，一戶一戶巡視，把長輩揹上車，送往安全地點。那一夜，豐田不是沒有救援，只是救援來自村裡的年輕人「兄弟姊妹」們十多個。

一個傷患，看見整個系統的斷裂：我家兒子富民在救災過程中踩到玻璃，腳部重傷。傷口深大、血流不止，卻因淹水，救護車無法抵達。好不容易接上救護車後，通往花蓮市的所有道路，三農場、共和村、壽豐橋、山邊路、養殖區全部中斷。原

本 10~15 分鐘的急診送達時間，最終花了將近 60 分鐘。救護車在水中原地打轉，所能靠的，仍是村裡哥哥們開著吉普車，在前方開道，劃開街道兩側的積水，才讓救護車得以通行。那一刻，平地的豐田，成了一座孤島。

誰在現場，誰缺席：那一夜，封路的是村裡的人；聯絡行政系統的、還是揹長輩、載傷患、開道的，都是村裡的年輕人，都是被電話的 line 吆喝一起上街的地方青年。沒有命令，沒有分工表，卻有一種非常清楚的共識，村子不能只靠運氣活下來。

豐田會的起點：這不只是一場救災故事，而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當制度缺席、通報失靈、官方不在場時，真正撐住村子的，是彼此之間早已存在的關係網絡。豐田會，正是在這樣的夜晚裡，被逼著誕生的。不是為了取代政府，而是為了確保下一次災難來時，村子不會再孤立無援。

二、為什麼只能自救

透過這次海葵颱風夜，豐田成為平地孤島的經驗。看見的不是沒有人努力，而是防災系統在關鍵時刻全面失聯。高強度降雨導致溪流無法宣洩，這是極端氣候下難以避免的現實；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硬體承載不足之外，通報、指揮與跨單位聯繫也同時中斷。

當晚，沒有即時封路、沒有撤離指引、沒有安置資訊。長輩受困只能打救護車，卻因車輛規格與道路條件受限而無法救援；最後，仍仰賴村中青年以人力與吉普車完成撤離。救護單位、派出所各有其侷限，但問題不在個別人員，而在系統設計假設了一個不存在的氣候與地形條件。

這場經驗讓人不得不提問：指揮中心是否真正指揮？通報系統是否存在？警消是否已長期過載？在花蓮狹長且多溪流的地形下，是否需要全然不同的防災想像？富民並非責怪任何單位，而是提出九項反思方向：從不同規格的救護車、即時環境監測、民眾與政府協作的通報系統，到村里層級的防災組織、清楚的疏散路線與安置認知。

富民也直言：不能永遠指望每個村子都有願意冒險的青年。在極端氣候成為常態的時代，花蓮人或許真的「久病成良醫」，但這不該只是人民的責任。因此我們牛犁也在這一群年輕人的期待下，積極邀請三村村長及地訪耆老進場，促成豐田在

2024 年辦理韌性社區防災工作坊。

三、 豐田會防災工作坊-豐田防災手冊³⁷

今年 (2025) 年初牛犁青年夥伴們拜訪團隊的郭俊麟老師，跟他請教了 QGIS 的系統，重新建立起我們自己村落的防災地圖。防災不是學習地震來了躲避、準備家裡的災害急救包而已；是必須重新在自己的村落思考看看，我們怎麼建立村落、社區自己的防災資訊與防災團體。

近年風災、地震頻繁，防災已成日常課題。郭俊麟老師也提醒：大型災害發生後，前 6~12 小時往往必須仰賴鄰里自救。這次，我們希望讓還在村裡的青年，能正式與三村村長坐下來，討論如何在災害來臨時彼此照應，守護長輩與孩子。

「豐田會防災工作坊」於 2025 年 6 月 8 日舉辦，集結豐田三村青年與三位村長，共同討論社區災害地圖與防災行動方案，嘗試從「受災者」轉向「共構安全的行動者」。我們不再只是等待外部救援，而是主動盤點社區自身的資源、風險與弱點，結合在地經驗與跨世代知識，建立屬於豐田的防災視角。

青年帶來數位工具、行動力與新的方法；村長則提供土地記憶、治理經驗與資源整合能力，彼此互補，形成一張能實際運作的共生合作網絡。這樣的過程，也讓社區展現出自我治理的可能，從被動受助走向主動協作。歷經兩個多月的田野盤點、討論與反覆修正，我們共同完成了一份專屬於豐田的防災手冊(附錄四)，將災害路徑、避難空間、社區資源與行動分工清楚整理，成為未來面對災害時，彼此可以依循、彼此照應的共同基礎。

³⁷ 附錄五：豐田防災手冊



圖 十 豐田三村防災地圖



圖 十一 豐山村簡易疏散避難圖

四、從預防到外援：豐田會救災網絡的形成與行動

2025 年 9 月 22 日晚間，樺加沙颱風來襲。豐山村村長返鄉掃墓，因為過去幾次防災工作坊的演練，第一時間便啟動「豐田會」的救災機制，村長主動聯繫牛犁的富民，召集青年與在地小農，迅速在忠孝街抽與架設農作截水板，阻擋雨水分流與不流入村落。當晚，豐山村平安度過風雨，沒有傳出災情。

然而，同一時間，光復鄉卻遭遇重大災變。受到 2024 年地震與 2025 年薇帕颱風影響，馬太鞍溪上游形成堰塞湖，在樺加沙颱風外圍環流與豪雨推升水位下，於 9 月 23 日下午 2 點 50 分溢流潰堤，沖斷馬太鞍溪橋。夾帶大量淤泥與樹幹的洪水，以極快速度衝入光復鄉，造成嚴重災情。

當晚，豐田會青年、也是順泰旅社的老闆，立即在社群平台公告：若有因斷橋無法返回光復的居民，可免費提供空房作為臨時收容。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個別行為，而是豐田會早已形成的互助默契。

同時也要感謝我們「豐田會」當時已盤點了大家，是否擁有重機器、是否會操作、具備怎樣的技能、是否會使用大、小型動力機器.....讓救災更貼近現場需求，降低無用之工。盤點不是為了知道誰有怪手而已，而是讓救災不再只靠衝動與體力，而是知道誰適合做什麼、何時上場。這讓民間行動從「自發」升級為「有結構的支援」。

自災後第二天起，豐田會的青年持續集結，開著吉普車與重機具前往光復救災。在佛祖街仍積水至半身高時，他們協助長輩撤離至安置所、協助搜尋失聯者；救援階段告一段落後，又接續投入清淤工作。每天群組裡反覆出現的訊息只有一句：「今天誰下去？」隨後便是調度怪手、鏟泥車與山貓，完成各自工地後，立即南下支援。

佛祖街轉武昌街的重要路口，正是靠著這群人的機具，歷經四、五天、數次被洪水再度淹沒後反覆施作，才逐步清除淤泥、築起簡易堤防，恢復通行。直到道路打通，車流得以分散進入光復市區，官方才發布災區路線圖，並對外宣示協助進場。

這段過程中，豐田會的救災團隊始終沒有缺席。從吉普車、卡車，到怪手、鏟泥車，他們用的是彼此的電話、信任與行動，將原本為自保而建立的防災網絡，延伸成跨鄉支援的救災行動。這不是奇蹟，而是一個社區在反覆經驗中，逐步長出來的治理能力。

也正因為這樣，盤點從來不是為了比較誰比較厲害，而是在一次次實際行動中，慢慢建立起社區的自我信任與行動記憶。每一次名單被拿出來、每一次機具被調度、每一次人力被接上現場，社區都在累積一個很清楚的訊息，我們不是第一次，也不是靠運氣撐過來的。這樣的集體記憶，會在下一次災害來臨時，降低恐慌與遲疑，讓每一份能力，都能在對的時間，出現在對的地方。附錄六

而豐田會之所以能啟動這樣的能量，並不是因為組織有多完整，而是因為關係早已存在。這些關係來自長時間的共事、共災與共勞，來自彼此知道誰住在哪裡、誰能做什麼、誰會在關鍵時刻出現。防災工作坊與盤點，只是讓這些原本分散、隱形的力量，有了一個可以彼此對接的形式。當災害發生時，豐田會啟動的，不只是一套行動機制，而是一個社區對彼此的信任，與對「我們可以一起撐過去」的共同認知。

「豐田會」不是沒有結構，而是沒有被行政格式固定下來。沒有章程、沒有職稱、沒有預算線，反而讓關係保持彈性。在災害現場，最重要的不是「誰是誰的上級」，而是誰在、誰能做、誰先上。自主團體能快速回應，正是因為它不需要經過層層授權。「豐田會」的信任，來自一次次共災、共勞、共撐。大家知道彼此不是因為名冊，而是因為：誰真的會在凌晨出現，誰扛得動、誰會操作，誰會留下來做到最後，這種生活中累積的信任，在危機時刻，比制度背書更快生效。「豐田會」不替任何人發言，也不替任何人承擔責任，它只是在關鍵時刻，讓「在場的人」彼此連起來。這意味著它不取代政府、也不與政府對立，而是在制度尚未抵達、或暫時失效時，撐住那一段空白時間。這是一種很重要、卻常被忽略的公共角色。

第四節 一直都在的家園經濟

為了能更理解鈞弼，我回頭閱讀了他所書寫的家庭史。這份家史，記錄的是他父母在撤離「富國島」前後，如何在臺灣重新安身立命的過程。這樣的書寫，是在夏林清與廉兮老師長期的鼓勵下完成的，我關注的核心，並非個人奮鬥史，而是來臺之後，家庭如何在同時撤退來臺的同袍情誼與鄰里關係中，逐步形成一種可以生活下來的日常秩序。

這是一個沒有完善福利、薪資不足、公共設施匱乏的場域，卻能在彼此分工、交換與互助之中，勉力維持生活。從這份家庭史中，可以清楚看見一種以鄰里互助、

勞力交換、空間共享與食物流動為核心的家園經濟實踐。它並非經過設計的制度模型，而是在資源不足的條件下，人們為了共同生存而逐步形成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成長經驗，並未停留在鈞弼的童年記憶中，而是深刻影響了他後來二十多年來與我們共同參與的行動實踐。當我回望牛犁一路走來的社區工作時，逐漸意識到，我們並非全然從零開始，也不是對「分工」與「交換」毫無所悉。相反地，這些原本就存在於社區生活中的知識與經驗，只是長期未被命名，也未被視為一種可以被理解、被討論的經濟實踐。

牛犁這些年所做的行動，無論是在陪伴、互助、共享資源，或是在危機中彼此撐住，其實正是在這樣一條家園經濟的脈絡中，緩慢而持續地匍匐前進。不是創新，而是辨識；不是設計，而是重新看見那些早已存在於生活之中的行動智慧。

一、隱在牛犁的循環經濟

在三十二歲之前，我搬過二十二次家。對我而言，「思念家鄉」從來不是一個會自然浮現在腦海中的感受，因為我並沒有一個可以長時間停留、累積記憶的地方。後來從高雄搬到豐田，這裡多風、多雨，地震也多，學校只到國中，高中必須到外鄉鎮就讀。這樣的條件，對許多人而言或許不夠理想，但我不想再過「孟母三遷」的生活，也不想再為了孩子的教育，一次次離開正在建立關係的地方。因此，當鈞弼提出要從社區本身開始進行地方實踐時，我才會真正動容，也選擇加入。那不是一個浪漫的想像，而是一個很現實的判斷：如果生活無法在這裡被好好支撐，那再多的理念都沒有意義。

內需，從一開始就是協會所有成員共同關注的議題。我們討論的不是宏大的發展藍圖，而是非常具體的生活細節：村內的雜貨店、菜攤、肉攤、修車行、飲料店、便當訂製，這些能不能被留下來？能不能被支持？能不能成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就連有薪的工作機會，我們也盡量以三村為優先聘用對象，因為工作不只是收入，更關係到人是否能在這個地方留下來。那裡面包含了誰在照顧誰、誰與誰一起合作、誰能在這個地方活下來，也讓地方有機會繼續活著；更重要的是，當成果出現時，如何被彼此共享，而不是被少數人拿走。

二、 用行動與社區對話——家園經濟

這些實踐並非先有清楚的概念，再依圖施工，而是在一次次生活選擇與行動中，慢慢走出來的路。也正因如此，當家園經濟逐漸成為我們工作的方向時，隨之而來的不是立即的共識，而是一連串關於關係、工作與制度的協商問題。

在團隊內部，我們必須不斷思考：如何與成員形成真正的夥伴關係？什麼樣的工作才是有價值的工作？以及，是否有足夠的機制，讓夥伴能在工作過程中被聽見、被回應，而不是只剩下執行與交付。現實的困境在於，多數工作仍需仰賴計畫運作，績效指標與期程往往將工作量僵化為可計算的項目，使得任何試圖回應家園經濟的行動，都容易被感受為「額外增加的負擔」。在這樣的條件下，溝通本身就成為一項需要投入時間與心力的工程。

這樣的張力也延伸到社區現場。在社區工作中，家園經濟並不是一個可以直接被宣告的理念，而是一種需要被不斷協商的生活方式。我必須反覆思考：如何與社區鄰里建立一種可以對話的關係？在資源有限、期待各異的情況下，是否可能發展出協商的機制，而不是由單一組織或少數人決定方向？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能在實際互動中，一次次嘗試、調整與修正。也正是在這樣反覆協商與摸索的過程中，家園經濟不再只是理念上的想像，而逐漸成為一種被實踐、被質疑、也被重新定義的行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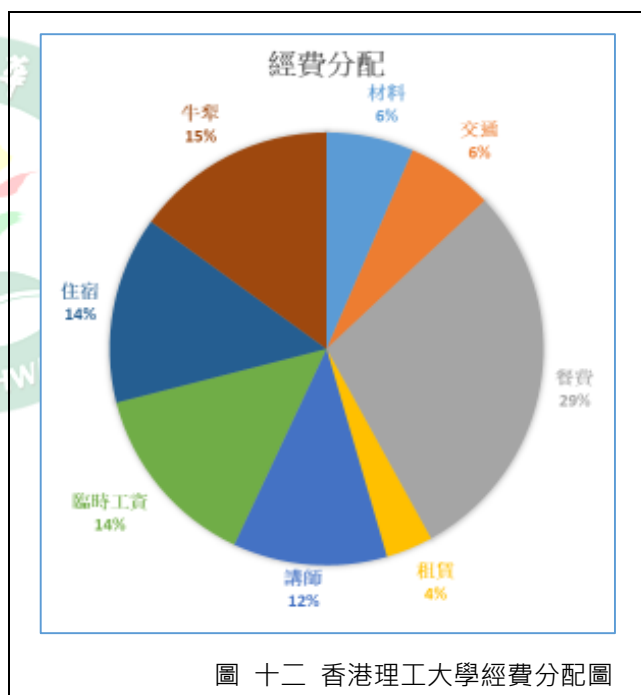


圖 十二 香港理工大學經費分配圖

（一） 以學習為名的行動實驗

家園經濟如何被放進一個八天七夜的行動中。2024 年 5 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服務學習課程，與牛犁正式簽訂合作機制，展開一場為期八天七夜的學習與服務行動(附錄六：香港理工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簡介)。課程內容包含三餐

與住宿安排、學習與服務所需材料，以及業師費用，整體經費高達七位數，並被明確設定為需在豐田地區消費與行動。為促成這項合作，牛犁其實已投入近一年的前期準備，期間與香港理工大學教師們多次往返討論、協商課程形式與合作方式。

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接待案。內部在文化組組長富民主導下，選擇以「家園經濟」的思路來協商這次行動的設計。八天七夜中，三十三位香港學生與教師在社區中日夜移動，加上相對充足的經費條件，使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關鍵問題：這樣的學習與服務，如何讓社區真正有感？若牛犁未來有意走向社會企業，這類高密度、短期但資源集中的行動，更需要被視為一個嚴肅的行動方案，而非單次合作。

在經濟面向：我們刻意設計了消費券制度，讓香港學生的三餐與飲料皆透過消費券向社區採購，而非由外部統包處理。課程講師的邀請，也優先選擇地方小農、社區達人、耆老、新住民與加納納等在地行動者，讓知識生產與勞動回到社區，而非由外來專業單向輸入。

在服務面向上，行動涵蓋社區健康長者、亞健康與失智長者、教會兒童、豐山與豐裡國小，以及新住民孩童的陪伴與輔導，也包含進入夜市進行防止家庭暴力的宣導。八天之中，實際與近兩百個家庭產生直接互動。居民在接待與互動過程裡，開始對「觀光」產生不同的理解，原來村落中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學習的一部分；無論是垃圾分類、高齡照顧、移民處境、失智議題，甚至大同戲院的經營模式，都成為彼此對話與觀看世界的入口。

（二）為何合作：一個被視為學習場域的行動現場

2025 年，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服務學習課程，選擇與牛犁建立合作關係，並非偶然。該課程以「實踐可持續生活的掙扎」為核心，關注可持續生計，如何在具體的社會經濟結構中被實踐，並引導學生理解農村與鄉郊社群在全球化與社會排斥條件下，如何回應貧困、邊緣化與生活不可持續的結構性問題。課程並不將「不可持續」視為個人能力不足的結果，而是試圖讓學生進入真實的社區情境，理解制度、歷史與生活選擇如何交織成具體的生活樣貌。

在尋找合作場域的過程中，香港理大並非只關注單一議題或成功案例，而是看見牛犁長期在社區中所累積的一種特質：行動並非由單一專業主導，而是透過陪伴、協商與關係勞動，在貧窮、老化、移動、照顧與災害等多重議題之間，緩慢形塑出

可持續生活的嘗試。這樣的場域，並不完美，也未完成，卻正好回應課程所關注的提問，可持續生活不是一種已被設計好的模式，而是在限制條件中不斷調整的行動過程。

對牛犁而言，這樣的合作同樣不是單向的「接待學生」或「展示成果」。理大課程強調學生須透過實地服務、訪談、影像紀錄與反思札記，進入社區的生活節奏，並在過程中檢視自身所受的專業訓練，是否真的能回應可持續與多元生活的需求。這樣的學習設計，使牛犁得以將社區視為一個真實的學習場域，而非被消費的研究對象，也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在資源、時間與人力高度集中的短期行動中，家園經濟、關係協商與行動倫理，是否能被實際放入學習與服務之中。

因此，這場合作並不是因為牛犁「具備示範性成果」，而是因為這裡仍在掙扎、仍在摸索，也仍願意將自身的未完成狀態，作為一個可被進入、被討論、被學習的行動現場。

（三）撐出來的行動

然而，這樣的行動究竟在村落中引發了哪些深層的對話與轉變，仍難以以短期、可量化的方式做出判斷。這些影響往往不會在活動結束後立即顯現，也不一定會以可見的成果形式出現。因此，即便至 2025 年 5 月已完成第二次合作行動，本研究仍不急於為這類行動下結論，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持續進行中的嘗試：在高度結構化的學習計畫與在地生活節奏之間，是否仍存在其他能夠促成社區對話與關係累積的可能形式，仍需時間檢驗。

若將視角拉長，並回到近兩年間所經歷的多次重大災害，包括海葵颱風、0403 花蓮大地震，以及樺加沙風災，便能隱約看見這些行動在村莊中所留下的痕跡。儘管它們未必以明確的「成效」呈現，但在災後的互助、資訊流動與即時行動中，豐田會的運作逐漸展現出一種集體回應的能力。這些能力並非在單一活動中被培養完成，而是在一次次看似零散的行動、學習與協商之中，慢慢累積，並在危機來臨時被喚醒。

也正是在這些時刻，村莊的力量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具體的行動樣貌，隱隱浮現於日常與災難交會的縫隙之中。

三、 緩慢行動中的辨識與共創

廉兮有些話語不斷的出現，讓我記憶深刻：重新回看反身性回觀，辨識框架的過程：

1. 從自己痛苦點、經驗，切入探索。
2. 不同生命經驗對照、辨別、自身所處條件
3. 由此理解自身層層社會結構下社會、政治、經濟的作用力，階級、性別、族群、主流眼光、權力...等，嘗試理解自身到他者如何辨識自己。
4. 解殖：辨識既有權力結構，看到結構、處境、歷史性的東西，對彼此觀點對焦，非各說各話，必須辨識是什麼形塑了我們此刻的行動和思考，覺察被形塑的固定視框並嘗試移動。

透過前述行動與案例的回看，家園經濟並不只是追求一種抽象的「共好」，更不是以善意之名要求所有人朝向同一個方向前進。真正困難、也真正重要的，是在差異之中，如何創造可以對話的空間，讓彼此得以辨識自身所處的位置、條件與限制，進而在不抹平差異的前提下，共同摸索可行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過程，無法仰賴英雄式的領導，也不是由少數人替他人決定答案。相反地，它需要的是持續的反身性回觀，從自身的痛苦與經驗出發，透過與不同生命經驗的對照，辨識階級、性別、族群與權力如何形塑我們的行動與思考。在這樣的辨識之中，所謂的「解殖」並非否定彼此，而是嘗試移動既有的視框，讓對話不再停留在各說各話，而能逐步對焦。

然而，這條路並不容易。人有長時間累積的習性，也有七情六慾，權力關係、情緒反應與既有位置，往往會在實際行動中反覆浮現，使協商變得困難，對話也容易破裂。因此，家園經濟並不是一條順遂的合作之路，而是一段需要不斷回頭整理、重新對齊的艱辛歷程。但也正因如此，它才值得被持續努力，不是因為它完美，而是因為它讓人有機會在差異與現實之中，學習如何不再以壓制或消滅作為解方。

家園經濟因此是一種關係性的實踐。它不以消除差異為目標，也不要求一致的價值，而是在反覆的對話、協商與行動之中，嘗試找到可以共存的方式。這樣的經濟實踐，往往顯得緩慢、勞累，甚至在制度績效與時間壓力下顯得「沒有效率」，

卻正是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互動與修正中，倫理得以被撐出來，行動者得以生成。

我想說的是，不是一套可複製的模式，而是一條仍在行走中的路。透過一次次行動，我們練習不要菁英式的敘事，轉而承認彼此的不完整，在差異之中持續協商如何一起生活下去。對我而言，這正是家園經濟最核心、也最真實的意義。

第五節 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

在這裡必須將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是理解與延續行動的方法說清楚，在我的行動與書寫中，我選擇以「生命敘事」作為理解行動的重要入口，但我也必須先說清楚：我所說的生命敘事，並不是在講一段感人的人生故事，更不是把苦難端出來換取同情。生命敘事更像一把鑰匙，讓我們能走進「為什麼你會這樣做」的脈絡，而不是只站在外面用結果評人、用產出貼標籤。當我們只看成果、只看投入與扛起來的份量，很容易把前線的人誤讀成性格特質：太拚、太扛、無擔當，甚至太情緒化。但把生命放回時間裡，就會看見：許多行動並不是「想做就做」的自主決定，而是在制度缺位、責任期待、人際關係、以及長期暴力與歷史壓力交疊之下，一點一點被推擠、被鍛鍊成的站位。

生命敘事的重要性，不只在於「解釋原因」，更在於「讓行動能被好好理解」。尤其在承擔沒有出口的時候，情緒常成為唯一的出口；但情緒也最容易被外界否定，彷彿貼上「太情緒化」就可以結案。對我而言，情緒不是失控，而是一種訊號：它在提醒支撐不足、界線被踩過、出口被堵住。當生命敘事被說出來，情緒就不再只是被指責的對象，而能被翻譯成可討論的公共問題：我們少了什麼支撐？壓力怎麼分散？責任可否重新配置？如何讓人不必靠燃燒來維持？

而生命敘事還會引出另一個更務實的提問：你是怎麼做下去的？這個提問，會把我們帶進「生活知識」的領域。也就是說，生命敘事不只提供理解行動的脈絡，也讓我們看見那些在日常中被磨出來、讓行動得以延續的做法與分寸。於是，本章試圖把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串在一起：一方面說清楚行動如何生成，另一方面也辨認出行動如何被延續、如何被共同承接。更簡單的說就是：「都很苦」只代表大家都被壓著，但被壓的方式是各自不一樣、身邊有沒有被接住也不一樣，所以長出的做法與價值觀就會不一樣。

從「心懷鄰里」這個命名出發，進入我實際的社區實踐現場，再到「家園經濟」

作為生活的理解框架，生命敘事始終貫穿其中，成為我辨識並生成「實踐知識」的重要方法。因此在這裡我必須將「生命敘事」這件事說清楚。

苦難不會自動把人變成同一種人；它只是把人推到不同的位置。位置、被接住的經驗、以及你怎麼解釋那份苦，會讓每個人長出不同的做事方式、格局與價值觀。

一、何謂生活知識：不是技巧清單，而是可延續的分寸

我所稱的「生活知識」，並非指一套可直接複製的技巧清單，也不是工法教學或流程手冊。它更接近一種在現場反覆實作、反覆失敗、反覆修補中生成的判斷能力、一種「手感」、一種拿捏分寸的智慧。這種知識往往不以正式語言呈現，卻深刻地支配著行動能否持續：什麼時候該停、什麼時候該等、什麼時候要找人一起、什麼時候要留退路；如何完成事情，同時不把人用壞、不把關係耗盡；如何在有限資源與高風險之下，仍然讓生活不至於崩解。

因此，生活知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是關於「把事情做完」而已，而是關於「把事情做得下去」。它使行動不必完全依賴個人的燃燒與意志，而能在關係與共同體中找到支撐條件。若說生命敘事回答的是「為何如此」，生活知識回答的就是「如何持續」。兩者合在一起，行動才不會只被看成結果與產出，而能被看見其生成史、其方法論、以及其得以延續的社會條件。

（一）苦難不是同一種苦

壓力來源不同：有人苦在「制度缺位、責任全落我身上」(就容易長出補位、扛起來的做法)；有人苦在「身分被排除、沒有安全感」(就更重視節奏、被聽見、慢慢來)；有人苦在「風險一直來、身體先撐不住」(就會走向邊界、修補、不要擴張)。所以看起來都在苦裡，其實是不同型態的困境。

（二）每個人被迫站的位置不同，視野就不同

你站在「要撐住系統」的位置，格局會往「怎麼讓事情不崩」去長；你站在「要讓人不被逼壞」的位置，格局會往「怎麼讓人穩下來」去長；你站在「要跟風險共處」的位置，格局會往「怎麼留白、怎麼減量」去長。位置不同，不是能力高低，

是責任落點不同。

（三）有沒有被接住過，會決定你怎麼對待別人

被接住的人，通常更知道「不要把人用壞」，也更願意把承接變成方法；一直沒人接的人，常只能靠硬撐，久了容易變成「只能靠我」的路徑。差別不在善不善良，而在生命裡是否曾有支撐。

（四）怎麼解釋自己的苦，會形塑自身的價值觀

有人把苦解釋成「責任」：我得扛、扛了才有秩序；有人把苦解釋成「關係」：我要讓人安全，關係才能走遠；有人把苦解釋成「風險」：我要守邊界，不然大家一起倒。同樣是苦，但意義不同，行動就不同。

（五）你最常遇到的失敗是哪一種，會決定你學到什麼

常遇到「組織要崩」的人，會學會補洞、建後台；常遇到「人被逼壞」的人，會學會節奏、照顧與陪伴；常遇到「自然反撲／災變」的人，會學會減量、修補與協商。價值觀常常是被現場教出來的。

二、三個生命敘事：知識的來源與行動的脈絡

在我、雪霞與鈞弼三人的生命敘事中，我看見生命敘事不只是呈現差異，更讓差異成為可理解的行動路徑。也在我們的敘事裡，我辨認出生活知識如何生成：它不是天生能力，也不是人格美德，而是人被迫站在某種位置、長期承受某種壓力後，為了不崩解而磨出來的做法。

同時，我也在此補上一個我常被問、自己也一直在想的問題：為什麼都在苦難中生活的人，大家的做事方式、格局與價值觀卻如此不同？我現在的理解是：苦難不是同一種苦，壓力來源不同、被迫站的位置不同、曾經是否被接住不同，還有「如何解釋自己的苦」不同，就會長出不同的價值主張與行動方法。有些人長出的是補位與扛起來，有些人長出的是節奏與安全感，有些人長出的是邊界與修補。差異不在誰比較高尚，而在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替自己找一條不致崩解的路。以下

三段敘事，正好讓這件事具體可見。

（一）雅帆：從「我撐」到「讓關係一起撐」、把支撐做成方法

我是一個被長期被期待「撐住」：撐生活、撐組織、補制度的洞、把別人的需要先放進來，自己放最後。這並不是因為我天生愛扛，而是當制度缺席、關係需求逼近時，我自然被推上補位的位置。我累積的知識並非抽象理念，而是一次次撐過失序與崩解後，身體與情緒留下的判斷：哪些地方不能再靠意志硬撐、哪些做法會把人耗盡、哪些責任若不重新分配就一定出事。

更重要的是，這些判斷逐漸被我做成方法；成為一套可分享、可讓別人接得住的生活知識：如何盤點人力與資源、如何把後台支撐做出來、如何拆成小任務讓夥伴能接手、如何在關係緊繃時把話說得不傷人、如何在危機前先把流程跑過一次。於是她開始從「我撐」轉向「讓關係一起撐」：不是退出責任，而是把支撐從個人的燃燒，轉化為共同體可以共享的條件。她的敘事也提醒我：承擔若無出口，最後會成為暴力；先傷到自己，也會傷到關係；而把出口做出來、把支撐分散出去，就是她在前線逐步長出的治理分寸。

（二）雪霞：從「被接住」到「願意接住」、把安全與節奏變成技術

雪霞的敘事從「被接住」開始。作為新住民，她最初位於被服務、被陪伴的位置；但也正是在被承接的經驗裡，她慢慢站穩，長出願意承擔的力量。她的生活知識有一種很珍貴的柔軟：她知道什麼節奏不會把人逼壞，也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能被同一套產出邏輯推著走。她在意「安全感」；讓人被聽見、不急著要成果、不把人當工具，讓人可以慢慢地長出能力與自信。

這些不是抽象的溫柔，而是她把「接住」做成了技術：如何降低一場活動的壓力、如何讓新來的人不尷尬、如何用做事的節奏帶出自信、如何在「要完成」與「不要用壞人」之間找到平衡。她所展現的家園經濟，也不只是技能訓練或收入，而是透過日常照顧與勞動重新加入生活循環，在關係中站穩自己的位置。她提醒我：生活知識不是天生的資本，它可以被培力、被生成；而生成的起點往往是有人願意先接住你；於是她也願意回頭成為那個接住別人的人。

（三） 鈎弼：與風險、土地、身體協商、把邊界智慧做成修補實作

鈎弼的路徑帶著邊緣經驗與早熟責任。在不安與創傷中很早承接，他習慣用承擔回應關係需求，也因此更早逼近身心邊界。多次災變、颱風破壞與失序的經驗，使他對「安全」有一種貼身理解：不是靠更大的計畫、更快的推進就會更穩，而是要與土地、身體與環境反覆協商。他傾向慢、修補型行動，拒絕被計畫綁架，因為擴張常常意味著代價被轉嫁給更脆弱的人與自然。

在這裡，他的生活知識是一種「不消除、不擴張」的手工倫理：如何在風險中留白、如何把等待與不做視為安全策略、如何讓空間自己恢復、如何在邊界中保留呼吸。於是他的共生不是浪漫理念，而是一種活下去的策略：從單向承擔轉向讓自然與關係也成為支撐；從硬撐轉向在邊界裡找回力量。這些轉向能成立，靠的正是——一套在現場磨出來的手感與分寸。

三、 從理解到承接：生命敘事作為公共行動

把我們三人的生命敘事並置，我更確定：生命敘事的價值不只在「講出經歷」，而是在讓我們看見行動的生成條件與知識的來源。它讓我們停止把人簡化成性格，停止把行動道德化成評價；也讓我們看見，很多被稱為「能力」的東西，其實是被迫承擔後磨出來的生活方法。當我們讀懂這些方法，就能更務實地討論：支撐要怎麼做？壓力要怎麼分？邊界要怎麼守？如何讓一個人不必靠燃燒，仍能在現場做事、又不至於崩解？

因此，生命敘事本身也是一種公共行動。它要求我們閱讀他人的生命記憶時，不停留在苦難的獵奇、可憐或淒慘，而是練習更有分寸地看見：他的主張如何長出來？他的站位如何調整？他真正需要被支持的是什麼？當敘事被如此對待，它就不再是可被取用的故事，而是讓當事人重新擁有解釋權，也讓共同體學會如何承接彼此。於是理解不再只是同情，而會更靠近一種成熟的溫柔：在不簡化他人的前提下，願意陪他把行動的路說清楚；也在不耗損彼此的前提下，慢慢找到「讓關係一起撐」的可能。

最後，我想說：當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被串起來，我們終於能說清楚；現場之所以走得下去，不是因為有人特別能扛，而是因為有人把方法磨出來、把分寸守住、

把支撐做成共同體的一部分。而這，正是我在這篇研究中最想留下的理解與邀請。

第六節 小結

對我而言，本章要談的「實踐知識」，不是一套可複製的方案，也不是把經驗整理成一張流程表，而是在制度撐不到、資源也不足的日常裡，我們如何一次次把生活撐住、把關係撐住，並在反覆失手與修補之間，慢慢長出一種做事方向：讓生活回到中心，讓人可以一起活下去，讓資源與責任不再只往少數人身上集中，並且在可承受的節奏裡，維持行動的延續。

回看第一至第四節，我更確定：這條路從來不是線性推進、逐步完成，而是不斷被現場打斷、被關係牽動、被制度邊界逼迫，然後再回頭調整與重對齊的過程。無論是第一節所談的「後台建設」，讓我重新理解「行動者之所以能回應他人」，往往不是因為意志或道德高度，而是因為曾經被支撐、被允許穩住；或是第二節鈞弼的敘事所揭示的：承擔之所以沉重，核心不在個人的性格，而在於長期缺乏可分擔的結構，使責任只能以單向補位的方式維持世界運作；

第三節「豐田會」則提醒我：制度失能並非例外，而是常態，而真正能在縫隙中啟動治理的，是早已存在、卻經常不被承認的關係網絡；

而第四節回到「家園經濟」時，我想說的也從來不是替代性經濟的設計藍圖，而是替那些一直都在、卻長期被忽略的生活實作重新命名——把「人如何一起生活、資源如何不被耗盡、關係如何不被用壞」放回評價核心。這也意味著：家園經濟不是效率競賽，而是一種關係性的實踐，需要在差異、情緒與權力關係反覆浮現的現實中，持續協商共存的方式。它緩慢、勞累，也常被視為「沒有效率」，但正是在這些微小的修正裡，倫理才得以被撐出來，行動者才得以生成。

也因此，第五節之所以必須被放進來，是因為如果不處理「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前面那些行動很容易又被讀回「成敗」或「個人特質」：誰比較扛得住、誰比較有能力、誰比較情緒化。但生命敘事讓我能把行動重新放回生成脈絡：一個人的位置、是否曾被接住、以及如何理解自己的苦，會形塑出不同的做事方式與價值取向。

更重要的是，生命敘事不是為了替痛苦找一個結論，而是讓「情緒」不再被當作可以結案的雜訊；情緒是一種訊號，提醒支撐不足、界線被踩過、出口被堵住，

進而把私人痛苦翻譯成可討論的公共問題：我們少了什麼支撐？壓力要怎麼分散？責任能不能重新配置？

而當生命敘事把問題帶到這裡，下一步就會逼出更務實的提問：那你究竟是怎麼做下去的？這個提問把我帶進「生活知識」——不是技巧清單，而是一種在現場反覆實作、失敗、修補中磨出的手感與分寸：何時該停、何時該等、何時要找人一起、如何完成事情又不把人用壞、不把關係耗盡。

因此，本章最後想留下的，不是「我們已經完成了家園經濟」，而是：家園經濟之所以值得被理解，是因為它把看似瑣碎的日常互助、分工交換、節奏拿捏，重新視為一種可被回看、可被承接、也可被討論的實踐知識。它提醒我們：真正的困難不只是缺資源，而是缺乏能讓承擔被分攤、讓關係不中斷、讓人能在可承受的節奏裡持續做事的共同性。當這種共同性被制度與成長邏輯反覆削弱時，生活就會被推向燃燒式的維持；而生命敘事與生活知識的工作，正是把這些燃燒背後的結構條件、分寸技藝與分攤可能，重新說清楚、重新放回公共視野——讓那些原本只能靠硬撐的經驗，慢慢長成一條更可延續的路。





第七章 結論：從「我」到「我們」的知識生成路徑

有沒有一種視野，能讓我們了解生活的意義？

有沒有一種知識，能讓我們無愧彼此？

有沒有一種獲致知識的方法，能讓我們跨越巨大社會距離的區隔，

讓人能辨識、理解與接納人我生命處境的差異，

在更廣闊相連的生命視域中，集體創造差異共在的人間。³⁸

第一節 路徑型結論：在關係縫隙中生成的知識與倫理

這是很喜歡廉兮（2009：260）的一段文字，從入學後就深深被這一段字吸引，也告訴自己，這就是我的行動指南。雖然本論文的書寫在此暫告一段落，但行動並未因此停止。在日常的關係與事件中，我們仍持續前行，也持續修正。每一次回看與調整之間，仍然會出現情緒、分歧與拉扯；差別在於，我們逐漸學會停下來、傾聽、協商，再重新出發，並為尚未完成的行動保留重新開始的可能。這樣的節奏，正是本研究所理解的地方實踐狀態。

因此，本研究起步於一個長期卡住我的疑問：當治理語言把人快速框進「問題—解方」，我們還能不能用另一種更貼近生活、也更負責任的方式理解現場？我所面對的不是單一個案的困境，而是體制節奏來不及、資源不對等、關係承擔被迫內化時，生活如何繼續被撐住。於是我選擇把「知識」放回行動與關係：不以完成方案為終點，而以辨識「怎麼撐出空間、怎麼讓人能繼續一起活」為研究核心。這也意味著，本研究並非要交出一套可複製模型，而是要說清楚一條路徑：我如何在現場被推著走、如何在回觀中修正看法、又如何把那些原本只存在於「撐住生活」的判斷，整理成可被對話、可被承接的知識。

我到底看見了什麼？我看見「手工知識」不是個人靈感，而是一種在行動中不斷生成的判斷：它關心會不會把人用壞、把關係弄斷、把自己耗盡；它是在生活現場、在關係裡做選擇，反覆拿捏分寸、修正做法。我也看見「承擔」常是制度缺席下被逼出的行動位置；若長期犧牲沒有出口，那會變成暴力，而非美德。因此，我

³⁸廉兮（2009）在〈沒有理解、何來公義？論主體生成的多元文化教育〉p260 裡面的一段文字，從入學後就深深被這一段字吸引，也告訴自己，這就是我的行動指南。

把倫理放回「關係中的關係」：倫理不是一次定案的原則，而是在每一次停下來、傾聽、協商、再出發之間生成；共生也不是完成式答案，而是一個仍在學習、尚未完成的過程，倫理永遠處在調整中。再者，我看見經濟原本應服務生活，而不是統治生活；互助、循環與信任本身就是經濟行動——它們不是情義的附屬品，而是家園得以繼續的基底。

我站在哪裡說？我站在「我」與「我們」之間說：置身其中、承擔風險、揭露困境。我的位置不是旁觀者，也不是替他人代言的發言者；我是一個在場的行動者與敘事者，必須對自己的介入負責，並把自己如何看、如何做、如何被脈絡推動公開出來，讓這份知識可以被檢驗、被討論、被修正。也因此，這篇論文的貢獻不在於提出一套抽象理論，而在於新增一種說法與方法：我把現場的「撐住」重新命名為可分析的實踐知識——以手工知識作為入場視框、以生命敘事進行視框移動的回觀、以家園經濟理解互助照顧與共享資源的生活治理。這三者串成一條路徑，使那些常被視為瑣碎的分工、接送、借物、照顧與補綴，不再只是背景，而成為理解行動倫理與地方治理的關鍵材料。

同時，我也必須誠實交代本研究說得到哪裡、說不到哪裡。第一，本研究材料高度在地性，呈現的是一條在特定關係網絡中生成的路徑，因此我不主張它可被直接複製；它更像一張可供參照的地圖。第二，作為同時置身其中的行動者與書寫者，我能貼近細節，但也可能因位置而看不見某些沉默、衝突或權力不對等的全貌；我只能在倫理允許的邊界內揭露困境，而非把所有關係攤開成研究材料。第三，本研究刻意不以量化績效作為核心評估，因此對制度性成效的統計性比較著墨有限；後續研究可以在不傷害關係的前提下，補進跨場域對照與長期追蹤，並更深入分析計畫語言如何形塑地方互助與承擔的分配。

第二節 結論：在行動中生成—實踐知識

回顧全書六個章節，可以看見本研究並非從一個事先界定清楚的研究問題出發，而是源於我長時間置身於社區實踐之中，反覆經歷承擔、修正、挫折與回看所累積出的理解路徑。我並非站在旁觀者或分析者的位置，而是作為一個深度被捲入其中的行動者，在制度、關係與事件交錯的現場中，帶著情緒進場，一邊行動、一邊學習，也一邊承受與調整。

第一章從我的生命經驗與社區工作的起點出發，說明我之所以進入社區，源自對「人是否能好好活著」的深層痛苦——那不是抽象題目，而是家庭、貧窮、遷徙與勞動經驗反覆浮現的刺點。因此，社區自始便不是單純的工作場域，而是一個回應生活能否被撐住的現場；生命敘事也不只是書寫方法，而是用來辨識行動動機、位置與責任的途徑。本章的貢獻在於把「背景交代」轉化為可被學術檢驗的方法論起點：透過命名、回望與視框分析，呈現行動者如何被塑造、如何介入、又如何在關係中修正判斷；並以「手工知識」作為入場視框，將行動從完成任務轉向撐住關係、拼裝補綴與協作磨分寸，使日常瑣碎成為可分析的知識材料。同時，本章以視框移動避免把弱勢快速寫成「問題—解方」，並以家園經濟重新定位互助、照顧與共享資源為生活治理的核心。總之，本章完成全篇定錨：以「我與我們」的置身站位，將行動中的判斷整理為可對話、可承接的實踐知識。

第二章在於把「裂縫」明確提煉成一種可工作的認識視角：知識不是從完整系統裡被教會，而是在資源不足、責任擠壓與關係拉扯中，靠身體與關係先撐住、再慢慢說清楚。我在本章新增了三個關鍵知識點：第一，把疤痕、繭、節奏、撤退 / 冒險時機等「勞動的身體記憶」轉譯為手工知識，指出它不只是謀生技巧，而是帶著倫理重量的分寸（如何不把人用壞、不把關係弄斷）。第二，提出「縫補工法」作為跨世代的行動語法：母親以婚姻求生的依附策略，與我以資源 / 計畫 / 有給職創造公共位置的轉譯，不是道德對錯，而是同一匱乏結構下生存策略如何改寫。第三，把行動倫理重新定義為「生活逼近崩裂時，如何不能不做」：在家庭極限分工、與鈞弼由補償走向承擔的勞動路徑中，我指出衡量行動的核心不是指標，而是關係能否續、人能否留下、日子能否被治理下去，從而為後續章節鋪出「如何活下去且不孤單」的實踐知識基底。

第三章提出「行動的分寸軸」作為社區工作可被對話的知識貢獻：在治理語言的績效要求與生活倫理的拉扯中，不選邊站，而以手工式的調音把「溫度」與「秩序」同時撐住。它把培力從訓練 / 證照的進步敘事，轉回現場協作中生成的判斷力：如何在有限資源裡先救人、再治理；如何讓規範保護人而不壓人，讓情感修補規範而不取代規範。章中以紅包、音響、薪資與急難救助等事件，示範可參照的工法：人命優先序、特例可回溯、信任預算、風險可分攤、情感勞動可見化、政策語 / 生活語雙向翻譯與修復節奏（看見—說清—補回—記錄）。因此，行動不再把人快速

框成「問題—解方」，而是把誰被迫承擔、誰能被接住的關係結構說清楚，讓治理被重新定義為可持續的倫理拿捏。

進一步聚焦於世代交會所引發的張力，特別是在勞動權益、勞基法與組織倫理之間的衝突。年輕世代提出的，並非拒絕付出，而是另一種希望留下來的的方式。這迫使我重新學習「一起工作」的意義：不是要求延續情感式的無償付出，而是如何在制度化的條件下協商，讓彼此能夠好好生活與工作，承擔在此不再只是美德，而逐漸顯露其邊界，並指向共生關係的必要。

第四章在於，把社區工作裡常被拿來衡量的「成功 / 成長」，從「把事做完、把問題解掉」移回「關係能否繼續、對話能否發生」。透過雪霞、阿玉、小明與「同一事件」的重看，本章指出：成果導向若未被關係倫理約束，容易把人推進可被管理的秩序，甚至在效率與分工中再製權力。相對地，真正的成長不是更會解題，而是更能承受差異與矛盾、願意把理解放回集體討論中被修正，並練習容錯、求救、分擔責任，為彼此留出「可持續的餘地」。而「多重置身」是本章的關鍵論述：我同時是母親 / 女兒 / 妻子 / 學生 / 主管 / 老化身體，這些位置交織成權力網，使我一方面承受制度要求、一方面也可能施加要求；因此理解不是善良，而是反身辨認「此刻是哪個位置在說話」、承認矛盾，讓行動從判斷走向協商，從「我完成」走向「我們一起撐」。

第五章的知識貢獻在於：把「社區」從制度化的社造 / 社福語言（指標、期程、核銷）中抽離，重新命名為「地方行動」——它不是任務的執行，而是在關係裡、在責任與情感之間，為了讓彼此能繼續活下去所生成的回應。由此，本章翻轉「成功 / 失敗」的理解：成功若只被當成個人能耐，會變成壓迫槓桿（越能者越多做、越多做越孤單），讓制度得以順暢運轉卻不必面對結構性負荷；失敗若被歸咎個人，則把挫折化為羞愧與互相埋怨，形成沉默與「弱弱相殘」。相反地，成敗應被視為關係調頻與制度壓力的訊號，促使團隊把難處說出來、把分工重新協商，讓「我」能被織回「我們」，把可持續的共事條件一點一點縫出來。

其次，本章提出「看不見的邊界」作為辨識工具：許多卡住不是技術不足，而是照顧責任、階級預設、語言與資訊落差、參與規則與資源配置所形成的無形門檻，使人身在同一個社區卻被擋在「被看見、被承認、被包含」之外。弱勢者看似退縮、盤算或選擇「不那麼好」的路徑，往往是被迫形成的生存戰術與日常治理能力；他

們不是沒有倫理，而是必須先讓家庭與生活不崩壞。從雪霞等行動者的生命經驗出發，本章重新理解在結構匱乏中長出的生存實作：她們的行動並非來自道德高度，而是根植於生活知識、手工倫理與關係網絡。也因此，本章完成一個關鍵的理論翻轉：倫理不是個人修為，而是一種需要被制度條件與關係網絡所「允許」的狀態；當生存不再被即時威脅，倫理才可能轉化為對他人的照顧與公共行動。於是韌性倫理也不再是英雄式抗衡，而是「手工式修補」：在破裂中願意再靠近、再協商、再留餘地，讓權益成為關係的底板，讓制度回到服務共同生活，而不是把人推離彼此。

第六章可提煉的知識點：把路徑知識具體化：將社區行動理解為「回看—辨識—修正」的累積，而非先有藍圖再執行；並指出實踐知識社群（能一起回看、校準分寸的人）是讓經驗可追溯、可討論、也不被快速收編的生成條件。

提出「後台建設」作為行動倫理的基礎：倫理不是個人美德，而是被薪資穩定、任務邊界、情緒承接等條件允許後，人才可能從生存焦慮轉向照顧他人，並走向公共性；後台因此是一種照顧政治。

重寫「承擔→共生」的意義：承擔若缺乏可分擔的結構，會內耗並把人推回孤立；共生不是讚美犧牲，而是把責任拆開、把節奏調到可承受、保留尊嚴與出口，讓「一起」有制度性的站位。

以災害經驗指出制度空白與關係治理：海葵、樺加沙顯示制度在關鍵時刻常失聯；關係網絡與「豐田會」在救援未進場的空白時間先啟動，形成快速動員、分工盤點、跨鄉支援的彈性治理。

重新命名「家園經濟」的核心評價：家園經濟不是替代性方案或效率競賽，而是日常互助、交換、共享與循環的既有實作被看見；評價重心從績效轉向——人能否一起活下去、關係是否站得住、責任是否能分攤。

第三節 行動的條件限制與結論

一、行動的條件限制

本研究的限制主要有三點。第一，材料與場域高度在地性：我呈現的是一條在特定地方關係網絡中生成的路徑，因此不以「可複製」為主張；它更像一張地圖，供類似處境的工作者參照與對話。第二，我同時是行動者與敘事者：這使我能進入

細節、看見協作的分寸，但也可能讓某些衝突、沉默與權力不對等更難被完整呈現；因此我需要持續在書寫中自我校準，避免把靠近誤當成理解已完成。第三，本研究偏重「生活如何被撐住」的機制與倫理，對於制度化成效的量化評估與跨場域比較，著墨相對有限，這是研究取向的選擇，也構成後續可補強之處。

二、 本研究的貢獻

本研究的貢獻可歸納為三點。第一，在概念上，我將「手工知識」從個人技巧的視角，移回制度縫隙中的集體協作：知識不是先被定義再套用，而是在協作、批判、回看與承擔之間，逐步被磨成可共享的行動智慧；因此，「有效」不再只是績效完成，而是能否撐住關係、撐出可行空間。第二，在方法上，我以生命敘事進行「視框移動」的回觀：讓敘事不落入自傳式抒發，而成為辨識我如何看、如何介入、又如何被脈絡推動的分析路徑，並將研究者的置身位置公開化為可討論、可被檢視的倫理站位。第三，在實務上，我以「家園經濟」重新命名社區中常被忽略的生活治理，把經濟從市場與成長的語言拉回互助、照顧、分工與共享資源，指出這些日常勞動不是背景，而是社區能否活下來的基底。綜合而言，本研究不只描述個案，更回應「知識如何在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中被一點一點創造出來」這個核心問題。

三、 研究的定位與後續方向

然而，本研究雖已提出上述三項貢獻，並不主張以此交出一套可終結社區實踐的「完整解方」。我所辨識的是一條仍在生成中的路徑：行動並非源自個人的意志或英雄式能耐，而是在被撐住的條件裡，逐漸形成撐住他人的可能；當制度無法即時回應生活，關係便成為人們得以繼續行走的支撐。那些在日常修補、照顧與互助中累積的生活知識，經由回看與整理，才逐步轉化為可被理解、被承接、並得以延續的實踐知識。也因此，對於某些讀者期待的量化成果或制度化成效評估，本論文的回應相對有限。後續研究可在不破壞關係倫理的前提下，補進跨場域比較與長期追蹤，並更細緻分析「計畫語言」如何改寫地方互助與勞動關係，使這條路徑能更充分進入公共討論與被制度承接。換言之，這裡不是結束，而是把一條可走下去的路先辨識出來，作為後續對話與行動的起點。

總結而言，這是一篇「路徑型結論」：它不宣告完成，而是把我如何學會在縫隙中撐開空間、在關係中覺察邊界、在承擔中尋找出口、在互助中重新理解經濟的過程說清楚。它也把一個承諾留給未來的行動：願我們都能成為願意調整的人——看見身體的耗損與情緒的極限，不把長期犧牲當作理所當然；並在每一次分歧與拉扯裡，仍願意停下來、傾聽、協商，讓「我」與「我們」在尚未完成之中，繼續走下去。

一種在行動中不斷生成的判斷

關心會不會把人用壞、把關係弄斷、把自己耗盡。

是站在生活現場、關係裡面做選擇的，不斷拿捏分寸、修正做法。

明白「承擔」是制度缺席下被逼出的行動位置，

長期犧牲若無出口，那會是一種暴力。

希望我們都能成為：能覺察邊界、做一個願意調整的人。

也能明確看見身體耗損、跟一個人的情緒極限。

而關係中的關係本身就是倫理生成的場域。

共生是一個仍在學習、尚未完成的過程，倫理永遠處在調整中

經濟原是服務生活，不是統治生活。互助、循環、信任本身就是經濟行動

「我」與「我們」的位置就是：置身其中、承擔風險、揭露困境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丁乃非 (2006)。拼裝車上手工業——「一小支文化抵抗的心理教育實踐路徑」。應用心理研究, 31: 240-245。
- 王淑娟 (2000)。對「家」之情感與意義的轉變：一個家庭教育者的重生〔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
- 王淑娟 (2010)。盈豐行的小女兒：走過貧窮與性道德壓迫。應用心理研究, 48, 39-78。
- 丘延亮 (2004)。演敘「貧窮文化」——劉易士書寫的考掘與譜系及我人的閱讀與踐行。收錄於丘延亮 (譯)，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導讀三，頁 57-106)。巨流。
- 丘延亮 (2006)。實踐永遠是在理論的前頭：解讀一個行動研究在地踐行的自敘。應用心理研究, 31, 246-249。
- 丘延亮 (2008)。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對話。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丘延亮 (2014)。從庶民發聲到萬邦思考：庶民研究、南地、與你我的關聯。文化研究：底層研究學刊, (出版中)。
- 成虹飛 (2014)。行動 / 敘說探究與相遇的知識。課程與教學季刊, 17(4), 1-24。
- 余桂榕 (2009)。採收自在：布農部落婦女生活教育的故事〔碩士論文，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 余雲楚、梁志遠、謝博齊、邱延亮 (2004a)。生業、職業、專業與志業——助人志業自主抗爭的社會學反思〔研討會論文〕。台灣行動研究學年會，臺北，臺灣。
- 何粵東 (2005)。敘說研究方法論初探。應用心理研究, 25, 55-72。
- 官大偉 (2024)。〈團結經濟與合作社教育〉，《原教界》，期 120，頁 13-X。
- 阿席斯·南地等 (2021)。創造國族：羅摩誕生地運動與恐懼自身 (李孝智、黃詠光譯)。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林香君 (2015a)。互為主體中建構主體性：實踐取向自我敘說、置身處境、在地實踐。教育實踐與研究, 28(2), 181-212。
- 林香君 (2015b)。立於實踐：我對自我敘說研究方法的辨識與選擇。應用心理研究, 63, 189-238。
- 林香君 (2015c)。置身處境、在地實踐：走一條主體性的專業發展道路。應用心理研究, 63, 51-104。
- 許寶強 (2007a)。告別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許寶強 (2007b)。資本主義不是甚麼。人民出版社。

- 夏林清 (1993) 。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張老師文化。
- 夏林清 (譯) (1996) 。變：問題的形成與解決 (原著出版資訊待補) 。張老師文化。
- 夏林清 (2004a) 。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應用心理研究, 23, 131–156。
- 夏林清 (2004b) 。做個快樂的動物機器——人：分進合擊的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 24, 58–62。
- 夏林清 (2006a) 。在地人形：政治歷史皺摺中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應用心理研究, 31, 201–239。
- 夏林清 (2006b) 。手工知識的勞動組合。應用心理研究, 31, 250–252。
- 夏林清 (2008) 。卡榫：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哲學與文化, 35(1), 123–151。
- 夏林清 (2010) 。走在解殖的路徑中：拮抗同行的社會學習。應用心理研究, 45, 45–72。
- 夏林清 (2012) 。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 夏林清 (2020) 。大小團體動力學：理論、結構與工作方法。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莊勝義 (2011) 。多元文化與教育正義：教育政治哲學的觀點。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4, 323–331。
- 游雅帆 (2013) 。女性社區工作自我實踐的身影－以牛犁協會女性為例。碩士論文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 廉兮 (2008) 。越界生活：理解邊緣處境的教育敘事。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 82, 259–268。
- 廉兮 (2009) 。沒有理解、何來公義？論主體生成的多元文化教育。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1, 259–268。
- 廉兮 (2010) 。從中心到邊緣的教育行動〔研討會論文〕。海峽兩岸行動研究交流研討會，花蓮，臺灣。
- 廉兮 (2012) 。從個人到公共：抵抗與轉化的教育行動研究。應用心理研究, 53, 21–45。
- 廉兮 (2013) 。抵殖民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的主體生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1，1–31
- 廉兮 (2014) 。庶民視角的教習踐行：邊界文本與抵殖民的家園政治。台灣文學研究, 6, 81–124。
- 陳光興 (2000) 。文化研究在台灣到底意味著什麼？收錄於 陳光興 (編) ，文化研究在台灣 (pp. 7–25) 。巨流。
- 趙剛 (2006) 。「多元文化」的修辭、政治和理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2, 147–189。

- 黃婉瑜 (2015) 。儒學的慰藉與傷害：追影子的人〔資料類型待補〕。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 張茂桂 (2002) 。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收錄於 台灣的未來 (pp. 223-274) 。華泰。
- 張育華、王芳萍、拔耐·茹妮老王 (2013) 。伏流潛行：女性社運工作者練功手記。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 鍾佩怡 (2013) 。工人女兒主體生成的矛盾探究〔學位論文層級待補，國立東華大學〕。
- 瑪達拉·達努巴克 (2014) 。找路·回家：不再「靠勢」的原住民同志教師〔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 鄭曉婷 (2008) 。行走中的認識：活化生命的書寫行動〔碩士論文，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 福柯 (Foucault, M.) (1992)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蘇峰山、劉玉珍、劉明清譯) 。時報文化。
- 福柯 (Foucault, M.) (2015) 。規訓與懲罰 (劉北成譯) 。三聯書店。
- 謝雪紅 (2004) 。我的半生記 (楊克煌筆錄；楊翠華編) 。楊翠華。
- 謝國雄 (2007) 。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群學。
- 蕭昭君 (2007) 。「妳媽媽的故事有什麼好寫的？」——生產「禮讚女性」教學知識的行動敘說。教育實踐與研究, 20(1), 201-226。
- 阿蘭·圖海納 (2003) 。我們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異 (狄玉明、李平沅，譯) 。商務印書館。

英文文獻

- Argyris, C., Putnam, R., & Smith, D. M. (2000) 。行動科學 (夏林清譯) 。遠流。(原著出版於 1985 年)
- Altrichter, H., Posch, P., & Somekh, B. (1997) 。行動研究方法導論：教師動手做研究 (Teachers investigate their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of action research) (夏林清、中華民國基層教師協會譯) 。臺北市：遠流。(原作出版於 1993 年)
- Bernstein, R. J. (1992) 。超越客觀主義與相對主義 (郭小平等譯) 。光明日報出版社。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2009) 。布赫迪厄社會學面面觀 (李猛、李康譯) 。麥田。
-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3) 。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 (蔡敏玲、余曉雯譯) 。心理出版社。

- Clandinin, D. J., & Connelly, F. M. (2008)。敘事探究：質的研究中的經驗和故事（張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 Freire, P. (2003)。受壓迫者教育學（方永泉譯）。巨流。（原著出版於 1970 年）
- Freire, P. (2011)。希望教育學（方永泉、洪雯柔、楊洲松譯）。巨流。（原著出版於 1992 年）
- Geertz, C. (2002)。當前我們的思維方式：通往一種關於現代思維的民族誌（楊德睿譯）。收錄於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pp. 205-226）。麥田。
- Geertz, C. (2009)。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方怡潔、郭彥君譯）。群學。
- Geertz, C. (2013)。論著與生活：作為作者的人類學家（〔譯者待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Lewis, O. (2004).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丘延亮，譯）。巨流。（原著出版於 1959 年）
- Mignolo, W. D. (2021)。解殖：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王嘉蘭、周俊男、唐慧宇、黃杰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 Rabinow, P. (2008)。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高丙中、康敏譯）。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於 1977 年）
- Sahlins, M. (1988)。原初豐裕社會（丘延亮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1), 159-181。
- Terkel, S. (1997)。Working。The New Press.
- White, M., & Epston, D. (2001)。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廖世德譯）。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 1990 年）
- Whyte, W. F. (1994)。街角社會：一個意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黃育馥譯）。商務印書館。
- Willis, P. (2013)。學作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秘舒、凌旻華譯）。譯林出版社。

附錄

附錄一 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簡介

一、協會緣起與概念

豐田地區（花蓮縣壽豐鄉-豐山、豐裡、豐坪三村）自 1913 年，歷經日本移民開村經營，及至客家、閩南、原住民、外省、新移民等，先後遷來定居，雖然大家來自不同族群與地區，而大家之所以會選擇遷來豐田定居的目的，卻是相同的，那就是為自己找到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家園。

在走過豐田地區風光的歷史歲月後，同屬農村型社區的豐田，面臨著產業轉型，社會結構變遷，以致產生了：農地休耕、人口老化、外流、單親隔代教養、城鄉落差等議題，同時也造成在地傳承文化逐漸消沉與流失。當然為解決農村型社區多元性議題，除仰賴政府相關部門，推出有效的政策，而社區「自覺」，以及社區因應時局變遷「能力」的養成，其實才是維繫農村社區永續經營最有力的要素。

1996 年，為因應農村社區變遷，協會由幾個家庭成員組成團隊，於豐田地區開啟推行社區總體營造事務，亦期以提振社區「自覺」與「能力」的養成，來因應社區面臨的各項議題。

2001 年協會正式立案，即以「協助社區奠立永續經營模式，並以發展文化產業、生態教育，以及推展社會服務、福利、照護暨環境教育」作為協會宗旨任務。因此多年以來，我們除了積極培育在地作業推行人才，還進行文化資產暨資源調查，推行鄉土、環境、生態守護教育，辦理民俗文化活動，深入居家關懷照護服務。並以『禮運大同』之「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作為協會理想願景，更以「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建制老人照護服務系統」、「關懷青少年教育」當作是我們的工作目標。然而在整體事務推行效益檢討下，我們覺得，唯有將社區各項面臨議題、事務，融入「環境教育」概念，並將豐田地區營造成為一個—「環境教育學習型社區」，才得以奠立永續經營基礎架構，而為能具體實踐，我們制定出六大實施作業策略：

(一) 奠立在地認同：

以推行鄉土、文化教育，來促進地區居民、學子，對在地文化的重視，並以辦理在地性文化活動，來形塑出在地共同認同的傳承文化。

(二) 培育在地自信：

以培育在地性多元專長，來拉近城鄉教育資源的差距，並以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以及各項營造事務績效，獲得各界肯定，來提升居民、學子，在地生活自信心。

(三) 迎合社區需求：

藉由深入居家訪談、服務，收集不同族群、年齡層之實值需求，制定出促進方案、計畫。

(四) 妥善運用資源：

人力為社區最重要資源，因此培育在地多元作業能力人才，來妥善開發運用在地資源，並導引外在資源整合運用，投入整體營造事務。

(五)力行環境守護：

執行環境、生態改善營造、資源調查建置、監測巡守護、彙編環境教育推行教材、手冊，辦理宣導教育，提升社區居民對環境、生態重視與守護。

(六)促進整體發展：

建立社區生活、環境安全防制作業系統，各項設施、場域結合教育議題營造，帶動聯結地區相關業者，共同推行社區生態體驗之旅，以及提倡無（低）污染產業發展，形塑地區成為「環境教育學習型社區」，奠定社區永續經營基礎架構。

2005 年起協會獲行政院徵選擔任「六星計畫-進階示範社區」，亦針對「六大面向」，制定出細部實施計畫與規範：

(一)產業發展面向：

- 1.培育在地開創人才。
- 2.促進產業聯結發展。
- 3.帶動週邊產業開發。
- 4.在地資源妥善運用。
- 5.結合社造事務推行。
- 6.不得與民爭利。

(二)人文教育面向：

- 1.奠定在地認同。
- 2.培育在地自信。
- 3.力行文化資產守護。
- 4.深耕在地生活文化。
- 5.以環境教育作根基。

(三)社福照護面向：

- 1.開設關懷服務據點。
- 2.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 3.執行居家關懷服務。
- 4.推行代間教育。
- 5.協助生活需求服務。
- 6.開創在地就業機會

(四)社區安全面向：

- 1.建置登錄通報系統。
- 2.制定促進方案作為。
- 3.推行安全防制教育。
- 4.環境安全巡守護。
- 5.綠色安全環境營造。

(五)環保生態面向：

- 1.培育環保志工團隊。
- 2.推行環保生態教育。
- 3.環境生態資源建置。
- 4.生態環境守護營造。
- 5.建構成為環教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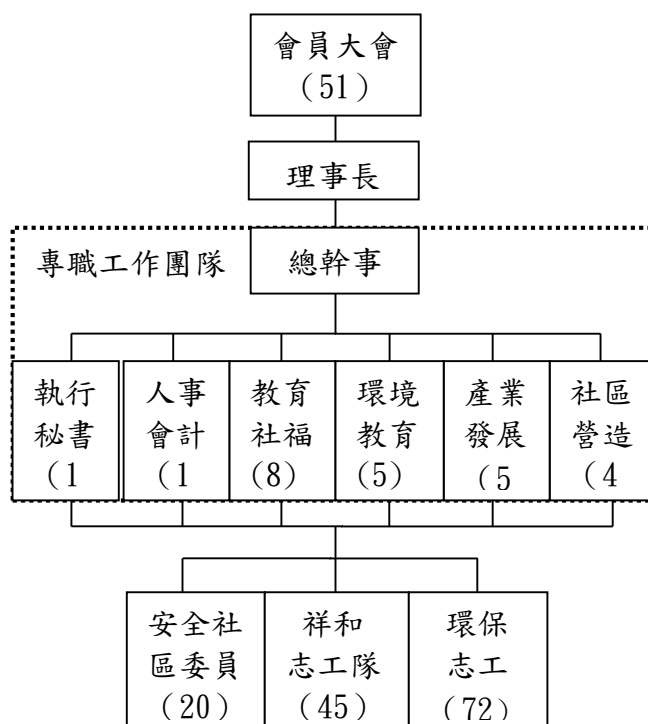
(六)環境景觀面向：

- 1.制訂認養維護機制。
- 2.培育社區美學概念。
- 3.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 4.型塑環境景觀特色。
- 5.奠定自力營造能力。

2007 年而為能深耕夥伴「核心價值」，以及拓展「社會責任感」，逕向地方法院登記為「社團法人」組織，並將「同心圓」營造概念-「能力輸出-資源帶入-群策群力」，來鼓勵自我成長，以為地區引進資源，並能與社區各社團組織，建立起良好的協力合作關係，邁向「社會企業」發展做好準備。

協會自 1996 年起從事社區營造事務至今，這期間我們不斷面臨著內、外多元議題的挑戰，而我們秉持不變的概念，那就是「不想做事的人-很會為自己找到許多個好理由」、「想做事的人-卻只會為大家找到一個好方法」、「做對的事-沒有人會反對」。

二、協會組織架構



三、歷年出版刊物、手冊

項次	手冊書籍名稱
1.	「發現豐田」一個日本移民村的誕生與發展
2.	豐田嘛是捱也屋－東部客家移民史
3.	社區林業－豐田地區保育共生植物手記
4.	踏旅豐田濕地
5.	你來，我來，打造豐田的美好
6.	豐田地區導覽手冊
7.	花蓮地區社區林業成果集
8.	檳榔玩偶環境教育教材
9.	軟陶環境教育教材
10.	臺灣夜鷹觀察手冊
11.	社區文化資產尋寶手冊
12.	豐田濕地導覽手冊
13.	圓夢社區家族樂園
14.	牛犁記集
15.	愛上豐田手冊
16.	豐田抒文集
17.	社區文化資產守護教材
18.	縱谷社區深度之旅手冊
19.	花蓮溪的生命樂章
20.	牛犁傳記

21.	守護我們的荖腦山手冊
22.	生命故事繪本集
23.	豐田地區社區林業-執行成果展示宣導體驗手冊
24.	豐田環境教育學習中心-「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通過教案」
25.	花蓮縣原住民部落民俗植物調查集-來自山野的回音
26.	後山來去-豐田村誌
27.	嘉仁的家人繪本

四、歷年獲得各相關單位頒發獎項

項次	評 選 績 效
1.	91 年獲文化部評定為全國七大優質社區
2.	92 及 95 年花蓮林區管理處評定為花蓮區社區綠美化績優社區
3.	92 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評定執行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指標單位
4.	93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評選為全國社區綠美化模範社區
5.	94 年交通部觀光局評選為全國最具發展觀光潛力社區第二名
6.	94 年營建署城鄉局評定地方文化特色入選社區
7.	94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評選為社區綠美化全國十大模範社區
8.	95 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評選為「94 年度多元就業經濟型」計畫執行績優單位
9.	95 年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評定為指標型績優單位
10.	95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評選擔任社區林業第二階段-四年計畫示範營造社區
11.	95~97 文化部評選擔任「六星進階型示範社區」
12.	96 年花蓮縣環保局評選為環保有功社團第二名
13.	96 年花蓮縣教育局評選獲頒社會教育有功團體
14.	96~102 年花蓮縣政府社會局評定老人服務據點獲頒甲等獎
15.	96 年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評選獲得國家永續社團獎
16.	96 年國家文化總會評選獲得『總統文化獎』—社區總體營造「玉山獎類」
17.	97 年度通過 WHO 國際安全社區組織認證
18.	99~101 年教育部評選頒發執行樂齡資源學習中心全國優等獎
19.	99 年文化部評選為全國「特優社造團體」
20.	99、100、101 年花蓮縣政府頒發藝文推廣有功團體
21.	100 年獲總統頒發獎勵金新臺幣貳拾萬元整
22.	100 年獲行政院環保署徵選擔任花蓮縣「節能減碳」示範營造社區
23.	100 年獲內政部移民署頒發新移民暨大陸配偶照護服務有功團體獎
24.	100 年獲交通部頒發路老師金質團體獎
25.	101 年獲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團體類」花蓮縣地方初選第一名
26.	101、102 年獲行政院環保署評選執行環保小學堂計畫成果發表全國優等獎
27.	101 年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獲行政院環保署認證通過
28.	101 年花蓮縣政府頒發執行照護關懷據點執行績效優等獎

29.	101 年獲花蓮林區管理處頒發推動環境教育貢獻獎
30.	102 年獲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頒發推行社區林業全國績優社區
31.	102 年行政院環保署評選頒發第一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團體類」全國優等獎
32.	102 年行政院環保署評鑑獲得低碳社區認證標章特優獎
33.	103 年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全國優等獎
34.	103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降低人口老化業務團體優等獎
35.	103 年行政院環保署評鑑環保小學堂執行績效全國績優
36.	103 年花蓮縣政府照顧關懷老人據點優等獎
37.	104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執行健康營造計畫績優單位
38.	104 年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環境教育評鑑合格證書
39.	104、105、106、107 年行政院環保署頒發執行環境教育計畫成果發表全國績優單位
40.	105 年花蓮縣政府頒發執行照護關懷據點執行績效優等獎
41.	106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金典之星團體組獎
42.	106 年花蓮縣政府頒發執行新移民學習中心優等獎
43.	106 年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展延認證
44.	10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樂齡優良教案特優
45.	107 年再次獲得國際安全社區認證
46.	107 年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團體組全國特優獎
47.	107 年教育部樂齡學習中心第 4 屆樂齡教育奉獻獎
48.	107 年花蓮教育處新住民學習中心成績優異獎
49.	108 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獲得據點創意服務獎
50.	108 年衛生福利部社區金點獎金點英雄獎游雅帆
51.	10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樂齡優良教案特優
52.	108 年教育部從 DOC 看臺灣應用創作大賽影片食農教育組特優
53.	108 年教育部從 DOC 看臺灣應用創作大賽影片組衣然愛你-創造價值組佳作
54.	108 年花蓮環保局環境教育個人特優獎游雅帆
55.	108 年花蓮縣教育處樂齡學習中心特優獎
56.	109 年教育部樂齡優良課程教案與教材評選特優
57.	109 年花蓮縣政府推動社區治安工作績優單位
58.	109 年衛福部 2020 永續 inPower 社會創新大賞-健康福祉獎
59.	110 年教育部第五屆樂齡教育奉獻獎-教學優良獎
60.	110 年教育部樂齡優良課程教案與教材評選優等獎
61.	111 年教育部樂齡優良課程教案與教材評選-你我有愛、性別無礙特優獎
62.	111 年教育部樂齡優良課程教案與教材評選-木育共學趣、桌遊玩出好人際優等獎
63.	112 年教育部從 DOC 看臺灣數位運用創作大賽-影片組銅牌
64.	112 年教育部第 6 屆樂齡教育奉獻獎之團體組-特優獎
65.	112 年花蓮縣政府推動社區治安工作績優單位

66.	113 年文化部社區營造貢獻獎
67.	113 年度教育部樂齡學習優良課程教案與教材-樂齡中心組特優獎
68.	113 年花蓮縣政府關懷照護據點檢核優等
69.	113 年花蓮縣政府失智照護服務計畫特約服務單位輔導查核特優



附錄二 牛犁女性社區工作實踐與學習歷程

知識建構期、知識專業期以領到證書為依據，無發研習證明書則沒登錄
Labonte and Laverack(2001)對社區能力的定義為；參與(Participation)、領導(leadership)、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問題評估(problem assessment)能力、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的能力、實事求是(asking why)的精神、人際網絡連結(links with other)、與外部資源連結(role of outside agents)、方案管理(program management)能力養成共九個面向的能力。許雅惠(2008)

圖像 姓名	進入 牛犁 前	知識默會期	知識言明期	知識轉移期	識才適用期
小毅	臨時工 家中 主要 經濟 來源	環境維護→ 環保生態→ 產業發展→ 社福照顧→ 人文教育→ 社區安全	2005 台灣省農會木棉花社造 講堂研習 2005 門諾醫院青少年教育訓練 2006 花蓮縣府志願服務研習 2011 教育部樂齡講師完成初 階、進階研習 環境教育研習 文化資產研習 東華大學社工學分 2011 樂齡中心志工暨種子師 資培訓	餐飲丙級證照 產業講師 2007-2010 外籍配偶生活 適應輔導講師 2007-2008 花師附小親子 軟陶創作教師聘書 2009 東華大學頒發數位中 心任教卓越獎 2012 教育部樂齡講師 2012 環境教育種子講師 資源動員的能力→人際網 絡連結→外部資源連結	1.文史 館館長 2.餐點 負責 3.出納
AN-LIU	清潔工 家中 主要 經濟 來源	環境維護→ 環保生態→ 安全社區社 →福照顧→ 人文教育→ 產業發展	2007 林務局社區景觀維護研 習 2007 衛生局健康城市研習 2010 花蓮縣府教育服務訓練 研習 2006-2012 文化資產研習 2011 環境教育研習	2009 東華大學頒發數位中 心任教卓越獎 2012 環境教育種講師 2010 健康促進種子講師 實事求是的精神→人際網 絡連結→外部資源連結	1.文化 資源普 查專職 人員
嫻子	青果 社員 工 家中 次要 經濟 來源 之一	環保生態→ 社福照顧→ 人文教育→ 社區安全→ 產業發展→ 景觀維護	2006 社區推動清淨家園專業 訓練班 2006 東區照顧據點研習 2006 台灣社區安全研討會 2006-2012 文化資產研習 東華大學修社工學分 14 學分 慈濟大學修社工學分 3 學分 2010 教育處志工教育訓練 2011 教育部樂齡講師完成初	2006-2010 外籍配偶生活 適應輔導講師 2007 國立台東社會教育館 頒發教育熱心負責功效卓 著 2009 東華大學頒發數位中 心任教卓越獎 2011 年交通部老人交通安 全教育金質獎路老師	1.高齡 者業務 負責 (壽豐 鄉)居 家服 務、課 程安 排、高

			階、進階研習 2011 樂齡自主學習團體領導人研習 2011 第五屆園藝療法國際研討會 2011 年交通部老人交通安全教育教材推廣研習 2012 台灣社工專協東區社工論壇	2011 台灣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學會頒發感謝狀 產業講師 2011 樂齡講師資格 環保優良志工 問題評估能力→資源動員的能力→實事求是的精神 →人際網絡連結→外部資源連結→方案管理能力→領導人物的養成	齡者夥伴建立、失智、身障等業務 2.祥和志工業務
葉子姐	保姆 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產業發展→ 社福照顧→ 人文教育→ 社區安全→ 環保生態→ 景觀維護	2005 台灣省農會木棉花社造講堂研習 2005 門諾醫院青少年教育訓練 2006 花蓮縣府志願服務研習 2006 花蓮縣府工作幹部研習 2006-2012 文化資產研習 2008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研習 2010 花蓮縣府教育服務訓練研習 2009 移民署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種子網絡研習 2011 第五屆園藝療法國際研討會 2012 台灣社工專協東區社工論壇 東華大學社工學分班 3 學分	產業講師 2007-2013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講師 2010-2013 小學多元文化講師 2012 豐山國小飲食文化鄉土教學講師 2011-2013 環境教育種子講師 實事求是的精神→方案管理的能力→問題評估能力→資源動員的能力→領導人物養成→人際網絡連結	1.總務 2.移民姐妹業務負責(花蓮縣)居家訪視、課程、轉介、通報業務
小默	小吃店、代課老師 家中次要經濟來源	人文教育→ 產業發展→ 社福照顧→ 社區安全→ 環保生態→ 景觀維護	2005 台灣省農會木棉花社造講堂研習 2005 門諾醫院青少年教育訓練 2006 花蓮縣府志願服務研習 2006 社區照顧據點研習 2008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研習 2011 海棠文教基金會方案管理主管班研習	產業講師 2010-2013 小學多元文化講師 2012 豐山國小飲食文化鄉土教學講師 2011-2013 環境教育種子講師 2006-2013 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講師 2012 台灣社區安全推廣中	1.會計 2.人事安排 3.產業經理 4.社工員

			2011 第五屆園藝療法國際研討會 研究所學分 9 社工學分 15	心頒發感謝狀 →外部資源連結→方案管理能力→實事求是的精神 →領導人物的養成→問題評估能力	
由子	小吃店 家中次要經濟來源	社福照顧→ 產業發展→ 人文教育→ 社區安全→ 環境維護→ 環保生態	2000 壽豐鄉衛生所健康營造研習 2001 東華大學師培所後山老師真好系列訓練 2001 花東縱管處導覽解說訓練研習 2002 東華大學師培所種子教師培訓研習 2004 行政院青輔會服務學習探索研習 2005 台灣省農會木棉花社造講堂研習 2005 門諾醫院青少年教育訓練 2006 台灣安全社區研討會 2006-2012 文化資產研習 2006 台灣安全社區東區研習 2006 社區推動清淨家園專業訓練班 2006 花蓮縣府工作幹部研習 2006 花蓮縣府志願服務研習 2006 台灣安全社區計畫種子研習 2007 文化資產保存經理人研習 2008 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協會研討會「2008 台日小規模多機能照顧服務實務研討會」 2008 台灣社造聯盟社造領袖學院結業 2008 花蓮縣社區照顧據點督導員訓練 2008 台灣社會發展研究協會研討會「2008 健康照顧與社	2001 豐山國小軟陶初級班教師 2006-2008 花師附小親子軟陶創作教師聘書產業講師 94 水保局『加強水土保持局鄉村培訓計畫』社區文化產業老師 2007-2013 花蓮縣社會處關懷據點輔導人員 2010 原住民社會工作人員在職訓練講師 2010 亞洲大學社工實習督導 2010 嘉南大學實習督導 2011-2013 東華大學原住民家婦中心暨日間關懷站輔導諮詢委員 2011 年交通部老人交通安全金質獎路老師 2010-2013 次濟大學社工實習督導 2011-2013 東華大學社工實習督導 2011-2012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花蓮分局雇工購料及體驗活動管理計畫」審查委員 2010-2012 花蓮縣水保分局農村文化資產講師 2011 擔任慈濟技術學院「長者健康促進社區部落種子	1.執行 秘書 2.社福 業務督 導 3.壽豐 樂齡中 心主任 4.花蓮 新移民 中心主 任

		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 移民署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種子網絡研習 2011 海棠文教基金會方案管理主管班研習 2011 年交通部老人交通安全教育教材推廣研習 2011 台灣安全社區輔導人員研習 2012 台灣社工專協東區社工論壇 2012 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環教育研習 東華大學社工學分 30 學分 慈濟大學社工學分 9 學分 2009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專班	2012 樂齡專案管理人員資格暨黃金種子講師 2013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領導人物的養成→方案管理能力→資源動員的能力→問題評估能力→實事求是的精神→外部資源連結→組織結構的健全能力	
--	--	--	--	--



附錄三 2006 年~2009 年每週午餐會報（佐證資料）

	00 周 ● 這週有去瞭解各部門所做，關於傷害防制方案的活動，以下分別列舉： 1. 消防隊：消防宣導。2.偵察隊：校園安全宣導。3.家暴中心：寒暑假的婦女防身術課程。4.保安隊：壽豐鄉已有六隊巡守隊。 ● 這週有到壽豐鄉戶政事務所去抄寫 93、94、95 年的死亡原因統計，一同幫忙的成員有雅帆、理政、凡萱、牧晨根據資料顯示，死因排行榜上最高的是「壽終正寢」，其次是「癌症」，排名第三的是「車禍」，給大家做為參考。 下週（8/19）有一場東區安全社區研習課程，要聯繫各公部門，以及各村的登錄人員。
95 年 8 月 1 日 12 點 ～ 13 點 午餐會報 資料：	00 霖 上週三開完會的時候，有跟美玲姐（美玲姐是講師）去福興社區參加水保局的課程，在會中認識了幾位米棧社區的工作伙伴。比較常接觸的社區聯絡人的通訊錄已經完成了，如果有要加的話會陸續登錄。 協助樹湖愛鄉協進會的信義房屋計畫已經在上週順利完成。下週要安排八月月份的社區家族聯誼（製作流程表，協調大興社區去辦理），這次要舉辦的社區是大興社區，這次的家族聯誼會和社造中心的第一次座談會聯合舉辦。 社造聯盟的暫時繳費收據已經寄過來了，會在家族聯誼會議的時候交給參與社造聯盟的會員。 社造中心要做一份全花蓮縣社區一些基本資料的普查，這份資料除了文化局的社區資料外，還包含了林務局、水保局、環保局、社會局等各單位輔導的社區名單，下週我會打電話一一確認。 關於工讀生實習生的工作安排方面： 1. 輔中這週主要工作是導覽手冊的製作。 2. 靜怡這週早上支援文史館，下午與牧晨去協調辦活動的事宜。 3. 理政最近就支援美琴姐 19 號掃街的流程安排。 牧晨這週早上還是在邱大哥的工班幫忙，下午與靜怡籌辦活動。
96 年 07 月 27 日 12 點～ 13 點午 餐會報資 料：	00 丹 夏天真的很熱，所以做豐裡村的普查好像腳步很慢，雖然普查工作還是一樣進行，可是感覺就好像很慢，不是故意在拖延，實在是沒辦法，太熱了。 豐裡村的狗更兇，太可怕了，要小心一點。 文史館的經營就要麻煩靜怡，謝謝年輕人，都很優秀。 7 月 31 日溪口村的林山勝阿公生日，請各位伙伴下午 5 點半到他家慶生。 00 周 我們去拜訪豐裡村，就像月丹講的一樣，進度比較慢。 禮拜二有參加在豐山社區活動中心舉辦的社區治安會議，會中有放許多影片，其中一段是說明一些比較新式的詐騙手法，跟大家報告一下，這些詐騙手法都是利用人性的缺點，比如說有人在用提款卡提款的時候，歹徒有兩個人，一個站你後面看密碼，另一個會跟你說：「耶，你錢掉下去了。」一般我們的反應是會馬上蹲下去撿錢，結果就忽略了提款卡，歹徒就趕快把提款卡換掉，遇到這樣的狀況要很小心，大家要注意一下。 最近我和衛生所的芳玲去拜訪參加保命防跌居家安全的老人家，拜訪的重點在老人家的衛浴設備及居家周邊的環境。一般而言，因為芳玲代表的是衛生所，我發現像這種比較隱密性的拜訪，大家會比較願意開門讓他們進去看，如果現在換成牛犁要去拜訪人家的房間，可能會有點困難。經過觀察，我們這邊的居家安全問題都還好，除了浴室有些地方要注意一點。

97 年 06 月 03 日 (一) 12:00~ 13:00 午餐會報 資料	00 諭 老人餐多一位陳曾嫌陳媽媽開始午晚餐都要送，易*從 5/31 至 6/5 停止送餐。 ◎、老校長的家環境維護打掃及苗圃除草工作。 ◎、星期六負責煮餐，下午負責碧蓮寺老人館量血壓活動。 ◎、謝孫春妹從 6/3 開始停止送餐，直到通知恢復為止。 小默 上週工作是整理及填寫 96 年度結算申報，昨天已經請玉梅和黑熊把申報表送到國稅局了。 ◎、6/4 宜昌國中一日遊，導覽部份由玉梅負責，午餐部分由美琴和瑋諭負責，共 36 人，DIY 部分是由阿丹姐、玉梅及美琴負責。 ◎、6/6 阿豪跟豐霖要去上資訊科技運用資料庫的課程。 ◎、6/14 信義房屋 20 人 DIY 隨手袋，時間是 13~16，由阿丹姐和秋燕負責。 ◎、6/14 玉里鎮公所早上要環保觀摩，由楊大哥負責。 ◎、6/14 花蓮縱谷之旅文蘭部落戶外教學由阿豪負責。 ◎、6/14 北投社區晚上到富麗漁村，需要派人與他們分享。 ◎、6/15 北投社區參訪，時間 10:00 至 12:00，由玉梅負責導覽的工作，午餐準備由阿丹姐和瑋諭負責。
98 年 05 月 14 日 12:00 ~13:00 午餐會報 資料	小毅 1.外配延續國語識字班一直都在進行，有二位講師(勁瑤、麗琪)。 2.現在新開的一個是外配機車考照班，5/11 已開始上課，如果你們有認識外配還沒有駕照，可以請她們來上課。我們也請了二位講師(玉梅、裕媚)。 00 英 客委會延續方案：1.豐山+豐裡村共訪問 527 戶。成功訪問 415 戶拒絕戶數 17 戶。無人居住或長期不在家 95 戶 2.深入訪談 41 位 3.第二次期中報告已在星期一寄出。4.第二次期中簡報請勁瑤協助。5.這週陪同莊心宜同學拜訪陳薇蓉家，研究客家飲食在花東地區的發展，期望對客委會的案子有幫助。 00 彰 夏季工作時間調整：早上 6:30、中午 13:30 上班 豐山村：1.中山路拓寬、生態公園、斷根移植景觀木 2.綠色生命教育園區工作進度達 80%3.豐山國小鳥屋製作 4.溼地保育區，忠孝街景觀木，生態公園除草環整。花蓮農校林地、水利局用地二地，正在規劃設計工作。 豐裡村：民族街、碧蓮寺、豐正路一、二段、林業館及文史館。 豐坪村：森活公園、東坪東興街、肯納園道路環整、除草。

附錄四 豐田防災手冊

目錄

1. 豐田
2. 豐田三村概況
3. 緊急防災準備
4. 居家環境檢測
5. 如何避難
6. 急救處理
7. 家中寵物
8. 其他資訊

豐田會

豐田防災手冊

前言

豐田三村自1913年建村，為三大宅眷移民之一。建村前，鄰近花蓮溪，又因附近溪流匯入，地形低窪易淹水。過去的考古調查中也發現豐田地區過去數百年到數千年前，可能都會是花蓮溪的河道。

因為地形，使得豐田在最初的建村過程中，不斷遷徙多次。直到1916年，總督府在今日漢口一帶，近空亞干溪畔建造堤防、1917年再次修繕，才使得豐田地區每年免受因空亞干溪漲潮，淹水至豐田一帶的困境。過去滿溪流經之處，也使得豐田地區的土地多過去河床的砂卵石堆積，造成早期農人們開闢農田的困難。

前言

自1945年，日本戰敗後，1946年豐田陸續迎來台灣人居住於村內，並尊禮寺（原豐田神社）為村內大廟，主祀鑾姆如來佛與釋迦摩尼佛。直至今日開村造百年又十二載，三村戶籍設於此地者共計1,922戶4,383人。

● 豐山村900戶2,039人，男性1,092人、女性947人。——村長梁德仁
● 豐裡村608戶1,377人，男性750人、女性627人。——村長羅瑞宇
● 豐坪村414戶967人，男性517人、女性450人。——村長游源盛

2025年06月

豐山村概況

豐山村日本時代舊稱「山下」，由於其地處山麓，主要產業為農業，加之鄰近中央山脈，豐山村地區的水產、土石流等問題，較豐田其他兩村更為嚴重。

其中包含中興街一路往山邊路之山區，為山崩地滑高危險區。豐里街往西、魚樟路往北之地區，以及中興街與黃岡路往北九線之路、忠孝亭等路段，都屬易淹水路段。

居住於山邊路的民衆，應注意暴雨以上特報發布時，是否有需要暫時避往親友家中；易淹水路段之居民，則應注意大雨陣雨特報發布時，準備沙包、擋水板，避免財物及人身受損。

豐坪村概況

豐坪村舊稱「太平」，因1917年初建堤防、1960年代遷移豐田大廟，將空亞干溪與花蓮溪水隔絕於外。堤防變遷至日月潭、松家橋下，使得豐坪村多數地區除非堤防潰決，不然難以有水災發生。其中，開發處（豐坪路三段）的漁場地區，仍因上游水流匯集，使得該處成為易淹水區域。

除此外，豐坪地區因為地勢平坦，颱風發生時，常有樹倒街塌、斷溝以致難以通行的情況。

其餘應注意事項

● 雨量達豪雨等級，居民應避免行走豐田火車站前滿洲，改走豐正路。
● 雨量達超大豪雨等級，需警惕地區也可能淹水嚴重。豐田地區居民若需緊急逃離，改走豐正路前往台11丙橋，再由台11丙橋前往前往花蓮市附設急診醫院。
● 2024年0403地震由頓頂新居引起，該新屋位於豐田至豐一帶來花園溪下，應隨時注意日常防護措施。
● 豐田三村未有「防空洞」，遇空襲時應尋找水泥建築，以「越隱匿、越堅固」為原則，躲避期間可**利用桌腳或櫃底躲避，切勿靠近玻璃窗、玻璃門、玻璃牆**，避免爆炸飛窗傷人。

名詞說明

等級	雨量	警覺事項
大雨	80mm/24小時 40mm/1小時	● 山區地帶：山崩、土石流、崩塌、落石。 ● 平地：排水系統或低窪區易淹水。 ● 山區：樹木傾斜、倒塌、電桿、電線受損。
豪雨	200mm/24小時 100mm/3小時	● 山區：山崩、山崩、落石、土石流、崩塌、落石、土石流、崩塌、落石。 ● 平地：排水系統或低窪區易淹水。 ● 山區：樹木傾斜、倒塌、電桿、電線受損。
特大豪雨	350mm/24小時 200mm/3小時	● 山區：山崩、山崩、落石、土石流、崩塌、落石、土石流、崩塌、落石。 ● 平地：排水系統或低窪區易淹水。 ● 山區：樹木傾斜、倒塌、電桿、電線受損。
超大大豪雨	500mm/24小時	● 山區：山崩、山崩、落石、土石流、崩塌、落石、土石流、崩塌、落石。 ● 平地：排水系統或低窪區易淹水。 ● 山區：樹木傾斜、倒塌、電桿、電線受損。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緊急防災準備

☐長期保存且可即食之食物
☐飲用水與生活用水
☐個人藥品
☐急救箱
☐現金與身分證件影本
☐手電筒、電池，或可供電、光產品
☐卡式爐（與瓦斯罐）
☐保暖用品
☐保暖用具
☐後背包或拉推車

附錄五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服務學習課程

實踐可持續生活的掙扎：大中華社群的實踐經驗

(課程簡介2025)

課程目標：

- ❖ 提高學生對可持續生活(sustainable livelihood) 的認識及其與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
- ❖ 促進學生了解大中華地區農村/鄉郊居民在實踐可持續社區生活的經驗及面對的挑戰
- ❖ 透過參與香港及外地社區服務，增加學生對不同生活方式的認識及加強人際溝通的能力
- ❖ 在服務學習過程中，鼓勵學生成為積極參與者及負責任的社會公民
- ❖ 鼓勵學生反思在大學所接受的專業訓練，如何幫助建立一個更可持續、多元化的生活模式

學習形式	時期	內容
(一) 簡介及教學講座 關於可持續生活的理論及分享講座	2025年1月15日	簡介會-介紹服務學習主題及安排-舊生分享
2025年2月	服務學習網上課	
2025年3月12及3月19日	認識另類社會發展(alternat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及可持續生活 簡介關於社會發展和可持續社區的概念和理論，探討在全球化時代下，城鄉基層階級被邊緣化的原因及影響 社會排斥及可持續生活模式 進一步研究「貧困陷阱」(poverty trap)這種社會排斥的情況、其相關結構和機制如何產生二元的社會發展。討論社會不可持續生活的成因及問題-是個人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時間性的還是結構性的？造成城鄉貧困/困難的社會機制是什麼？當中與學生個人生活模式的關係？	
2025年3月26日	-海外非政府機構(NGO)於網上(ZOOM)進行組織及服務的介紹、進行即時問答環節-進行社會情境遊戲/活動	
(二) 反思性的研討會 (reflective seminar)	2025年4月初及中	可持續生活的個案討論(小組討論及簡報) 1. 不可持續發展的案例探討2實現另類發展和可持續生活的案例探討

